版本目録學論叢（一）

昌彼得著

學海出版社印行

版本目錄學論叢（一）

昌彼得著

學海出版社印行

版本目錄學論叢第一輯

目次

談善本書

我們在目錄書中常常見到，或是聽到「善本」這個名詞，但究竟什麼樣的書才能稱爲善本？一般青年學子對其概念還很模糊。「善本」、顧名思義，是指美好的書本，但怎樣才算美好呢？要了解這一名詞的含義，須先清楚它的意義在歷史上的演變。「善本」這個名詞的起源並不太古、它是在印刷術發明並普及以後，大約在北宋時期才出現的。北宋末年有一位學者葉夢得（石林）在所著石林燕語卷八中說：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書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

另外南宋初期有一學者叫朱弁的，他在曲洧舊聞卷四云：

「宋次道（敏永）家藏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蓄書，以次道家爲善本」。

這兩個例子說明凡是經過審慎校勘的書本可以稱爲善本。這是宋代所謂善本的定義之一。

朱弁曲洧舊聞卷四又云：

穆修在本朝初爲好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欲二家集行於世，乃自鏤版，鬻於相國寺。

穆修根據唐代的本子將韓柳集雕印出版，對古文的提倡有很大的貢獻。又高宗翰墨志云：「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這兩個例子說明了晉唐的古本可以稱爲善本，這是宋代所謂善本的定義之二。

洪邁容齋四筆卷十，東坡題潭州帖云：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鐫，最爲善本。

又現在通行的通鑑紀事本末前有元陳良弼的序文，他說：

趙與篙以爲嚴陵（刻本）字小且訛，於是精加讎校，易爲大字，成爲天下之善本。

這兩個例子是把近代所校刻很精的本子也稱爲善本。這是所謂善本的定義之三。

另外宋紹興年間，有一位名叫董弅的，他跋世說新語：說「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者釐爲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載。余家舊藏，蓋得自王原叔（洙）家，始得晏元獻（殊）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裁，最爲善本」。現在通行的世說，即自晏殊校本出

，與敦煌所出唐代寫本頗有差異。這是以經過精校而無重複且注文精當的本子稱為善本。又在宋會要稿第五十五冊中有一段資料云：

宣和七年四月九日，提舉秘書省言：取索到王闕、張宿等家藏書，與三館秘閣現管帳目比對到所無書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秘書省官校勘，幷係善本」。

這是以流傳稀少的書稱為善本。

由以上所舉我們可以歸納宋朝人對善本書所下的定義，凡是經過精校的，及精刻的，精注的，流傳稀少的，或舊本等五類書本皆可稱為善本。此一定義，元明兩朝一直沿用。清光緒初張之洞在所著的輶軒語語學篇中論善本書說：「善本非紙白版新之謂，謂其為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不譌不缺之本也」。於是他對善本書下了三個定義：

一、足本——沒有缺卷，未經刪削的本子。

二、精本——凡精校的，精注的書皆屬之。

三、舊本——凡舊刻，舊抄皆是。

他的這三點意見實際是從宋朝以來所謂的善本歸納裡來的。而他所說的善本，也就是一般讀書人所稱的善本。

惟是我國自明末清初以後，一般人所認為的善本書，其意義與前面所述的略有差異，藏書家所稱的善本，完全視書本是否古舊而定。凡是舊刻，舊抄的，因為存世較少，他們認為應該特別予以珍藏，妥為保存。有些書雖然校刻的很精，編注的很好，但若是通行的本子，藏書家就不將它列入善本書中，故藏書家所謂的善本，實是指的珍本書而言，與讀書人的觀點不同。

中國雕版印刷起源甚早，約在七世紀末，至遲八世紀初就已發明了。到了宋代，印刷術已相當的進步並普及，雕版印書也流傳甚廣，然而元明兩代的藏書家，初並未特別重視宋版書之被認為可貴是始於明中葉以後。當時有些學者對通行的一些書讀起來發生疑問，於是尋覓舊本來作校勘訂正，因此宋版書成為藏書家蒐訪的對象，覆刻宋元本書成為風氣，宋元舊本乃大受重視。茲舉一個故事來說明。據清吳翌鳳遜志堂雜鈔記載：

嘉靖中，有朱吉士大韶者，性好藏書，尤愛宋時鏤板。訪得吳門故家藏有宋槧袁宏後漢紀，係陸放翁、劉須溪、謝疊山三先生手評，飾以古錦玉籤。遂以一美婢易之，蓋非此不能得也。婢臨行題詩於壁曰：「無端割愛出深閨，猶勝前人換馬時，他日相逢莫惆悵，春風吹盡道旁枝」。吉士見詩惋惜，未幾捐館。

像這種以人來交換書，真是佞宋之癖，入於膏肓。又譬如明隆萬間的一位大史學家王世貞（弇州

），為了要得到一部宋版漢書，不惜出售在太倉的一座田莊才購得。可以想見當時珍重宋版書風氣之一斑。到了明清之際，像毛晉、錢謙益、季振宜等人，皆極力蒐求宋元版。此一時期雖然大家重視宋元版，但他們並未只以宋元版為善本，只是特別珍貴而已。在這種風氣影響下，到了清代中期，蘇州的黃丕烈、海寧的吳騫，一個以收藏宋版豐富炫耀，一個以集藏元刻多未標榜，百宋千元，傳為書林的佳話。但在此時期，也還沒有認為除了宋元版以外就無善本。就是到了光緒初年，歸安的陸心源，將家中的許多宋元版及一些名家手抄或批校的書貯放在皕宋樓，明以後的刻本則藏在守先閣，但以舊本與非舊本書分置，也並未以善本與普通對稱。

專將舊本視作善本的，是開始於清末杭州的藏書家丁丙、丁申兄弟。他們於光緒十四年在嘉惠堂內闢了一間屋子署名善本書室，專放置舊本書，廿七年並編印了一部目錄——善本書室藏書志，善本之名，自是始專歸之舊本書。稍後，宣統年間繆荃孫編印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善本之名，遂為後來藏書家所沿用。所指者，卽張之洞所言的舊本而已，足本、精本皆未包括在內。故今日一般習稱的善本僅是指的珍本，並非學者所認為的善本，已失去了它原來的意義了。至於舊的標準如何？這亦隨時代而異。明清之際大家所搜訪的，偏重宋元版，以宋元版本為舊。清乾隆年于敏中、及嘉慶初彭元瑞先後奉勅編輯天祿琳琅書目及續編，所著錄的，除了宋元版以外，將

明朝精刻或覆宋刻本書也酌歸入舊本。這一標準，為後來藏書家所沿用，大抵以明代初年以前刻本為舊。至清末，標準又略降低，丁丙善本書室中所貯，除了宋元及明嘉靖以前刻本外，萬曆以後的刻本傳世較稀少的，亦歸入善本之列。所以他出版的善本書室藏書志編輯略例說明著錄的標準有四：一、舊刻，指宋元古本；二、精本，指明嘉靖以前刻本及萬曆以後罕見的版本；三、舊抄，指明及近代影抄精本；四、舊校，指名家批校本。這一善本的標準，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民國廿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的善本書目卽依照此標準。並又編印善本書目乙編，以著錄明萬曆以後的刻本及清初所刻而較罕的版本。卅六年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出版的書目，在書名下分別注明甲或乙或不注，注甲字者是依丁丙的善本標準，注乙字者則與北平圖書館善目乙編的標準略同，不注者是普通本。四十五年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的善本書目亦沿其例分成甲乙丙編。到了五十七年，台灣所出版的各大圖書館藏善本聯合目錄所採的標準又降低了一些，不再分為甲乙，凡是明亡一六四四年以前的刻本皆列入善本，再加上清初所刻而傳世較少的版本。蓋舊本書傳世日漸稀少的緣故，不得不特別予以珍藏。所以俗謂的善本也者，在實質上只是傳世較少的珍本，也就是一般收藏家所說的舊本。但在我們做學問的人應該將範圍看廣一點，應以張文襄所說的舊本、足本、精校精注本作為衡量善本的標準才是。

舊本書既為藏書家所珍貴，那麼舊本書到底有什麼價值呢？收藏家之所以特別寶貴與重視舊本書，也並非完全將舊本書視作古董，而是因為它確具有學術上的價值。清道光年間，洪亮吉的北江詩話將當時的藏書家分成考訂、校讐、收藏、賞鑑、掠販五等。其中的賞鑑、掠販兩家中，固然或有將宋元版視作古董的，至於考訂、校讐、收藏三家，則是以所藏的善本作學術的研究，或蒐集文獻以供他人來作研究。

我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圖書的歷史悠久，就是從印刷術發明到現在也有一千二百多年了。古籍經過了若干次的繙刻，而因校刻的人的學識高下而有優劣之分，倘若讀者不選擇善本，往往可能發生關係重大的影響。現在我講兩則故事，作為例子來說明：一、宋朱彧萍州可談中記載、在北宋哲宗元祐年間，杭州府學有位教授姚祐先生，某次考試生徒的易經，出題：「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參加考試的學生見到試題後，相覷詫然，無從措筆。因為易經的原文是「乾為金、坤為釜」，國子監刻本不作坤為金，於是有生徒懷著監本，上前請教教官，是否依據福建麻沙刻本而有錯誤？蓋監本不如此。姚祐檢核了監本及所讀的周易，果然是自己的麻沙本刻錯了，將釜字上面漏了兩點，變成了金字，而鬧了一場大笑話，遂坦承錯誤認罰改題而止。二、明正德嘉靖間陸深金臺紀聞記載，明代初年金華有一位名醫戴原禮，嘗因事去南京，寓住旅

邸，見對過有一醫生診所，每日前往求診的病人很多，心想一定是一位神醫，遂去其門前察看，見其所處方，並無什麼特異之處。一天，偶見有一位病人拿著藥方已走出門外，那醫生匆匆追出來，告訴病家，煎藥時要放錫一塊作為引。原禮在旁聽了，甚感奇怪，從來聞有以錫作引的藥方，遂上前請教醫生。醫生說：這是依據古方。原禮要求一閱原書，原來是餳字之誤，餳卽是糖。醫生藏本將食旁誤刻成金旁，易字又少了一筆，乃變成了錫。於是告訴他急為改正。由於醫生不講求版本，沿用不好的本子開方，幾乎要釀成人命。可見雖是一個字的誤錯，其影響也可能是很大的。

以上所講的是古代的事例，我再談一個現代的例子。諸位可能還記得，在民國五十五年臺北市高中聯考國文時，有一道改錯題，由於所引據的本子不同，發生了所謂蓬篷之爭，而一時喧騰報端。此題是出自唐李白的別友人詩：「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來改其中的錯字。標準答案應將蓬字改成竹頭篷字，因而引起了以草蓬字不誤未改的學生家長們之不滿，紛紛投書報紙指摘。當時國立編譯館公開答覆說：根據明嘉靖年間吳郡郭雲鵬覆宋刻善本（卽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本），應作竹頭「篷」字。姑不說「孤蓬」一詞，在文選中屢見不鮮，喻作小草。就從版本來談，他們的依據也未盡當。郭氏刻本並非覆刻宋本，也並不是真正的善本

。宋楊齊賢注、元蕭士贇補注的李太白詩現在存世最早也最善的版本，是元至大間余氏勤有堂刻本，其次有明正德間安正書堂刻本，都作蓬字，不作篷字。編譯館不去查考較早的版本，而但依據未必佳的嘉靖本，致引起軒然大波。所以我們讀書做學問，應當特別注意版本，才能避免製造笑話，宋黃朝英著的靖康緗素雜記，在卷十中記載說：

韓愈之子名昶，嘗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與？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為銀字（按金根、車名，殷名乘根，秦改曰金根。金根者，以金為飾）。

韓昶不懂古代制度，乃有亂改古書的毛病。所以我們讀書時，如發生了疑問，不妨從版本方面來探究，也許可以獲得解決。近代西洋學者研究中國學問，如遭逢問題時，往往從版本方面來研究而找到了解答。

講求版本，並不一定是說舊本都是善本，沒有錯誤的。清初有一位校勘名家陸勅先（貽典）曾說：「古今書籍，宋版不必盡是，時刻未必盡非。然較是非以為常，則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時刻之是者無六七」。真是可謂經驗之談。是前人也並不一定偏重宋版，不過舊本書中的確有它的佳善之處。清中葉以後有許多校勘學家做了不少的校勘工作，像盧文弨的群書拾補卅八卷，蔣光

煦的斠補隅錄廿四卷，陸心源的群書校補四十卷，用他們所蒐得的舊本來校勘當時通行本，將傳本脫漏謬誤的地方，一一校出記錄下來，對讀書人有很大的貢獻。

為什麼我國獨獨會有版本的問題發生呢？我們要清楚這個問題，必須先要明瞭版本的意義。在紙未發明以前，古人利用竹或木削成狹長片來寫書，單指一根稱為簡，將若干根簡編連起來稱作一册或一篇。除了簡册以外，另有一種寫字的工具名為方或版的，其形制據古書的記載，是以木製成的長方形板，上面大約可以書寫五至九行，一百字以內。「版」本來是古代圖書形制之一種，主要供官府記錄錢糧土地戶籍。到後來紙發明了，而廢用竹木，「版」字則在歷史上消失了一段時期。唐代發明了雕板印刷，由於雕板的板與古代的方版形狀相似，所以沿用舊稱，將雕板稱為「版」。「本」字，根據說文解字曰：「木下曰本，從丅」。即樹木的根，為根本之意。譬如別錄云：「讎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書」。劉向校書，盡取中外所藏的書本。顏氏家訓書證篇中常引江南書本，以別於江北的書本。都是說明各書的本根來源。「版」是橫的，有時間地域的區別，譬如宋版、元版、明版、杭刻、蜀刻、閩刻等，可稱為緯。「本」則是縱的，是經，沒有時代地區性。「版」雖有不同，其「本」則可能是相同的，譬如宋版書及後代覆刻或影印該宋版，版雖不同，其本則不殊。版本學就是研究圖書的這種經緯縱橫關係，它所包含的範圍較廣，並

非單指雕板，就是手抄本、批校本，也都在版本學研究的範圍之內。

中國版本學之所以會產生，乃是因為印刷的歷史久長，歷代雕印書的人的學識有高下，以及其刻書的目的有所不同，於是印刷的書本也就有了優劣。在宋朝時，印刷術已是非常的發達，當時雕印的中心地區有三：

一、以杭州為中心的浙江地區，即所謂的浙刻本。

二、以眉山為中心的成都地區，即所謂的蜀刻本。

三、以建陽建安為中心的福建地區，即所謂的閩刻本。

在這三個出版業中心，以杭州所刻最為著名。兩宋國子監及江南地區的官刻，絕大部分是在杭州雕板的，故杭州校勘寫雕印刷的專業人才較多，所出版的書亦最精。四川刻書也相當的不錯，此地自唐以來，印刷業即甚為發達，而且文化水準相當高，故所刻之書也很精美。建陽建安則為福建書坊薈萃的地方，著名的麻沙書坊即在建陽縣境，出版最多。不過書坊以贏利為目的，故所刻較遜。宋代杭州刻書多是請書法名手來繕寫上版，用棗或梨樹木版來雕鐫。棗梨木料堅實耐久，可以保存繼續刷印達幾百年。其所有印刷的紙大都以桑麻為主要原料造成。桑皮紙甚為厚實，具有韌性，國子監刻書多用此種紙刷印。麻紙雖較薄，但韌性也不錯。四川印書除了用麻紙外，另

也有用籐皮纖維為主要原料造成的籐紙。上述的幾種紙皆可以耐久，不容易磨損脆裂。至於福建刻書因為多出自書坊，以圖利為主，為了使銷行廣，必須售價廉，故力求減低成本，選用廉價的材料。譬如以榕樹木代替棗梨來雕版，榕樹，福建生產甚多，故價廉。而且其木料質粗鬆，易於施刀，自然也就省工了。在用紙方面則多以竹製的紙，竹紙價低，但其缺點為無韌性，放久後，易於脆裂。所以福建雕印的書，在品質上雖遠不及杭蜀兩地刻本，惟因售價低，銷行反而較廣，遍及全國。

此外，在校勘方面，閩版也沒有浙本蜀本矜慎。我國雕版印書的過程，是先寫樣本，經過校勘，然後請書家繕寫在薄紙上，再經過校勘，如無錯誤，則反貼到木板上，由雕刻工刊雕，雕竣，初用朱色刷印數部，再送請校勘，蓋恐怕雕字工人將原來的字劃雕錯了，無誤後，才正式印刷裝訂成書。杭蜀二地刻書校勘審慎，經過多次的校勘，故錯字較少。福建刻書為了省工，校勘的次數少，而且比較馬虎，故缺筆漏字的情形較多。像前面所講到「乾為金、坤又為金」一類的笑話，在宋人筆記中屢見不鮮，批評也最多。然而閩本售價低，流傳反而較廣。現今傳世的宋版書，閩版書幾乎佔了一大半。到了明代，情形又有改變，在書賈方面，尚大抵一如往昔，偷工減料，據嘉隆閩郎瑛七修類稿中記載說：福建的書坊如果發現某一書的銷路好，馬上僱工予以翻刻。

為了搶時間、搶生意，往往將原書中的篇第暗中刪減，使人不覺。造成了卷數雖相同而內容卻有很大的差異。然而因為便宜，一部書只售半部的價錢，而為人所爭購。這尚只是造成版本異同的原因之一，而明代末季的人還有一個更壞的習慣，喜歡改纂書。王陽明的致良知之說，講求頓悟，本來並不錯。但是經過再傳以後，其末流流入狂禪學派，讀書不求解，只要閉室面壁幾天，自謂道理想通，可以一以貫之，卽自以為是聖人。這類人校刻古籍，遇有不能通解之處，卽予以纂改，以使符合自己的意思，正好像唐代韓昶改金根車為金銀車的情形一樣。所以清人常說：「明人刻書而書亡」。這句話並不是說明朝人刻其書後，該書沒有了，而是該書失去了它本來的面目，等於原書亡了一樣。清代樸學之所以興起，正是明末學風所激促成的。清人崇漢學，講名物訓詁，特重校勘學，蒐求宋元版，都是因明末之任意纂改古籍所造成。另外還有一種書因版本不同而內容發生差異的原因，則是屬於政治型，有意的改纂。清乾隆中纂修四庫全書就是一個實例。清高宗為了消弭民間反清復明的思想，假修書徵書之名，達到焚禁圖書之實。遇有流傳已久的書而無法禁毀，則將其中他認為有違礙的內容，加以纂改。不僅對明朝人的著作如此，宋人書中凡有不利於金人的記載，也予以刪改。我再舉一個例子：南宋莊綽寫了一部書名雞肋編，其中原有一「孔子宅，敘述金兵南侵時，經過山東曲阜孔子的老家。指著孔子宅大罵，說：這就是曾說「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的人，於是放火焚毀孔子老家，文中記載金兵的暴行甚黠。修四庫時，大概因此篇文字無法部份纂改，於是將全篇刪去，而另杜撰一篇敘述孔子世系的文章以補其位。所幸此書元人抄本還存世，可使我們得睹其書的原貌。至於對明人的著作，因涉及清開國的歷史，刪改的更多。就是清人本身修纂的史書，也因時代的不同，遞有纂改。譬如現在通行的清實錄，其中清開國及初期的幾朝，是乾隆朝纂修頒行的。假如拿故宮所藏清順治年間初纂的太祖、太宗兩朝實錄來校勘，內容就有很大的差異，若干史實的真象，重纂時予以隱沒了，所以我們做研究利用某書資料時，首先應當將該書的版本源流約略了解，才能靈活的運用。做研究工作的人，倘若具備有一些版本學的知識，則可得心應手，對研究當有不少的助益。

最後來談談善本的鑑別。這個問題包括如何鑑定版本，及怎樣知道其本的優劣。鑑定版本是版本學上較難的一個課題，必須多看，多作比較的研究，正如孫從添藏書紀要中所說：「必須眼力精熟，考究確切」。假若不浸淫其中若干年，是很難鑒別無失的。因為自明末假造宋元本的風氣即很盛，技術也不斷的進步。如果眼力不能精熟，即易受其愚弄。當然，一個收藏家或圖書館的採訪人員，必需具有很精的鑒別眼力，才不致上當吃虧。但在做學問的人而言，只要具有基本的鑒別知識，知道某書是宋是元，或是否好版本即足。現在我簡略的談談鑑別善本書的幾項原則

，也就是必須具有的幾項基本知識。

一、要略懂我國版刻的歷史，知道歷代雕版的優劣情形。一般而言，宋元版是善本，明中葉以後刻本較差，清康雍以後刻本校勘矜慎。然而宋代有浙蜀閩版之分，同一地區刻本，又有公私之別。也有宋元版明代修補印行的，其間差異頗大。明季刻本，固多改纂，也不乏覆宋精刻的。清代刻本，固多校勘精審，但也只限於收藏名家的刻本，不宜一概而論。至於同是手抄本，其中有著名藏書樓或名家的抄本，也有鄉間塾師或生徒抄本，其優劣則有天淵之別。如果瞭解版刻及圖書的歷史，對鑒別善本有很大的幫助。

二、需要略具版本學的常識，而知道區別宋元版或名家批校鈔本。精於鑒定版本固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一見其本卽可約略區別它是宋元版或明清刻本，則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因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風格，只要能了解各時代的風格，而知道其上限，就能約略推斷出該版本可能最早的時代。我約略的談談鑒定的幾個最基本的常識。

甲、版式　所謂版式，就是一塊書版的格式。書版的四周圍有墨線稱作版匡，也名為邊欄。四周一道墨線的稱為單欄，兩道墨線的稱為雙欄，通常的上下一道墨線，左右兩道墨線的稱為左右雙欄。版的中央部位留有一條不刻正文的部位叫做版心，因為宋元時代通行蝴蝶裝，文字向裏

對摺，此部位在中心故名；明初以後改行包背及線裝，文字摺向外面，此部位也變成向外部份，故又名版口。版心的上下各有一道橫線，從此橫線至上下邊欄形成上下各一個空格，叫做象鼻。象鼻中空白的稱為白口，中間有一道墨線的稱為小墨口或線口。若為粗黑線或全黑的稱為大黑口或濶黑口。如果上象鼻之中刻有書名，通常稱為花口。在上橫線之下及下橫線之上，通常各刻有一似魚尾形的墨文稱做魚尾，係供摺紙的準線。也有僅上面有而下面無的名單魚尾，也有多至三個四個的。上下魚尾之間係供刻記書名，卷數及葉次。宋版書多是白口單邊，版心上方記本版字數，下象鼻中記刻工姓名或單記一字。而記字數的情形源起稍晚，大抵起於南宋光宗以後，而南宋以後通行左右雙欄。至於書名並不全刻，只用兩字或三字。自南宋末年又開始有版心上下作黑口者，至元及明初乃通行。明正德嘉靖間覆刻宋版漸多，故版心又變為通行白口，不過罕有記載字數及刻工的。嘉靖間又有開始將書名改刻在上象鼻內，而書名全刻，形成花口，萬曆以後成為定式。又宋代通行每卷前載列該卷的卷目，下連屬正文，因為係沿襲唐代卷子本的款式，但刻宋人著作用此式的則不多。以上所談只是大概的情形，而且不能斷其下限。譬如見到版心上下記有字數刻工的，不能卽認為它是宋版，因為元代及明中葉以後仿宋覆宋刻本也有此式的；見到黑口本不能必說它是元版或明初本，嘉靖以後也偶有刻作黑口的。不過可以定其上限，版心上方刻有

書名的，絕不會是明正德以前的版本，黑口本也不容易僞充宋版。

乙、行款　所謂行款，是指其版每葉若干行，每行有若干字。清江標嘗撰宋元行格表，以為宋版書的行字有一定的規式，卽每葉若干行，每行的字數，必與行數相同。固然，如南宋國子監刻九行大字本諸史，每葉十八行，行十八字，浙東茶鹽司刻群經注疏合刻，每葉十六行，行十六字等，誠如江氏所説，但此並不能完全概括所有宋版。從傳世的宋元版觀之，行字之間並沒有一定的關係。不過某家所刻各書，大都有他一定的行款。如宋元刊附釋音群經注疏，皆每葉廿行，行十八字；宋刻十行本諸史，皆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臨安陳氏書籍鋪所刻唐宋詩集，均每葉廿行，行十八字，蜀刻唐人文集，率每葉廿四行，行廿一字等等，也可以供我們作鑒定的參考。

丙、字體　書畫詩文等藝事，各時代有各時代的風氣，精於鑒賞者，一望卽可知。圖書版刻的字體也是如此，且雕版工匠一時有一時的習尚，其或翻刻摹印，貌雖似而神已離。故審察字體實為鑒別最主要的方法，不過這需要博覽多識，非初習者所能。但能略識梗概，也足供初步鑒別的參考。

宋本書中常見的有三種字體，一仿歐陽詢體，字畫規整端方，通行於江浙等地雕版書。一種為福建刻本所常見的，字體在顏柳之間。另一種亦近柳體，但與閩刻不同，其横畫落筆處，帶有

瘦金體的韻味，是為蜀刻的字體。元刻字體，初期亦因襲自南宋，中葉以後則通行趙孟頫的松雪體，圓潤秀逸。此種氣習下至明代弘治正德年間，沿而不改，只有工拙之分。正德以後，覆刻宋版的風氣漸盛，尤以覆刻南宋陳氏書棚本唐人詩集最多，陳氏書棚本訪歐陽率更體，覆刻時因仿其字體及版式，影響所及，故嘉靖以後刻書字體及版式的習氣一變。惟寫刻未精，工匠為便於施刀，漸變成橫輕豎重，板滯不靈的匠體字，即現在我們通稱為宋體字者。此類字體起於嘉靖，變於隆慶，成於萬曆，大抵每三五十年一變，愈趨愈方板。清代除通行宋體字外，另外尚流行一種輭體字者，即正楷書，這兩種字體一直沿用至今，我們可以從字體約略鑒定其雕版的時代。

丁、刻工　宋元版書中大都記有刻工，這是研究版本學很重要的資料。研究刻工是比較晚起，近幾十年來對刻工的研究漸有成績，最早是民國廿三年日本長澤規矩也先生在日本書誌學上發表了宋元刻工表初稿，對於研究刻工的人有很大的方便，風氣所及，後來編寫善本書志圖錄的，對於刻工皆加以詳細記載，近年對刻工已作有系統的整理予以斷代及分地區研究。故可從刻工來考出該書大概刻於何時何地。不過應注意的，明清覆刻宋元版，有並刻工照樣翻刻不改易的。故鑒定版本須各方面均要配合，光憑刻工一項是不夠的。

戊、諱字　宋清兩朝對於皇帝的御名，須要避諱，或缺最後一筆，或用其他同義字代替，

如清代以元代玄，正代禎，允代胤等。宋代不僅避皇帝御名，即若干同音字，也須缺末筆。如高宗名構，須兼避勾、鉤、溝、遘等字。有時不作缺筆，而空其字，其字地位代以「今上御名」或「太上御名」等字樣。元以蒙古入主中華，不用漢俗，故不避諱。明人沿元習俗，也不避諱。但在天啓年間又恢復避諱，譬如熹宗名由校，校字避諱改作挍字，又改作較字。由書中避諱的情形可以看出該書刻在何時。如近年漢華公司影印的宋本中興館閣錄，其書於寧宗廟諱「擴」字，代以「今上御名」，可知其本刻在寧宗時。又如四部叢刊景宋本豫章黃先生集，書中於構字注曰「太上御名」，可知其本刻在孝宗時。故宋清刻本，審察書中的避諱字，及於那一位皇帝，則可以考出其本的刊刻時代。不過宋代私家刻書，避諱不甚謹嚴，明代覆刻本，也與原本同樣作缺筆，故尚需審定其他方面，光據避諱字，尚不是絕對的鑒別方法，何況元明並不避諱。

此外紙張的情形，也可供鑒別的參考。總之，鑒定版本，不宜執著，分開來論，絕不能單憑一兩項特徵而推斷其版刻的時代，必須綜合各種情況均相符合，才能下斷語。至於鑒別抄本的優劣，須先熟習前代收藏名家的生平及抄書情形，大抵各名家抄書都備有專用的紙。名家所抄的書必是罕見的書或傳錄好的版本，故必為善本。如非名家抄本且未鈐有名藏家的收藏印記，其價值較低。關於抄本批校本的情形，因涉及較廣，限於時間不多談。

三、需要略具目錄學的常識。張文襄書目答問略例云：「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其書宜讀，而不得其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要如何才能事半功倍？這就需要目錄學來為之指引。目錄學的意義是把繁雜的圖書，依照學術的分類，部次得井井有條，使讀者能即類以知學，因學以求書。故前代的讀書人莫不具有目錄學的知識，以備開啓研究學術之門。自明季社會重宋元版風氣所及，於是有專重圖書版本的目錄書出現，也就是所謂的賞鑑書志。從清初常熟錢曾撰讀書敏求記開其端，乾嘉以後逐漸成為中國目錄學的主流。藏書家將他們珍藏的舊本，撰寫書志，介紹於人。因為他們收藏豐富，同一書藏有若干不同的版本，便於互相勘對，校其異同，使讀者能知傳本的優劣。假如我們具備了這方面的知識，明瞭各家書目的內容性質，遇有問題時，一檢各家書志，即可對某書版本是否珍善，作一抉擇。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志前言

本館館刊終於在臺灣復刊了，自本期起特闢善本書志一欄，將陸續介紹本館所收藏的善本書，打算每期斟酌篇幅刊載幾篇。本館所藏的善本圖書多達十四萬三千餘册（包括代管北平圖書館等善本書），其中有不少的珍本祕笈，雖曾編有善本書目出版，但著錄簡單，不能顯出各書的特點。所以在善本書目出版以後，前任館長蔣慰堂先生卽有意做一部藏書志。終因茲事體大，限於經費及人力，遲遲未能着手。本年春，本館獲得學生書局的合作，使本館館刊得以在臺灣復刊。在屈翼鵬館長擘劃下，決定闢善本書志一欄，漸次地介紹本館所藏善本。本館館刊之有善本書志欄，並不自今日始，除了抗戰前本館籌備伊始，因所藏的善本甚少；及勝利還京後，因忙於整理編目，日不暇給，這兩個時期所出版的館刊，沒有此欄外，抗戰期中在重慶出版的圖書月刊，卽曾有過此欄。不過我們現在所計劃撰寫的書志，在內容及體例上與過去有所不同，因此我佔用一點篇幅，加上一段贅語，將我們的計劃作一簡單的解說。

藏書志是我國目錄學史上比較晚起的一種體制，然自清乾嘉以來，已成為目錄學的主流。這種體制，溯其初祖，實淵源於唐宋以來的書畫賞鑒一派。明嘉靖以降，因宋元舊本秘笈普遍地受到藏書家的寶愛，相沿成風，迄明末清初而益甚，於是有模倣書畫賞鑒的體裁，而專注重於賞鑒方面的書錄。開這一派先河的，當推錢遵王的讀書敏求記。錢氏在他的藏書中遴選最精好的，每一書寫一篇解題，編為述古堂書目題詞，後來改名讀書敏求記。這種解題有異於前代的敍錄，不介紹書的著者及內容，但討論它繕寫刊刻的工或拙，及遞藏的源流，純從欣賞審鑒的觀點來論述。其後乾嘉間于敏中、彭元瑞等先後奉勅編撰天祿琳琅書目正續編，除敍述鋟梓的年月、刻印的工拙外，並詳載收藏家的題識印記，並考訂他們的時代與爵里。自此例一開，嘉道以來的藏書家，紛起師法，而踵事增華，體例越來越詳密。舉凡一部書的版式行款、刻工、避諱字、刻書牌記、序跋題記、及收藏的印記、遞藏的源流、紙墨字體刊雕的工拙，都予以詳細的記敍。這種賞鑒書志大都僅以書的外形為記述的對象，雖有助於版本的考訂鑒別，而無關於版刻的源流異同與書的內容。雖然也偶而有取與通行本校勘附列校勘記的，如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但僅限於極少數的經籍。能仿古代目錄敍錄而紹介作者的生平及闡釋一書大旨的，更不多覯了。

目錄書的功用很廣，但是要衡量一部目錄書功用的大小，最主要的是看這部目錄對於讀者在

治學參考方面所具有的效用而定。自清以來的藏書志，雖然在供版本研究方面，有它的價值，但是對於一般的讀者就顯得沒有太大的意義，所以自來不如四庫全書總目之受到重視。本館的善本書志，為了增強參考的價值，俾供初學者在治學途徑方面有所補益，故除了因襲版本賞鑒的體例以外，還計劃兼具敘錄提要的作用，及考訂每一書的版本源流與異同。

敘錄是我國目錄書中特色之一，後代或稱作解題與提要。其目的在介紹著者的生平，及一書的內容與大旨。這一種體制對於初學者最為有用，使讀其書者，可以知人論世；未見其書的，也可藉以知道它的大概內容。簡單扼要的介紹著者及書的內容，是本館書志所計劃從事兼具的第一點。自印刷術發明以來，書籍多用雕版來代替抄寫，所以一書而有許多不同的版本流傳。書每經過一次翻刻，因刻的人校勘態度有審慎馬虎的不同，故傳本有善與不善的區別。有的人得到一部書，不去考索它有無殘缺，就拿來翻刊；或者是明知其有殘缺，而不願費力去另找別的本子補足，翻刻時反而改頭換面來掩飾它殘缺的痕跡；或者是校讀時因我國古文詞義深奧，因不了解文義而任意改竄刪削的。因之不同的版本在內容方面往往有很大的差異，不僅是誤字失校而已。某一部書流傳的究竟有那些本子？這些版本的內容是不是有所不同？那幾種本子比較好？那幾種本子是足本？抑是經過刪節竄改的？這些問題相信不論是初學之士、或作研究工作的人，都是希望知

道的。而這些問題必須在知道了各書翻刻翻印的源流，並取各種本子經過勘校以後，才能獲得解答。以前的藏書家因藏書的數量有限，而且校勘又費時，所以寫藏書志都不便涉及這些問題。本館因為藏書比較豐富，各種的版本大體略備，而且近代所存的善本大多歸之公家，即有本館所未入藏的本子，也可以到其他的圖書館去借勘，加上清代以來的學者也零零星星作了許多的校勘工作，可供我們參考。因之本館敢大膽的提出這個計劃，將每一種書編寫成版本考，作為善本書志撰寫的重心。因此之故，本館藏書志不像前人以每一部書為撰寫對象，而以每一種書為對象。即是撰某一書的書志時，將本館所藏該書的各種版本一併縷述，說明其版式行款、遞藏源流，然後再考訂本館未入藏的本子有若干，及各本間的淵源與優劣異同。

本館的計劃雖然如此，但從事此項編纂工作的同仁，自愧學疏識陋，能否達成我們的希冀實在沒有把握。不過願趁本館館刊在臺復刊伊始，作一個初步的嘗試，希望方家先進不吝指教，以為日後編撰本館全部藏書志時，做釐訂體例及工作計劃方面的參考。

元刊本贋品知見記

自晚明以來，士林已競重宋元舊刻。清初錢牧齋、季滄葦、錢遵王諸家倡之於前；乾嘉以還，黃蕘圃、汪閬源、楊彥合等繼之於後，咸不惜重貲，竭力購求。甚至殘編斷簡，亦寶若拱璧。於是坊賈因緣射利，往往作僞欺人。此風晚明已然，不自今日始也。作僞者大抵以新刊充舊槧，以覆本作原刻，割裂改換，百怪千奇。但宋刻鑑別多方，其僞易辨；惟明初刻書風氣，沿自胡元，字體率尚歐波，板式多爲黑口，且皆不避諱，鑑別已難；其或覆刻元本，行款全同，則尤不易辨。以是之故，書賈得肆其技，或移綴真本跋文，或抽除重刊序記，遂致魚目混珠，藏家每受其欺。精鑒如吳兔牀，尚誤以景泰本道園學古錄爲元槧，其鑑別之難，可概見矣。爰就管見所及，得十四種，條其真僞之別，著之於篇，用請正於方家。此十四種明本，昔賢類多誤爲元本。至於鑒別不精之藏家，見黑口書即題爲元版，而不值識者一哂者，此不復及。倘後此續有知見，當更詳焉。

六書正譌五卷，元周伯琦撰。明覆元至正十五年平江郡刊本，每半葉五行，篆書一當小字六，注

雙行，行二十字。左右雙欄，小黑口，單魚尾，魚尾下題六書正譌卷幾，再下記葉數。卷末有「男宗義同門人謝以信校正」一行，首有至正十一年自序，十二年吳當序，十五年宇文公諒序。

按此本，各家多謂爲元刊。然藏此本者甚衆，果爲元刻，其流傳似不應若是之廣。獨繆氏藝風堂、沈氏抱經樓定爲明覆元本，所見甚諦。嘗取盋山書影所攝錢塘丁氏所藏元本及嘉業堂書影所著元本，與此明本對勘，無不盡同，知兩家誤明爲元。他家所藏，殆亦如是也。歸安陸氏伯剛跋此書元刊元印本謂：「篆文圓勁，楷書遒麗，蓋以伯琦手書上版者。」（儀顧堂續跋。）而繆筱珊謂明覆元本「篆文結體，猶是伯琦手書。」（藝風藏書記）。蓋翻雕精妙，風神宛是，宜乎各藏家之咸誤也。近見王晉卿文祿堂訪書記所記元本，版式一與此同，惟版心上記有字數，與明覆本差異，迺眞元本也。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三十六卷附宋季朝事實二卷，元人撰。明初刊本，黑口雙欄，雙魚尾，上魚尾下題宋鑑幾卷，（卷作弓），下魚尾下記葉數。每半葉十六行，行二十五字。每卷首行頂格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幾，次行下題豐城游明大昇校正，卷前冠乾道四年李燾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表。目錄前有木記一方，凡四行，云：『宋史通鑑一書，見刊者節略太甚，讀者不無遺恨焉。本堂今得善本，乃名公所編者，前宋已盛行於世，今再繡諸梓，與天下士大夫共之，誠爲有用之書

。回視他本，大有逕庭，具眼者必蒙賞音，幸鑑。」

按此本紙墨精好，雕寫俱工，甚為藏家所重。遠者如季滄葦、汪閬源、吳槎客，近者若昭文張氏、聊城楊氏，吳興劉氏等，均曾庋藏，胥定為元槧。惟丁志及張氏續志以為明本。楊紹和氏引四庫總目提要，謂永樂大典宋字韻內，多載「宋史全文」四字，證此為元代刊本，且抨張氏以題有「宋史全文」者為明本之語為臆說。更謂「是書乃宋之遺民逸老入元後所作，因末卷多涉元事，故不著姓名序跋，而以李燾進長篇表冠之於首，當時坊賈或亦不無避忌，遂並詭稱前宋盛行耳。其為元代刊本無疑。若明代重刻，當不如是。」（楹書隅錄卷二）其言甚辯而實誤。按永樂大典所收書皆載入文淵閣書目，而宋史全文一書，目中無之，四庫館臣已疑之矣。且卷首有豐城游明大昇校正一行，拜經樓題跋記、愛日精廬藏書志及日人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均載之，楊氏書錄則未言及。考游明字大昇，豐城若竹人，明景泰二年進士，天順末陞福建督學僉事，卒於官。游氏喜刻書，甚精雅，此本版式頗類建本，蓋游氏官閩時所刊。楊氏不察，豈所藏之本，游氏校正一行為坊賈剜去遂致眩惑歟？（曾見一本，此行各卷俱被剜補。遠視之，若天衣無縫，細審之，始見偽跡。）此書原本，罕見藏家著錄，版式不得而詳。惟張月霄氏曾收一本，題「諸儒集議續資治通鑑」，以為元刊元印本。謂其本：

『清朗悅目，視重刊本神氣索然』。今不知流落何處。姑識之，以待比證。

吳越春秋十卷，漢趙曄撰，元徐天祐音註。明翻刻元大德十年本，每半葉九行，註雙行，行十七字。四周雙欄，白口，單魚尾，魚尾下題吳越春秋幾（卷），再下記葉數。前有徐天祐序，卷十末有「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註」，「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兩行，「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註」一行，及「紹興路儒學學錄留堅」，「紹興路儒學學正陳昺伯」，「紹興路儒學教授梁相」，「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等銜名四行。

按孫氏平津館及鄧氏群碧樓所著錄之元本，蓋即此本之誤。又嘗見另一明翻元本，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錢塘丁氏亦誤以為元本。此書元明本之別，陸氏儀顧堂題跋曾詳言之，云：『吳越春秋十卷，題曰後漢趙曄撰，前有徐天祐序，卷十末有「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註，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兩行，「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音註」一行，「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及儒學梁相等銜名四行。每頁十八行，每行十八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六七字不等，版心分上下兩卷。明覆本款式及卷末題名同，惟每頁十六行，每行十七字，板心分十卷，異於元槧耳。』陸氏所謂明覆本，即丁志所著錄之元本；豈九行十七字之明本，陸氏未之見耶？

鄂國金佗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宋岳珂撰。明嘉靖壬寅（三十一年）唐一鵬覆刊元西湖書院本，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左右雙欄，黑口，雙魚尾，上魚尾下題金陀粹編卷幾，下魚尾上記葉數，版心下記刻工姓名（陶、文、卿、仁、明、全、青、奎、蘇州文祥，蘇州高良仁、蘇州陳環、蘇州沈喬、蘇州楊……等。）前有嘉靖壬寅張鏊序，尾曾江洪富後序。

按丁志著錄此本，謂：「別本有嘉靖壬寅張鏊序，謂是本巡按浙江御史唐一鵬重刊，又有兩浙鹽運使曾江洪富後序，今皆削去，以充元刻。」是書估抽去此本重刊序跋以充元刊，由來久矣。潘氏滂喜齋、瞿氏鐵琴銅劍樓皆有元本，然未詳版式，真贋未知；而吳興張氏適園所謂元本，即此明本之誤也。嘗見元西湖書院本，版式行款，一與此同，惟板心上下線口，上記字數，下記刻工姓名（士元、王正、山、用、才、張、平山、茅、振、東子、寶、房、吳、東……等），與明覆本異。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呂不韋撰，漢高誘註。明弘治十一年河南巡撫李瀚覆刊元嘉興路儒學本，每半葉．行，註雙行，行二十字。四周單欄，版心白口，雙魚尾，上魚尾上記大小字數，下魚尾下記刻工姓名（王廷桂、徐隆、許、和、康、巳、成、汞、文、虎、銳、淮、威、等。）前有高誘序，鄭元祐序，鄭序後有「嘉興路儒學教授陳泰至正六年」一行，卷末有「弘治十一年秋河南開

封府許州重刊」一條，及後序一篇。

按各家著錄此書所謂元本者，凡有三種，皆十行二十字。一卽此李瀚本，丁松生氏嘗云：「世之所謂元刊者，殆以此本匿去後序，剷去弘治一行而爲之。」江陰繆氏藝風堂所藏元本，卽此本也。另一則孫氏平津館，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本，鄭序後有「嘉興路儒學教授陳泰校吳興謝盛之刊」一行，丁志曾著錄此本，定爲明翻元本，然其本未見，版式不得而詳。再一則陸氏皕宋樓，劉氏嘉業堂及莫氏五十萬卷樓所藏本。鄭序後無陳泰校一行，版心小黑口，上記大小字數，下刻一「青」字。其本行書端楷，字體流動，而沈厚之氣，溢於行間，確爲松雪家法，或卽劉貞所刊原本歟？

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撰。明初翻刻元本，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字數同。黑口雙欄，雙魚尾，上魚尾下題紀聞卷幾，下魚尾上記葉數，卷末有「孫厚孫寅孫校正」及「慶元路儒學學正胡禾監刊」兩行。

按此本字體呆滯，刻工粗率，與元刊之筆畫靈活者大相逕庭；然因其後有校刊人名兩行，自來藏書家皆以爲元刊，而無異辭，近傅氏沅叔始疑爲明代翻本。傅氏曾購得臨清徐梧生所藏此書元本，公諸海內，始發舊說之覆，誠書林一快事也。據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及文祿堂訪

書記所記元泰定間慶元路刊本，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白口，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茅元吉、章子成、章宇、王子仁、張以方、王明、鮑成、梁壬、古、之、泉、祥、見、明、仁甫、子木、文、福、宇、仁、仲、父、何、齊。）卷末有「孫厚孫寧孫校正」一行。字仿鷗波體，繕寫工妙，模印精良，較之翻本，實有天壤之別焉。

桯史十五卷，宋岳珂撰。明成化十一年江浙覆元刊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黑口雙欄，雙魚尾，上魚尾下記書名及卷數，下魚尾下記葉數。空格均依宋本行款，上有小字批，又有小字旁注。

按鐵琴銅劍樓所藏，商務印書館影印於四部叢刊之本，所謂元刊者，實即此本。此本版式字體，雖大類元槧，然細審其筆畫，時露明中葉刻書習氣。張菊生跋語謂：『是本筆法刀工，視元本却微有別，然未能遽決。』足證張氏之卓見與其謹慎之風度。按藝風堂藏書記，著有成化江浙刊本，據繆氏所記，一一與此本合。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於明嘉靖本題記中，且著有成化十一年江浙刻書識語，證知此本實江刻非元槧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宋朱熹考異，王伯大音釋。明建刊本，四周雙欄，黑口，雙魚尾，上魚尾下題昌文之幾卷，下魚尾下記葉數。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小字雙行，

字數同。卷一首行頂格題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一，次行低一格題晦庵朱先生考異，下空三格題留耕王先生音釋，第三行低三格記宋莒公云云凡三行，二卷後則於首行卷下註「考異音釋附一小字雙行。

按此本松江韓氏讀有用書齋目即著錄為元刊本，更前海寧查初白竟以為宋板，莫友芝已辯其謬，謂「觀其款式字體，當是明初刊本。」（宋元舊本書經眼錄）此書元刊本，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與明本有別。經籍訪古志及文祿堂訪書記均載之，乃元至元辛巳（十八年）日新書堂刊本也。此書除日新書堂本外，就目驗所及，凡有四種，版式行款俱同，惟板匡大小差異，字體雕工之精麤亦有別，要皆輾轉翻刻；世率以元槧目之，實不盡然也。

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附錄一卷，宋梅堯臣撰。明正統己未（四年）宣城太守袁旭刊本，四周雙欄，上下黑口，雙魚尾，上魚尾下記卷數，下魚尾下記葉數。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無總目，目錄分附各卷首，下接正文，猶存古意。前有慶曆三年歐陽修序，後紹興十年汪伯彥序，正統己未楊士奇跋。

清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曾著錄此本，以為元刻。按此書初刻於北宋，歐陽修序之。汪伯彥重刊於紹興；入明則袁旭、姜子奇，清則梅氏、徐氏、梁氏，迭次翻雕，迄未見有元人重

刊書序。清初楊氏序曰：『是集再刻於紹興，三刻於正統，四刻於萬曆。』（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引。）此袁旭本即出自汪本。蓋聖俞雖承西崑靡濫之後，佐歐陽修以變詩體，見推於當代，然其詩『旨趣古淡，知之者希。』故除宋明地方守令及族裔間刻以傳外，胡元九十餘年間無有梓行之者；有之，惟徐師曾所撰年譜之刻而已。考莫氏之誤，殆沿之吳焯。吳氏繡谷亭薰習錄所述元本，即為此本。三十年老娘，亦不免倒繃孫兒。所謂書囊無底，信哉！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宋范浚撰，高㫤編。明成化十五年蘭溪令唐尚虞刊本，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左右雙欄，上下黑口，上黑口中於卷一至五刻一「文」字，卷六至十為「行」字，卷十一至十七為「中」字，卷十七至二十二為「信」字，字下記葉數，墨質白文。版心雙魚尾，魚尾間於卷一至六刻「上幾」（葉），卷七至十四刻一「中」字，餘則或標明書之體裁，或記每版字數。卷前有陳巖肖敘及總目，末有吳師道序及屠維大淵獻之歲章懋跋，每卷前別列分目。

按香溪集一書，世傳元本頗多，見於清初以來各名家書目者，無虞十數。而明代重刻本，反不見著錄，寧不可異？惟邵亭書目載此書云：『又有蘭溪令唐尚虞己亥刊，有章學（按學字衍）懋序，蓋至正十九年或永樂七年（按應為十七年），並翻宋本。』考章懋字楓山，蘭溪人，明成化二年進士。此己亥當為成化十五年。因疑世稱元本，或因未考章氏生平而致誤。

曩曾徧檢各家書志，皆未嘗錄有章序，心意索然，但蓄疑固未稍釋也。頃獲睹此本，章序赫然獨存，急取與盋山書影所攝季滄葦、汪閬源、丁松生遞藏之元本，及嘉業堂書影中之元本，逐字核對，無不皆合，舊疑冰釋，心神為之一快。蓋此本版式古雅（莫天一云：「每卷別列各目在前，宋元舊刻每如此，明刊則鮮矣。」）字體優美，而章序既被割除，無怪乎各鑒藏家之多誤也。惟尚不悉張、陸、瞿、繆諸氏所藏，較此本若何；且未獲睹真元本，亦憾事焉。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元馬祖常撰。明弘治六年山西按察使熊翀刊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黑口，雙欄，雙魚尾，上魚尾下題石田先生文集卷幾，下魚尾下記葉數，版心下記刻工名（琢、章、等），墨質白文。每卷首行題馬石田文集卷第幾，前有元王守誠、蘇天爵、陳旅三序，及後至元五年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古揚州路總管刊板牒文，卷尾有明弘治六年張頤及熊翀二跋。

按此本四明盧氏、昭文張氏、常熟瞿氏、吳興劉氏及各藏家多曾收藏，或為刊本，或為影鈔，率謂為元至元本。觀其字體呆滯，雕工亦麤，絕異元槧。蓋張熊二跋，為書賈摘除，藏者為卷前之元刊牒文所惑，因而致誤也。然附錄中許有壬撰馬氏碑銘成於至正七年，其時已在刻書後。熊跋（跋文多見錄於舊鈔本中）謂按甘肅時，得馬氏裔孫馬鐵牛持祖常所撰母夫人

石刻墓銘，因增附集中（附入卷十五。）並錄虞伯生撰桐鄉阡碑，許有壬撰墓銘，附於集尾。是附錄編刊於明代甚明，鑒者不察，亦云疎矣。考此書元本，錢遵王曾藏之，題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無附錄。錢氏謂：「是書雕造精妙，為元刻中之上駟，楮墨簇新，古香可愛。」（讀書敏求記卷四。）以此本較之，萬不逮也。文祿堂訪書記云：「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元刻大字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綫口，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刻工姓名，至元五年王守誠、蘇天爵序。」錄之以著其異焉。

鐵崖文集五卷，元楊維禎撰。明弘治十四年郴陽馮允中刊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黑口，雙欄，雙魚尾，上魚尾下題鐵崖文集卷幾，下魚尾下記葉數。卷一首葉項格題鐵崖文集卷之一，第二行下題「會稽楊維禎著」，第三行下「毘陵朱昱校正」，卷五末葉後有「姑蘇楊鳳書於橘州之正誼書院」一行，首有弘治十四年馮允中序，尾有朱昱跋。

按此本紙色雅潔，鐫雕精妙，版式亦頗典古。葉德輝氏嘗謂收藏家皆誤以為元刊（書林清話卷七：明人刻書載寫書生姓名條。）其言雖未免過甚，然精鑒如張月霄氏亦不免謬誤，餘子更無論矣。蓋此本之精雅，足與元本比擬，如抽去前序後跋，以充元槧，藏家頗易受欺也。

文選六十卷，梁蕭統選，唐李善註。明成化二十三年唐藩翻刻元張伯顏池州路本，黑口，雙欄，

雙魚尾，上魚尾下題文選卷幾，下魚尾下記葉數，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每卷首行頂格題文選卷第幾，第二行低一格題昭明太子選，次低八格有「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分刻兩行，又次「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二十字，亦分刻兩行，卷前有成化丁未唐藩重刊序。

按此本唐藩序多爲書賈撤去，以充元槧。孫淵如、莫天一諸氏，卽爲所愚者也。又明嘉靖元年金臺汪諒翻刻張伯顏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楹書隅錄亦誤以爲元本。實則元刊本『每頁二十行，每行大字二十，註雙行，行二十一字，每卷有目連屬篇目（按：卽連屬正文之謂），版心間有刻工姓名，卷一首葉有「九華吳清庥刀筆」七字，六十卷末有「監造路吏劉晉英、郡人葉誠」一行。每卷首葉之第四行有「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二十字一行』（儀顧堂續跋。）與明成化及嘉靖翻本均異。

唐音輯注十四卷，元楊士弘編，明張震輯注。明初建安葉添德刊本，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字數同。黑口雙欄，雙魚尾，上魚尾下於始首一卷則題始音，不記卷數，於正音遺響各卷則題唐音卷幾，下魚尾下記葉數。前有虞集序，葉添德後序，目錄後鐫有「三峰記」鼎形木記及「建安葉氏鼎新繡梓」長方木記各一。

按此本版式字體，大類元槧，故昔人著錄每誤，孫淵如氏，即其一也。葉德輝始辨為明刻，然所舉證據實未當。近屈翼鵬先生嘗正其譌，並詳考輯注者為明人；刻者葉添德（號景達）之時代，約在洪武末葉至正統之間（詳見中央圖書館圖書月刊重慶版第二卷第五期。）於是此本刻於明初，乃斷然可信。葉氏刻書甚多，藏家不誤為宋，即誤為元（如正統十二年葉景達刊鍼灸資生經七卷，丁志、瞿目皆以為元刊），亦可以附正也。

明藩刻書考

我國印書之術，肇始於唐，興於五代，宋元而下，其業寖盛。槧雕之事，官府奉為重典，坊間頓成利藪，古籍以不墜，人文藉以宏興。而明代藩邸王孫，以天潢貴冑，襲祖宗之餘蔭，貫其餘財，盛行雕造，邁軼前代，宜世所艷稱也。

明懲燕王之變，因於藩府，心存猜忌，多所箝制。既奪其兵政之權，復禁其私自交往，故藩王即雖雄桀之主，亦無不韜光養晦，自汙其志。於是下焉者以聲色狗馬自娛；上焉者則修學好古，右文刻書，致成一代之宏業，增光明室。諸藩或講求養生修鍊之術，纂刻道家養性保命之作；或心存濟世，傳刻醫典；或醉心遊藝，倘佯琴棋之間，纂刻諸譜；或仿宋郡齋刻書故事，刊刻當地先賢著述；或優遊文史，耽於咏哦，詩文諸集，纂刻尤盛。而經史致用之學，永樂以後，多捨棄而不講求，故傳刻者亦尠焉。此明藩刻書之大較也。

明藩刻書，今可知者，無慮卅家。明初則有周、蜀、慶、寧、楚諸府；周府自洪武間刻千金方，以迄萬曆，屢經傳刻，金丹正理，其著者也。其支裔博平，亦有刻本傳世。蜀府恒多賢王，

自明初迄萬曆，傳本不絕，四部之籍，皆曾槧雕，尤爲著稱。慶藩纂刻，皆在明初，多屬總集。寧藩多獻王權所自纂刻，自洪武以迄正統。據其目所載，凡百餘種，今傳世亦最夥。楚府刻書，自明初以迄萬曆，說苑新序，至今傳誦。支裔武岡，亦有詩集傳世焉，成弘以降，槧雕尤廣，淮唐諸府，多刻總集；吉府多刻子書，以迄萬曆；益府多刻小學譜錄，迄於崇禎，活字印書，媲美蜀藩。秦府史記、魯府抱朴子，咸稱善本；遼藩昭明文集，人爭寶之。嘉靖間當推晉趙二府最著，晉府多刻總集，卷帙爲諸藩之冠；趙康王於四部之籍，無不繙雕，尤爲淹雅。他如德藩之漢書，瀋藩之易林，徽藩之萬花谷，崇府之包公奏議，靖江之李杜集，並爲士林所重，而萬曆間鄭藩之通音律，所刻樂律全書，尤爲審音家所推重，不獨以雕版著聲藝苑也。其他諸藩如：漢、衡、伊、崇、襄、潞、代、岷、汝等府，或繙雕舊籍，或自刻詩文。稽古右文，於焉爲盛。此諸藩刻書之梗概也。

我國刻書之業，自宋以來，即以江南爲盛；僻遠之地，則罕聞焉。而明藩如廣西桂林之靖江，雲南之周、岷，四川之蜀府，山陜之晉、代、秦、韓、瀋、寧夏之慶府，遼北之寧（洪武間，永樂時遷南昌）、遼、（永樂時遷荊州）諸府，雖居邊域，猶盛槧雕，獎掖文化之功，不可滅也。

明人刻書，率喜竄亂舊章，為世所詬病；書帕坊本，校勘不謹，人多輕之。唯諸藩刻書，尚多精本。蓋以其被賜之書，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翻雕，故時有佳刻也。明藩刻書，尚多據舊本重雕，無明人竄亂之惡習；且藩王多好學，有招賢之力，故校勘亦較審。而書式多存古意，尤足發思古之幽情也。

千頃堂書目著錄：「寧獻王書目一卷、徽府書目一卷、衡府書目一卷，江寧王府書目一卷」。按寧藩書目一卷，四庫收入存目，提要謂此目所載，係寧獻王纂刻之書，凡一百三十七種。又按明史諸王傳載衡府新樂王載璽：「博雅善文辭，索諸藩所纂述，得數十種，梓而行之」。衡府書目一卷，當即指此。由此例之，千頃堂目所載各藩書目，殆皆刊刻之目，而非藏書之目也。明藩刻書之盛，即此可見。惜此諸目今皆失傳，無由窺見。明藩撰述甚富，見於史傳及千頃堂等各家書目所載，無慮百數，當時殆皆曾鏤雕以傳，今亦莫能詳考矣。茲編所錄，僅據明周弘祖古今書刻所載，及各家書目所錄，兼據史傳書序，凡藩府刻書之可考者，彙為一帙；略仿四部，分類編次，復就知見，加以疏注，庶見一代之宏業。雖非全豹，亦可見一斑矣。至若舊籍所載藩刻碑版法帖，則屏而不錄焉。

甲、經部

周易十卷　魏王弼注　趙府味經堂刊本

見嘉業堂明善本書目（以下簡稱嘉目）、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以下簡稱中圖善目）。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版心上刻「味經堂」三字，前後無序跋。按趙府味經堂刻書甚多，經書率九行十八字，其所刻之詩緝，版心有味經堂三字，又音圖後刊有「趙府刊於居敬堂」一行，及「趙府居敬堂章」木記一方，知味經堂亦趙府之堂名，又名居敬堂也。所刻諸書，自字體觀之，皆嘉靖間所刊刻。千頃堂書目著錄有趙康王厚煜居敬堂集十二卷。據明史諸王世表，康王襲封於正德十六年，嘉靖三十年薨。由此考知，味經堂、居敬堂所刻書，皆康王所刊也。史稱厚煜「性和厚，構一樓名思訓，嘗獨居讀書，文藻贍麗」。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二十卷　宋楊萬里撰　嘉靖甲辰（二十三年）魯府敏學書院刊本

見繆荃孫藝風藏書記（以下簡稱繆記），前有嘉靖甲辰魯國望洋子當㴐序。此本係翻宋刻，繆氏云較嘉靖間尹氏瘞鶴亭本為佳。

周易輯聞六卷　宋趙汝楳撰　萬曆間周藩刊本

見四庫標注、邵亭書目。

大易鈎玄三卷　明鮑恂撰　宣德十年寧府刊本

見詒莊樓書目（以下簡稱詒目）。詒目不著刊刻年代，按四庫著錄之學易舉隅卽據此本而改題者，提要云：「是書本名學易舉隅，寧王權爲刊版，始更名大易鈎玄，卷首有寧王權序，題曰旃蒙單閼，蓋宣德十年乙卯也」。

續韋齋易義虛裁八卷　明涂宗濬撰　萬曆甲寅（四十二年）瀋藩重刊本

見中圖善目。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版心下記刻工名——裴皮、祝壽刊、渠沙等，及每版字數。前有萬曆甲寅山西按察司副使南居益序，云「藩王雅耽經傳，心契茲編，重梓於邸」。後附河圖一卷。

尚書　吉藩刊本

此本未見著錄，明史諸王傳：「吉簡王見浚，成化十三年就藩長沙，刻先聖圖及尚書於嶽麓書院，以授學者，嘉靖六年薨」。則此書約刻於成化弘治間。按尚書孔傳十三卷，正義二十卷。此刻不詳有無傳註。

書傳會選六卷　明劉三吾等撰　趙府味經堂刊本

見天祿琳琅後編，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以下簡稱丁志），嘉目，故宮善目，明代版本圖錄，中圖善目。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版心上刻「味經堂」三字，則此亦康王所刻。

毛詩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本未見著錄，不詳有無箋注。按毛詩白文一卷，鄭玄箋注本二十卷，正義本四十卷。

詩緝三十六卷　宋嚴粲撰　趙府味經堂刊本

見丁志，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以下簡稱莫錄），故宮善目，中圖善目。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版心上刻「味經堂」三字，音圖後有「趙府刊于居敬堂」一行，及「趙府居敬堂章」木記一方。此亦康王厚煜所刊，丁志、莫錄別居敬堂、味經堂為二刻實誤。

禮記纂言　蜀藩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著錄三十六卷，元吳澄撰。

春秋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明代胡安國傳盛行，此亦當為胡傳。

左傳　蜀藩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刻未見著錄，當是杜預集解三十卷本。

左傳　趙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

五經白文二十三卷　嘉靖間衡府刊黑口本

見嘉目、古今書刻。按邵亭書目載有嘉靖庚子（十九年）衛府刊五經白文。考明史諸王傳：「衛恭王瞻埏，仁宗第十子，永樂二十二年封懷慶，幼善病，宣宗撫愛之，未就藩，正統三年薨，無子國除」。邵亭殆誤衡府為衛府也。據明史表：衡莊王厚燆，嘉靖十九年襲封，隆慶六年薨，此當是莊王所刻。

五經白文二十三卷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

五經纂言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著錄，撰者卷數不詳。按元吳澄嘗撰易纂言十卷、書纂言四卷，禮記纂言三十六卷，春秋纂言十二卷，唯無毛詩。

五經改機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著錄，撰者、卷數不詳。

五經傳注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著錄，撰者、卷數不詳。

五經句解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著錄，撰者、卷數不詳。按錢補元志著錄李公凱易經句解十卷，尚書句解三卷，毛詩句解二十卷，劉彭壽春秋經句解無卷數，四庫著錄有宋朱申周禮句解十二卷，此帙或乃蜀藩彙刻也。

篆文孝經一卷　明朱厚烇篆　嘉靖乙卯（三十四年）益藩刊本

見中國善目。前有嘉靖乙卯益藩慎菴序，卷末有「嘉靖乙卯秋九月宗室慎菴篆」十四字。按明史表：莊王厚烇，嘉靖二十年襲封，三十五年薨。千頃堂書目小學類著錄此書，謂為朱永仁篆，蓋誤。明張時徹益莊王神道碑銘云：「王精研書法，真草小篆，為世所珍，撰著詩文，淵深雋永」（焦竑國朝獻徵錄卷二）。

四書集註二十六卷　宋朱熹撰　吉藩翻刊正統司禮監本

見古今書刻、丁志。丁志云：「有吉府圖書大方印，周弘祖輯古今書刻，吉府刊四書集註

，當即翻正統司禮監刊本，故蓋印於每卷之前」。

四書集註二十六卷　宋朱熹撰　嘉靖戊申（二十七年）伊府刊本

見丁志。云前有嘉靖戊申十月伊藩掌國正派體元子序，謂「命工正官將原頒官本四書翻刻，傳至子孫，貽於後世」。蓋亦翻刻正統司禮監本也。按明史此本乃伊王典模所刻。典模貪愎暴虐，嘉靖四十三年削爵國除。伊府刻書，今可考者，僅此一種。

四書集註二十六卷　宋朱熹撰　楚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本當亦翻刊司禮監本。

四書集註十九卷　宋朱熹撰　萬曆乙卯（四十三年）崇藩崇義書院刊本

見中國善目。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版心上有「崇藩四書集註」六字，首有萬曆乙卯純齋道人序，謂「余于藩務有暇，閱諸善本，潛心考訂，命工鐫刻，以廣其傳」。卷末有「皇明乙卯歲在春王正月吉崇藩崇義書院藏板」二十一字兩行。此本乃據舊本校勘，非翻司禮監本，故每節上有音註，云宋元板作某字。昔人每謂明藩刻書，尚多據宋元善本，此其一例也。此刻凡中庸一卷，大學一卷，論語十卷，孟子七卷。

四書五經注解　嘉靖初年晉藩養德書院刊本

此刻未見著錄，按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周宣序晉藩刻文選云：「殿下為高皇帝七世孫，天性篤孝，喜讀書。嘗刻四書五經注解、唐文粹、宋文鑑、趙松雪讀書譜諸書，遠近寶之」。此當與唐文粹等同時刊刻，唐文粹宋文鑑今均有傳世，此書則未見，撰注者及卷數俱不詳。

樂律全書四十八卷　明朱載堉撰　萬曆間鄭藩刊本

見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書目，明代版本圖錄，台灣大學圖書館書目，中國善目，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各種前有朱載堉序或進書表，及附參考書目，算學新說卷末有「萬曆三十一年八月初三日刻完」一行。此書各家著錄卷數多寡不同。中央圖書館藏本，凡律呂精義內外篇各十卷，律學新說四卷，樂學新說一卷，樂經古文一卷，算學新說一卷，操縵古樂譜一卷，旋宮合樂譜一卷，鄉飲詩樂譜六卷，二佾綴兆圖、靈星小舞譜、六代小舞譜、小舞鄉樂譜各一卷，聖壽萬年曆二卷，萬年曆備考三卷，律曆融通四卷，計十六種四十八卷。千頃堂目所載較此增成祖元教樂章譜等十三種，明志著錄四十卷，四庫所收四十二卷，較此帙少樂經古文及曆書三種。蓋此書隨撰隨刻，故歷次印本，多寡不同。晚近流傳者，大抵以國學圖書館所藏十七種四十九卷本為最夥（國學圖書館現存書目未載此書，殆於抗戰期中散佚）。按明史諸王傳，載堉嘉靖二十五年封世子，萬曆十九年鄭恭王厚烷薨，載堉辭爵，讓於盟津

王見憑曾孫載堉，詔以世子祿終其身。載堉專心律數，窮畢生之力，撰為此書，廣博浩大，考辨詳確，其立論多為清人所沿用。故朱竹垞譽之曰：「河間獻王之後，言禮樂者，莫有過焉者也」（曝書亭集卷四三樂律全書跋）。

新刊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梁顧野王撰　萬曆癸酉（元年）益藩刊本

見丁志、諸目、明代版本圖錄。前有萬曆初元益王一齋序，卷末有益世孫翊鈏跋。按明史表恭王厚炫嘉靖三十六年襲封，萬曆五年薨。翊鈏則恭王孫宣王也。此書蓋莊王厚燁欲刻而未就，故恭王紹其志而刻之。

重編廣韻　益藩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益王厚炫刻玉篇序云：「我聖祖高皇帝命儒臣有洪武正韻之作，而於玉篇、廣韻二書，仍之不廢。第中多脫略，我先考端王取二書詳加校訂，正其譌謬，補其闕略……我先兄莊王既序廣韻而梓之……」。則此書乃莊王厚燁所刻。厚燁精於字學，嘗家刻孝經忠經。此書當為宋陳彭年重修本五卷也。

毛晃韻　慶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此書即宋毛晃增修互註之禮部韻略，四庫著錄五卷。

草韻集韻五卷　金張天錫原編　無名氏續輯　成化十年蜀藩刊本

見千頃堂書目、中國善目。卷首有成化十年蜀王序，後有成化甲子趙瑛跋。每半葉八行，行大字七，黑口，版心下記刻工姓名——王、馬、山、廷、六等。

洪武正韻十六卷　明樂韶鳳等撰　隆慶元年衡府刊本

見中國善目。每半葉八行，小字雙行，行二十四字，黑口，版心下有刻工名——李炤、沈世楫、馬仲孔、紀存義、章彬、賀東州等墨質白文。卷末有隆慶元年衡王跋，云：「是書出自中秘，寰宇景仰，而艱得捧閱，閭肆謄鈔殊乖，讎校靡確，敬遵式壽梓」。蓋翻刻明初內府本也。按明史諸王傳：嘉靖十七年，莊王厚燆嗣。嘗辭祿五千石，以贍宗人，宗人德之，隆慶六年薨。

吟韻解註　秦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著錄，按千頃堂目載有永興王音□吟韻詳註五卷。據明史表永興王係秦府之支裔，當即此書。

古文訓學大略　楚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小學類附錄元人古文訓學大略四卷，不著撰者名。

乙、史部

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司馬遷撰　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　嘉靖甲午（十三年）秦藩刊本

見甘泉鄉人稿、繆記、諂目、莫錄、故宮善目，明代版本圖錄，中圖善目。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註雙行，行二十三字，白口，版心中縫以千字文為次，自天至往共分二十册，每卷末記史若干字，註若干字。卷前有嘉靖甲午秦藩抑鑑道人序。此書乃定王惟焯所刊，史稱其有賢行。此書版心以千文為次，殆欲盡刻諸史歟？按此本流傳甚廣，清錢謦石嘗校之，以為王延喆本、汪諒本各缺一葉，而秦藩本不缺，遂謂為明翻宋本之善者，見甘泉鄉人稿書跋。自來藏家著錄，多從其說，云為翻刻宋黃善夫本。近張菊生氏曾見一本，有嘉靖庚戌（二十九年）秦藩輩中道人修版序云：「予叔考定王得蘇州本，命工刻之」（校史隨筆）。始疑其非翻宋刻。予曾取此刻與王汪諸本校之，此本蓋覆刊震澤王氏本即所謂蘇州本，而間參校他本，故訛奪之處多沿王本之誤，而與宋刻異也

漢書一百卷　漢班固撰　德藩最樂軒刊本

見郘園藏書志（以下簡稱郘志）、莫錄、中國善目。此本白文無注，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上有「德藩最樂軒」五字，版心下記刻工姓名，前後無序跋，不詳刊年。按此本刻工有李澤、李受、張敖與嘉靖三年徐焴刻唐文粹同；有李受、張敖、周永日與嘉靖四年王延喆刻史記同；有周永日、李受、李清、李澤、何祥，顧祥等與嘉靖八年南監刻本漢書同；則此書當亦刻於嘉靖初年也。明史表載懿王祐榕，正德十六年襲封，嘉靖十八年薨，當即其所刻也。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宋朱熹撰　嘉靖丙辰（三十五年）趙府居敬堂刊本

見袁簿，版心有「趙府居敬堂」五字。按袁漱六有藏書簿四冊，未曾刊印，故未見，此據葉德輝書林清話所引。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

蜀鑑十卷　宋郭允蹈撰　洪武間蜀藩刊本

此刻未見著錄，按遜志齋集卷十二載方孝孺序此書云：「殿下受封茲土，既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縱觀史策，考論臧否，以為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臣序之將重

鋟而傳于世」。黃堯圃跋此書明鈔本云：「張白華先生家有此刻，遂丐歸影鈔足之，前有方正學序，是明初版矣」（蕘圃藏書題識卷二）。是此刻清代中葉尚有傳本也。史載蜀獻王椿「洪武二十三年就藩成都，性孝友慈祥，博綜典籍，容止都雅，帝嘗呼為蜀秀才。在鳳陽時，闢西堂，延李叔荊、蘇伯衡商榷文史。既至蜀，聘方孝孺為世子傅……時諸王皆備邊練士卒，椿獨以禮教守西陲」。獻王刻書甚多，今傳者尚有自警編。

蜀漢本末　洪武間蜀藩刊本

此刻未見著錄。按遜志齋集卷十二方氏序此書曰：「近世信都趙氏復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千年之事實，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為一書，曰蜀漢本末……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此書亦獻王所刻也。錢補元志載趙居信蜀漢本末二卷。四庫入別史類存目，提要謂「前序一篇，不知誰作」，蓋偶失考也。

貞觀政要十卷　唐吳兢撰　元戈直集論　成化丙申（十二年）崇府刊本

見丁志。此本前有成化元年八月朔憲宗御製序，末有「成化丙申崇府重刊」木記，蓋翻刻司禮監本也。按明史此本為簡王見澤所刻。見澤英宗第六子，成化十年就藩汝寧，十八年薨。

貞觀政要十卷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本未見著錄，當亦翻刻成化元年司禮監本。

孝肅包公奏議集十卷　宋包拯撰　嘉靖二十二年崇府刊本

見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以下簡稱瞿目）、中圖善目。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黑口，版心下記葉數，全書凡一百八十六葉，前有嘉靖廿二年崇王序。按明史表此書乃莊王載境所刻。

先聖圖　吉藩刊本

未見著錄。按明史諸王傳：「吉簡王見浚，成化十三年就藩長沙，刻先聖圖及尚書於嶽麓書院」。則此書約刻於成化弘治間。錢補元志著錄孔聖圖譜三卷。

古今宗藩懿行考十卷　明朱常淓撰　崇禎八年潞藩刊本

見嘉目，中圖善目。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版心上刻「大明崇禎八年」六字，兩魚尾間刊「潞國新刊古今宗藩懿行考」十一字，書首冠崇禎九年正月潞獻書表。此本板匡寬濶，字大爽目。史載崇禎中流賊竄擾，常淓捐金助餉，以能急國難稱於時。然格於禁錮，宗藩不得登仕籍，故常淓撰進此書，欲以動上之聽也。

宗藩訓典十二卷　明馮柯撰　萬曆三十七年襄藩貞白書院刊本

見嘉目、中圖善目。每半葉十一字，行二十一字，以十二支分卷，版心上刻宗藩訓典子（丑、寅、卯……）帙，下刻「貞白書院」四字，再下記刻工名。前有萬曆二十三年涂杰序，壬寅馮若庸序，襄藩景新子序，三十七年馮若愚重刻序，癸巳馮柯自敍。按柯字貞白，以薦擧侍襄靖王，此書卽奉王命所作，萬曆壬寅其子瑛進之王府，忠王翊銘命工刊刻也。

禮制集要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傳本未見，按千頃堂目著錄禮制集要一卷，云：「命學士劉三吾編輯官民服舍器用等類成書，以戒僭越。凡爲目十有三，自冠服器用以至儀從奏啓書押，皆有等第。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成」。

禮儀定式一卷　明李原名等撰　嘉靖乙未（二十四年）徽藩重刊本

見鄞范氏天一閣書目內編（以下簡稱范目）。卷末有「嘉靖乙巳徽藩重刊」木記。按太祖實祿：「洪武二十年十月丁卯，太祖復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往者臣僚尊卑禮儀，旣嘗定議頒降，其中節目，有未詳盡，宜加考訂，著爲定式，中布中外。原名等乃集諸儒，稽考舊制，重加訂定，凡二十六條」。此本蓋徽恭王厚爝重刻內府本也。

直說通略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錢補元志著錄鄭滁孫直說通略十三卷。

直說通略　遼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

史略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千頃堂目及四庫均未著錄，按讀書敏求記載有臞仙史略二卷（玄賞齋書目亦載此書，不著卷數），則此書當為寧王權自刻也。錢遵王於此書頗為推崇，其言曰：「賢王奉藩多暇，故詩說禮者有之；貫穿歷代興亡，提綱擧要，較其良惡，千古瞭如指掌，蓋未有如寧王者」。

史略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不詳何人撰者，按宋志著錄史略三卷，不著撰人；又四庫著錄有宋高似孫史略六卷，此書不知孰作。臞仙史略，內府曾為刊行，見丁志。蜀府所刻，或卽朱權所撰也。

異域志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明志著錄寧獻王權異域志一卷（千頃堂目不載卷數，）則此刻亦獻王自纂刻也。

西遊記　魯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錢補元志著錄長春眞人西遊記二卷，云李志常述邱處機事。

寧藩書目一卷　不著編人　嘉靖二十年寧藩刊本

見四庫總目存目。提要云：「初寧獻王權，以永樂中改封南昌，日與文士往還，所纂輯及刊刻之書甚多。嘉靖二十年，多焜求得其書目，因命教授施文明校刊行之。所載書凡一百三十七種，詞曲院本道家煉度齋醮諸儀俱附焉。前有多焜序，及啓一通，後有施文明跋。多焜啓中所稱父王者，乃弋陽端惠王拱樻，以嘉靖初受命攝寧府事，多焜後亦襲封」。按此書近未見傳本，古今書刻所載弋陽王府刊刻諸書，當多見於此目也。

史通二十卷　唐劉知幾撰　嘉靖乙未（十四年）蜀府刊本

見繆續記。按此本卽正德間陸深所刊，其版後歸蜀府，修補印行，號稱己刊而已。蜀成王讓栩正德五年襲封，嘉靖二十六年薨，史載其「尤賢明，喜儒雅，不邇聲伎，創義學，修水利，振災邮」。撰有長春競辰稿十六卷，見千頃堂書目。

小學史斷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著錄宋南宮靖一小学史斷二卷。

小學史斷　遼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

史斷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載寧獻王權史斷一卷，明史權本傳亦云嘗撰史斷一卷，然四庫館臣據通鑑博論考此書即南宮靖一所作，非權撰也（見四庫總目通鑑博論提要）。此本當為寧王權自刻。

通鑑博論　弋陽王府本

見古今書刻。按明史寧獻王權傳，權嘗奉敕輯通鑑博論二卷。此書以洪武二十九年九月表上之，內府曾為刊刻，此殆權自刻也。

東萊呂氏西漢精華十四卷東漢精華十四卷

按瞿目云：「舊不題名，首標東萊呂氏，宋元時書肆本式也，此明藩重刻本，有刊板序」。

此本未見，瞿氏語焉不詳，不悉何藩所刻。

丙、子部

新書十卷　漢賈誼撰　正德乙亥（十年）吉府刊本

見愛日精廬藏書志（以下簡稱張志）、瞿目、皕宋樓藏書志（以下簡稱皕志）、繆記、明善本書經眼錄、明代版本圖錄。每半葉八行，行十八字，黑口，後有吉府右長史楊節跋。陸心源氏云：「查陸氏修于正德九年，吉府本據楊跋，重刊於正德十年，相距甚近，疑陸宗相所修之版，後歸吉府，改頭換面，掩為重刻耳。明人往往有此，不足怪也。陸本皆明朗，吉府本則卷六多模糊處。第三葉十一、十二、十三行，陸本有空白處，吉本則否。挖補痕跡顯然，尤為陸本即吉本之明證（皕志卷卅九）。其言可信。按明史此本為簡王見浚修補印行。

說苑二十卷　漢劉向撰　正德五年楚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中圖善目。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黑口，版心下記刻工姓名——張敏學、張好古、葉善、楊勝、未名呈、宗大等。

說苑二十卷　嘉靖乙未（十四年）楚府崇古書院重刊本

見儀顧堂題跋、莫錄、中圖善目。按此本行款版式與正德本同，唯無刻工名耳。卷末有嘉靖

乙未楚藩跋，云「先王敦古好學，體道崇經，念向為漢宗英，特為表章是書，刻諸藩邸。顧歲久磨滅，檢閱為艱，予因達纂善本，重用鋟梓」。據明史表，正德本係端王榮減所刻，愍王顯榕復重刻正德本也。

說苑二十卷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陸氏跋楚府本亦云：「是書明凡五刻，有四川蜀府本……」（儀顧堂題跋）。然此刻各目未見著錄。

新序十卷　漢劉向撰　嘉靖乙未（十四年）楚府崇古書院刊本

見古今書刻、陸跋、中國善目。按此本與說苑同時刻，版式行款亦與之同。

新序□卷　晉藩刊本

見嘉目，云莫郘亭舊藏，此本未見，不詳何時刻。

新序十卷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

新序十卷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

篆文忠經一卷　明朱厚熢篆　嘉靖乙卯（三十四年）益藩刊本

見中國善目。卷末有「嘉靖乙卯秋八月皇明宗室愼菴篆」二行，此本蓋與篆孝經同時刻。

忠經一卷　舊題漢馬融撰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

曹大家女教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隋唐志著錄曹大家女誡一卷，四庫收入存目。

鄭氏女孝經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總目儒家類存目著錄一卷（宋志入小說家類），云「唐朝散郎侯莫陳邈之妻鄭氏撰，其書仿孝經分十八章，章首皆假班大家以立言」。

小學　德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刻未見傳本，按宋志小學類著錄朱熹小學之書四卷。文公小學明代頗爲盛行，當即其書，惟不詳有無箋註。是書所錄，皆宋儒所謂養正之功，茲仿四庫，列入儒家。

邇言十二卷　宋劉炎撰　嘉靖乙丑（八年）光澤王府刊本

見四庫總目，提要云：「此本爲嘉靖乙丑光澤王所刊，考明史諸王世表，光澤王寵瀼，以成化

二十三年封，嘉靖二十五年薨。己丑為嘉靖八年，當即寵瀼。前有梅南生序，稱得鈔本於棠陵方思道。梅南生即寵別號也」。按寵瀼以遼惠王嫡二子封光澤王，古今書刻所載遼府本，即此刻也。

辯惑編五卷續編七卷附錄二卷　元謝應芳撰　明顧亮續　萬曆二年益藩木活字本

見中國善目。明藩以活字印書，尚不經見，今可考者，唯此書與蜀府欒城集二種而已。按明史表，此書乃恭王厚炫所刻。

養蒙大訓　代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錢補元志、千頃堂書目並錄此書十二卷，元熊大年撰。千頃堂目注云：「集先儒格言成歌詩以訓弟子」。

理學類編八卷　明張九韶撰　嘉靖壬寅（二十一年）益藩刊本

見丁志，前有嘉靖壬寅益王勿齋重刊序。按明史此本乃莊王厚燁所刻。

方氏女教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著錄，撰者、卷數不詳，疑為方孝孺氏所作。

補註釋文黃帝內經素問十二卷靈樞經十二卷　唐王冰註　趙府居敬堂刊本

見皕志、丁志、莫錄、觀海堂書目、明善本書經眼錄、明代版本圖錄、中國善目。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註雙行，版心小黑口，上刻「趙府居敬堂」五字，下記刻工名——仲、崔、煇、雲、孝侃、恒、倫等。

素問遺篇一卷　趙府刊本

按此書趙府曾先後兩次刻之。初刻於永樂宣德間趙簡王高燧，見明志、千頃堂書目。千頃堂目註：「世傳素問王冰注本，本缺七十二篇刺法論，七十三篇本病論注，簡王得全本補行之」。晚近流傳此書所謂元本者，殆即簡王刻本也。次刻於嘉靖間康王厚煜，即與內經靈樞經合刻者，見皕志等目。

脈經十卷　晉王叔和撰　趙府居堂刊本

見郋園藏書志。版心上有「趙府居敬堂」五字，亦嘉靖間康王所刻。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三十卷　宋唐慎微撰　嘉靖丁酉（十六年）楚府崇本書院刊本

見中國善目。此書乃翻刻成化四年山東巡撫原傑本，故版式行款與成化本同。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唯成化本於本草原文作墨地白文，此本仍為墨文而以括弧別之。卷末有嘉靖丁酉孟春月吉楚府崇本書院重刊」木記一行按此書係愍王顯榕所刻，愍王曾刻五經，

說苑、新序。崇本書院又稱崇古書院。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三十卷　宋唐愼微撰　萬曆五年蜀府刊本

見天祿琳琅書目卷九，前有萬曆五年周叙序，蜀府承奉正陳珙奉王命校刻，此本亦遞翻成化本也。

醫說十卷　宋張杲撰　嘉靖丙午（二十五年）瀋藩刊本

見經籍訪古志、丁志。前有張子立序，末有高節後序。按明史表此本乃憲王胤栘所刻。

保幼大全　代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著錄宋何大任太醫局保幼大全二十卷。此書本名小兒衛生總微方論，明人刻本始改為保幼大全也。

千金寶要六卷　宋郭思編　隆慶六年秦藩石刻拓印本

見平津館鑒藏書籍記、中國善目。每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凡石一百六十五塊，前有隆慶六年秦王守中刻石序。石立陝西耀州眞人洞前，郘亭書目謂景泰中秦王刻石於耀州蓋誤。守中者，靖王敬鎔也。

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三卷　金張元素撰　寧藩刊本

見古今書刻、瞿目、故宮善本書目。按此書本張元素撰，此本題河間劉完素著者，蓋沿金刻本之誤也。

儒門事親　德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著錄此書十五卷，金張從正撰。

東垣十書十九卷　金李杲等撰　遼藩刊本

按此書遼府曾先後兩次刻之，初刻於永樂間簡王植，嘉靖八年遼藩光澤王重刊序曰：「簡祖乃梓行於時，至祖靖王之世，行之既久，版本漫缺……」。考明史簡王植以洪武二十五年封遼，永樂二十二薨。知此書洪武永樂間已曾刊行，唯今無傳本耳。至嘉靖八年光澤王又重刊之，見古今書刻、明代版本圖錄。光澤王名寵瀼，遼惠王之子，恭王之弟，史稱其有令德。此本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卷前有嘉靖八年光澤王序，版心下刻「梅南書屋」四字。按同年王又刊通言十二卷（見前）。

壽親養老新書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刻傳本未見，遜志齋集卷十二載方氏序此書云：「賢主治蜀，德政既修，國內又安。群臣有奉壽親養老新書以進者，覽之終卷歎曰……乃命工刻之」。則爲洪武間獻王

椿所刻也。按錢補元志著錄鄱鉉壽親養老新書四卷。

乾坤生意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明志著錄寧獻王權乾坤生意四卷，此本當為明初獻王自刻。

活人心法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著錄寧獻王權活人心法三卷（錄謙益列朝詩集小序及觀海堂目載朝鮮翻本均作二卷），此本當亦獻王自刻。

壽域神方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明志、列朝詩集小序著錄寧獻王權壽域神方四卷，此本當為獻王自刻。

新刊袖珍方大全四卷　明朱有燉編　洪武二十四年周府刊本

此刻傳本未見，按徐康前塵夢影錄云：「周府袖珍方皆狹行細字，宛然元刻，字形猶作趙體」。丁志著錄弘治翻本錄有洪武二十四年周王序云：「邇來雲南一載有餘，詢及醫書，十無七八。察其人病，或祭神祀鬼；間有病者求藥，而里無良醫；或恐其偏僻之見，求為殊異之方，遣次用行，死者多矣。乃於暇日集錄經驗諸方，始成一書，名之曰袖珍，命工刊梓，以

廣其傳」。知洪武間周府曾刊行矣。嘉目載有永樂間周藩刊本，殆劉氏之誤歟？抑永樂間周府又重刊之歟？其本未見，不能考知。明史載定王橚初封開封，洪武二十二年徙雲南，世子有燉理藩事，二十四年十二月勅橚歸藩。據此序則此書之纂刻，當為世子有燉，非定王也。又按千頃堂目載李恒袖珍方四卷，注云：「恒字伯常，合肥人，洪武初周府良醫，奉獻王命集」。是亦云為憲王有燉纂集。諸家著錄以為定王橚纂集，皆誤。周府纂輯之醫書，尚有普濟方、救荒本草，當時曾否刊刻，今已莫能考矣。

玉機微義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刻傳本未見，按四庫著錄此書五十卷，明徐用誠撰，劉純續增。

醫方選要　興府刊本

此刻未見著錄，按明徐春甫序古今醫統大全救荒本草云：「昔睿宗獻皇帝在藩邸，為生民念念，拳拳於醫藥，裒集醫方選要，刊布行世」。又按明史睿宗獻皇帝傳：睿宗興獻皇帝祐杬，憲宗第四子，成化二十三年封興王。弘治四年建邸德安，已改安陸，七年之藩。王嗜詩書，絕珍玩，不畜女樂。楚俗尚巫覡，而輕醫藥，乃選布良方，設藥餌以濟病者。正德十四年薨，後以子入嗣大統，是為世宗，追謚獻皇帝。是此書約刊於弘正間矣。千頃堂目著錄此書十

卷，云興獻王命本府良醫周文寀輯。此書四庫入存目，提要謂「周文寀爲蜀獻王椿侍醫時，承獻王之命所作，則洪武中人也」。館閣諸臣誤興獻王爲蜀獻王，殆偶失考。此書今倘有嘉靖間禮部刊本流傳，可覆按也。

羣書亞方　遼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著錄，編者、卷數不詳。

攝生衆妙方十一卷急救良方二卷　明張時徹編　隆慶三年衡府刊本

見繆記、中國善目。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每卷首行下題四明芝園主人集，第二行題益都堯岡山人校。卷前有隆慶三年衡王樂善子序，末有衡府醫正馬崇儒跋。按明史此書乃莊王厚燆所刻。

魯府秘方四卷　明劉應泰編　萬曆甲午（二十二年）魯府刊本

見四庫總目存目，提要云：「應泰嘗爲魯王府侍醫，前有萬曆甲午魯王序。考明史諸王傳，魯荒王檀，八世至敬王壽鏳，於萬曆二十二年嗣封，是年歲在甲午，蓋即壽鏳，故其序自稱魯王八代孫也」。按千頃堂目，此書即奉魯王命編輯也。

十神書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著錄，著者卷數不詳。按錢補元志醫家類載葛乾孫十藥神書一卷，疑即此書。

焦氏易林二卷　漢焦延壽撰　嘉靖辛酉（四十年）瀋藩勉學書院刊本

見丁志、莫錄。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前有嘉靖辛酉瀋藩西屏道人書於敕賜勉學書院之修業堂序。按明史表，此書乃宣王恬烄刻，史稱其「好學，工古文詞，審聲律」。嘗撰綠筠軒稿，見千頃堂目。

天原發微五卷　宋鮑雲龍撰　明鮑寧辨正　嘉靖庚戌（二十九年）秦藩刊本

見皕志、丁志。前有嘉靖庚戌秦藩掌中道人刊版序。按明史表，此書乃宣王懷埢刻。

靈棋經二卷　漢東方朔撰　正德十五年崇藩刊本

見郘亭書目、嘉目。按明史此書乃莊王祐樞刻。

靈棋經二卷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

星書一卷　宋蔡沈撰　嘉靖丁巳（三十六年）秦府刊本

見張志、皕志（舊抄本）。前有秦王重刊序。此書亦宣王懷埢刻。

臞仙肘後經二卷　明朱權撰　寧藩刊本

見古今書刻、明代版本圖錄。半葉十一行、黑口。

肘後神樞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明志著錄寧獻王肘後神樞二卷，則此書當亦寧王權自刻。

運化玄機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著錄寧獻王權運化玄樞二卷（明志及列朝詩集小序作一卷），當卽此書，殆朱權自纂刻也。

北斗課、天運紹統、冲溪子獲步大羅天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諸書未見著錄，著者卷數不詳。

潞藩新刻述古書法纂十卷　明朱常淓撰　崇禎丙子（九年）潞藩刊本

見丁志。此書為潞王自撰刻，前有潞國敬一主人序

太古遺音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撰者甚多，千頃堂目、明志著錄袁均哲撰二卷（國史經籍志作四卷），司馬泰文獻彙編收有謝琳撰無卷數，四庫藝術類存目載有明楊掄撰不分卷，此刻不知孰作。按

朱謀㙔藩獻記謂寧獻王權有太古遺音一書，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序亦云權著有太古遺音二卷，則此書當爲獻王權撰，殆亦其自刻也。

神奇秘譜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明志著錄寧王權神奇秘譜三卷。

琴阮啓蒙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明志著錄甯獻王權琴阮啓蒙譜一卷

棋經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不知孰撰，按宋志著錄張學士棋經一卷，四卷收有宋晏天章元元棋經一卷。

萬象仙機十卷　明敬一道人撰　崇禎間潞藩刊本

見中圖善目。敬一道人卽潞王朱常淓也，嘗撰刻書古今宗藩懿行考，述古書法纂，此書亦其自刻，板匡寬大悅目。此書所錄皆圍棋譜，流傳極罕，中圖藏本僅殘存八卷。

香譜四卷　宋陳敬撰　崇禎庚辰（十三年）益府刊本

見何厚甫培元經眼書目，此本係翻刻元至治本，按明史表此書乃末王由本所刻。

茶譜二十一種十二卷　不著編人　崇禎庚辰（十三年）益府刊本

見何厚甫培元經眼書目。凡陸羽茶經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蔡襄茶錄一卷，朱子安東溪試茶錄一卷，吳文錫茶略，孫大綬茶賦合一卷，屠本畯茗笈一卷香水清供錄一卷，曹士謨茶事拾遺一卷，續集古今茶譜五種一卷（內宋黃儒品茶要錄、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趙汝礪北苑別錄、沈括本朝茶錄、程百二品茶要錄補）續集古今茶譜六種一卷（內明許次紓茶疏、陸樹聲茶寮記七類、田藝蘅煮泉小品、馮可賓岕茶牋、屠隆茶牋、黃龍德茶說）。

飲膳正要　慶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存目著錄元和斯輝飲膳正要三卷。

獨斷　楚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著庫錄二卷，漢蔡邕撰。

化書六卷　五代譚峭撰　天順間代府刊本

此刻傳本未見，按瞿目、丁志著錄弘治翻本云天順間代府曾刊行，四庫提要亦云明初代府嘗為刊行。

仕學規範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刻傳本未見，遜志齋集卷十二載方孝儒序此書曰：「賢王殿下旣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刻以傳示好學者」。按自警編刻於洪武二十七年，此本當亦洪武末年蜀獻王椿所刻也。四庫著錄此書四十卷，宋張鎡撰。

自警編不分卷　宋趙善璙撰　洪武二十七年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丁志、故宮善本書目。此本係覆刻宋端平元年九江郡齋本，仍分爲甲、乙、丙丁、戊五集。

洞天清錄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著錄此書一卷，宋趙希鵠撰。提要云：「明甯獻王嘗爲刊版於江西，見寧藩書目」。則此書亦永樂至正統間甯府所刻。嘗疑周弘祖古今書刻所載弋陽王府刻書殆皆據寧藩書目，於此可得一證也。

養生雜纂　慶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存目著錄二十二卷，宋周守忠撰。

養生雜纂　遼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

養生日覽　遼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書錄，著者卷數不詳。按四庫存目著錄周守忠養生月覽二卷，疑即此書，古今書刻誤月為日也。

張文忠家訓　德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著錄，卷數不詳。按張養浩字希孟，號雲莊，濟南人，卒謚文忠，元史有傳，此書即其所撰。明藩刻書，亦多沿習宋郡齋漕司書刻故事，率取當地先賢著作傳刻。德藩國濟南，故刻張文忠之詩集，樂府（見後），家訓也。

簡生遺集　遼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著錄，撰者卷數不詳。

湘獻遺翰　遼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著錄，撰者卷數不詳。

便於蒐檢四卷　明衡王編　衡藩刊本

見中國善目。此書所錄為小學，忠經等，以篆文刻之，版心有便於蒐檢四字，卷前有無年月衡藩序。此書未見著錄，不詳為衡府何王編纂，觀其字體，約在嘉靖萬曆間。

初學記三十卷　唐徐堅撰　嘉靖甲午（十三年）晉府虛益堂刊本

見下志，觀海堂書目，中國善目。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版心下間刻有「晉府重刊」四字，卷前有嘉靖甲午晉藩虛益堂重刊序。此本係翻刻錫山安國桂坡館本。按明史表，簡王新㙉於嘉靖十二年以新化王長子奉敕管理府事，十五年嗣封，此本即其所刻。蓋端王知烊欲刻此書未就而薨，簡王紹其志而刻成也。

錦繡萬花谷前集四十卷後集四十卷續集四十卷　宋不著撰人　嘉靖乙未（十四年）徽藩崇古書院刊本

見繆續記，冀錄，明代版本圖錄，中國善目。每半葉九行，每行平列如雙行小註式，行十七字。所引書名以墨質白文表達，版心上有「勅賜崇古書院刻」七字，前有嘉靖十四年貫詠序略謂徽藩觀王得弘治間無錫華燧氏所印之錦繡萬花谷，重加讎校，命工鋟梓，此刻因覆刊華氏活字本，故字體一似活字也。按明史此本乃恭王厚爝刻。

錦繡萬花谷　楚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

羣書鈎玄　魯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存目著錄十二卷，元高耻傳撰。

原始秘書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存目著錄十卷。明寧王朱權撰，則此本當為獻王自刻。

續編錦囊詩對故事四卷　明不著撰人　嘉靖癸巳（十二年）　博平王府刊本

見中國善目。每半葉八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黑口。卷前有嘉靖癸巳傳平王敬齋序，不著撰人。按千頃堂目著錄博平恭裕王安淢（按明史「安淢」係「安泧」之誤）錦囊詩對，當即此書。恭裕王安泧，周惠王第十三子，弘治二年封，嘉靖三年薨，史稱：「惠王有子二十五人，而安泧獨賢，嘗輯貽後錄養正錄諸書。勤於治生，田園僮奴車馬甚具，賓客造門，傾己納之。其時稱名德者，必曰博平」。敬齋者，其子溫簡王睦柯也。

圓機活法五十卷　明不著編人　徽府刊本

見鄞范氏天一閣書目內編。

博物志　楚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著錄十卷，舊題晉張華撰。

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一卷　松溪道人無詬子註　隆慶戊辰（二年）代府刊本

見詒目，云前有隆慶戊辰代藩分封蒲陂山陰王元峰道人精一子者，山陰王俊柵也，以嘉靖卅七年襲封，萬曆三十一年薨。諸王傳云：「萬曆二十年，西夏弗寧，山陰王俊柵奏詩八章，寓規諷之旨。代處塞上，諸宗洊經禍亂，其言皆憂深思遠，有中朝士大夫所不及者」，蓋有識見者也。此書註者題松溪道人無詬子，不詳何人，明藩尊貴，筆札例不題名，以此揆之，殆亦代藩諸宗也。

法藏碎金錄十卷　宋晁迥撰　趙府居敬堂刊本

見蕘圃藏書題識續錄、瞿目、乙志、中圖善目。瞿目云：「陳氏書錄，晁氏讀書志俱作法藏碎金，案文元裔孫瑮跋語及此本版心亦無錄字，則卷首標題當是趙府臆加也。明嘉靖間瑮於館閣鈔得刻之。易名伽談。此本首列文元遺事數則，後有刻跋，版心有趙府居敬堂五字，蓋趙藩刻本，仍從原名也」。按嘉靖二十五年晁氏寶文堂刻本，今尚有傳本，亦題法藏碎金錄，不名伽談，瞿氏云云，蓋揣測之辭。此本乃康王厚煜所重刊寶文堂本，康王薨於嘉靖三十九年，其雕此書，則與晁刻相去為時不遠也。

神僧傳九卷明成祖御編　秦藩刊本

見丁志，云：「此書首列永樂十五年正月御製序，每卷有西天竺青河髮僧梓一行，則秦藩別

號也」。此書明永樂間內府曾刊行，此本當為重刻內府本，唯不詳何王也。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別旨一卷　晉葛洪撰　嘉靖乙丑（四十四年）魯藩承訓書院刊本

見丁志，莫錄、明善本書經眼錄，明代版本圖錄，中圖善目。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序文版心上刻「敕賜承訓書院」六字，餘僅「承訓書院」四字，下端頁數旁記刻工姓名，前有嘉靖乙丑大明六代孫魯藩務本健根序，云「是編之膾炙者眾矣，顧所傳鈔舛謬，乃與兒輩手校壽梓，以與同志者共之」。按明史：「奉國將軍健根，鉅野王陽鎣諸孫，博通經術，年七十猶縱談名理，亹亹不倦。嘉靖中詔褒其賢孝。子鎮國中尉觀瀝，字中立，居母喪，蔬食逾年，哀毀骨立。嘗繪太平圖上獻，世宗嘉獎之，賜承訓書院名額，並五經諸書」。據此，實魯府宗室刻也。四部叢刊景印，平津館翻刻，皆據此本，據黃蕘圃云，此本不及正統道藏本佳。

參同契　慶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二卷。

龍虎經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宋志神仙家著錄張隱居演龍虎上經二卷。

悟真篇　慶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宋志著錄張端金液還丹悟真篇一卷。

脩真十書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著錄脩真十書二十三卷，不著編人。此書正統本道藏亦收入，凡六十卷，計雜著指玄篇八卷，金丹大成集五卷，鍾呂傳道集三卷，雜著捷徑九卷，悟真篇五卷，玉隆集六卷，上清集八卷，武夷集八卷，盤山語錄一卷，黃庭內景五臟六腑圖一卷，黃庭內景玉經註三卷外景玉經註三卷。

神隱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明志載寧獻王臞仙神隱書四卷（四庫存目著錄神隱志二卷），此書當為獻王自刻。

救命索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著錄寧獻王權救命索一卷，此書當為朱權自刻。

浩歌　懽聲　老更狂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諸書未見著錄，撰者卷數不詳

金丹正理大全四十一卷　不書編人　嘉靖十七年周藩刊本

見明代版本圖錄，中圖善目。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版心四魚尾，卷末有嘉靖戊戌周藩萬嶽山人序。此書爲道書全集之一，所收有諸真立奧集成，龍虎經等多種，每書前多題紫霞山人涵蟾子編輯，不詳何人。

金丹正理大全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本未見著錄，或即翻周府本。

二十家子書二十八卷　明謝其威編　萬曆六年吉藩崇德書院刊本

見中圖善目。皕志著錄殘帙數種，謂爲徽藩崇德書院刊，殆即此本之誤也。此本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白口，版匡上有批註，版心上刻「崇德書院」四字，下記刻工姓名。前有萬曆六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省序，次吉藩潭洲道人德山子序，謂：「謝卿於侍講之暇，語及諸子書二十餘種於前任時元祐宮得之道藏中者，校讎多年，玩味有得，手錄進呈。孤……于是命工刊刻，以廣其傳」。則此刻係自道藏本出也。凡老子道德經二卷，關尹子文始真經一卷，亢倉子洞靈真經一卷，文子通玄真經一卷，尹文子一卷，子華子二卷，鬻子一卷，公孫龍子一卷，鬼谷子一卷，列子冲虛真經二卷，莊子南華真經三卷，荀子三卷，揚子法言

一卷，文中子中說一卷，抱朴子二卷，劉子一卷，黃石公素書一卷，玄真子一卷，天隱子一卷，無能子一卷。按明史，譚洲道人德山子者，宣王翊鑾也。

丁、集部

楚辭集註八卷辯證二卷後語六卷　宋朱熹撰　萬曆丁酉（二十五年）吉府刊本

見繆記、故宮善目。此書係吉府承奉司常山暘谷魏椿奉宣王翊鑾命重刊。

陶淵明集　慶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此書四庫著錄八卷，然宋明刻本率多十卷。

昭明太子文集五卷　梁蕭統撰　遼國寶訓堂刊本

見平津館鑒藏書籍記、繆記、莫錄、中圖善目。四部叢刊影印亦即此本，每半葉八行，行十六字，白口，卷一第三行題「大明遼國寶訓堂重梓」，第四、五兩行題「明成都楊慎、周滿。東吳周復俊、皇甫防校刊」。卷末有嘉靖乙卯周滿後序，蓋遼藩重刻周本也。

分類補註李太白集三十卷　唐李白撰　宋楊齊賢註　元蕭士贇補註　嘉靖己丑（八年）靖江王府懋德堂刊本

見嘉目。按靖江王府同年又刻杜集（見後），此本版式當與之同。據明史此本乃恭惠王邦寧刻。

李白詩　弋陽王府刋本

見古今書刻。按分類補註李詩，元明之際頗為盛行，是刻當亦此類。此書明代流行者凡有三十卷本及二十五卷本兩種，此刻不悉若干卷。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二十卷　唐杜甫撰　宋劉會孟評點　嘉靖己丑（八年）靖江王府懋德堂刋本

見中圖善目。此書與李太白集同年刋行。此刻每半葉八行，行十八字，黑口，版心下記刻工名，墨質白文。卷前有嘉靖己丑靖江王序，云「得蜀郡所刋集千家註批點杜詩者而觀之，因其註索其理，則少陵之微辭奧旨，愛君憂國之意，宛然在目，乃命工梓之」。序所謂蜀刻者，殆即元高楚芳刋本，此本即覆刻元本。元本今尚有存者，即聊城楊氏楹書隅錄著錄本，亦八行十八字也。

杜詩選注　趙府刋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著錄董養性杜詩選注四卷。養性字邁公，樂陵人，元至正中嘗官昭化令，攝劍州事，入明不仕，終於家，自稱臨川高閒雲叟。

欒城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　宋蘇轍撰　嘉靖辛丑（二十年）蜀藩活字本

見繆記、明代版本圖錄、中國善目。四部叢刊景印亦據此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前有嘉靖辛丑劉天謨、王珩二序，及崔廷槐後序。按明史表此書乃成王讓栩所刊，成王曾刻史通，見前。

重編海瓊白玉蟾文集六卷續集二卷　宋葛長庚撰　正統間寧藩刊本

見擘經室外集。阮氏跋云：「此本乃明正統間遐齡老人臞仙重編。臞仙序中述及玉蟾有上清、玉隆、武夷三集內未入者收之，余重新校正，定為八卷，附錄一冊，及霞侶奉酬之元韻，仍綴諸卷末，而壽諸梓，以永其傳焉」。臞仙者，寧獻王權也。史載權自遷南昌後，「日韜晦，構精廬一區，鼓琴讀書其間」。又云：「日與文學士相往還，託志翀舉，自號臞仙」。臞仙刻書，多在洪武永樂年間，所纂刻者，率多道家修性保命之作，此書蓋其晚年編刻也。

西湖百詠一卷　宋董嗣杲撰　明陳贄和韻　嘉靖丁酉（十六年）周藩南陵王刊本

此刻傳本未見，酉志著錄舊抄本，即傳抄此刻，云前有嘉靖丁酉周藩南陵王序。按南陵王雲樓子重刻序亦見載於明田汝成西湖志。此本所載嗣杲原倡及贄所和，各九十六首，共一百九十二首，序稱「謂之百詠者，蓋亦極言之耳」。然此書天順刻本書各百詠，鮑廷博跋謂：「疑周藩翻雕之時，其底本偶有脫頁，未及深考，遂以為原闕四首」（四庫提要引），其言是

也。按明史表，雲樓子者，南陵莊裕王睦楧也。以正德八年封，隆慶元年薨。史稱其一敏達有識，嘉靖末年，曾條上七議：請立宗學以崇德教，設科選以勵人才，嚴保勘以杜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餐，戒奔競以息饕貪，制拜掃以廣孝思，立憂制以省祿費。後頒宗藩條例，多採其議焉。

薩天錫詩　曾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錢補元志著錄薩都拉雁門集八卷、集外詩一卷。四庫著錄據汲古閣刻本則僅三卷。

靜修先生文集三〇卷　元劉因撰　成化乙亥（十五年）蜀藩刊本

見嘉目，又丁志著錄弘治十八年崔嵩翻本亦云成化乙亥蜀藩曾序刊之，繆志謂為肅府重刊，蓋誤。按明史此書乃惠王申鑿所刊，申鑿撰有惠園集，見千頃堂書目。

張文忠詩集　德藩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此書乃元張養浩撰，德藩嘗刻文忠家訓（見前），此書當同時刻也。張文忠集之卷數，各家著錄本歧異不一。今傳元刻本凡四十卷，明末刊本則僅二十七卷，四庫自永樂大典輯出，釐為二十四卷。凡此諸本，詩文俱有，單刻詩集，傳本未見。焦竑國史經籍志

載張文忠集十八卷，或僅詩集歟？

鶴年先生詩集一卷附錄一卷　元丁鶴年撰　明管延枝編　正統九年楚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丁志。前有正統九年楚藩序，云「鶴年先生讀書樂道，嘗見知於我祖昭王暨我考莊主，禮遇甚厚。予理國之暇，檢閱先生詩稿讀之，皆舂容典雅，溫厚和平。凡忠君愛國之誠，憂喜勞逸之意，一於是發焉。昔兄憲王欲梓未果，爰命本府紀善管延枝、馬純編輯校刊」。按明史表此書係康王季㑭所刻，明志載丁鶴年海巢集三卷，注云：「本西域人，後家武昌，永樂中始卒，楚憲王為刻其集」（千頃堂目略同）。憲王蓋康王之訛也。然二者卷數相異，今傳之正統二年章琦武昌刻本亦為三卷，丁氏所藏，豈殘本耶？

蚓竅集十卷　明管時敏撰　楚府刊本

見四庫總目。提要云：「敏初名訥，以字行，華亭人。洪武九年徵拜楚王府紀善，從王之國，後進左長史，事楚王楨。二十五年，乞致仕歸里，楨請命於朝，留居武昌，祿之終身。是集即楚王所刊，中有丁鶴年評語，鶴年家於武昌，與時敏皆為楚王所禮重，故并其評語刻之」。

清江先生文集　明貝瓊撰　楚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著錄清江文集三十卷，四庫著錄本較增海昌集一卷。

斗南老人集六卷　明胡奎撰　寧府文英館刊本

見古今書刻、四庫總目。四庫提要云：「奎字虛白，海寧人。先元至順間。嘗遊貢師泰之門，明初以儒學徵，官寧王府教授，是集前有寧王權序。此本為明初寧王府文英館所刊，見於寧藩書目」。

頤菴文集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傳本未見，按明志著錄胡儼頤菴文集三十卷。儼字若思，南昌人，洪熙元年，致仕家居，明史有傳。此本殆亦寧王權刻也。

頤菴文選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著錄二卷，胡儼撰，不詳編人。又千頃堂目載吳國倫編頤菴文選十二卷。

大明中興頌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傳本未見，按千頃堂目騷賦類載有王起東大明頌無卷數，注云：「上虞人，洪武二十三年十月獻頌以為禮部試右侍郎」。當即此書。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方孝孺撰　嘉靖二十年蜀藩刊本

見中圖善目。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前有嘉靖二十年四川巡撫劉大謨序，云：「其鄉人趙君弘道、侯君世言繼參蜀藩，攜以自隨。今殿下適菴，夙勤儒慕，卽取而梓諸書麻，以傳播之」。適菴者，成王讓栩也。

採芝吟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傳本未見，按千頃堂目著錄採芝吟四卷，寧獻王權撰。

梅花百詠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傳本未見，按咏梅之什，歷代有之。宋志著錄有宋李祺梅花百詠一卷；四庫著錄有元馮子振與釋明本唱和梅花百詠一卷；千頃堂目載有明楊光溥、侯肱梅花百詠無卷數。寧藩所刻，不知孰作，或朱權自撰歟？

遺稿五卷蓮詞二册　明遼簡王植撰　遼府刊本

見千頃堂書目，云：「簡王、高皇帝第十五子，洪武十四年封，二十六年之國遼東廣寧州，永樂二年遷荊州。遺集曾孫惠王恩鑙所刊」。按明史表：惠王恩鑙成化十六年襲封，弘治八年薨。則此本刻於成弘間矣。

擬古感興詩一卷　明漢王高煦撰　漢府刊本

見千頃堂書目。注云：「凡二十八篇。列朝詩（按即錢謙益列朝詩集）云：其臣僚嘗爲鏤版行世」。按明史、高煦以永樂二年封，十五年就藩樂安州，宣德元年八月反，削爵。則此本當刻於永樂末年也。

誠齋牡丹百詠一卷梅花百詠一卷玉堂春百詠一卷　明周憲王有燉撰　宣德五至六年周藩刊本

見中圖善目。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黑口，前有周藩書引。按憲王有燉，洪熙元年襲封，正統四年薨。史稱其博學善書。尚撰有誠齋新錄三卷，誠齋遺稿一册，見千頃堂書目。

一齋詩十卷　明唐莊王芝址撰　唐藩刊本

此書未見著錄，按朱彌鍗覽天小稿卷十二一齋詩序云：「余先考莊王幼耽經史，老而彌篤；餘力暇日，時出詠言。諸體皆備，萬象畢隨……余嗣守藩服，涵泳有年，因命儒臣，次爲十卷，寫之文荷，以永其傳」。彌鍗嗣封於成化二十三年，嘉靖二年薨，則此集約刻於弘正間也。

小鳴藁十卷　明秦簡王誠泳撰　弘治間秦府刊本

見千頃堂目書目、四庫總目。四庫提要云：「誠泳號賓竹道人，太祖五世孫也。弘治元年，

以鎮安王襲封，十一年薨，謚曰簡。明史諸王列傳，稱誠泳性孝友恭謹，嘗銘冠服以自警，所著有經進小鳴集。既薨，紀善強晟，校刻其詩。嘉靖初王孫定王維焯表上之，詔送史館。史稱經進，蓋由於此。此本不題經進字，蓋刻在前而進在後也」。

羅川剪雪詩一卷　明強晟撰　弘治甲寅（七年）秦府刊本

見中圖善目。每半葉九行，行十五字，黑口，前有弘治甲寅秦藩序。強晟官秦府紀善，故簡王爲刻其集也。此書傳本甚早，千頃堂目、明志及四庫俱未著錄。

敬軒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　明薛瑄撰　嘉靖三十五年趙府味經堂刊本

見中圖善目。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白口，版心上刻「趙府味經堂」五字，下記刻工名——仲、隆、孝、弟、卿、恒、侃、陞、崔、回。前有嘉靖三十五年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王崇慶序，云：「陳君文岡乃謀及趙王枕易賢殿下梓行之」。按味經堂，一名居敬堂，刻書甚多，率無序跋，年代不可考。據此刻可證之蓋康王厚煜之堂名也。

甕天小稿十二卷　明唐成王彌鍗撰　嘉靖庚子（十九年）唐藩刊本

見中圖善目。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前有嘉靖庚子唐藩思誠子居善堂刻書序。成王彌鍗薨於嘉靖二年，以弟彌鉗子宇温嗣爵。思誠子者，即敬王宇温也。

謙光堂詩集八卷　明文城王彌鉗撰　嘉靖二十年唐藩刊本

見中國善目。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此本亦敬王宇溫刻。彌鉗者唐成王弟，敬王宇溫生父，初封文城，以子襲藩，改稱唐王，定謚曰敬。史稱其「有學行，孝友篤」。

雪峰詩集八卷　明岷靖王彥汰撰　嘉靖十四年岷府刊本

見中國善目。每半葉八行，行十四字（上空一格），黑口，題皇明親藩雪峰道人著。卷前附嘉靖乙酉廖道南撰懿行紀紀，次乙未岷府左長史祝文冕序，十四年漢川王譽𣗳纂修敍，末有李邦彥、謝應麒後序。此本蓋靖王子漢川王譽𣗳所編刻也。按明史、彥汰於嘉靖四年以抗制擅權革爵，十二年賜冠帶理府事，十五年以兩宮徽號恩復。此書刻時，尚在復爵前。此書傳本甚罕，千頃堂目，明志及四庫均未著錄。

洹詞十二卷　明崔銑撰　趙府味經堂刊本

見丁志、詒目、中國善目。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版心上刻「趙府味經堂」五字。

柏齋集十一卷　明何瑭撰　嘉靖己酉（二十八年）鄭藩刊本

見四庫總目。提要云：「集凡文十卷，詩一卷，為嘉靖己酉鄭王所刻。鄭世子載堉，即瑭之甥」按明史此集乃恭王厚烷刻。厚烷於嘉靖二十九年，因祐橏之誣陷反叛，削爵錮之鳳陽，

隆慶元年始復。此集之刻，適在其削爵前一年也。

四溟山人全集二十四卷　明謝榛撰　萬曆甲辰（三十二年）趙府冰玉堂刊本

見中圖善目，嘉目著錄此本謂為嘉靖丁未刊，蓋誤。此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版心上有「趙府冰玉堂」五字，下記刻工姓名——崔恩、吳、崔德、裴世璺、王真、王廷召、崔一後、裴國登、張奉、李福等。前有嘉靖丁未趙王枕易道人序，萬曆丙申趙王恒易道人序，嘉靖庚戌蘇祐序，及萬曆間張泰徵、邢雲路、張季彥等序，後有蘇潢、陳養才及萬曆甲辰程兆桐三跋。按茂秦集，趙府先後曾三刻之。初刻於嘉靖丁未，題四溟旅人集，康王序之，書凡四卷。傅氏沅叔謂曾於文友書坊見之（見藏園羣書題記），然未見於簿錄也。二刻於萬曆丙甲（二十四年），題曰四溟山人全集，康王曾孫穆王序之，傳本亦未見。三刻於甲辰，即此本也。此本乃就丙申本重加校訂，蓋因前刻挂漏居多，因屬內翰丁子裕董正其事，而翻刻之。程兆相跋所謂「訂其所為魯魚，訂其所為錯亂，得字數千有奇，頤指剞劂，將謂可稱善本」也。此書傳本甚罕，四庫著錄及清光緒間新昌胡氏問影樓叢刻，皆據萬曆四十年臨清知州戚以進編刻之十卷本也。

中丞馬先生文集八卷　明馬卿撰　崇禎九年趙藩刊本

見嘉目。按嘉業堂藏此書，今歸國立中央圖書館。其本前有崇禎九年趙王義易道人重刻序，云：「忽云書肆中見一板，刻三陽書屋。余不覺驚起而問，此外祖馬氏家刻，在於何處？取來，果是此書。急急遍尋，僅得百餘葉，尚缺大半。余遂取家園之梨，捐祿金，補刻全帙」。蓋馬氏家原刻，趙藩修補印行，非其所刊也。此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版心上有「三陽書屋」四字。此書四庫失收。

雲仙集四卷　明朱勛潏撰　嘉靖己亥（十八年）瀋藩刊本

見中圖善目。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白口，每卷首葉題雲仙散人著，姪子南岑胤梴子胤榛校正。前有嘉靖己亥瀋藩南山序，庚子何瑭序，辛丑栗應宏序，後有己亥子胤榛跋，云：「家君上承先王之傳，獨得聖賢之學，藏脩之暇，製為詩文，不下數千百篇。榛每承庭訓之餘，輒自手錄成卷，慮恐散失，將壽諸梓，於是請於我瀋國主南山，忻然命刻之」。南山者，憲王胤栘也，自號南山道人，嘗撰集名保和齋稿，見千頃堂書目。

胥臺集二十卷　明袁袠撰　萬曆甲中（十二年）衡藩重刊本

見四庫總目。提要云：「此書初為其嗣子尊尼所刊，詩文各十卷，題曰袁永之集。此本為萬曆甲中衡藩所重刊，改題曰胥臺集，實即一書。前有左長史鄭復亨序，言衡府司理張炳忠，

為衷之甥，以是集贄於衡王，因為開雕云」。按明史此集係安王載封所刻。

少鵠詩稿八卷　明武岡保康王顯槐撰　嘉靖間武岡王府刊本

見中國善目，四庫著錄亦即此本，唯標題少鵠詩集，與此微異。此本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白口，版心下記刻工姓名——鄭、吳、蔣、高、艾、吳仕等。無總目，目錄分附於各卷前，每卷首葉第二行題楚國武岡王著，前有勅監湖廣戶部主事岳東升序，少鵠者，楚端王榮㳚三子顯槐，端王嘗自號黃鵠道人，故顯槐自稱少鵠，以嘉靖十七年封武岡王。史載其於嘉靖四十三年上書條藩政，請設宗學，擇立宗正宗表督課。明末親王子弟之須入學，考績陟黜，自其發之。千頃堂目載其尚著有文集及續集八卷，今皆不傳。

東樂軒詩集六卷　明弋陽端惠王拱樻撰　嘉靖三十年弋陽王府刊本

見中國善目。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每卷首葉題「皇明管理府事弋陽惠王醒齋著」，前有盧陵胡經序，後有嘉靖三十年子多焜跋。按明史：自寧藩宸濠以反叛伏誅，即以弋陽王拱樻攝府事，嘉靖三十年薨。此本為恭懿王多焜所刻，適端惠王方薨也。千頃堂目僅著錄其訓忠堂集四卷，未載此書，四庫亦未收。

東館岳音十卷續集十卷　明益敬王常遷撰　萬曆間益府刊本

見中圖善目。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黑口，每卷題益世子仙源道人著，前有萬曆己丑韓國禎、許國二序。仙源道人者，敬王常遷也。常遷以萬曆九年封世子，三十三年襲封，此集之刻，在襲爵前。此書四庫未收，千頃堂目著錄僅四卷，蓋未見原書也。

文選六十卷　梁蕭統編　唐李善註　成化二十三年唐藩刊本

見瞿目、陸續跋、繆續記、故宮善目、中圖善目。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黑口，每卷首葉有「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二十字分刻兩行，前有成化丁未唐藩序。蓋唐藩重刻元池州路本。按此本唐藩序每為書賈撤去，以充元本，藏家每受其欺。雖精鑒如孫淵如、莫伯驥亦不免為所愚也。

文選六十卷　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　嘉靖四年晉藩養德書院刊本

見丁志、繆續記、諳目、中圖善目。此刻亦翻雕元張伯顏池州路本，每卷首葉有「晉府敕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一行，前有嘉靖四年晉藩書於敕賜養德書院序，六年晉藩後序，及八年晉王知烊序。按此本乃端王知烊刻，知烊所刻總集甚多，據葉德輝氏云皆非善本。

文選六十卷　梁蕭統編　萬曆戊寅（六年）楚府刊本

見中圖善目。此本白文無注，傳本甚希，卷末有「萬曆戊寅歲楚府校刊」雙行木記一方。按

明史表此書爲末王華奎刻，華奎以萬曆六年封世子，八年襲爵。

選詩　遼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傳本未見，當卽就昭明文選中詩篇編刻之。按今傳者有明末郭正域批點之選詩七卷。

唐文粹一百卷　宋姚鉉編　嘉靖八年晉藩養德書院刊本

見天祿琳琅後編、日本圖書寮善本書目、嘉目、詒目、故宮善目、中圖善目。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卷前有世宗璽書一道，次嘉靖己丑晉王知烊序，卷末有「晉府敕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刻」一行。

文苑英華　慶藩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著錄一千卷，宋李昉等奉勅編。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　宋呂祖謙編　嘉靖五年晉藩志道堂刊本

見天祿琳琅後編、平津館鑒藏書籍記、丁志、皕志、莫錄、日本圖書寮善本書目、故宮善目、觀海堂書目、中圖善目。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一字，黑口，有嘉靖五年晉藩志道堂重刊序，晉藩書於養德書院後序，嘉靖八年五月十三日皇帝書復一道，及知烊恭謝璽書序文。志

道堂、養德書院皆端王知烊之齋名。此本版式與天順閩嚴州本相同，當亦翻刻宋慶元太平府學本。

古文關鍵　楚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著錄二卷，宋呂祖謙編。

古文關鍵　蜀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

三體唐詩　楚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著錄六卷（錢補元志載四卷），宋周弼編。

唐詩鼓吹　慶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錢補元志及四庫著錄十卷，金元好問編，元郝天挺注。

元文類七十卷　元蘇天爵編　嘉靖丁酉（十六年）晉府刊本

見繆記、明代版本圖錄、中圖善目。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前有嘉靖丁酉晉藩序。此書蓋端王知烊欲刻未就而薨，簡王新㙉踵其志而刻成。書式仿元西湖書院本，則為重刻元本也。

據序稱尚欲刻程敏政之明文衡，傳本未見，當未刻成。

唐詩正聲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明志著錄高棅編，二十二卷，四庫未收。

璇璣迴文詩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著錄寧獻王編集璇璣回文詩詞三卷，當為明初朱權自刻。

增廣唐詩　慶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著錄慶靖王凝真軒增唐詩鼓吹續編十卷，當即此書。慶藩既刻唐詩鼓吹，又纂刻此以廣續之也。

文章類選四十卷　明慶靖王㮵編　洪武三十一年慶藩刊本

見古今書刻，四庫總目。提要云：「不著編輯者名氏（按千頃堂目著錄慶靖王㮵凝真子文章類選四十卷），前有洪武三十一年凝真子序，并慶府圖章。以史考之，蓋慶王㮵也。為太祖第十六子，好學有文。洪武二十六年，就藩寧夏，三十六年始建邸。是書刊於三十一年，則在建邸後矣」。

增奇集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著錄，編者不詳。中央圖書館藏有此書明刻本一部，前後無序跋，題

紫霞洞天編，收錄皆唐人詩文。該本半葉十一行，白口，觀其字體，約刊於正嘉間；相其版式，似為藩府所刻，殆即寧藩所編刊歟？

元詩體要十四卷　明宋公傳編　正德己卯（十四年）遼藩重刊本

見四庫標注、中國善目。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黑口，前有正德己卯遼藩序。宋氏名緒，字公傳，以字行。

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　明李伯璵、馮原編　成化八至九年淮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中國善目。四庫著錄亦即此本，提要云：「伯璵、上海人，官淮王府長史。原、慈谿人，官淮王府紀善。是書即奉淮王之命作也。前有淮王序，自稱西江頤仙。案明史康王祁銓，以正統十一年嗣封。此書作成於成化弘治間，則所稱頤仙者，即祁銓也」。

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　嘉靖丙申（二十五年）淮府重校刊本

見故宮善目、中國善目。按明史此本係莊王祐棨重刻成化本。

瓊芳集二卷　明淮康王祁銓編　成化十四年淮府刊本

見中國善目。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黑口，題西江頤仙編，前有成化十四年淮藩序。西江頤仙者，康王祁銓也。此書傳本甚稀，千頃堂目、明志及四庫皆未著錄。

秦漢文　汝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著錄胡纘宗秦漢文粹四卷，此書今傳本，但題秦漢文，無粹字，汝府所刻，當卽此書。按明史：「汝安王祐梈，憲宗第十一子，弘治十四年之藩衛輝，嘉靖二十年薨，無子封除」。汝府刻書無多，所可考者，僅此一種耳。

唐詩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編者、卷數不詳。

唐詩古今註　慶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著錄，編者、卷數不詳。

盛明十二家詩選十二卷　明益宣王翊鈏編　萬曆乙酉（十三年）益府刊本

見中國善目。此書千頃堂目著錄，不載編人。此本題潢南主人編，據前益藩序，知其自編刻也。按明史宣王翊鈏萬曆八年襲封，三十一年薨。

海嶽靈秀集二十二卷　明朱觀熰編　萬曆間魯藩刊本

見日本圖書寮善本書目，云版心有「敕賜承訓書院」六字。按觀熰、魯府鉅野王陽鎣諸孫，奉國將軍健根子，封鎮國將軍，嘉靖中，嘗繪太平圖上獻，世宗賜承訓書院名額以嘉獎之。

此書蓋其自編刻，非會王刊也。承訓書院曾刻抱朴子，見前。

增修詩話總龜九十八卷　宋阮閱撰　嘉靖二十三年淮府刊本

此書傳本甚多，各家多曾著錄，然咸題宗室月牕道人刊。按此本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卷一第三行題皇明宗室月牕道人刊，前有整飭山東海道副使郴陽李易，及江西饒州府同知海鹽張嘉秀兩序，卷末有書寫貴溪姜輔周、刊字番易某某、樂平胡還等名。李易序稱「淮伯王月牕」，張嘉秀亦序謂「月牕殿下，高皇六世孫」。則月牕道人者，當即淮憲王厚燾也。厚燾襲封於嘉靖十八年，四十二年薨。此書係經月牕改編，題阮一閱撰，四庫提要評其疏舛。

詩人玉屑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著錄二十卷，宋魏慶之撰。

詩林廣記　慶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四庫著錄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宋蔡正孫撰。

臞仙文譜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明志，千頃堂目著錄寧獻王權文譜八卷。

臞仙詩譜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明志、千頃堂目著錄寧獻王權詩譜一卷。

江西詩法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明志、千頃堂目著錄寧獻王權江西詩法一卷。以上三書當爲明初朱權自刻，今皆失傳。

文章歐治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著錄，撰者卷數不詳。

文章荃蹄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此書未見著錄，撰者卷數不詳。

孏仙詩評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著錄寧靖王奠培竹林孏仙松石軒詩評二卷（明志載一卷）。據明史表靖王奠培正統十四年襲封，弘治四年薨，史稱其善文辭，又撰有却埽吟及擬古詩二百篇，見千頃堂書目，諸書今皆不傳。

雲莊樂府　德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錢補元志、千頃堂目著錄元張養浩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一卷，四庫未收。德藩曾刊張文忠之詩集及家訓，此書當為同時所刻也。

太和正音譜二卷　明寧獻王權撰　洪武三十一年寧藩刻本

此刻今不傳，丁志及中圖善目著錄有傳抄本，題丹邱先生涵虛子編，前有龍集戊寅寧藩序，云：「余因清讌之餘，採庶當代羣英詞章，及元老儒所作，依聲定調，按名分譜，集為二卷，目之曰太和正音譜；審音定律，輯為一卷，目之曰瓊林雅韻；蒐獵羣語，輯為四卷，目之曰務頭集韻。以壽諸梓，為樂府楷式」。按戊寅為洪武三十一年，古今書刻所載弋陽王府刻之太和正韻，當卽此書。千頃堂目及錢補元志著錄元丹邱子太和正音譜十二卷，則誤矣。

瓊林雅韻一卷　明寧獻王權編　洪武三十一年寧藩刊本

見古今書刻、丁志。前有寧藩自序，序後有洪武戊寅胡盧木印。

務頭集韻四卷　明寧獻王權撰　洪武三十一寧藩刊本

此書未見著錄，據前引寧藩太和正音譜序，知寧藩曾刻之也。

大雅詩韻　弋陽王府刊本

見古今書刻。按千頃堂目著錄寧獻王大雅詩韻七卷，注云正統辛酉（六年）序，則此書殆寧王權

王權晚年所刻也。

附記

嘉目著有明怡府明善堂刊本春秋胡傳三十卷。按：明代無怡藩；明善堂乃清代雍乾間怡親王允祥之堂名，又名安樂堂，藏書甚富。劉氏蓋偶失考，誤為明藩也。

歷代版刻的演變

印刷術是傳播文化最重要的工具，這一項偉大技術的發明，是我們祖先對世界文化所提供的四大貢獻之一。這種方法在我國盛時，逐漸東傳高麗、日本，西被中亞，又輾轉影響及於歐州。在十五世紀中葉，西洋印刷術的始祖德國約翰谷騰堡剛開始試驗製造活字版時，我國印刷術已有了輝煌的成就。

在談到印刷術的發明，我們先要明瞭它的淵源，以及它發明的背景。我們祖先是喜歡使用印章的，官私的文書必定要加蓋璽印以資憑信，這種習慣一直沿襲到現在。上古且不談，有實物可據的，印章在西元前一千多年的殷商時代就已經使用了。在漢代以前，我國文書，多為簡牘，所以璽印多施用於封泥上，為了清晰醒目的緣故，璽印多刻為陰文，鈐到封泥上就變成凸字。晉代以後，印章漸漸改用朱鈐到絹或紙上，所以字往往刻為陽文，印成朱色，故又稱作朱文。這時的印章字數多的，有多到上刻一百二十個字，如葛洪抱朴子中所述的越神章印是。大的有大到長一尺二寸，寬二寸五分，如通典中所載北齊的「督攝萬機」木印，是用來印籍縫的。假如用一尺多

長，上刻一百多字的印章鈐蓋到紙上，這不是與雕版印刷非常相似麼？所不同的，只在技術上，一種是鈐蓋，一種是刷印而已。

我國古代常常有將文字鐫刻在石碑或摩崖上，來紀功頌德。像石鼓文、詛楚文、秦始皇的瑯琊、嶧山、會稽、芝罘等石刻。又有將儒家的經典刻在石上，以作為定本，供士人抄寫或校勘用的，像東漢的熹平石經、魏正始間的三體石經、唐開成石經等等。約在西元第六世紀初年南朝蕭梁時代，就已經知道了用紙墨來拓碑的方法。用紙在石碑上摹拓，與雕版印刷，在形式上雖有不同，但在技術上卻是非常近似的。秦始皇的嶧山石刻自從在五世紀中葉被北魏太武帝排倒，而被山下居民用野火焚燬以後，民間有另外摹刻於石或摹雕於木來傳拓的。杜工部的李潮八分小篆歌有「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句，用棗木代石碑來傳刻摹拓，這與雕版印刷更接近了一步。印章與拓碑這兩種方法，無疑的是孕育我國雕版印刷術發明的前驅。

其次來談談印刷術發明的背景。我國自六朝以來，著作漸多。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書，不過一萬多卷。晉荀勗著中經新簿，著錄的也還不到三萬卷。到了隋書經籍志一共著錄了八萬多卷。而據新唐書藝文志載自唐初至開元這一百二十年間的著作，就多達二萬八千多卷。可見教育文化愈來愈普及。在當時固然也有藏書家，像宋周密齊東野語所記載，晉張華藏書三十車，梁元帝聚書

八萬卷，唐吳兢藏書一萬三千四百卷等，但這僅有帝王或顯官才有這樣大的財力。在一般好學的人，如想多讀書，僅靠傳抄，或購買昂貴的寫本，是非常感到不便的。在這種情形下，印刷術的發明，自然有其必要。至於直接促成印刷術的萌芽，根據現在有的資料來看，應當以佛教的影響爲最大，其次要推曆本。佛教自東漢明帝時傳入我國，歷南北朝而大盛。佛教有功德的說法，當時的信徒紛紛建立塔寺，雕造佛像，及繕寫經咒施人，以報功德。建塔寺，雕佛像固然需要很多錢，就是寫經咒，假如不能自寫而需請人來寫的話。根據記載，寫一張紙的報酬，多的要費二百五十錢，少的也要數十錢。這種功德當然只有有錢的人，才能做得起。一般平民爲了崇功報德，不得不另謀其他簡易省錢的方法。像敦煌所發現的許多佛像及經咒雕印品，日本所存最古刻本，神護景雲四年（西元七七〇年）印成的百萬塔陀羅尼咒，及民國初年在湖州天寧寺及杭州雷峰塔所出的五代吳越國王錢弘俶印陀羅尼咒，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曆書是農民所不可缺少的，何時耕耘，何時播種，農民都依據曆書爲準。在全唐文卷六二四有一篇馮宿禁板印時憲書疏，他說：「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可見農民對於廉價曆書需要的殷切。所以早期的印刷品，這類東西也不少。

我國印刷術究竟起源於什麼時候？史冊上沒有明白的記載。因之自來的學者有各種的推考，

字的有謂始於東漢的，其次有始於北齊說，及始於隋代說。這三種說法的起源，實在是前人對於古籍文義的誤解，都不可靠。今天限於時間的關係，而且東漢說與北齊說與實際情形也相去太遠，不加引辯。現在只對始於隋代的說法略加辯解。雕刻始於隋代說是首倡於明嘉靖年間的陸深，所著的河汾燕閒錄卷上說：「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西元五九三）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印書之始，又在馮瀛王之先。」日本島田翰雕版源流考引這段記載，改「悉令雕撰」為「悉令雕版」。並說此語出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今本作雕撰，而陸深為明人，猶及見舊本，而記云雕板，必宋藏中有作雕板的，以強調隋代已知印刷。又近人孫毓修著中國雕版源流考引敦煌石室書錄：「大隋求陀羅尼經上面，左有施主李和順一行，右有王文沼雕版一行，宋太平興國五年翻雕隋本」，遂謂雕版肇自隋時。這兩家的論據雖然不同，但都說是始於隋代。關於前一說，根據費長房所述的文意，雕指廢像，撰指遺經，絕無印刷的意思，清初的王漁洋在他所著的居易錄中，已予以辨正。今傳的宋磧砂藏經本歷代三寶記，及嘉靖二十四年原刻儼山外集本河汾燕閒錄都是作「悉令雕撰」。我們不曉得島田翰根據的是甚麼本子錯作「雕板」，而生此誤解。大隋求，是梵文— Mahapratisara 的譯語，即陀羅尼的名稱。譬如唐釋不空金剛所翻譯的也稱作大隋求陀羅尼經，而孫毓修氏誤當作隋唐的隋，而推衍為太平興國翻雕隋本，也是一個錯誤。根

據種種跡象來推測，我國早期的印刷品並不是不可能在隋代就已萌芽了，只是還沒有確證而已。

在現存的典籍中，記載我國有印刷品出現最早的時代，是在唐代初年。唐馮贄雲仙雜記卷五引僧園逸錄說：「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衆，每歲五馱無餘。」玄奘生於隋開皇二十年（西元六〇〇年），死於唐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年）。如果此說可靠，我國印刷術的起始，至遲已在七世紀的中葉。只是此書的作者，舊題唐馮贄撰，而四庫提要據張邦基墨莊漫錄考訂是北宋時王銍所偽撰。此書中所記載的，大都怪誕不經。所引的書，也多未見於著錄。所以對這條資料，前人常不敢採信。玄奘印普賢像施人的事，雖然在唐釋慧立所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及道宣續高僧傳中的玄奘傳都沒有記載。但慧立的三藏法師傳卷十敘及玄奘自印度求經返回長安後，在顯慶三年高宗派使臣來慰問及賜賚，云：「法師受已，皆為國造塔及營經像給施貧窮……發願造十俱胝像。」又說他在臨終時命嘉尚法師具錄他所翻的經論，及所「造像十俱胝」。可見玄奘確曾有造經像施貧窮的事。他曾造像十具胝的事，在道宣的玄奘傳及宋高僧傳中的嘉尚法師傳，亦有記載。在三藏法師傳中提到佛像有三種情形，一種是雕像，稱之為若干軀；一種是畫像，稱之為若干幬或幀。此處所說的「造像十俱胝」，是那一類的像，則傳中沒有明言。按俱胝是梵文中的一個數目字的譯音。據一切經音義的解釋，其數為一億，即一千萬，也有解釋作十萬、

或百萬的。不論俱胝是作十萬、百萬、或千萬來解釋，十俱胝總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當然不可能是雕像，也不會是繪像，因為據傳中所述的雕像最多不過二百餘軀，繪像最多的也只有一千論。只有一種情形，用印刷的方法，才可能有這麼許多。由此來推證，雲仙雜記引僧園逸錄玄奘印普賢像施人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我們不能因為這部書的作者出於後人偽託，而連它引錄的記載也不相信。

玄奘所印的普賢像是怎樣的呢？據我的看法，很可能是雕刻像印章似的，在紙上鈐蓋而成的。在敦煌石室中所發現這類的佛像很多，有整卷紙上鈐蓋着成百的小佛像。中央圖書館此次展出的有一卷唐人寫「佛說佛名經」中，卽鈐有這一類的小佛像，然後再用手來着彩色。用佛像印鈐蓋到紙上，印成佛像，在方法上雖然還不脫印章使用的範疇，但是在人類的思維上，却有了不同的意義。由僅僅是信符的作用，演進到可使圖像印製迅速的概念，不能不說是思想上的一個進步。雖然距離文字的印刷，可能還有一段歷程，但有這裏思想作動力，相信不會太遠了。所以可以說，至遲在西元第七世紀中葉、初唐時代，我國雕版印刷術就已經開始萌芽了。

根據舊籍的記載，在西元第九世紀，唐代的中晚年，雕版印書的事，已經相當的普遍了。自刻書的地域來說，至少有四川、河南、淮南、浙江、江西、敦煌等地。自刻書的範圍來說，除了

佛教的經咒而外，有詩集、曆書、字書、小學，及陰陽五行等書。不僅是短篇的民間通俗印刷品，大部頭的，士人必讀的小學書，如五卷的廣韻、三十卷的玉篇，也雕印過。當時印刷的技術如何？到了敦煌石室發現後，才使我們得到一個輪廓。斯坦因在敦煌得到了一卷唐懿宗咸通九年（八六八年）王玠刻印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現藏於英國不列顛博物館，近年台灣曾做原卷影印流傳。從這部金剛經印刷的清晰，字體的遒勁，卷端圖像雕刻的生動，可見第九世紀中葉，我國雕印的技術已經相當的進步，決不是短時間就可以達到這種水準的。

據前人的記載，唐代利用這種新發明的印刷術尚只限於私人。政府的雕印書籍，要到五代時才開始。五代長樂老馮道的雕印儒家經傳，在我國圖書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九二九年）滅蜀，受到四川人印書的影響，在長興三年（九三二年）宰相馮道奏准委國子監雕印羣經，至後周太祖廣順三年（九五三年）畢工，前後更換了四個朝代，而這項工作在馮道的支持下，未曾中綴，共費時二十二年。所雕印的計有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及孝經、論語、爾雅等九經三傳，附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種，這是儒家經典有印本之始。後來在顯德六年（九五九年）又刻了一部經典釋文。在同時又稍後，四川有毋昭裔的刻書。毋氏的刻書，最為前人所津津樂道。因為他在貧賤時，曾向人借文選、初學記，人有難色。於是他發憤，若日後

發達了，願刻印這兩部書，以普惠天下讀書人。後來他當了後蜀孟昶的宰相，果然如願以償，除了這兩部書外，又雕印了白氏六帖及九經。初，他刻書時，人都嗤笑他。到蜀亡於宋後，人家都破產，他卻家累千金，子孫都靠這些書版生活。五代的監本及毋氏的刻書，一部都沒有傳下來，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五代雕印本，除了湖州天寧寺所出的周顯德三年（九五六年）吳越王錢弘俶印陀羅尼經外，其餘的像法國巴黎圖書館所藏的唐韻、切韻，以及分藏於世界各地的佛教經咒，都是敦煌所出的。

唐代圖書的裝置，通行的有兩種型式。一種是卷軸式，這是自戰國以來紙未發明前用帛寫書的舊式。一種是葉子裝，這是受印度貝葉經的影響而採用的。至遲在初唐即已流行，所不同的只是改橫寫為直書。唐代的刻本，也沿用這兩種型式，如咸通本金剛經即作卷軸形，這部經是八塊版印成，粘為一卷的。每塊版刻四十多行，在版中空隙處刻註版數。敦煌所出的韻書，則大都作葉子式。但是卷軸舒卷困難，查閱甚不方便。葉子查閱固然簡便，然而容易散失錯亂。在唐代末年大概是受了印刷普及的影響，促成了我國書裝的改進。一種由卷子改進為摺疊，即是書仍粘成長幅，只是不捲，而每隔若干行摺疊起來，就是宋以來的所謂梵夾本或經摺裝。這種裝置法，其實是印度貝葉經遺制，所以後代僅限於釋家經典採用。由葉子則改為宋代的蝴蝶裝，這種演變的

過程從伯希和在敦煌所獲得的五代印本切韻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來。這部切韻殘紙有十六葉，每葉三十四行，形式就像宋代的蝴蝶裝的單葉，所不同的只是每葉中間未留版心，以三十四行為一版，每版版數刻在每葉正文之後。所以宋人常說：「葉子，其制似今策（即册）子。」後來的蝴蝶裝則將每版的中間留一空行。以刻書名、及卷頁數。字向裏對摺，集若干葉再粘連裱背成為一册。這種裝置法大概在五代就已演變完成了，五代刻的監本，據記載，就是作册裝的。到明永樂中始改蝴蝶裝為包背裝，字向外摺，書皮包連脊背，與蝴蝶裝同。嘉靖以後，則通行我們所熟悉的線裝。

我國的印刷術經過了至少三百年的演進，又在政府的倡導之下，到了宋代更普遍起來，由少數的地域逐漸擴展到全國，刻書的內容則經史子集等四部無所不包。宋代的國子監繼承了五代國子監的事業，大量雕印書籍。長興監本九經三傳書版，宋初尚存，只是有注無疏。於是在太宗端拱元年（九八八年）國子監奉敕校刊九經三傳的正義，到咸平四年（一〇〇一年）完成，這是群經義疏有刻本之始。此原刻已不傳，但今尚有南宋覆本傳世，皆半葉十五行，即世所盤稱的單疏本。到了南宋紹興末年，福建三山人黃唐官兩浙東路茶鹽司時，取諸經的注與疏合在一起刊雕，是為注疏合刻之始。此諸本皆半葉八行，故稱為八行本，或叫做黃唐本，現在還有流傳的。除了經

籍而外，在太宗淳化五年國子監又校刻史記、兩漢書、及三國、晉書等，這是我國正史有刻本之始。此諸史皆半葉十行，行十九字，今僅有史記及兩漢書還存有殘帙。中央圖書館所藏的後漢書殘本，即是此刻。北宋監本史記僅刻裴駰集解，而無正義及索隱，中央研究院藏有殘卷，中館則藏有南宋初覆刻本。近年通行的所謂仁壽本史記，即取中研究院的原本及中館的覆本配成影印的。而史記的三家注，則始刻於南宋時建安黃善夫，涵芬樓百衲本史記則用黃本影印。靖康元年金人下汴梁，把國子監所貯的書版俱擄掠而去，高宗奠都杭州後，故又曾將諸經史重翻雕過一次。除國子監而外，各地方政府刻書的風氣也很盛，自司庫州軍，以至縣學書院，皆以傳刻古籍文獻為務，開明人書帕本的先聲。而私家並有以刻書為世業的，像臨安尹氏、建安余氏，皆子孫相繼達數百年。又臨安的陳起、陳續芸，也是父子相承，所刻唐宋人詩集甚多，即世所艷稱的書棚本，因為他的書坊在棚北大街故名。中央圖書館所藏的一部最著名的孤本江湖羣賢小集，就是陳氏父子所刻的。陳氏刻書對於後代影響頗大，留待後面再談。在宋朝的北方，遼金兩國，雖然也有雕印，但遠不如宋朝的興盛及精美。遼國對於書禁甚嚴，有將書傳入中國的，罪至死刑，故對於他們印刷的情形，所知甚少。金國的印書業以平陽為重心，只是他們多以擄自宋朝的監版重印，官私自刻的不多，故金刻本傳世的比較少，最為藏書家所珍視。

印刷術到了宋代，不僅是普遍了，而且還有新方法的發明，那就是活字版的創始。在谷騰堡發明西洋活字的前四百年，宋仁宗慶曆年間（一〇四一——一〇四八年）有畢昇首創膠泥活字版。其方法是用粘土刻字，每字為一印，放在火上燒堅，排字時，用一鐵板，上放松脂臘及紙灰，外圍鐵範，待字排滿後，放火上烘使臘溶，則用平板按其面，使字印平整，而後使墨印刷。常用二塊鐵板，一板印刷，一板排字。印完後，再用火熔臘，以手拂，字印都落下來了。這種膠泥活字排板法與近代的鉛印很相似。宋代的活字印書，現在一部都沒有保存下來。近代的目錄書中雖然著錄有幾部所謂的宋活字本，實在是靠不住的。

宋代雕印書雖然很盛，可是經過了八九百年的天災人禍，傳下來的也就寥寥可數。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的宋版書一共有二〇六部，此次展出了四十餘種，又金刻本五種。其中大多數是僅存的孤本或比較罕見的，現在我提出幾種比較具有學術上的價值且未經近代影印的書作一簡單的介紹。五代史記，我們現在所能讀到的宋本是南宋慶元五年曾三異校刊本，也就是涵芬樓影印入百衲本廿四史中的本子。中館所藏的五代史，除了慶元本外，還有一部北宋徽宗時雕版的小字十二行本，是楊守敬得之於日本，為僅存的一部全帙，此外則只有傅沅叔還藏有十二卷殘本。此本在時代上比慶元本要早七十多年，頗有校勘的價值，我姑舉一個例子。如卷四二孟方立傳，敘述晉

將安金俊攻邢州孟方立，他的部將石元佐獻策說，邢州城堅不易攻，不如攻磁州，誘使方立来救，可以敗之。宋小字本云：「金俊以為然，軍滏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為金俊所敗。」而曾三異本則無「滏水之」三字。這句話便成了「軍西」，意義不明。按地理志，滏水在磁州城西，東流繞磁州，軍滏水之西卽是迫近磁州城，故孟方立帥兵來救。曾三異本無「滏水之」三字，顯然是脫漏了。這部書還未經前人利用校勘過。又如柳河東文集，傳世的宋本有三，一為慶元六年魏仲舉編五百家注音辯本，一為嘉定間鄭定輯注重校添注音辯本，一為廖瑩中世綵堂本。世綵堂本於舊注的姓氏都加以删削，實非善本。魏仲舉本，四庫曾據宋本著錄，惜內府所藏宋本僅殘存首二十一卷，見天祿琳琅書目著錄，今已佚傳。商務印書館嘗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殘本影印入四庫珍本初集。宋刻今尚存的僅有鐵琴銅劍樓所藏殘本十一卷。魏仲舉本雖較早而不全，昔黃蕘圃嘗稱柳集以鄭定本為最善。鄭定本僅見於楹書隅錄及適園藏書志著錄，此兩本今俱歸於中館。此書四庫未收，後代亦未翻印，海源閣舊藏本宋刊宋印，尤足珍貴。註東坡先生詩是嘉泰二年淮東倉司刻本。此本今傳世可考的凡有四部，都是殘本。以常熟翁氏所藏的三十二卷及中館藏十九卷為較多，其餘的嘉業堂藏四卷，海源閣僅二卷。中館藏本曾經明安桂坡、毛子晉，清宋牧仲、翁覃溪等遞藏。覃溪得到這部書後，珍若拱璧，而題其室曰「寶蘇齋」。每年十二月十九日，招集賓

朋，設奠陳列此書，以拜東坡生日。當時的名流桂未谷、李南澗，阮文達等數十人，或題詩，或跋語，或繪圖，書於本書各本的前後護葉，滿目琳琅。光緒末年，此書歸於湘潭袁伯夔，不久袁氏寓所失火，藏書被焚，伯夔幾欲以身殉，幸家人冒火搶救此書而出，僅書口書腦，頗有燒燬，尚無大損，諸家手書題記，今猶存百餘則。姑不論此書中前賢墨蹟的可寶，此書在學術及校勘上也很有價值。此書以編年為次，考註詳審。比起自元以來通行的僞王十朋分類集註本之分裂篇題，強析門類為善，前人已有定評。康熙中宋牧仲得此殘本，因囑邵長衡、李必恒等補註缺卷，雕印以傳，改名施註蘇詩。然而宋氏急於成書，邵長衡等憚於詳考，往往肆意刪改，故多失原真。翁覃溪嘗據此宋本而作補注，近常熟翁萬戈君在美擬鳩集各殘本配全影印，如能成為事實，誠書林中的一大快事。

自元以來，版印的技術又累代皆有改進。宋代的膠泥活字因難於上墨，容易損壞，其後又經過鉛錫活字的試驗，到了元代王禎又創用木活字，今元代的活字印書也無傳。入明以後活字版才普遍起來，今傳的有一種九行本活字印漢魏至唐人諸集，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活字本。據黃蕘圃說，約印於成化弘治間。此諸集就字體觀之，似是銅活字印的。稍後在弘治正德間有無錫華氏一族的會通館、蘭雪堂，及安氏的桂坡館，都以用銅活字印書而著名。此外或範銅，或雕木，今傳比

較著名的如隆慶間閩人饒氏所印的太平御覽，則用銅活字。如蜀藩印本欒城集、益藩印本辯惑編則用木活字。活字印書，印後版即撤除，不像雕版可以放置以備隨時再印，故活字本書不如雕版書流傳的多，這是藏書家何以對活字本比較喜愛的緣故。

前人談到朱墨套色術的發明，每以之歸之於明末吳興人閔齊伋（一五八〇——一六四四年）。實則胡應麟在萬曆十七年所著成的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卷四中就曾說：「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這所謂的雙印就是指的兩種顏色套印。萬曆十七年閔氏是年方九歲的幼童，可見在閔氏以前就已有這種方法的存在。中央圖書館在民國三十六年購到了一部元至正初年（一三四一年頃）資福寺刻朱墨套印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經文朱印，注文墨印，燦爛奪目。這是一項重要的發現，將我國套印法的起始，上推了二百七十年，這時還在西洋印刷術發明前一百年。這部書的發現曾使藝林有小小的騷動，有的板本學家存着懷疑的態度。然而無論從這部金剛經的字體、版式來看，其為元代刊印無疑。何況我們還找到了套板法在閔氏以前就已存在的記載。再者我們還可追溯它的淵源。自宋末劉辰翁以來，流行詩文的評點。在宋元間刻的書，很多旁刻圈點的。元程端禮（一二七一——一三四五年）所著的讀書分年日程曾談到朱墨點抹法。這種方法當然很可能影響到雕印業者的利用。只是朱色是比較貴

重的東西，印一部套色書的費用，無論在材料上及人工上要抵印墨印的好多部，所以胡應麟說：「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這是以前套版書流傳少的主要原因。到了明末吳興閔齊伋、凌濛初等人，才光大其術，由兩色套印遞增到四色五色套印，增加了圖書的美觀，讀之使人怡情悅目。

自隆慶、萬曆以後，在我國版刻史上有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書中雕印插圖的興盛。板印圖繪，即後代所稱為版畫藝術的。這項藝術在嘉靖以前本已有之，只是數量較少，而且大多為宗教性的，畫面古拙肅穆。非宗教的書雖亦有附刻插圖的，但皆出於摹刻，而欠生動。隆萬以後的版畫，則盛極一時，無論是在地理、譜錄、兵法、人物傳記、章回小說、詩集、傳奇雜劇等類書籍，大都附刻插圖。而這些插圖大都由畫家自行造意，所以氣韻生動，神采奕致。雕鏤則趨於工緻，線條細挺，一刀不苟。像此次所展出的萬曆間集雅齋刻唐詩畫譜，每詩一畫，造境高雅，格調絕佳，真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又如萬曆四十五年刻的牡丹亭還魂記，每齣一圖，線條細如毫髮，而極勻稱，雕刻得絲毫不苟。明末像這類纖麗細緻的作品很多。因為這一時期的書坊都以插圖為號召，不惜工本，延聘當時繪圖及鐫刻的名手，所以才能有輝煌的成就。而海陽人胡正言在崇禎間刻了一部十竹齋畫譜，溶套印術於版畫之中，將我國的雕版印術發揮到了最高境界。這部特藝彩色畫譜的繪、刻、印，都出於胡氏一人之手，繪畫之神，雕鏤之巧，墨色的濃淡，着色的深

淺，無不奇妙。版畫的三絕，在這部畫譜中表現無遺。自胡氏以後，遺無一人能繼起這項絕藝。

在明嘉靖年間，我國書刻的字體有一個顯著的改變。原來在弘治以前，刻書時往往請書法名手繕寫上版，所寫的字體大多是當時通行的書體。如宋刻書多歐陽率更體，間亦有用顏柳體或摻雜宋徽宗的瘦金體。元中葉以後書刻則多倣趙文敏松雪體，一直到明弘治間，都沿此習尚。明正德嘉靖間，覆刻宋本的風氣頗盛，因當時最重詩文，所以覆刻唐人的詩文集最多。前曾談過，唐人的詩集以臨安陳起刻得最多，故明人翻刻也都根據書棚本。嘉靖中葉刻唐人詩集的如朱警唐百家詩、黃貫曾唐詩二十六家、蔣孝中唐詩、張遜業東壁圖書府唐十二家詩等，都是根據十行十八字書棚本繙刻的。書棚本刻書是用歐陽率更體，翻刻時亦仿其體，於是成為風氣。爾後雕工為了便於施刀，漸變成橫輕豎重板滯不靈的匠體字，即今人所謂的宋體字。這種風氣入清以後，更至其極。現代人所謂的仿宋體，實際並非仿宋，而是仿明代的翻宋。

中央圖書館此次展覽因場地狹小，所陳列的元刻本不多，僅二十餘種，都是現代流傳比較稀少的。如汲冢周書，四部叢刊所影印的是明嘉靖刻本，不如此元本之善。如呂氏春秋，各家著錄的所謂元本，實際上大都是明弘治間李瀚刻本而割去序跋冒充的，中館所藏的才是劉貞刻的原本。如秋澗先生全集，涵芬樓影印的是明弘治本，此元嘉興路儒學本則極罕見。如張文忠公集，明

末刻本多經刪削，四庫則據永樂大典所載校補，編為二十四卷。中館所藏元本，凡二十八卷，可資校刊傳本的地方甚多，近代尚未曾影印。明版書陳列的更少，只略舉幾種罕見的及雕繪精美的版畫書，前面已簡略提到，不再介紹。

明朝人刻書校勘不精，而且大多以臆校改，久至隨意刪節。這種現象，自萬曆以後更盛，所以後人有「明人刻書而書亡」的感嘆。清人入關，初年尚沿習明風，自康熙以後，學風轉變，由空疎而轉入樸實。影響於刻書業的是書坊趨於冷落，代之而起的是私家刻書興起。私家刻書，都慎選宋元舊刊或舊抄來摹刻，並廣羅秘笈，彙為叢書。如康熙年間的納蘭成德通志堂經解、曹寅楝亭十二種，乾嘉以來的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等等，實在不勝枚擧。道光以後，更蔚成風氣，藏書家幾乎沒有不選其珍藏，精校慎刻，以嘉惠於讀書人的，一直到民國初年而不衰。自圖書版刻史而言，清代的確是最盛的時代。然而自印刷術史而言，清代只能說是守成時期。雖然清代在銅、木活字印書方面，在套印術方面，在版畫的雕印方面，並不遜於明，或許還有勝過的，但這種僅是繼承了前人的技藝，對我國的印刷術却沒有甚麼新的貢獻。所以自清光緒初年西洋石印法傳到我國，當時人就有我國雕版術將廢的感嘆。近四五十年，西洋印刷術日新月異，珂羅版、各式的照像製版、新式鉛印、新式銅版等技術相繼傳來我國，我國固有的印刷術更日趨式微，已成絕

響了。我國雕版印刷術自發明到今已有一千二百年，活字印刷術從發明距今也有九百年，在過去曾有一段光輝的歷史，表現了很高的造詣，它的影響並遍及全世界。但很可惜的是後人只能作技術上的改進，而在方法上未能跳出前人的圈子。現在知識普及，印刷品需要增多，而且要符合經濟的原則。速度快，成本輕，是近代西洋印刷術的兩大特色。我國印刷術在藝術上固然有它獨特的價值，但是這兩個現代的任務，却不是我國印刷術所能勝任愉快的。在抗戰末期還偶有一二好古之士，仍用舊法雕印書籍，但這除了觸發我們思古的幽情而外，對既倒的狂瀾，是無法挽回了。

唐代圖書形制的演變

李唐一代（西元六一八——九〇七年）可以說是我國圖書史上古與今兩個時代的分水嶺。在量的方面，因印刷術的發明，代替了用手來抄寫，而使圖書的生產加速；在形制方面，因為舊式卷軸閱讀的不便，而逐漸改進為册葉的裝訂。這兩種演進，都是圖書史上由古代邁入近代的重要過程。關於前一個問題，晚近學者研究討論的很多，在未有進一步的新資料發現以前，可以說大致已獲得一個結論。關於後一個問題，則研究討論的比較少，偶有涉及的，也都過於簡略。使我們對於我國圖書的形式，如何由卷軸演變成為册葉的歷程，尚缺乏一個明確的概念。筆者姑就舊籍的記載，及近代發現的遺物，對這一個問題試作探討，以求教於方家。

我國圖書形制演變的過程，自從元代吾邱衍以來，論者多認為係由卷軸一變而為摺疊本，再變成為册葉。吾氏著的閑居錄說：

古書皆卷軸，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復為部帙。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卷四）、及近人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一）也與之持相同的見解

但是這種論據，在宋人的記載中，還找不到痕迹。按歐陽修歸田錄卷二云：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原註：一作清，或作晉）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

此處所謂的「葉子」，近代的學者因為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三有：「裴鉶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吳彩鸞，善書小字，嘗書唐韻鬻之。……今世間所傳唐韻，猶有□旋風葉，字畫清勁，人間往往有之」的記載，於是認為唐代的「葉子」，即是旋風葉，也就是摺疊本。但是吳彩鸞寫的唐韻，宋代流傳的頗多。張邦基所謂的「猶有□旋風葉」，其意思並不一定說所有的唐韻，都作旋風葉。「葉子」的形式，據歐陽修說，「其制似今策子」。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五「葉子」條也說：

古書不以簡策，縑帛皆為卷軸。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册是也。

他們兩人都說「葉子」與當時的書册相近似。宋代圖書通行蝶裝，而蝶裝與摺疊本在形式及裝置上迥然不同。因之葉子即是摺疊本之說，不能不令人感到懷疑。

黃庭堅跋張持義所藏的吳彩鸞書唐韻云：

石仙人吳彩鸞書孫愐唐韻，凡三十七葉，此唐人所謂葉子者也。按彩鸞隱居在鍾陵西山下，所書唐韻，民間多有。余所見凡六本，此一本二十九葉彩鸞書，其八葉後人所補（山谷別集卷十一）

此張持義舊藏的吳彩鸞書唐韻，清初尚流傳。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八曾著錄，註云係用小楷寫。又同卷載有明項元汴舊藏的彩鸞楷書四聲韻帖（即孫愐唐韻），註云：

徽宗御書籤，題韻帖。共六十葉，每葉面背俱書，帖內小字自注。

書末有題記：「元和九年正月三日寫吳王本」一行。就記載的情形看來，這本也是唐代所謂的葉子。孫愐的唐韻據自序說：「總一萬五千文，其註訓解不在此數」。孫氏唐韻，現今不傳。宋陳彭年的廣韻則係根據唐韻重修的，廣韻的註文據四庫提要說：

凡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較舊本為詳，而冗漫頗甚。

唐韻的註文雖然比較簡略，想也不致少於十萬字。由此推算，以楷書六十葉面背皆寫計算，則每面所容當近千字；如以小楷書三十七葉本來計算，則每葉要寫三千字左右。我們可以想見，每葉要寫下這麼多字，決不是像摺疊本狹長紙所容得下的。而且面背俱書，也不宜於作摺疊式的裝置。書畫彙考卷八又著錄有唐貞元十一年釋義道所寫的法華經，卞氏註云：

小楷書，硬黃箋本。高八寸，濶一尺六寸，凡二十七幅，每行四十字。

從這一段記載中，我們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唐代的「葉子」，是橫寬縱短的散葉，與胡蝶裝本子展開的形狀相近，所以歐陽修、程大昌等說「其制似今策子」。民國初年王國維整理故宮的書籍，曾發現了一部唐代寫本王仁煦刋謬補缺切韻，後來由羅振玉等影印傳世。這一部唐寫本也是幅葉寬大，橫長縱短。又法國伯希和教授在敦煌千佛洞石室也獲得了一部唐代寫本王氏切韻殘紙四十二葉，款式與故宮本同（見蔣經邦敦煌本王仁煦刋謬補缺切韻跋，載國學季刊第四卷第三號）。這都是歐陽修所謂以葉子寫的，而備檢用的書。從這些唐代的遺物，益可證明「葉子」係散葉式而非摺疊本了。

自後漢和帝時蔡倫發明造紙的方法以後，直到唐代以前，我國的圖書都作卷軸形。此外還有一種書裝，即印度的貝葉經，也流行於我國。大唐西域記卷十一載：

恭建那補羅國王宮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

多羅樹又名貝多樹，它的葉子簡稱曰貝葉。印度佛經都是用這種貝葉裁成長方形來書寫。自漢明帝時佛教傳入我國後，到南北朝、隋唐而極盛。印度及西域的僧人來我國弘法，以及我國和尚往

印度求經，所携來的都是這種貝葉梵文經。道宣續高僧傳卷二載：

那連提黎耶舍，天保七年屆於京鄴，文宣皇帝安置天平寺中，請為翻經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勅送於寺。

又如慈恩法師傳載玄奘自印度運返佛經六百五十七部，五百二十夾。以上所舉不過數量上比較大的例子。貝葉經的裝置法，是在積若干葉後，上下用板夾住，再以繩綑紮。佛經係用梵文書寫，所以這種裝置又稱為梵夾裝。這種圖書形式在佛教流行的國家，大抵都受了它的影響。近代在敦煌以及新疆各地發現的前代遺物中，有不少這種貝葉式佛經，用土耳其斯坦各種方言翻譯的，手寫或印刷在長方形紙片上。唐代的「葉子」，無疑的也是受貝葉經的影響。我們稱圖書的一張為一葉，這種意義的起源，葉德輝曾加以考證。他認為竹木之「葉」，在古代載籍中與典册的型式全然無關，因此懷疑書葉的名稱，是本之於貝葉經（見書林清話卷一「書之稱葉」篇）實則明末的潘之恒已曾作過這種推論，他在葉子譜題辭中說：「葉子，古貝葉之遺製」（續說郛卷三十九）。這種推論，相當的可信。

貝葉經的形式，因貝葉的大小受天然的限制，而梵文是由左向右寫，所以形成上下甚窄的狹長形。但是這種形式，用我國由上而下直行的文字寫讀起來，就不太合式了。唐代的葉子，雖說

是做自貝葉經，然而略有變通。就前人的記載及近代發現的遺物來看，大約可以分為兩種。一種雖然作扁方形，但是上下加高。譬如前引的義道寫法華經，寬與高為二比一，韻書約為三比二。關於唐紙每幅的大小，據程大昌演繁露卷七「唐人行卷」條云：

>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卷七），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為邊準（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為墨邊十六行也），率一行不過十一字。

李義山所說的紙幅，每幅十六行，一行十一字，雖與近世所出的敦煌唐人寫經紙幅不完全相同，但是字有大小，李氏所指的當是通常的情形。而紙幅寬與高的比例，則都大約為三比二。「葉子」大概就是以一幅為一葉，這是與貝葉微有不同的地方。這種「葉子」因為紙幅比較寬大，為了翻閱方便計，唐人寫書作此式時，大多喜用硬黃紙，元虞集寫韻軒記云：

> 世傳吳仙（彩鸞）嘗寫韻於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道園學古錄卷三十八）。

又前舉義道的法華經，也是用硬黃箋寫。硬黃的意義，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五說：

> 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

本來是以供臨摹用的。而寫韻書及經書硬黃，恐怕是取其硬挺，翻閱收檢，都比較方便。像後代的書畫，作册葉裝置時，必襯在硬紙上一樣。

葉子的另一種形式，與貝葉完全無異，所不同的只是變貝葉的橫式爲豎式，成爲上下高潤，左右狹窄。清乾隆十一年，四川潼川府城外琴泉寺內的寶塔，被雷震倒塌。此塔的頂端貯有前蜀王衍（西元九一九——九二五年）時宰相王鍇所手寫的法華經，因而散出。沈清官潼川知府時購到了五葉，後歸於繆荃孫，繆氏著錄於藝風藏書續記卷二。此經每葉五行，每行十六字，五葉共有字二十三行。又伯希和在敦煌石室中獲得了漢乾祐三年（九五〇年）刻印的陀羅尼咒七葉，此七葉咒文係從一個版一次印成，而後裁開的（見卡特 Thomas F. Carter 原著，富路特 L. Carrington Goodrich 增訂「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漸」第八章註十二）。上面所舉的兩種貝葉式葉子，雖然是五代時的，而非唐代的遺物，不過五代時所採用的這種型式，很可能淵源於唐代。李賀送沈亞之歌有句云：

白藤交穿織書笈，短策齊裁如梵夾。（歌詩編卷一）。

可見唐代已經有將書葉裁成貝葉形的了。

「葉子」既然是一張張的散葉，必須加以裝置，才不容易散失。裝置的方法，大概或者用夾，

或者用函。夾是仿貝葉經的方法，如慈恩三藏法師傳所載，造一切經十部，用「夾紵寶裝」。函的本義爲容，古代有所謂的玉函、石函，都是用來盛放珍貴的物品。至於什麼時候借用這個名詞來作爲圖書的一種裝置？葉德輝認爲自南朝蕭梁時改卷軸爲摺疊本以後，裝書始用函；並且說當時護書的帙，應當名之曰函（見書林清話卷一書之稱函篇）。葉氏認爲用函裝書起於改卷軸以後，誠然頗具見解。但是他以爲摺疊本始於晉，並由此推衍說蕭梁以後的書帙應當稱函，這是他對於「本」字的誤解，而作的揣測之辭。實則帙是用作包裹卷軸的，函是用作盛書的，二者的意義並不相同。而且在唐以前只有書帙，並無書函的記載。根據文獻，用函裝書最早起始於唐。孟郊（西元七五〇——八一四年）的讀經詩云：

垂老抱佛腳，教妻讀黃經。經黃名小品，一紙千明星。……拂拭塵几案，開函就孤亭。儒書難借索，僧義饒芬馨（孟東野詩集卷九）。

用函裝書，當在改卷軸爲葉子時，其後書冊盛行，也就沿用這種方法來裝書了。

現在回頭來談談「葉子」之制起始的時代。歐陽修說葉子格自「唐中世以後有之」，其制係倣「葉子」而作。由此推測，則他認爲「葉子」當始於唐代中葉以前。再根據記載來看，大約在唐初太宗時，圖書就已經有作「葉子」式的。唐釋法聰傳載：

貞觀二十一年（西元六四七年），海鹽縣鄱陽府君神因常祭降祝曰：「為請聽法師講涅槃經」。道俗奉迎，播花相接，遂往就講，餘數紙在（道宣續高僧傳卷三十五）。

這段記載中值得注意的是「餘數紙在」四個字，假如是卷子式的話，一卷首尾相連，必不致於留下幾張紙。可見他的涅槃經不是卷軸，而是散葉，才有遺落的事情發生。又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

永徽元年（六五〇年），有內使遣營功德，前後造一切經十部，夾紵寶裝。

前面已談到過，夾是一種做貝葉經的圖書裝置法，卷子的包裝則用帙。此處說經用夾紵（按集韻：紵音貯，義同），可見不是卷軸，而是「葉子」本。此外大約自貞觀以後，還有一個特異的現象，卽和尚誦經，每每以通若干紙來計數，這類例子，見載於道宣續高僧傳及贊寧宋高僧傳中的，不勝枚舉，與所記唐以前的僧人讀經以卷計不同。又唐朝自至德元年（七五六年）以來，白衣出家，須經過考試，以能背誦佛經若干紙，始許剃度（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及四十二）。若干紙固然不能說就是葉子本的若干葉，不過與「葉子」制的通行，恐怕很有關係。唐代的「葉子」，大概是由釋典首先採用，而後漸及於其他的書籍。宋高僧傳卷五釋一行傳載：

玄宗詔入，謂行曰：「師有何能」？對曰：「略能記覽，他無所長」。帝遂命中官取書籍以

示之。行周覽方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唱數幅後，帝不覺降榻稽首曰：「師實聖人也」！

此處說「覆其本」，不言捲卷，下並云「唱數幅」，可見內府典籍也有作「葉子」式的。孫樵讀開元雜報云：

樵囊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孫可之文集卷十）。

可見孫樵所藏的開元雜報是作幅葉裝。又沈亞之的藏書，李賀說他「短策齋裁如梵夾」。自唐中葉以後，「葉子」制已稍稍普遍，這是唐代圖書形制的第一變。

「葉子」比起卷軸來，無疑的是進了一步，查閱起來要方便得多。但是它不像卷子黏連在一起，當然容易散失錯亂。正如唐釋玄逸所喟嘆的：「若鍵度失其夾葉，猶禮記脫錯先後」（宋高僧傳卷五玄逸傳）。所以歐陽修說，凡有常備檢閱的書，才用葉子來寫。這恐怕是葉子不太流行的主要原因。於是又從而改進，這種改進，係沿著兩個方向平行來發展。一種改進是變葉子為摺疊本，摺疊本大概是由貝葉式葉子演進而成的，不再將紙裁開，而摺成像貝葉式的狹長形。這種裝置法對於儒家的經籍影響很小，僅有釋家及道家的經典採用，所以後代稱作經摺本或梵夾裝。

關於摺疊制起始的時代，宋羅璧說：

唐末年猶未有摹印，多是傳寫，故古人書不多而精審。作冊亦不解線縫，只叠紙成卷，後以幅紙概粘之（原註：猶今佛老書），其後稍作冊子（羅氏識遺卷一成書得書難篇）。

這段記載中值得注意的是羅氏稱叠紙成卷為作冊。冊、即策字，這個字本來是紙未發明以前用簡牘時代圖書的一個名詞，是一個象形字，將許多簡編連起來才稱作冊。後代借用這個字來作為圖書的名辭，根據它的原義，必定是在將書葉連訂在一起以後。所以我們俗稱散葉謂之葉，積若干單葉合訂在一起才叫做冊。唐代的葉子因為係散葉，尚不知道裝訂的方法，故還不能叫做冊。羅氏認為摺疊作冊起於唐末，我們參照唐代的文獻，這是絕無可疑的，而且可能還要早一點。

唐范攄雲谿友議卷中載：

韋（皐）乃辭去東遊，妻罄粧奩贈送。清河公（張延賞）喜其往也，盡以七驢馱物。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也。其所有者，清河氏（按稗海本作妻字）所贈粧奩及布囊書「冊」而已。（此據影宋鈔三卷本引，按稗海十卷本則載卷四）。

這是記載後代書冊最早的一段文獻。韋皐、新唐書有傳，德宗貞元初（約七九〇年）代張延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關於雲谿友議所說他是張延賞的女婿，及僅携書冊東遊的事，則唐書本傳中未有記載。范攄，據唐書藝文志註，為僖宗咸通時人（九世紀中葉）。即令韋皐携帶書册的事不確

，而范氏已經用「册」字來形容圖書，則其時必已經知道將書葉連訂的裝置方法。再參照羅璧的意見，此處所用的册字，很可能就是摺疊本。北宋初年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四載：

盧光啓策名後，跋歷臺省，受知於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幷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八行重疊別紙，自公始也。

這一段掌故，宋吳曾著的能改齋漫錄卷一也曾引載，唯無「八行」兩字。此處稱「重疊別紙」，「朝士至今效之」，當是後代奏摺的起源。張濬征幷汾事，按新唐書本傳及昭宗紀，在大順元年（八九○年）。我國奏議書疏，在唐代以前，都是卷子，盧光啓改作摺疊，應當是受圖書形制變遷的影響。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有敦煌所出的玄奘法師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卷一卷，每行十七字。此殘卷現在雖作卷子式，但其中每隔六行，有一顯然的摺痕，因之推測它原來必定是作摺疊式的。此經就字體觀之，約寫於唐中葉以後。又英國斯坦因在敦煌所獲得的經卷中，有一部僅只八葉的摺疊本佛經，是五代漢乾祐二年（九四九年）刻印的。這部摺疊本的一邊曾粘連在一起，翻起來就像現代的書册一樣（見卡特原著，富路特增訂「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漸」第八章頁五八，及頁六五註十二）。這兩種是現代僅存的五代以前摺本，它的形式與宋以後的釋道藏經沒有什麼區

別。到明萬曆末年嘉興楞嚴寺募刻大藏經，改作方册，摺疊式才廢棄不用。

葉子另一演進的方向，是由幅葉蛻變為册子。羅璧說册子後於疊本。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卷四云：

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細閱卷舒，甚為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為印摹，卷帙一變而為書册。

根據他們的意見，册子的起始後於摺疊本，其時代最早不過唐末。我們再根據其他的記載及現存的實物來推度，在五代時册裝就已流行了。五代國子監雕印的九經三傳，據記載是作册裝。五代會要卷八經籍云：

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册。

五代的監本，現已不傳，書册裝置的形式，無法詳悉。不過從其他方面來推證，應當不是摺疊本。九經三傳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共有一百九十五卷，五代監本每部裝為六十五册，則每册平均有三卷之多。就後代的經摺裝本佛經來看，都是一卷裝為一册，否則則書册太厚，而有不便。

以此來例五代監本，一冊有三卷書，是不宜作摺疊式的。五代監本雖然不傳，但是它的版式行款還可以從後代的翻本來窺見。日本室町氏所刻的爾雅，係覆刻自宋本，書末有「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一行，其本黎庶昌曾影刻入古逸叢書。王國維跋此書說：

此本實紹興後重刊舊監本，其行款大小與唐人書諸經卷子，一一相近，自是五代舊式（觀堂集林卷十七）。

此書字體寬大，每半葉八行，行十六字，註雙行，行廿一字。從這部遞翻本的行款看來，五代監本非摺疊本可知。唯此覆本中間有版心，與現存的五代刻本格式不同。是不是五代監本原來即作此式？抑或是宋代覆刻所更改的？現在已經無法詳考了。不過五代刻書的規模，從敦煌所發現的遺物中，還可以略窺梗概。法國伯希和教授在敦煌石室中獲得了五代時刻印的切韻殘紙十六葉，每葉凡三十四行，每行的字數有廿四、廿五、廿七、廿九、及三十等五種，係五種不同的版刻。裝置的方法是字向裏對疊，有如宋代的蝴蝶裝。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此五代刻本中間沒有版心，以三十四行為一版，每版版數刻在每葉正文的後面（參見魏建功撰敦煌石室存殘五代刻本韻書跋，載國學季刊第三卷一號）。這些五代刻本的格式與唐代的葉子非常相似，我國圖書如何由葉子蛻變為宋代的蝴蝶裝，從這些殘紙中，可以獲得一個清晰的輪廓。到了宋初，則將每版的中間，

留一空行，成爲版心，來刻記書名版數，這種演進，才算完成了。

就以上所討論的，我國圖書的演進，初由卷子解散爲葉子，葉子復衍爲幅葉式及貝葉式二種。貝葉式葉子進而改爲摺疊本，幅葉式葉子後來蛻變而成冊子。這種種演進的過程，是極其自然的。有的在唐代就已完成，或者是在唐代已肇其端。吾邱衍所說，由卷子變爲摺本，由摺進而爲書冊，實在是一種不太近情理的推測。

中國的印刷術

印刷術是我國對於世界文化四大貢獻之一，這種方法在我國盛時，逐漸東傳高麗，日本，西被中亞，又輾轉影響及於歐洲，在十五世紀中葉，西洋印刷術的始祖德人約翰谷騰堡 Johnnas Gutenberg 剛開始製造活字時，我國印刷術就已有了輝煌的成就。

在未談到我國印刷術的起源，且先略述我國古代書籍的情形。我們在古書上常見到「竹帛」二字，竹就是竹簡，卽所稱的簡牘，也有用木做的；帛卽縑帛，用絲製成；古代的書籍就是用筆寫在帛或簡上。但是縑帛太貴，簡牘又重，所以流傳不便。到後漢和帝時（西元八九——一〇五），宦官蔡倫乃發明造紙，用樹、麻、及破布、漁網為原料，價賤而輕，使我國文化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六朝以後，著作漸多，據新唐書藝文志序說唐開元中著錄的書有八萬多卷。在當時固然也有藏書家，如宋周密齊東野語所記載的：晉張華載書三十車，梁元帝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藏書一萬三千四百卷等等，但這僅是帝王、顯宦方有這大的財力。在一般好學的人，如欲多讀書，鈔寫的方法，是仍感不便的。在這種情形下，印刷術的發明，自然有必要了。

我們祖先好用印章，這種習慣一直保存到現在，將印章鈐到紙上，這不是與雕板印刷很相似嗎？我國古代常有將文字鐫刻在石上以紀功德的事，如石鼓文、詛楚文，秦始皇的泰山、芝罘、會稽等都是很早的石刻。又有將儒家經典刻在石上作為定本，供士人抄寫或校勘用的，像漢熹平石經、魏正始三體石經，唐開成石經等。在南朝蕭梁時（西元五〇二——五五六），就已經知道了搨碑的方法。傳搨與印刷形式上雖略有不同，在方法上却是很相近的。以上兩種事實對我國印刷術的發明，至少有很大的啓示作用。杜工部的李潮八分小篆歌有：「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句。此詩大約作於唐代宗大曆二年（西元七六七）。唐代中葉已經有將碑雕木為板的事，這與雕板印刷術更為接近。在這時候，我國早期印刷品也許已經出現了。

我國印刷術的起源，就現存的材料看來，與佛教和曆書都有很大的關係。六朝以來，佛教在我國大盛。佛教有功德之說，當時的信徒紛紛建立塔寺，塑雕佛像，以報功德。但是這僅是有錢人才有這種能力，一般平民為了崇功報德，不得不另謀其他的方法。清末敦煌石室中發現的佛像雕印品很多，恐怕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曆書是我國農民不可少的，何時耕耘，何時播種，農民均以曆書為準，所以早期的印刷品這種東西很不少。

我國印刷術究起源於何時？史書上沒有明白記載。日人島田翰撰雕板源流考說我國在北齊時

就已有刻本書，這是他對古書文字的誤解。葉德輝在書林清話裡已經指出，無須再辯。在現存的書籍中，談到我國有印刷品最早的時代是在唐初。唐馮贄雲仙雜記卷五中引僧園逸錄說：「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衆，每歲五馱無餘」。玄奘生於隋開皇二十年（六〇〇），卒於唐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若此說可靠，則我國印刷術的發明，至遲已在西元七世紀的中葉，但是此書所記載的大多怪誕不經，前人常不相信。此書的作者，舊題為唐馮贄，四庫提要據宋張邦基墨莊漫錄斷為宋王銍撰。他所引的僧園逸錄又不見於著錄。玄奘印普賢像的事，在唐釋慧立的慈恩三藏法師傳及道宣續高僧傳裡的玄奘傳，都找不到絲毫線索。雖然如此，雲仙雜記一書，宋人書裡常引到，宋志也著錄，就是僞造，也必出於宋以前人之手，就敦煌所出的這種印刷品很多來看，這件事也未必不可相信。次一較早而且可靠的材料在全唐文卷六二四的「馮宿請禁印時憲書疏」，疏中大意謂近來河南，四川板印的曆日流行於市，在官府未頒授前，應予禁止。馮宿是德宗貞元間（七八五——八〇四）進士，卒於開成二年（八三七）。此可為我國印刷術在九世紀初即已流行的確證。唐代民間雕印曆書很盛，唐語林卷七曾載有僖宗入蜀時（八八一），四川民間有因雕印的曆書，朔晦相差而爭訟的事。今敦煌所出的有唐末所刻的曆書，均可得到證明。與馮宿同時的元稹，他作白氏長慶集序有「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語，自注云：「楊越間多作書

，授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此序作於長慶四年（八二四），那時已有詩集的刻本。再次早的材料為司空表聖文集卷九「為東都講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一文，說「自洛城罔遇，時遭乃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鎪」。洛城罔遇一語，乃指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廢佛的事，此可證明在武宗會昌時已有經律的刻本。其他如前人所常引的唐范攄雲溪友議所載的紇干尚書泉，雕印劉宏傳，時代不可考。柳玭家訓，唐語林所記載的時代又較晚，無須列舉。以上僅是據前人的記載所知的一鱗半爪，究竟那時印刷的技術如何？到了敦煌石室發現後，才使人得到一個輪廓，斯坦因在敦煌石室中得到了一卷唐懿宗咸通九年（八六八）王玠刻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現藏英不列顛博物館。據說這書刻印的技藝很進步，決非短時期可以達到這種水準的。此可作為我國印刷術不獨至遲發明於九世紀，而且那時技術已經很精的物證。

唐代刻書的地域據現存的資料看來，至少有四川、河南、敦煌、及揚、越等處，其中以四川最盛。刻書的範圍除前舉的經律、佛像、詩集、曆書外，柳玭家訓所記的，在成都書肆見到雕印的書又有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及字書、小學。日人木宮泰彥日支交通史上記載日僧宗叡在日本清和天皇貞觀四年（唐懿宗咸通三年，西元八六二）隨真如法親王入唐，貞觀七年（八六五）返國，帶回經論章疏等百餘卷，其中有西川印子唐韻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

據向覺明氏說此所謂印子就是雕印本。尤可證明唐代刻書，不僅是短篇，大部的書也已印行，並且超民間通俗所用的印刷品進而刻士人所必讀的小學書。

據前人的記載，唐代利用這種新發明的印刷術除曆書外尚只限於私人。政府雕印經籍，要到五代時才開始。馮道的雕印儒家經傳，在我國歷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後唐明宗天成四年滅蜀，受蜀人印書的影響，長興三年（九三二）宰相馮道奏准委國子監雕摹群經，至後周太祖廣順三年（九五三）畢工，前後共易四代，費時二十二年。據王靜安五代監本考，所刻的書有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孝經，論語、爾雅等十二經，附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種，顯德六年（九五九）又刻經典釋文。在同時而稍後，孟蜀宰相毋昭裔又刻文選及九經。以上諸刻本，現在都失傳了。

我國印刷術經過了至少近二百年的演進，到了宋代漸盛起來。由少數的地域逐漸擴展到全國。在這時期又有活字印刷術的發明，關於這留待後面再談。宋代國子監繼承了五代國子監的事業，大量雕印書籍，據王靜安兩宋監本攷，宋國子監刻的書有一百三十種，數近萬卷，其中以經書為主，其次為子、史，集部的書比較少。這些書僅有少數流傳到現在。除國子監外，各地方政府及私人刻書的風氣也很盛，私家並有以刻書為世業的，像書林清話所說的臨安尹氏，建安余氏，

子孫相繼達數百年。當時人刻書多請書家書寫，字體生動，校勘、雕工、紙墨都很精好，所以為藏書家所寶貴。可惜的是現在流傳的，比起當時刻的，在數量上顯得太少了。同時在北方的遼金兩國，也相繼刻書，但契丹遼書禁很嚴，傳入中國者在法律上有死罪，故遼刻本今無傳。女真金官刻的書現在也不存，幸尚有少數私家所刻的書保存下來，但比起南方的宋國，在技術上要差得多了。

雕板印刷術在宋代又轉入一種新的用途，就是紙幣的印刷。在唐代曾有所謂的「飛錢」通行，據現在的人攷證，這種飛錢僅同古代書寫的券契，上蓋官印而已。真正印成的紙幣，大約始於唐末及五代時的四川。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說在宋以前，「蜀人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人十六戶主之」。自唐末以來，四川雕印書已盛，當時人用這種方法來印鈔票，很為可能，此可說是世界上印刷紙幣的鼻祖。宋太祖開寶三年（九七〇），利用四川人的方法，在京師設便錢務，印刷紙幣，行使數百年，促成了社會經濟的繁榮。宋代初年印刷紙幣是用木版或是用金屬製版，現在無法知道，不過前人有「宋明道三年（一〇三四）發內府金，收換會子及銅版勿造」的記載，可見至遲在十一世紀初年卽已開始用銅版了。清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之亂時，聯軍士兵入北京，打毀一大佛像，在佛座下拾得紙幣一束，此紙幣是明太祖時用銅版印刷成的，票面

黑色，上鈐朱印，印刷很精美，現在這個文明寶鈔銅版尚藏在中央博物院，我們看到明初鈔票的精美，也可想見它的源流必甚久遠。

元人入主中夏，雖只短短的九十年，但是官私刻書的風氣，仍不下於兩宋。這一時期，在印刷術上又有一重要的貢獻——朱墨套印法的發明，使我國印刷術更趨於藝術化。清代以來的版本學家都認為套印法是明萬曆末年吳興淩濛初、閔齊伋等發明的，但是民國三十六年中央圖書館竟收購了一部元至正間（一三四一——一三六八）資福寺刻的朱墨套印本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這真是我國印刷史上一個重要的發現。這部書曾引起了藝林中小小的騷動，有些版本學家對這件事感到懷疑，我們姑不論這書在版式、字體、刻工及紙墨方面決不是明中葉以後所偽造的，就是在前人的記載中也可找到在閔刻以前這種方法的蛛絲馬跡。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卷四曾說：「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我們很容易看出來，這所講雙印就是指用兩種顏色套印的。胡氏是明萬曆四年舉人，這書據自序成於萬曆十七年，胡氏作成此書時，淩濛初僅為年方九歲的幼童（淩氏死於崇禎十七年，年六十五。）可見在淩氏套印諸書前已有這種方法的存在。王先謙校本郡齋讀書志卷六載：「紹聖中諫官翟思言元祐間名大防提舉（神宗）實錄，祖禹、庭堅等編修，刊落事跡，變亂美實，外應姦人詆誣之辭，命曾布

重行修定，其後奏書以舊錄為本，用墨書；添入者，用朱書；其刪去者，用黃抹。已而將舊錄焚毀，宣和中或得其本於禁中，遂傳入民間，號朱墨史云。」元程端禮所撰的讀書分年日程[illegible]談到朱墨點抹法。今流傳的明初文明寶鈔，就是在墨印上加鈐朱印，根據上面所引的事實，元代有套印的書，不是不可能的。因為印一部套印書的費用，要抵印墨印的幾部，故胡應麟說必貴重用之，這是以前套印書流傳少的主要原因。現存我國最早的一部雕板書是金剛經，現存最早的套印書也是金剛經，真是我國書林的一個巧合。

明代人刻書草率而濫，校勘不精，任意節略舊籍，變亂卷次，字體呆滯，為藏書家所詬病。這種習氣到明末萬曆至崇禎（一五七三——一六四四）七十餘年間更至其極。但是自印刷術的眼光看來，這幾十年間是我國雕板印刷術最盛時期。在量的方面言，這時期所刻的書遠超過前代，尤以常熟毛晉汲古閣，以一人的財力刻書數千卷，在我國書刻史上真可算得空前絕後。在技術的方面言，這時期繼承了前代的朱墨套印法，更增衍至五色套印，吳興凌氏、閔氏等人大量套印各書，僅現今流傳的至少在五十種以上。他們所套印的書，彩色斑斕，讀之使人怡情悅目，為我國套印術鼎盛時期。此外書中附刻插圖也以這時期最盛最精。明末所刻的章回小說、曲集、譜錄、人物傳記、大多附圖，而且多很精美，像今流傳的萬曆間刻的程大約墨苑、方于魯墨譜、湯顯祖

的牡丹亭還魂記、崇禎四年刻的方悟青樓韻語廣集等書所附的圖，其人物的生動，線條的勻稱，雕鏤的精巧，在雕板印刷品上皆可臻於上乘。又像崇禎四年刻的彩色套印十竹齋畫譜，其精美更堪稱千古絕唱。在這一時期，我國雕板印刷技術已發揮到了最高境界。

現在再來談我國活字印刷術的情形，葉德輝曾引宋岳珂的九經三傳沿革例說晉天福年間（九三六——九四七）已有銅活字版。因為找不出其他的證據，這種說法近人都不大相信。我國活字版的發明者最早只能推到西元第十一世紀中葉的畢昇，比起谷騰堡發明活字也要早四百年。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說：「慶曆中（一〇四一——一〇四八）有布衣畢昇，又為活版，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脣，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版，待就火煬之，藥稍熔，則以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常作二鐵板，一版印刷，一版已自佈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版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數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這種膠泥活字排版法與現在的鉛印很相似。宋代用活字印的書現尚流傳

的，在藏書家目錄中可見的有三部：卽天祿琳續編的藍印毛詩，藝風藏書續記的帝學，與郋園讀書志中的韋蘇州集。但是天祿琳琅所著錄的宋元本，據前人考證多不大可靠。葉郋園的韋蘇州集，據見過的人說實是明初排印，現流傳的一種九行活字本的唐人集子很多，黃蕘圃說約在明成化弘治間印，葉氏所藏的也許就是這種九行本。繆藝風的帝學是否天水舊物，因未見原書，不便遽下論斷。另外盧震京編的圖書學大辭典首有周禮疏與金剛經二頁書影，說是故宮博物院藏的宋活字本，但現在的故宮博物院的書目已改定為刻本。活字印書因印後版卽折毀，不像雕板可以保存，尚可隨時修補再印，加上幾百年來的天災、火災、蟲鼠之災、其流傳自然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不過看到元王禎在他的農書後記說活字版「古今此法，未見所傳」。他撰的活字印書法又說在其前有用燒熟瓦活字或錫活字，「但上項字樣，難於使墨，率多損壞，所以不能久行」。宋代應用這種方法印書是否普遍，是殊值得我們懷疑的。

元代活字印的書今無傳，就是利用活字印書也很少聽到。元王禎在農書後記說：「禎前任宣州旌德縣尹時，方撰農書，因字數太多，難於刊印，故尚己意，命匠創活字，二年而畢工，試用一如刊版」。王禎因膠泥活字有缺點，乃改用木活字，「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盔字既滿，用木榍之使堅牢，字皆不動，然後用墨刷印之」（王禎活字印書法）。因此段文字附在農書後，

前人多以為農書原本是用活字印成，故美國國會圖書館前曾打算重價徵求這書。據萬國鼎農書考略（載圖書館學季刊第四卷第三、四期）說，王禎農書乃是在江西刊板，不是用活字印的。他所創的活字，只試印了一部旌德縣志。

活字印刷到了明代始盛行，明人除用木活字印書外，更進而用金屬鑄字。明邵寶容春堂集會通君傳：「會通君姓華氏，諱燧，字文輝，無錫人……為銅字版」。常州府志：「安國字民泰，無錫人……嘗以活字銅版印吳中水利通志」。又明陸深金臺紀聞：「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妙」。以上明人活字用銅鉛見於記載者。但明代鉛字排印的書，今未見流傳，清董武英殿事金簡曾說過「埏泥體粗，鎔鉛質輭」。明人的鉛字恐怕是用純鉛作的，不像現在的鉛字是用鉛銻、錫、錫的合金，所以軟而不便於用。安氏桂坡館的刻本書現存的比較多而活字印的却很少。獨華氏會通館蘭雪堂印的書現流傳甚多，藏書家都視同宋元本一樣珍貴。今可知華氏用銅活字印的書有春秋繁露、藝文類聚、容齋隨筆、蔡中郎文集、元氏長慶集、白氏長慶集、文苑英華辯證等。其他如明人用銅活字或木活字印的書流傳到現在的更多。

我國印刷術到了清代只能說是守成時期。雖然清代人精於校勘，翻刻古書必定參校許多本子，或者是影刻宋元本，必使它神形酷似，像乾嘉間的顧千里、黃蕘圃、孫淵如、汪閬源等所刻的

書，精美的程度足以方駕宋元；雖然圖像的雕印，像萬壽盛典、圖書集成等書的附圖，其細緻也可與明人媲美；雖然套印的書，像殿本勸善金科，盧坤刻的杜工部集，用五色六色，更超明末閔刻之上；雖然用活字印書，像銅活字的古今圖書集成，木活字的聚珍版叢書，卷帙鉅大，也比明人為盛；但是這僅是繼承了前人的技藝，對我國印刷術卻沒有什麼新的貢獻。所以清道光以後西洋石印法傳入我國，當時人已有我國雕板術將廢的感歎。近四五十年來，西洋珂羅版、各式的照相製版、新式鉛印新式銅版等等印刷術相繼而來，我國固有印刷術更日趨式微了。我國雕版印刷術自發明到今已有一千二百年，活字刷印術從發明距今也有九百年，在過去曾有一段光輝的歷史，表現了很高的造詣，它的影響並遍及全世界，但很可惜的是後人只能作技術上的改進，而在方法上未能跳出前人的圈子。現在知識普及，印刷品的需要增多，而且要符合經濟的原則。速度快，成本低，是近代西洋印刷術的兩大特色。我國印刷術在藝術上固然有它獨特的價值，但是這兩個現代的任務卻不是我國印刷術所能勝任愉快的。在現在雖然有一二好古之士，仍用舊法雕印書籍，這對涂了觸發我們思古的幽情而外，對既倒的狂瀾是無法挽回了。

中國的版畫

「版畫」是近年來的一個名詞，在我國以前稱之為繪圖、繪刻，或繡像的，卽是雕版書中的插圖。我國自古以圖書並稱，漢書藝文志所載的兵書，很多都註有圖若干卷。陶淵明詩云：「流觀山海圖」，隋書經籍志載有周官禮圖，靈秀本草圖等等，是古書大都有圖。書中附圖，不僅增加美觀，更能將文字的意義藉生動的畫面而表現出來，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到了印刷術發明後，插圖也用雕板印刷來代替筆繪，所以版畫可以說是繪、刻、印三種藝術的結晶品。

版畫的起源，我們根據前人的記載及近代發現的實物，並參照西洋的印刷術史，可以斷言它是與印刷術而俱生的。換句話說，印刷術是因版畫的需要而演進的。我國佛教南北朝以後大盛，造像寫經成為僧俗修行祈福造功德的方法，也是供養所必備的，這對於貧民信徒卻是一項負擔。於是廉價的複印品，在唐初就應運而生了。據唐馮贄雲仙雜記引僧園逸錄載：「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捨四衆，每歲五馱無餘。慈恩法師傳載玄奘曾造素像十俱胝。一俱胝按一切經音義的解釋，是一千萬。造一億的佛像，我們想像除了用印刷的方法外，當然不可能用手來繪這麼許

多。雲仙雜記雖說是宋人所僞作，但此段記載卻不是沒有根據的。敦煌發現了很多用木或銅刻的佛印鈐蓋滿了的小佛像紙卷，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一卷唐人寫佛說佛名經，每段前鈐一小佛像，並著彩色。玄奘所印的普賢像恐怕也是用這類佛印鈐蓋的。大型的版畫要到晚唐，才有出現。

我國版畫的演進，可以分為四個時期來看。從唐末到五代是萌芽期。這一個時期的作品，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都是宗教性的。畫面古拙穆肅，雕印相當精美。這些版畫除了吳越國王錢弘俶所印的陀羅尼經卷扉畫出於湖州天寧寺以外，其他都是在敦煌發現的。其中有一卷唐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王玠雕印的金剛經，卷端印有「祗樹給孤獨園」圖一幅，這是現存最早的一部雕板書，也是最早的板畫。其他如唐末五代時刻的勸化文，文殊師利菩薩像，及曹元忠造的觀世音像、毗沙門天王像等類單張的作品，敦煌所出的很多。上為菩薩像，下方印祈願方或咒文，以供民間供奉持誦用的。這一時代的版畫，存在國內者，僅有曹元忠造毗沙門天王像及錢弘俶造陀羅尼經二種而已，其餘都在英法二國博物院中。

宋代以後，版畫逐漸普遍，已不僅限於佛教的作品，其他書籍中也多附有插畫。宋刻板畫，現在流傳的不多，所知尚存於天壤間的，僅有列女傳及梅花喜神譜二種。其他如宣和博古圖錄、考古圖、營造法式、大觀本草等，原書雖然不存，還可以從後代的翻本或影寫本來推見。北方金

刻的有本草圖經，補註腧穴鍼灸圖經，及近代發現的平陽姬氏刊歷代美女圖，趙城藏經卷前的說法圖。元刻流傳的就比較多了，有大德本繪圖列女傳，至大重修博古圖，至元杭州大普寧刻陀羅尼經及後至元本梵網經菩薩戒本的扉畫，至正初資福寺刊金剛經的寫經圖等。寫經圖係以朱墨二色套印，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圖書，比日本最早的套印板畫寬永四年（一六二七）印的塵劫記，要早二百八十多年，為明末大量套色印書的張本。梵網經菩薩戒本扉畫拜佛圖（見附圖一）雕鏤細緻，開明末纖細的先聲。明洪武以迄嘉靖雕印的，大抵以翻刻宋元舊本為主，自行繪刻的還不多見，這六百年間的作品，就所見的來看，仍以人物圖像為主，漸及於器皿草木花卉。遒勁而不失古拙，生動而不失穆肅。

自隆慶元年衆芳書齋刻增編會真記，開我國版畫的新紀元。自是直到清雍正時這一百六十年間，是版畫的極盛時期。有專刻山水的，如西湖遊覽志、海內奇觀、名山圖等；有刻人物的，如人鏡陽秋、女範編、帝鑑圖說等；有刻翎毛花卉的，如雲齋竹譜、花鳥譜、十竹齋畫譜等；有刻兵法武器的，如耕餘剩技、神器譜、師律等；有刻譜錄的，如方氏墨譜、程氏墨苑、煙霞倶等；有專摹刻前人名畫的，如歷代名家畫譜、唐六如畫譜等。而明末清初的傳奇雜劇刊刻最盛，無不附圖，圖無不精，流風餘韻，迄康雍而不衰。康熙間的芥子園畫傳，內府本萬壽盛典，古今圖書

集成的圖繪，精美都不下於明末。這一個時期的書坊刻書，都以插圖為號召，延聘當時繪雕的名手，巧極心力，爭奇鬪勝。正如萬曆間金陵坊刻文昌化書凡例說的：「繪圖係今時名士，鐫刻皆宇內奇工。筆筆傳神，刀刀得法」。促成了我國版畫史上的極盛時代。無論在數量上或雕繪的纖麗上，不獨可說是空前，也可以說是絕後。

我國的刻書業自明嘉靖以後，集於蘇、杭、金陵三地，版畫的繪刻也以此三地為最精。像杭州的張氏白雪齋、楊氏夷白堂、容與堂、墨繪齋，蘇州的書業堂，金陵的唐氏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閣都以刻圖精而著稱。此外吳興也很盛，臧懋循雕蟲館刻的元曲選圖，及凌氏套印本琵琶記的附圖，精美也足與三地埒。當時的雕版藝術，由徽州人執牛耳。無論是在杭州或金陵刻的書，插圖精美的，大部是徽州人分雕鐫的。如萬曆本文昌化書、方氏墨譜，為新安黃守言鐫。萬曆本女範編、大雅堂雜劇、顧曲齋元曲，由歙縣黃伯符刻圖。萬曆本海內奇觀，為新安汪忠信刻。萬曆本圖繪宗彝，由歙黃德寵刊。萬曆本狀元圖攷，由歙黃應澄繪刻。崇禎本吳騷合編，由歙汪成甫刻圖。明末本魏仲雪批西廂記、陳眉公批繡襦記，由新安劉素明刻圖。明清初相繼印的盛明雜劇初集、二集、及新編的插圖，均出於歙鮑承勳一人的手。這些雕版名手也大都擅長繪畫，如萬曆本狀元圖攷繪刻均為黃應澄一人，明末刻陳洪綬繪會真記圖的項南洲，吳騷合編中的圖，有一

部分是他所繪的。因此這些雕板藝術家的地位頗高，自不同於一般的刻匠，所以才能有輝煌的成就。

這一時期的版畫，大都由畫家自行造意，不僅限於摹刻人物圖像，所以氣韻生動，神采奕致，雕鏤則趨於工緻，線條細挺，一刀不苟，萬曆間集雅齋刻的唐詩畫譜，每詩一畫，造境高雅，格調絕佳，真是詩中有畫，畫中也有詩。萬曆四十五年刻的牡丹亭還魂記，每齣一圖，線條細如毫髮，而極勻稱，雕鐫得絲毫不苟（附圖二，寫真一齣的插圖），明末清初的作品像這一類纖麗細緻的甚多。另外有一部板畫，值得特別提出介紹。明末清初人胡正言在天啓至崇禎間刻了一部十竹齋畫譜，全書八册，內分翎毛、花卉、梅、竹、石、果七類，用彩色套印的。胡氏海陽人，自幼穎異巧思過人，他曾學過製墨、造紙、篆刻、繪畫，無不精絕。他的作品除了畫譜外，還有一部印譜。這部畫譜的繪刻印，都出於他一人之手。繪畫之神，雕鏤之巧，墨色的濃淡，著色的深淺，無不奇妙。版畫的三絕，在這部畫譜中表現無遺。楊文驄作序說：「胡曰從氏巧心妙手，超越前代，以鐵筆作穎生，以梨棗代綃素。而其中皴染之法，及著色之輕重濃深，遠近離合，無不呈妍曲致。窮巧極工，卽當行作手視之，定以為寫生妙品，不敢作刻畫觀」。批評非常允當，絕不是阿諛之辭。

乾隆以後，出版業受樸學風氣的影響，形勢丕變。私家刻書極盛，大都從事翻雕宋元秘笈，書坊逐漸雕零。乾隆以來的版畫，雖然仍承襲明末的纖麗，但在細緻及數量方面，無法可以比擬，雖然也偶有彩色套印，像同治三年刻的盼雲軒畫傳，比起十竹齋畫譜，那就差得多了。光緒以後，西洋的石印法，照相影印法相繼傳來我國，版畫更加式微。近年來雖也有藝術家從事木刻，但在格調上滲入了西洋畫法，像極盛時代的纖細，已不復可見了。

美日訪書記

今年八月五日至八日，美國譜系學會（Geneology Society）為慶祝該會成立七十五週年紀念，主辦了一項國際性的會議，以討論檔案、譜牒、地方志等文獻資料的集藏與保存的技術，及其在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遺傳學方面研究的價值等問題，名之曰「世界文獻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Records），邀請了四十餘國的歷史、社會、譜系學者，及檔案、圖書館專家二百五十餘人，各作專題報告。另外自世界各地，主要是北美地區的人士自費前往旁聽及參與討論的有三千多人。　地點在猶他州首府鹽湖城（Salt lake, Utah）。我奉准應邀代表國立中央圖書館前往出席，報告自由中國所藏圖書文獻資料的情況。因此藉著這個機會，於大會結束後便道參觀美國、日本幾個收藏中文圖書較多的圖書館，以察訪我國舊籍流散域外的情形。

近十年來我國圖書館界訪問美國的頗多，然而大都以考察圖書館的業務為主，鮮有把觀察集中於中國舊籍收藏情形的。美國收藏中國典籍的歷史不太久，雖然可以遠溯到一百年前滿清政府贈送美國政府的一批中國書，為美國收藏中文書的始基。但大學圖書館留意集藏中文舊籍，最早也不過

五六十年，而僅限於極少數的幾所著名大學，如普林斯頓、哈佛、哥倫比亞等，像耶魯、達慕思(Dartmouth)等大學，雖然歷史悠久，但注重收藏中文書還是比較晚起。近十多年來因為漢學的研究普遍受到重視，各大學紛紛增開中國學術方面的課程，圖書館購藏中文書的日漸增加。尤其自大陸變色後，共匪摧殘我固有文化，很多的古籍為了逃避焚燬的厄運，流散於外，聽說大都被美國的圖書館所收藏，因此我想利用這次旅行的機會，來察看美國圖書館收藏中國古籍的概況，及尋訪國內無傳的佚書。

根據今年春天美國東亞圖書館協會(Committe of East Asian Library)的調查，截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底止，美國各圖書博物館設有東亞部收藏中文書的，共計有六十二所。這個調查恐怕還有少許遺漏，就我所曾參觀過的大學，如猶他州普洛弗鎮的伯罕揚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ovo, Utah)設有東方研究所及中文系，圖書館內也藏有好幾千冊中文書，在該調查表內卻未列其名。美國的東亞圖書館數量既多，而且分佈各州，我因時間及經費所限，自不可能一一前往　只能採取重點訪問，僅選擇那些收藏中國舊籍比較豐富的或順路的東方圖書館去參觀。在日本也是如此，因各大學鬧學潮，圖書館多關閉，也只能擇要參觀。我於八月三日離臺，四日抵達美國，九月三日離美，在美國整整的停留了一個月。我所參觀的有美國國

會圖書館、哥倫比亞、普林斯頓、耶魯、哈佛、芝加哥、加州伯克萊、伯罕揚、達慕思等大學圖書館、及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Field museum）等。美國的伯罕揚、達慕思兩大學的東方部係近年新成立，歷史甚短，故藏書也很少，前者還不到一萬冊，後者也不過五六萬冊，而且都屬新出版或翻印的書，罕有舊籍。自然歷史博物館藏中文書約萬餘冊，因藏書係供工作上研究的參考，故偏重於金石藝術方面，及一般的參考用書，間有舊籍，但很少，大都是新出版的。至於美國國會等七館的中文藏書都在十萬冊以上，而且以舊籍為主。現在我把他們藏書的情形，分別簡介如下：

(一)美國國會圖書館　國會東方部分為中韓文部及日文部。中韓文部藏中文書根據去年十二月底的統計，共三六八、〇八一冊，其中木刻線裝舊籍包括善本書約計十八萬冊。國會所藏的善本於一九五七年曾編印善本書錄出版，著錄了近三萬冊。近年又略有增加，在普通本庫中還存有若干的明版書。善本書中有不少極為罕見的書，或是僅存的孤本。如宋版三十卷全本後漢書補志，元刊元印本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是難得的秘笈。又如趙汝愚編國朝諸臣奏議，今傳各家所藏宋本多為殘帙，印亦較晚，國會所藏雖也殘缺了五十卷，但在存世殘本中還是比較多的一部，而且刷印約在元代初年，比其他的刷印藏本較早，甚為珍貴。明版中

如嘉靖本湛若水著古文小學、成矩編周易本義、郭維藩著杏東文集、胡侍著蒙谿集;隆慶本王交著綠槐堂稾;萬曆本李遜著李襄敏公奏議、王升著讀左氏春秋贅言、譚大初著次川存稿、劉景韶著太白原稾;天啓本文翔鳳著河汾教、楊天民著楊全甫諫草、羅治著太月山人集、崇禎本姜達元著尚書大測、元默著勦賊圖記、弘光本鄭大郁編經國雄略等,都是現今國內不傳的佚書。其普通本中西部之書,均相當的豐富。具有特色的如所藏地方志達三千多種,為各館收藏之冠。叢刻叢書有七八百種,傳世的大體略備,也很難得。又如明劉玉撰執齋集、清初王棠著知新錄等,雖是清代刻本,但已是現世稀覯的書。除了中韓文部的藏書外,法律館中也藏了好幾千冊中文舊籍,如通典、會典、律例、則例等,其中也偶有稀見的書。

(二) 哥倫比亞大學　哥大東亞圖書館分為中日韓三部份,中文部藏書據去年十二月底的統計,為一六四、六九一冊。哥大藏書大體分類置架,未區分善本普本及新舊籍,故舊籍究有若干,該館未曾統計,就我在庫內觀察估計,至少要超過半數約九萬冊以上。善本較少,明版書不多,加上比較流傳稀少的清初刻本,估計也只有五六千冊。哥大藏書以族譜及清代各地的搢紳錄最豐富,為世界之冠,大多是目前臺灣所無的。所藏族譜多達一千一百種,日人多賀秋五郎所編「宗譜之研究——資料篇」中,僅著錄了九二四種,實際上未收完全,還有

脫漏。所藏的清代各衙門的則例也相當的豐富，在目前只有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可以與之比擬。其他如有方志一千多種、清代文集約九百種，也是該館特色之一。

(三) 普林斯頓大學　普大藏中文書以葛斯德捐贈的藏書為基礎，故該校為紀念葛斯德先生將東亞部定名為葛斯德東方圖書館（Gest Oriental Library）。據說葛斯德先生原打算把他在中國收集的藏書捐贈給耶魯大學的，但其時耶大未設置東方部，對中文書不重視，未予接受，故葛先生轉贈於普大，至今耶大當局猶懊悔不已。普大藏中文書截至去年十二月底止，共一七五、七三七冊。其中舊籍約計七萬冊，包括善本一萬多冊。善本書以明版為主，宋版則有磧砂藏經殘帙多種，其中有七卷是商務印書館影印磧砂藏未收的佚書。又有舊抄本明實錄一部。該館藏善本書，三年前已聘請屈萬里先生考編，撰成書錄，尚在籌印中。普通本中以中國醫藥典籍收藏最富，最具特色。有銅活字古今圖書集成原本一部，在海外甚為難得。

(四) 耶魯大學　耶大東亞圖書館藏中文書，據今年五月底的統計共一〇九、六六七冊，其中舊籍只有兩萬多冊。因該校東方部成立較後，故購藏的書籍不多。該校藏書使用的分類法有兩種，一九四〇年以前入藏的書，用裘開明氏哈佛燕京圖書分類法，一九四〇年以後入藏的

書則用國會分類法，所以圖書的排架分歧，查檢不易。該校有一個善本圖書館，名為賓克圖書館（The Being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集藏各國的珍本及手抄稿本。其中所藏以西洋善本為主，東亞者則多是日本、朝鮮的舊抄、舊刻或活字本，鮮有中國舊本。那些日本朝鮮的舊刻或活字本，大都是乾隆以後的印刷品，不能算作珍本。其中只有現存世最早的印刷品，西元八世紀中葉日本稱德女皇所印的百萬塔陀羅尼咒、及若干日本古寫本經傳，比較稀珍。耶大在東亞圖書館內別有一個善本書庫，然其中所庋藏的大抵是明清兩代所刻的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等小說，實際上不完全夠稱善本，而在普通本書庫中卻不乏明版，譬如明黑口本元朱德潤著存復齋集、嘉靖本王道撰順渠先生文錄、萬曆本方氏墨譜等，卻是今日流傳比較稀罕的書。該館善本據我估計，不過三兩千冊，無甚特色。

(五)　哈佛大學　哈大圖書館東亞部名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 Yenching Library），所藏中文圖書之富，在美國僅次於國會，據去年十二月底的統計，達二九六、一八五冊。其中舊籍約近二十萬冊，內有善本書二萬多冊，及北平燕京大學寄存的善本數千冊。善本以明版居多，宋版僅有真德秀西山讀書記甲集、揚子法言、及福州東禪寺藏、思溪藏佛經零本多種，另有所謂宋版五經白文，就我的鑒定，實為明初覆刻。元版則有節孝文集、通志等數

種。宋徐積節孝文集今傳世較早的刻本是明嘉靖及清康熙間刻本，宋版固不易得（間有所謂宋版，實康熙覆本偽充），卽元刻亦世所罕覯。元刻通志雖傳世較多，然大都為明印，該館所藏刷印較早，書品亦佳。明版中有十竹齋畫譜二部，不過刷印較晚，彩色稍遜。普通本中以叢書最富，數逾千種。其他較具特色的，有地方志二千多種，清人文集近千種，又有族譜二百多種，雖不及哥大的多，但在美國已佔第二位。明人集雖不多，僅百多種；也偶有少見，如陳琛紫峯文集，現今國內卽無藏本。

㈥芝加哥大學　芝大東亞圖書館藏有中文圖書一六六、三〇八冊，其中舊籍約計十萬冊，以經學、子書、及金石考古方面的書比較豐富，因為該館對這幾方面的圖書特別措意優先採購的緣故。此外地方志及清人文集也不少，方志有一千八百多種，清人文集有八九百種，也是該館藏書特色之一。善本書約有二萬冊上下，中有元版增廣注釋唐柳先生集一種，建刊黑口，或為明初翻本。另有通鑑綱目一種，舊編定為宋版，現已經錢存訓先生鑒定，改為明初刊本，誠是。明版書則甚多，如明王肯堂著尚書要旨、孫繼有尚書集解、鄒翔楨尚書揆一、王用賓三渠集、汪應軫青湖文集、余養元選余食其稿遺、盧象昇大司馬盧公集等等，都是國內無傳而罕見的書。

(七)　伯克萊加州大學　伯克萊加大東亞圖書館是美國東方圖書館中後起之秀。據今年初東亞圖書館協會的調查表，截至一九六八年底止，該館藏中文書約十五萬册。而據今夏方接任的館長湯迺文兄告訴我，所藏中文書已近十八萬册。蓋因該館圖書購置經費充裕，及主持同仁的努力採集，故增加較速，寖有駕臨哥大、普大、芝大而上之勢。其中文書中十之六七是木刻舊籍，約逾十萬册。所藏雖無大特色，然四部之籍皆備，而以清代文集比較豐富，約近千種。善本書不太多，約一萬數千册，多爲明版，宋版僅有建刻十行本周易及春秋左傳兩部，但已修補入明，書品略遜。除了中國刻木以外，該館還藏有朝鮮日本的舊活字本及舊刻舊抄本漢籍不少，不下萬餘册，都是近年收購的，尚未編目。該館另藏有日本百萬塔陀羅尼咒及雷峯塔藏經各一卷，又有木刻的書版及各種銅木活字，是研究我國印刷術最好的參考資料。

除了上述七館外，美國東亞圖書館藏中文書在十萬册以上的，還有洛杉磯南加州大學、康乃爾大學、史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米契根大學、及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等，我因未能前往參觀，不知道他們收藏中國舊籍的情形如何。這幾所大學雖然不以收藏舊籍著稱，我想中文藏書既有如此之多，總有一部分是屬於舊籍或善本的。依據調查統計，美國各東亞圖書館所藏中文書截止一九六八

年，總數是三、〇二六、七二九册，而前述七館藏書總計一百四十六萬册，其中舊籍卽達一半以上約七十六萬多册。其餘各館雖說所藏舊籍不多，在一百五十多萬册中，推測至少有十分之一是木版線裝書。由此估計，我國舊籍流散在美國的，不會少於九十萬册。其中善本部分僅就此七館所藏統計，已達十二萬册以上。而七館普本庫中也還有若干善本漏選的，我在國會普本庫中瀏覽翻閱時卽發現了幾部明版，例如趙清獻集是嘉靖刻本、黃鳳池刊八種畫譜是萬曆天啓間刻本、班馬異同是天啓本、鍾惺史懷是崇禎本。因爲時間的關係，未能逐一查閱，這種情形，我想各館大體都有。再如哈佛燕京圖書館中還有一批舊籍沒有編目竣事，其中也應當有珍本。再加上我未去參觀各館藏書中可能選出的善本，美國所藏善本總數約在十四萬册上下，應當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估計。這批近九十萬册的中國舊籍，包括十四萬册的珍本流散在美國，就各館分別而言，儘量都不能說怎麼豐富，但集合言之，就不能不說是一個龐大的數字。

在典藏方面，各館對舊籍都異常珍視，保管得相當好，尤其是善本書大都製有布函套來保護。書庫內都裝有空氣調節器，使庫內保持一定的溫度及濕度，既清潔又防蟲蠹。所感不足的，是舊籍編目人員的缺乏，所以各館編印有書本目錄的很少。就是卡片目錄也大多僅具有書名及著者片，以供查檢，分類片則多不完備。而且有些目片著錄的也不完全正確，如著者項、版本項、及

分類常有錯誤。因此美國所藏的中文書籍雖然豐富，還未能結為整體，完全發揮它的功能。近年美國東亞圖書館的負責人士，有編印善本聯合目錄的擬議，這是一個可喜的消息。如能成為事實，不僅是在美國的學人可以充分利用這批總量龐大的藏書來研究我國文化，就是世界其他各地研究漢學的人要尋覓資料，也方便得多了。

在九月三日我結束了美國的訪問，轉道日本參觀。日本與我國毗鄰，自古以來即受我中華文化的薰陶。我國圖籍，自唐以後，流傳入日本的很多。所以自宋以來，日本藏書情形即受到我國學者的重視。如北宋時歐陽修作日本刀歌，即說到尚書百篇，日本尚有收藏的。南宋末年宰相馬廷鸞也曾敘及我國的經書，往往有日本的翻刻本。清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就有好幾種是得自日本的佚書。清末民初楊守敬、羅振玉、董康等人相繼訪書日本，獲得了國內不傳的古籍很多種。近代我國圖書館界參觀日本的，在這方面也都比較注意。因此我國舊籍藏在日本的數量很多，但對他們收藏的情形比較清楚。而且日本許多收藏的圖書館大多有目錄行世，容易查考，所以我到日本參觀，主要在欣賞宋元古本。我是九月四日抵達東京，參觀了兩天，轉赴京都，於十一日自大阪乘機返臺。在日本的一週中，我只參觀了國會圖書館、靜嘉堂文庫、內閣文庫、宮內省書陵部、天理圖書館、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等幾個收藏中國善本比較著名的地方。還有東洋文庫原來也在我打算參觀之列，但因為我是星期四抵達東京的，而星期六下午各機關不辦公，我在一天半的時間內趕參觀了四個圖書館，來不及再去東洋文庫。而我很早就與京都平岡武夫教授及王

夢鷗教授有約，王教授還是自廣島趕來京都等候我的，所以不能等到下週再參觀東洋文庫，只有放棄，而於星期日匆匆趕去京都。

日本國會圖書館是二次大戰後，於一九四八年二月成立的，把所有政府部門的圖書館，甚至有私人的文庫都納入他的組織之下，一共有三十四個分支圖書館，除我所參觀的靜嘉堂文庫、內閣文庫，宮內省書綾部都是他的分館。國會圖書館藏書總數，據今年四月初統計，一共二、四四七、〇八一冊。國會分館收藏中國舊籍有十多萬冊，靜嘉堂文庫所藏除購自歸安陸氏皕宋樓的善本四萬五千冊外，另藏舊籍七萬五千冊，共有十二萬冊。內閣文庫，及宮內省書綾部（卽昔日的宮內省圖書寮）各藏善本上萬冊。總計各館所藏的宋本逾二百種，元版三四百種，其中頗多孤本。如我所見的靜嘉堂藏冊府元龜、白氏六帖、李太白集、內閣文庫藏的周易新講義、廬山記，宮內省藏的黃唐本尚書正義、孝經、通典、寒山詩附豐干拾得詩等等，都是初印，刊雕精美，書品絕佳。宋龔原著的周易新講義十卷，是我國久佚的書，四庫未著錄，日本文化二年（一八〇八年）翻刊入佚存叢書第五帙中，方顯於世，阮元乃據抄本進呈，國內始有流傳。宋陳聖俞廬山記五卷，國內傳本不全，四庫僅得殘本三卷著錄，民國初羅振玉才據日本藏宋本景印入吉石盦叢書中。冊府元龜，國內通行的皆自明崇禎刻本出，大圖書館始藏有明鈔本。宋本存世極罕，今可考

見的，除前北平圖書館藏有殘本八十七卷，現由本館保管外，只有靜嘉堂別藏有殘本一部，存四百七十四卷。宋本與傳本頗有異同，足資校勘通行本的僞脫。又如內閣文庫藏有元至正刻本宋濂著的潛溪集十卷附錄一卷，也是今日僅存的孤本。現在流傳的宋濂文集都是明代人所選編的，內中所收宋濂早期的文章不多。此至正刻本收了七三篇，只有極少數的幾篇見之於明刻本外，其餘的都為傳本所未收。

天理大學圖書館建立於一九三〇年，迄今尚不足四十年，但在歷任館長辛勤購求下，藏書已超過一百萬册。所藏的中國舊籍數量雖不多，但是其中頗有善本，而且所藏的善本大都精罕，在日本的圖書館收藏中，頗負盛名。該館藏有宋版十六種、金版二種、元版數十種。宋版書皆係初印精絕，如徽州刻本毛詩要義、建安劉元起本後漢書、臨安尹家書籍鋪本搜神秘覽、紹興本劉夢得文集、吉州本歐陽文忠集及經典釋文等等都是罕覯的秘籍。惜因日本各校都在鬧學潮，圖書館當局深恐善本書毀損，為防患於未然，已將善本書庫扃鎖封閉，不能進入庫內細加瀏覽，僅參觀了由該館準備的宋金元版十數種而已。京都大學也因學潮關係，善本書庫未開放，只參觀了該館預先提備的宋元版二十多種，大都是佛典，其中有一部宋黃唐本禮記正義，初印甚精，傳世稀罕，惜僅殘存卷六十四一册。該校別有人文科學研究所，其圖書館藏書甚多，則未受學潮影響，仍

予開放，以供閱覽。該所原來是獨立的，戰後始併入京大。所藏中文舊籍達二十萬册，大都是清代以後所刻印的通行本，善本僅有少許，宋版只有十行本左傳註疏等數種，多屬常見的，無特異之書，但普通本則較完備，世界各國在此地作漢學研究的頗多。

以上所談的只是美國日本圖書館目前收藏中國舊籍的大概情形。各圖書館仍繼續在臺灣、香港、日本作收購的努力。不過近年舊籍的流通量已告減少，這種增加率預料不會太大。所以有的圖書館轉向於攝製膠卷，以輔藏書的不足，這類顯微膠捲，各館收藏的也不少。衆所週知的是抗日戰爭期中，於民國三十年我國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一批前北平圖書館所藏善本二千多種二萬多册，在運達美國後不久，將其攝製顯微膠片一千〇六十三捲，目前全世界的大圖書館差不多都購藏得有。自從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目出版，尤其是臺灣各館收藏的善本聯合書目出版後，因為查檢方便，世界各地研究漢學的人，可以按圖索驥，委託收藏的圖書館代為攝製他們所需的古籍資料。現在僅中央圖書館一館，每年代美國圖書館攝製善本書微捲即達百多種。向其他的圖書館如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故宮博物院等處也各有若干，美國日本互相攝製的也不在少數。近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並擬具了擴大的計劃，將他們所沒有的典籍，委託收藏的圖書館，攝製沖印成影本圖書，以增益收藏。現已攝印成明以前的著作四五百種之多，大都是日本其他

各館所藏的，正擬進一步向國外委託攝製。看了美國日本各國書館辛勤增藏我國舊籍的情形，再反過頭來看國內圖書館的收藏，不能不令我感慨系之。臺灣各圖書館所藏的舊籍，總共約有五十多萬冊，其中善本書約二十五萬冊，除了臺灣大學及省立臺北圖書館所藏的而外，都是從大陸移運來的。從卅八年迄今二十年，這個數字可以說沒有什麼變動。偶有增益，數量也很微小。拿臺灣與美國日本在收藏的內容來作一比較，明代以前的著作，以國內所藏的比較豐富，固然也有海外收藏而國內無傳的，但數量很少。但清代以後的著作，則國內要比美國或日本少得多，這是因為從大陸徙運來臺灣的以善本為主的緣故。國內所有國外所缺的圖書，在出版界不斷翻印及國外圖書館委託攝照的情形下，這種差距日漸減少。然國外所存而國內不傳的古籍，則國內還沒有一個圖書館擬有設法增添充實的計劃。我國的典籍向海外傳播，以供全世界人士研究，可以宣揚我中華的文化，這當然是件好事。但假若達到了這種情形：國人研究文史哲學的，如不到國外去找尋研究資料，就無法獲得良好的成果；以及我國文化的精髓，要待別國學人來發揚，總是件說不過去的事。然而現在已有這種趨勢，作高深研究的人已感到國內所藏的圖書文獻資料不夠，而需要向國外尋求。歐美人士研究漢學的，好些不到臺灣來，而以日本為中心，就因為日本所藏的圖書資料要比臺灣豐富的緣故。我相信再過若干年，等到美國所藏的善本舊籍聯合書目編纂完成，

將所有的舊籍接合成為一體，再加上攝製的大批顯微影本罕見圖書資料，美國將成為世界上漢學資料收藏的大本營，研究的中心。這絕不是故作驚人之談，而是極可能的趨勢，假如我們不再努力的話。

保存整理我先民的文化遺產，是我們中國人無可旁貸的義務。將我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發揚光大，也是我們應有的責任。我們的科學不如人，還想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去，而我們固有的文化保壘，更應當由自己來固守保持，不希望他人來越俎代庖。現代的學術研究，講求的是證據，是資料，閉門造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誰利用的資料豐富，誰的研究才能獲致成果，所以任何的學術圖書館尤其是國立圖書館，一定要收藏豐富的圖書資料，提供優良的研究環境，以便利學者來作研究工作，這樣才能提高國家的學術地位。這幾年臺灣的高等教育發展得很快，研究所及研究生逐年遞增，所缺少的，是還沒有一個優良的研究環境。現在談復興中華文化，假如連我們究竟有多少文化資產還不清楚的話，怎麼談得到去復興。我們看看中外的歷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復興，都是先從整理故籍開始。因為溫故才能知新，識往才能開來。我認為要復興文化，首要的條件，是把我先哲的文化遺產予以整理。喪失了固然沒有辦法，如果還流傳在域外的，必需覓求充實完備，來供人研究，抱殘守缺，是不能開花結果的。臺灣的藏書，在自然應用科學方

面，固然很少，但在本國文化方面，却有良好的基礎。已出版的善本聯合書目和卽將出版的普通本聯合書目可以把各圖書館的收藏結為一體，只要再增添少數國內不傳的典籍，就可以將我們的文化堡壘充實起來，成為我國學術研究的中心，不僅可以提供一個優良的研究環境，使國人來整理研究，發揚光大之，而無需外求。就是世界各國有志研究漢學的學者，也不能不以我國為搜輯資料的淵藪。因此我提出下列四點呼籲，希望政府及社會予以支持：

(一) 希望我教育當局、主持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當局、以及各文化基金會重視集藏我國古籍問題，籌撥經費，委由國立圖書館以收購或攝製國內無藏的古籍，及世界各國有關漢學的著作。臺灣各圖書館已有良好的基礎，所需增添的數字並不太大，且可分期辦理，每年所需經費並不甚鉅。

(二)據聞有些軍政機構或多或少收藏有若干的舊籍。這些舊籍因為缺乏專人整理，多堆置庫內，而無法供人利用，任其塵封。倘若因日久或遭受水火蟲蟻之災而損毀，實在可惜。去年交通部把他用不着的舊籍三千八百多册，捐贈給中央圖書館，整理編目而供公衆閱覽，這種大公的精神值得欽佩。希望尚有收藏的官署，如果所藏的舊籍而無參考的必需，或因整理無人，因而塵封箱置的，曷如仿照交通部，把它捐贈給公共圖書館。倘或因牽涉財產問題不便

捐贈的，也可委託中央圖書館代爲保管，整理編目以公開閱覽，供人研究。

㈢ 私家藏書如因不得已而需要出售時，希望以合理的價格售歸公立圖書館，請勿貪圖些微之利而輕易的讓其流入國外，而損失國家的文化資財，尤其是國內無傳的舊籍。如能仿效林柏壽先生愛護國家文物，近日將所藏捐贈予故宮博物院的精神，而捐贈所藏古籍予國立圖書館，應由政府予以褒揚。

㈣ 近十多年臺灣出版界氣象蓬勃，翻印古籍很多，廣被全世界，宣揚我國文化，功勞甚大。不過所依據的多是臺灣所有的藏本。我希望今後的出版界不妨仿效鮑廷博、楊守敬、董康等前賢的精神，在美日等國多訪求一些國內所無傳的古籍來出版，以溝通有無，使稀見的書得以流傳國內，不要僅作單方面的輸出。這樣雖然在成本上要增加一些，但爲了文化事業，我認爲還是值得的。

٢ -

我國版本學上幾個有待研究的課題

「版本」這一個名辭，通常一般人都用來形容某一書的雕版時代，實則並不盡然。「版本」是一個代表兩種意義的連合名辭，「版」是雕版，「本」是指的書本。「版」本來是我國古代圖書的一種，又名作「方」，用木做成，形狀為長方形，長短約與竹簡相似，只是比竹簡要寬，上面可以書寫從五行到九行，大約可容百字，故古人多用來作戶籍册。唐代發明了雕版印刷術，刻書的版與之相似，故借用來專指雕版。「本」，許慎說文解字云：「木下曰本，從丅」，是根本的意義。漢成帝時劉向校書中秘，所依據的有內府所藏、太史所藏、大中大夫卜圭所藏、射聲校尉立所藏、巨富參所藏等各種不同的書本。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中所常引的江南書本，以別於江北書本，都是說明各書本根的不同。「版」因刊雕有先後，所以有時代地域的區別，而「本」則沒有。譬如後代覆刻或影印宋元古本，時代雖與原刻有早晚的不同，而書本則與原版無殊。所以「版本學」也者，正確的說，是研究版刻的鑒別與歷史及書本的源流的一門學問。

我國圖書之開始有雕印，到現在至少有一千二百年的歷史，而版本之成為一門專門學問，使

得人來研究它，還不過是近五六十年的事。我國印刷術肇始於唐代，歷宋元兩朝雕版印書的事已經非常普遍，但還談不上有版本之學。到了明代，版本學才漸萌芽，入清以後方始昌盛，雖然有版本的書，還沒有研究版本學的專門著作。因為前人都是依據他豐富的收藏，來比勘考校，完全憑他的經驗來鑒別及著述。至於其所以然之故，大抵是心領神會，未嘗明白的寫出來以教示於人，所以還沒有步入科學的領域。清宣統三年葉德輝發表了他所著的書林清話十卷，是我國第一部研究版本的專著。在這部書中對我國雕版的起源及歷代公私刻書的情形、書林的掌故，都有相當詳細的考述。民國以來，又經過中外學者不斷的研討，才真定了版本學的基礎，成為人們研究的一項專門學科。版本學上的知識，我們所知道的，比起清人來，固然要豐富得多，但終究歷史還淺，有許多問題，還有待我們來繼續研究。現在我且提出幾個比較重要的課題來商榷，以供有興趣的同道來共同研討。

清孫從添藏書紀要說：「夫藏書而不知鑒別，猶瞽之辨色，聾之聽音。雖其心未嘗不好，而才不足以濟之，徒為有識者所笑，甚無謂也。如某書係何朝何地著作？刻於何時？何人翻刻？何人抄錄？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為宋元刻本？刻於南北朝何時何地？如何為宋元精舊鈔本？必須眼力精熟，考究確切」。誠如孫氏所說的，鑒別是研究版本的一個基本手段。假如我們不能

鑒別，不僅是爲識者所笑而已，而我們所獲得的知識卽不可靠。我國版本鑒別之成爲一個重要的課題，始於明代末葉。在兩宋人的筆記中雖常有提到監刻、及蜀、閩本之有不同，但只是文字校勘上的區別。宋尤袤遂初堂書目及相臺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此書自來相傳是宋岳珂撰，近友人翁同文先生始考訂爲元荊溪岳德操所作），始臚列當時流傳的各種不同版本，是我國記載版本最早的兩部目錄書。前人刻書，都有序跋或牌記，敍述刻書的原委及記載雕版的年代地域，只要一加翻閱，就可以知道該書是何時何地何人所刻印的，所以在宋元兩朝沒有鑒別版本的問題發生。明代中葉以後，民間覆刻宋版的風氣很盛，一般的收藏家也都珍視宋版，像嘉靖時江陰朱大韶用所寵愛的美妾向人掉換一部宋版漢紀。萬曆時蘇州王世貞賣了一個田莊，僅爲了收購一套宋版前後漢書。明末的常熟毛子晉，甚至出高價徵求，在大門口張貼告白說：有拿宋版來賣的，計葉付錢。所以當時民間流傳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的諺語。入清以後，錢牧齋、季滄葦等復倡之於前，乾嘉時黃蕘圃、吳兔牀等人更推波逐瀾於後，於是有佞宋、寶宋的名稱出現。不僅寶宋，而且珍元。降及清季，藏書之家幾乎沒有不以所藏宋元本來炫耀於人的，而他們的身價也全憑所藏的多寡來定高下。然而宋元刻本，歷時幾百年，屢經兵燹水火蟲蠹之災，傳世的究屬有限。徵求的旣多，販鬻的自然無以爲供，於是坊估遂不惜僞造來欺騙購藏者，以獲暴利

。據明萬曆年間高濂燕閒清賞錄、屠隆考槃餘事等書的記載，當時坊估作僞的方法，已經是千奇百怪。愈後作僞的技術也愈進步，不僅用明刻來充宋元，甚至有拿清代覆本來冒宋本的。只要書一入書估之手，無論是宋元原刻或明清覆本，鮮有不改頭換面的。原有的序跋牌記往往被折除，移真綴假，以假作真，以致面目全非，明清兩代的藏書家重視宋元，固然使得許多的孤本秘笈，得以復出老屋，重顯於世。也促成了我國舊本書的混淆不清，增加了後世鑒別的困難。

書估造假的風氣既盛，藏書家不能不謀求鑒別的方法，以防上當。然而在有清三百年還沒有一部討論鑒別版刻的專著，只有在孫從添的藏書紀要，及清人隨筆與藏書志間有論及，僅提出了幾個鑒別的原則。清代人鑒別的方法，不外是從書刻的字體，版式、行款、紙張、避諱字等五項來鑒定。書刻的字體，固然是各時代有其特殊的風格，然而欲精於此，非多見真本，了悟其風神，則不足以言鑒別。若但執着顏、柳、歐、趙諸體字來區別宋元，則未免失之泥。如遇虎賁中郎，更真贋莫辨了。何況清人區分宋元字體，僅憑其經驗，並非經過比較研究後所得的結論。至於版式行款，各朝代並無一定的規格。而且後代覆刻的版式行款與原本無異，實難以作為鑒別的根據。從紙張來鑒別，因各時代造紙的技術與原料成分各有不同，不失為一比較科學的方法。但我國於各時代造紙的技術與原料尚乏詳細的記載，若光靠經驗用手觸摸來鑒定，則並不完全可靠。

從紙張來鑒定古物時代，在西洋往往作化學分析成份，或用放射元素來測定，雖然比較科學，然而對於我國的雕刻書並不完全適用。因為西洋印書用活字版，僅印一次，印畢後版即撤除，不像我國的雕版，刻成刷印所需要的部數後，版尚可貯存，歷時數十年乃至數百年，遇有需用時，仍可隨時印刷。故刷印的時代雖有早晚的不同，而其版則一。譬如南宋初年所刻的南北朝七史書版，在明初還相當完整，我們不能因為它用明代的紙所印成，而否認它是宋版。從避諱字來鑒別宋刻，雖是比較可靠的一種方法，但若在書中沒有見到宋朝皇帝的名諱嫌字，或私家坊刻避諱不謹嚴，甚至不避諱，則就無法鑒別。綜觀清代的藏書家所提供的幾種鑒別方法，對於版本學的研究，雖然頗有貢獻，但終究不是完全可靠的方法。姑不論那些方法無法鑒別出某書刻於何時何地，就是用來僅斷定為宋為元，也往往有錯誤。觀清代各家藏書志著錄的所謂宋元版，其中即不乏贗品。雖以清內府收藏之富，翰林侍從諸臣賞鑑力之高，在天祿琳琅書目所載的宋元版，據葉德輝書林清話所指出，及近人張允亮所考編的故宮善本書目，其中就有不少是元充宋，或明清刻本以僞宋元的，更可見鑒別的不易了。

民國以來，藏書家的鑒賞力比較清人又有進步，一則是受西洋印刷術傳入我國的影響，宋元舊本用西法影印流傳的衆多，聞見上比前人要廣些。再者是在清人鑒別方法以外又知道利用雕版

刻工來作考訂。原來在宋元本版心的下方，往往刻有一個字至三個字不等，這幾個字就是刻工的姓名，或單有姓或名。刻工在他們所雕的版片中心私自簽刻下姓名，不過是為了便於統計各人所刻版片的數量來計算工資用的。版心有刻工在宋元本中除了少數的坊間刻本以外，頗為普遍。明代中葉以後的刻本也間有記刻工的，只是不如宋元的普遍。清代的學者雖已注意到刻工，但只認為是宋版書的特徵之一，而罕有利用來作考訂的。近四五十年來學者始注意及此，如傅沅叔、張菊生、胡適之、傅孟真諸先生，往往從刻工來考訂版刻的時代。因為古代印刷雕字工匠是一種專業，凡公私有雕印書的，多僱募這些專門技術雕刻工來從事。故在同一時代與同一地區雕刻的許多書，它們的刻工往往相同，所以從刻工不僅可以考訂出書刻的時代，甚至於可以考出雕版的地域。例如傳世的九行本南北朝七史，自來以為是在四川眉山雕版的，趙萬里先生根據其書的刻工，考出多見於南宋初年浙江刻本各書，因知七史是紹興年間在杭州雕版的。又如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的宋刻小字本歐陽修五代史記，前人或以為北宋刻，或以為南宋刻，莫衷一是。我曾根據它的刻工考出來是北宋末年浙江原刻而在南宋初年修補印行的。再參稽記載，知道此書就是徽宗時湖州思溪王氏所刻，其版在高宗南渡後取入國子監，修補印行的所謂監本。所以近代所編撰的書志，如寶禮堂宋本書錄、文祿堂訪書記等書，對於所著錄宋元版的刻工，都有詳細的記載，以供

稽考。

刻工的確是版本鑒別上的一項重要參考資料，我們若要整理我國的宋元舊本，改正前人鑒定的錯誤，考出那些失去刻書序跋牌記宋元本的刻時刻地，也只有先從刻工的研究入手不可。只是一書的刻工少則數人，多以百計，而現存的宋元本數量又不少，查考起來非常困難費時。三十多年前日本長澤規矩也曾根據我國故宮博物院、及日本靜嘉堂、宮內省圖書寮、金澤文庫、足利學校等所收藏的宋元本的刻工，編了一個索引，名為「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初刊載書誌學第二卷第二、四兩期，我國鄧衍林將之譯載於圖書館學季刊第八卷第三期。這篇刻工名表是依刻工姓氏的筆劃為序，下注所見載的書號。從某一刻工可以查檢出他曾刻過了那些書，在那些書中只要有一部存有原來序跋，知道它的刊刻年代及地方，就可以類考出凡有該刻工的書為何時何地所刊雕。雖然長澤氏所採用的宋本僅一百一十餘種，元本六十餘種，數量不多，原來所鑒定的版本，有些也難免有點問題，但他的這項工作的確給予人的方便不少，值得贊揚。我覺得像這樣的刻工表極值得我們有志研究版本學的來重編，而且也有此必要。近幾十年來宋元本經過影印的很多，而私家的藏書也大都收歸公有，很容易見到，不像在私人手中，扃楳秘藏，不輕示人。而近人所編著的題記書志也大都詳載刻工，所以我們所能見到的資料，比長澤氏的時代不知要豐富多少

倍。這個刻工表編成後，可以便於查考，但還只是研究版本的初步基礎。我們可以再進而甄別整理，來比較研究各時代各地域書刻的字體及版式，歸納出一個法則，才能談得上是科學的鑒別方法，再來鑒定那些沒有刻工的宋元版。如此則可以真僞立辨，到那時，書估再也無從施展他們造假的技倆了。

印刷術是我國發明，這是中外學者所無異辭的。但發明於什麼時候，則歷史上沒有記載。我國現存最早的雕印品，是英國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石室所發現的唐懿宗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年）王玠所刻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現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這卷佛經雕印的相當精美，可以推知必需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演進到那種技術。現今存世最早的印刷品是日本稱德天皇時代所印的百萬塔陀羅尼咒。稱德天皇在天平寶字八年（西元七六四年）討平惠美押勝之亂後，為了酬謝佛恩，乃發宏願，下令造三重小塔一百萬基，廣印陀羅尼咒，在每一塔內放置印本陀羅尼咒一卷，一直到他崩的那一年——神護景雲四年（西元七七〇年）才畢工。在第八世紀時代，正是日本銳意吸收我國文化的時代，那時的京都奈良完全模倣唐朝長安的格式來建造。稱德天皇時代主持印造百萬塔陀羅尼咒的是東宮學士吉備真備，吉備曾在我國留學十九年，他的建議用印刷來代替抄寫，顯然的是受我國的影響。由此可以推知我國在唐代宗以前，就已經知道印刷的方法了

。然而我國現存的實物固然沒有早到第八世紀的，就是目下在前人的載籍中，所能見到可以確認為有關印刷的記載，也要比百萬塔陀羅尼咒晚五十多年。因之我國印刷術究竟起源於何時，成為中外學者多年來研究的對象。近來有些學者發現了在明代邵經邦所著的宏簡錄中，有一條記載說：唐太宗曾下令梓行長孫皇后所撰的女則十篇。又在唐劉知幾史通中有太宗朝所修的五代紀傳，於「太宗崩後，刊勒始成」的話，又舊唐書褚无量傳說：玄宗即位，无量奏請將內庫所藏的舊書「繕寫刊校」，以證明在唐太宗及玄宗時，也就是第七世紀後期或八世紀初就已有印刷的事。然而這幾條資料的來源都有點問題，邵氏所說唐太宗命梓行女則十篇，在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鑑中均沒有記載。邵氏生後幾百年，不可能見到歐陽修司馬光他們所未見到的文獻，故其說實來可據。後兩條記載所說的「刊」字，根據文義是「著作」與「刊削」的意思，並非如後代所指的雕版。雖然根據其他的跡象來推測，在唐玄宗時代，甚至在太宗時代，已知道雕版印刷，並非不可能的事，只是還沒有明確的證據而已。我國印刷發明的時期問題，目下還沒有得到結論，仍有待我們來繼續研究。

我認為我國印刷術的發明，似以受佛教的影響比較大。六朝以來，我國佛教昌盛，信徒們為了積功德，往往雕刻佛像或抄寫佛經來施捨於人。據當時的高僧傳記中記載，那時的人抄寫相同

的佛經動輒以千百份計，在這樣的情形下，自然很容易想到如何能用複製的方法來代替重複抄寫。雲仙雜記引僧園逸錄說：玄奘法師用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衆，每歲五馱無餘。雖然雲仙雜記一書是宋人所僞作託之於唐馮贄撰的，但玄奘以像送人的事，在續高僧傳及宋高僧傳中都有記載。他所施贈的佛像，數以百萬或千萬計，不可能是雕刻或手繪，當然只有出之印刷的一途。不過印佛像只是用木刻劃佛像在紙上鈐蓋，有類於蓋印章，還不能說是雕版印刷。然而這種複印的方法，予人的啓示作用很大，很容易轉變成雕版印刷，來複印佛經。我相信在初唐或盛唐時期佛教的典籍中，可能有這類的資料存在，只是有待我們去發掘。還有近幾十年在敦煌及新疆考古發現的遺物中有許多佛教印刷品，沒有記載刊版的年代，如日本中村不折收藏有一卷吐魯番所發現的古刻本妙法蓮華經殘卷，文中雜用武則天所造的異體字，可能是距武后不久所刻的。像這一類無刊印年代的古刻本，也需要我們來研究考訂它們的年代，其中可能有最早期的印刷品。

從明萬曆以後到清朝初年這約一百年之間，是我國書坊刻書最盛行的時期。若從純藝術的觀點來衡量，也是我國雕版印刷技術最精美的時代。在這一時期中的蘇州、杭州、以及南京等地書坊林立，他們彼此間為了爭奇鬬勝，多以重金聘請繪雕的名工。當時的官私刻書，很多可能是由他們承包雕印的。書中附刻插圖，以這一時期的印品最生動精美，顏色套印也以這一時期最普遍

，由朱墨兩色遞增至四色五色套印，像崇禎時金陵十竹齋彩色套印的十竹齋畫譜，可以稱得上曠絕古今。雖然這一時代書刻字體通常用匠體字，呆滯不靈，不如宋元本的生動，然也有不少精美的印品，如勾吳袁氏書種堂的楷體字刻書，歙縣程君房墨苑中所摹刻各家的手蹟，也未嘗不可作法帖觀。這一時期應該是我國版刻史上相當重要的一頁，然而在葉德輝的書林清話中卻沒有考述，近代撰中國雕版源流史的也都從略。固然是明末坊刻不受清代藏書家的重視，也是他們所刻的以傳奇雜劇，章回小說為主，在乾嘉以來樸學氣氛籠罩下，而鮮流傳，葉氏所見資料不多的緣故。近幾十年來雜劇小說的研究考證蔚成風氣，而明代刻本也成為公私購藏的對象，往日所不為人知的書，多重顯於世。近人也有研究的，如陶湘之專研套版，鄭某之整理版畫，但為數究不多。他們的研究，也還有近年發現的資料可以補充。其他如那時書坊的情形，各書坊間關係（常有此家所刻的書版，後又改由他家來印行），繪雕工中何以多為安徽人，他們在當時藝術界的地位如何以及他們的生平等問題，則前人還沒有研究過。這一頁歷史，尚有待我們來補寫。

多年來常有朋友及出版界與我談起某某書以那些版本比較好，以我國古代圖書的浩瀚，而每一書流傳的本子又衆多，我相信這一個問題不是任何一位版本目錄學家或校勘學家所能完全解答的。我國關於概述各書的內容及著者生平像四庫全書總目一類解題的書，前人著作的比較多。而

對於論析各書流傳版本的源流與異同這一類的參考書，則罕有纂述。像邵懿辰的四庫簡目標注，莫友芝的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張之洞的書目答問、葉德輝的四庫全書版本考等著作，雖然在各書下續列許多所流傳的版本，但都沒有條析流傳各本的淵源如何，及究竟這些本子有無異同。讀書之必需選擇版本，這個道理，差不多凡是讀書的人都知道。因為一部書因本子的不同，其內容往往有很大的差異，我試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一下。在上個月曾因某市初中聯考入學試題所引起而喧騰一時的「蓬」「篷」之爭，據報紙披載說教科書主編機構曾召集專家開會討論，最後決定以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所影印元刊古本所載的「蓬」字為正。這首李白別友人詩之應作「蓬」字，在古人的詩文中如蕭統文選所收的詩賦，就可以找出好些例子來證明，主編機構不去考證它的本源，僅引既非最古亦不最善的四部叢刊本為正，實在未免有點那個。四部叢刊所影印的是明嘉靖時東吳郭雲鵬寶善堂刻本，並不是元刻。現存宋楊齊賢注、元蕭士贇補注李太白詩集最早的雕版是元代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今故宮博物院還收藏有一部。郭雲鵬雖說是從元本翻刻，可是這個人刻書的態度太不謹嚴了，他把楊齊賢及蕭士贇的注文刪削去了好多。喜歡刪削改纂，這也是一般明朝人刻書的最壞習氣。所以他的刻本固然不及元刻之善，也不如在他前後正德萬曆年間的各刻本可信。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這部書，據郘亭書目等目記載，現在流傳的有明刻說郛、學海類編

，歷代詩話，知不足齋叢書、湖北先正遺書等叢刻本，都是一卷，僅從各本的卷帙是分辨不出它們有什麼不同的。但若一加比勘，則內容有很大的出入。明刻說郛本凡錄三十五條，學海類編及歷代詩話卽出說郛本，只是歷代詩話本又少一條，只有三十四條。知不足齋叢書本是根據明洪武時華亭孫道明寫本來翻刻的，共有六十九條。不僅條數要比說郛本多出一倍，各條的文句也比說郛等本為詳，湖北先正遺書卽從知不足齋本刻。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現今國內流傳的有明南京舊刊本、王叔承刊本、萬曆謝天瑞刊本、以及稗海、叢書集成等本，都是十六卷，四庫全書也根據此十六卷本著錄。此書在日本曾經翻刻過，日本寬文二年刻本，分為天地人三集，每集六卷，共十八卷。其本比十六卷本多出四十一條，有的幾條文字要比十六卷本多出幾十字至二百餘字不等。寬文本是從明萬曆三年黃貞升本翻刻的，黃本則出之元代抄本。黃本現今已無存者，尚幸有日本翻本，才能使我們見到此書的本來面目。

清顧千里嘗說：「書以彌古為彌善」。書每經過一次翻刻，或因校勘不慎，而致錯誤，或因故意的改竄，自然沒有早期的刻本好。但這也不能一概而論。有的書雖然刻印的時代比較後，但他所根據的本子要比流傳的刻本更早而好，所以這個刻本也往往勝過比它早的刻本。如世說新語，現今存世最早的刻本是宋寶慶本，稍後是元代坊刻本，然此書最善的本子却是明嘉靖時吳郡袁

聚嘉趣堂刻本。因為現存的宋元刻本將劉孝標的注文有些刪節，而嘉趣堂本是從宋陸游本覆刻，注文未刪的緣故。如水經注一書，清代的武英殿聚珍本，及全祖望、趙一清等校刊本，都要比明朝的幾次刻本好，因為他們曾經根據永樂大典校勘，補脫、刪妄、正誤了七千多字。清代的學者對於校勘學的貢獻很大，所以有些書清代的刻本，往往要勝過元明本。假如我們不了解傳本內容的異同、翻雕的源流，是無法來抉擇好壞的。

六年前，我撰寫說郛考，將說郛所收的幾百種書，曾取流傳的各種本子來對勘，並參考各家的書志，撰成說郛書目考，縷述每書的源流及傳本的異同。這個工作，有些朋友認為還有點參考的價值。因此使我想到假如能將這項工作推廣，將四庫所著錄的書或明以前人的著作，都仿這種方式而更加詳的敍述傳本的源流與異同，這樣的一部參考書，對於作研究工作者，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出版界翻印古籍，也知所選擇版本，不致於再有謬種流傳了。當然、像這樣一部鉅製的編纂，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假如同道們認為有這個需要，有決心，再能獲得學術團體的協助，我深信終可以完成的。

說郛源流考

一、緒論

說郛一書係天台陶宗儀九成氏纂輯歷朝稗史傳記，稗官小說諸書而成，收錄繁富。陶氏生當元末明初，頗見異本，故是書甚為後人所重視，四庫提要評之云：「斷簡殘篇，往往而在；佚文瑣事，時有徵焉。固亦考證之淵海」實非過論。顧自明以來，其書迭經郁文博及明末人士之竄亂重編，已失原貌；而傳本亦頗有異同，莫所是正。清儒雖藉以資考證者有之，而作系統之研究者尚付闕如，據管庭芬海昌藝文志載海寧陳師曾嘗撰說郛書目考十卷，惜未刻而稿散佚，北平圖書館尚藏其殘帙三卷，見該館書目。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法儒伯希和撰「說郛考」一文，刊載於通報，廿一年馮承鈞氏譯載於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六卷第六期。其文援引宏富，於陶氏之生平，說郛之編纂與校訂原委，版本源流，均有所考證。雖伯氏撼稱遠處海外，資料不足，尚多存疑，以俟續考，然仍不乏創見。廿七年（一九三八年）日本京都文化研究所司書渡邊幸三以該所與

近衛家及京都帝大所藏諸本重編說郛，參證比勘，頗有發現，復撰「說郛考」，載該所東方學報第九册，於伯氏之說頗多訂正或補充。卅三年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員景培元君復據渡邊氏之考訂，順治本重編說郛非重刊之說，取其館藏本並參校涵芬樓校印明鈔本，京都文化研究所本、通行本、及四庫全書本，撰「說郛版本考」，載卅四年該館館刊創刊號，並編五本說郛子目異同表附後，其文雖鮮發明，然疏證頗詳也。

余以于役國立中央圖書館，司中文舊籍考編之事，獲遍覽所藏。本館藏有是書明鈔、舊鈔、及重編說郛各一部，因於編校之餘，間及是書。於諸氏之說，竊多質疑，或亦有可以補充者。故不揣愚昧，試再為考論之。

二、陶宗儀之家世

陶宗儀，浙江台州黃巖人，先世居閩之長溪。其弟宗儒嘗編陶氏家乘一書，宋濂序之。其譜今雖不傳，宋序尚載宋學士文集鑾坡前集卷六，序云：「台之黃巖有大姓曰陶氏，其先自閩中徙永嘉，復自永嘉來徙，遂占籍為黃巖人，其後族系曰滋，而為二房。曰赤山，曰陶下。陶夏之房有諱泰和者，遷于湫水，即今所謂陶陽也。泰和字處溫，宋皇祐間仕為處州裏溪都巡檢。生子四

人，長曰埴，徙於石塘。次曰某，字萬里，仍居陶陽。次曰昉，裔絕不傳。次曰武功大夫甄。甄子三班借職詢，別遷於武林。蓋自巡檢府君至今秘書丞宗儒，已十有二世矣」。按鄭元祐僑吳集卷十二白雲漫士陶君墓碣曰：「（宋代）有諱檟（一抄本作擾）者，台州司戶參軍，遂家於台。八世孫諱若晦，始居之地，乃以姓顯」。據此鄭氏撰宗儀父墓碣所敘，檟至宗儀凡十四世。參以陶氏家乘世系，檟為泰和之祖，始遷台州，而陶陽之名，至五世祖時始著也。若晦子辰，官史館校勘。辰子居安，官太常寺簿。居安子應雷，為太學錄。至元十三年元兵南侵，偏師至台，應雷為鄉里請命，而得保全（見陶君墓碣及孫作南村傳）。應雷二子，長曰煜，即宗儀之父。次曰復初，字明本，號介軒老人，官至台州儒學教授，贈從事郎溫州樂清縣尹（見書史會要卷七）。

煜字明元，自號逍遙山人，又號白雲漫士。煜、元史無傳，其事蹟除見鄭元祐所撰陶君墓碣外，至正廿一年楊維禎嘗作白雲漫士陶君墓碣銘，載東維子文集卷二十四。此二墓碣均從宗儀之請而作。又按宋濂鑾坡後集卷八陶府君墓誌銘跋尾云至正廿三年封贈改葬，張翥嘗應宗儀弟宗儒之請，為撰白雲漫士墓誌銘。唯張翥文集不傳，今傳者僅其蛻菴詩集五卷。清光緒廿一年修台州府志，曾據鄭元祐撰墓碣及輟耕錄，撰陶煜傳，載府志卷七十四。煜以孝聞，少從鄉先生周仁榮學，邃於易。以家貧，試吏蘭溪，歷補江陰州及湖州歸安，至正十六年調紹興上虞典史。盡心吏

牘，不怵於勢，不溺於利，然居於下僚，終不得志，十八年卒於紹興寓所，享年七十三。廿三年以幼子宗儒貴，封贈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有子女各三人，宗儀居長。

宗儀母趙氏，名德真。據鄭楊二碣銘，為宋宗室孟本之女，伯希和說郛考據孫作南村先生傳有宗儀「工舅氏趙集賢雍篆筆」之語，以宗儀為趙孟頫外孫實誤。孟本始末不詳，據宋史宗室世系表三載，乃燕王德昭後，舒國公惟忠之九世孫，於孟頫為從兄弟行，故宗儀以舅氏稱雍也。德真先煜十二年卒，張翥曾為撰墓銘，文今不傳。輟耕錄卷九陶母碑條嘗摘引之，有「夫家貧，劬力紡績，以給諸子，無廢學」之辭。王逢梧溪集卷二有題天台陶宗儀母趙縣主德真墓誌銘後五古一首，亦云：「手製丹霞帔，及嫁不稱時；遺次井臼間，跬步必中規。良人既祿仕，婉娩黃髮期；落月鑒綺疏，春霜薄羅帷。生而賢且淑，焉用壽考為」。蓋陶氏家貧，趙氏持家教子，劬勞備至，在至正六年，生其幼女宗婉後即辭世。

宗儀二弟名宗傳，南邨詩集卷二載「乙丑（洪武十八年）十月廿八日得鄉人林序班公輔寄聲報舍弟夢臣沒於道」一首，夢臣疑即宗傳之字，元末仕江浙行省掾，轉臨海尹（宋濂陶府君墓誌銘跋尾），洪武六年官代縣知縣（鑾坡後集卷八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三弟名宗儒，一名誼，字漢生。娶王淑為婦。元至正間由江浙行樞密院管勾遷樞密院都事。洪武時官秘書丞（鑾坡前

集卷六陶氏家乘序贊），遷吏部員外郎（徐一夔始豐稿陶陽圖譜序）。大妹名宗媛，生於天曆元年，適同郡儒士杜思絅為繼室，歸杜四載而夫亡，矢志守節。二妹名宗瑞，適寧國楊至。三妹名宗婉，未嫁。吳王元年（至正廿七年）九月明太祖派朱亮祖攻方國珍，克台州，城亂，宗婉、宗媛、及宗儒婦王淑為游軍所執脅，均不辱而殉節死。明一統，其事呈報朝廷，嘗修入古今列女傳及元史。新元史列女傳亦載其事。楊維禎嘗撰陶氏三節傳一文，載東維子文集卷廿八，宋濂有題天台三節婦傳後一文，見鑾坡後集卷三。此二文所載殉節事蹟均較正史及古今列女傳為詳。

三、陶宗儀之生平

陶宗儀字九成，號南村。其友江陰孫作嘗撰陶先生小傳一篇，載滄螺集卷四。在明代所刻之陶氏所撰輟耕錄、書史會要二書卷首亦冠此傳。此傳為後來諸書所撰陶宗儀傳之主要資料，或是全錄其文。除哈佛燕京學社所編明代傳記綜合引得所列之書十三種外，其他如陳繼儒逸民史卷廿二，佩文齋書畫譜卷四十，光緒廿一年修台州府志文苑傳二，新元史卷二三八等皆有宗儀之傳。在各家之傳中，以台州府志所撰傳較詳，仍大抵本之孫作陶先生小傳。此傳據所敘，僅止洪武六年癸丑。伯希和氏據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載洪武九年刻本書史會要卷首已有此傳。因考其作於洪武

六年至九年之間。渡邊氏則謂約作於七、八年間。孫作江陰人，號東家子，按游志續編載彼所撰謝氏北墅八詠序，彼係於至正十五年避兵家於淞江，與宗儀同邑。汲古閣刻本滄螺集卷首有宋濂撰東家子傳一篇，此傳宋学士全集未收。據此傳孫作於洪武六年應徵赴京，是年陶宗儀亦爲守令薦擧赴京。宗儀辭官返淞，孫作則留京纂修日曆，六月書成，外任太平府儒學教授三年。由此推之，其作此傳之時間，當在六年宗儀辭官歸華亭之時，而不致遲至七年外任太平府儒學教授之後。考傳中有云：「先生崎嶇離亂，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人力，人以孝稱」。宗儀僑寓淞江之年不可確考，惟按輟耕錄所記考之，至正十五年春已住淞江，遷住之年約在十四、五年之間。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迄明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得十九年，與小傳所稱「崎嶇離亂，幾二十年」之語符合。再據此傳內容觀之，此傳歷敘宗儀於浙帥泰不華，南台御史丑閭，及張士誠等之辟擧，皆辭不就。而于洪武六年之辭官，尤褒譽備至。亦可推見此傳之作，蓋因洪武六年辭官而發。此傳既非作於宗儀晚年，且過份強調其不仕事，故于其生平多所未盡，後世或以遺民視宗儀，亦以此。然南邨輟耕錄及其詩集間載記事，參以孫作撰小傳，於其始末尚約略可見也。

陶氏生年，小傳不載，伯希和氏推測其約生于元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建文元年（一三九九）尚在。渡邊幸三氏則稱至元元年前後生，明建文元年以後卒。唯元有二至元，渡邊氏未確指

，如為前至元，則猶前於其父（其父卒於至正十八年，年七十三，以此推之，則生於至元二十三年）。如為後至元，則幼於其妹（其大妹宗媛卒於至正廿七年，年四十，以此推之，則生於天曆元年）。故渡邊氏之推斷，不足採信。陶氏之卒年，據其詩集紀年觀之，當在建文三年十一月以後。陶氏有南村詩集四卷，毛氏汲古閣刻入元人十種詩集中。此集中所收詩，大多入明以後所作，元末時詩甚罕。其詩不少冠有干支紀年，最晚之詩為卷二挽陸北岩教諭五言一首，註云：「辛巳（建文三年）十月廿九日卒」。此詩當作於十一月初，是其時猶在。其生年，伯氏之推斷，雖乏確據，但就其詩文考之，相差大致不遠，或似應略早數年。按元日試筆次張泉民讀書雜興詩有「壽齡過八十，無夢到鵷行」之句，又次韻答張林泉詩有「憶昔交遊各少年，君年八十愈昂然」句。此二詩作年無可考。如依伯氏推測生於延祐七年，至建文三年，年八十二，與二詩年已過八十之語，雖無不合，惟此詩須作於建文二、三年方符。又按輟耕錄卷十一寫像秘訣條云：「王思善澤，自號癡絕生，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至正乙酉（五年）間，檇李葉居仲廣居寓思善之東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峰孝光先生往訪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歲，已能丹青，亦解寫真……爾後，余復託交其尊人曰華父，遂與思善為忘年交」。據此條與王思善父訂交，及與思善為忘年友之語推之，宗儀之年似應與王父相若，至少應較思善長二十上下稱之方宜。如陶氏生於

延祐七年，至正五年方二十六，僅較思善長十四歲，其作此語，則尚未允。宗儀為長子，其父煜生於至元廿三年，延祐七年，年已卅五，以前人婚娶之早，始初得子，亦難相信。是故陶氏之生年，似猶應上推數年，當在延祐三年前後，至建文三年年已八十六。

小傳云：「先生沖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遊浙東西，師潞國張公翥、永嘉李孝光、京兆杜本，問文章為事故」。陶氏之早年及何時應科舉，均無可考。按輟耕錄卷八云：「先師錢先生璧，字伯全，壬申科（至順三年）進士，雲間人」。蓋宗儀早歲從錢璧受業。至於張翥、李孝光、杜本等，輟耕錄中或稱先生，或稱官銜，無稱師者，蓋壯年遊學其門，非受業之師也。其出遊浙東西之年不詳。據輟耕錄所記，至遲自至正五年迄十二年間。其遊蹤可考者，凡歷杭州、吳興、湖州等地，而以在杭時為多。卷廿三玉鹿盧條云：「余昔宦遊錢塘，因識吳和之」。是其出遊係因仕宦，惟居何職，則無可考。

小傳又云：「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台御史丑閭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按泰不華於至正十一年二月任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尋遷台州路達魯花赤，攻方國珍，十二年三月殉職，見元史本傳。丑閭事蹟載元史忠義傳，傳中僅載其官京畿漕運副使，出知安陸府，至正十二年禦紅巾殉職。其任南台御史，不悉何年。二人之辟舉宗儀，當在至正十一年間。斯時劉福通擁韓林據朱皐

，徐壽輝起蘄黃，皆以紅巾為號，其黨四出攻掠。元史順帝本紀載至正十二年七月，饒徽賊陷杭州路。新元史徐壽輝傳載至正十三年七月派「項普勝陷婺源州、徽州，自昱關入浙西，遂陷杭州。至正十二年宗儀住杭，曾避難湖州。輟耕錄卷七志異條記其事云：「至正壬辰（十二年）春，自杭州避難居湖州……八月過杭州……九月十日，紅巾犯省」。自至正十二年後，杭州屢遭兵亂，實非淨土，於是宗儀有遷寓之意矣。

宗儀娶昭武大將軍都漕運萬戶費雄女元珍，費氏本吳興人，自其曾祖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寀即著籍淞江之上海（見輟耕錄卷七斛銘條）。在元末各地大亂，兵禍頻仍中，淞江偏處江海之濱，尚稱靜謐。至正十六年後，其地為張士誠所據，而受元正朔，獲一時之安，故各方相率避難者衆。據正德松江府志所載，知名之士如宣城貢師泰，會稽楊維禎，錢塘楊瑀，錢惟善，盧陵張昱，江陰孫作等，皆在至正十餘年間先後遷寓其地。淞江既無兵燹之禍，復為其妻之故鄉，故宗儀亦流寓其地。輟耕錄卷二十真率會條云：「向予避兵雲間時，其地有林泉之勝，而無烽燧之虞。同時嘉遯者，皆文人高士」，蓋寫實也。而孫作小傳云：「家甚貧；抵淞教授弟子」。豈其然哉！宗儀遷淞之年不詳，輟耕錄卷二端本堂條云：「右二事乃貢尚書師泰授經宣文閣下日所目見者。至正丙申（十六年）間避地雲間，每談朝廷典故，因及此」。則至正十六年，宗儀已住淞江

矣。又錄中記松江之事頗多，有年代可考，始於乙未（十五年）春，如卷七粥爵條，卷廿三死護文廟條，由此推之，其遷淞之年最遲當在十四、五年之間。

宗儀寓淞，初家府城之北，泗水之南，結廬而居，故號南村，教授課徒為生。據其詩，晚年退休後始遷住城東，張士誠開府平江，曾署以軍諮，辭謝不往。明洪武初，兩次徵召，明史文苑傳云：「洪武四年詔徵天下儒士。六年命有司擧人才，皆及宗儀，引疾不赴」。按孫作小傳僅言其以病免，未云其不赴。四年之詔徵，宗儀是否應召赴京，無可考。而六年之荐擧，則曾應徵赴京。考南邨詩集卷一有洪武癸丑（六年）八月二日與諸暨趙用賓、江陰孫大雅、大年兄弟等同遊南京鍾山詩。八月二日遊鍾山事，孫作曾撰遊記一篇。此文滄螺集不載，見宗儀編遊志續編。宗儀辭官歸返淞江時，宋濂作序贈之，載鑾坡後集卷八。是宗儀在洪武六年曾應召赴京，已無可疑。明史本傳，言其引疾不赴，蓋未考也。

錢謙益列朝詩集陶宗儀小傳云：「九成詩自敍，洪武二十九年丙子率諸生赴禮部考試，讀大誥，賜鈔遣歸。而孫作小傳不載，豈其晚年亦曾列官教授耶」？考宗儀率諸生赴禮部考試，據南村詩集所載，記詠其事者，凡有詩七首。即卷一「紀行」詩五古一首，卷三「三月朔日入都門」，「二日早朝」，「到家」七律三首。卷四「三月率諸生赴禮部考試」，「十日給賞」，「十一

日謝恩」七絕三首。自諸詩考之，彼係於三月一日抵京，十一日謝賞東還，往返歷時三旬，然七詩均未冠干支紀年。其卷四「三月率諸生赴禮部考試」詩之前一首曰「丙子五日甲子雨」詩。錢謙益謂此三詩為洪武二十九年丙子作，殆以此。然考此集並非依年編次。四庫提要云：「其編次年月頗為無緒，殆雜收遺藁而錄之，未遑詮次」。僅卷四「庚午十二月十八日雪」詩以後各詩，就冠有甲子之五首觀之，尚略順年代之先後，錢氏以此稱此三詩為丙子年作，尚非的據。且洪武二十九年，宗儀已屆耄齡，而任此奔波之事，亦有可疑。按三月朔日入都門詩云：「何幸布衣膺寵命，擬隨仙杖覲前旒」。則宗儀是次率諸生赴禮部考試，係以布衣身份，並非任有公職。明史本傳據錢氏之揣測，遽謂宗儀晚年任職教官，蓋非實也。然就載籍考之，宗儀於明初確曾擔任公職，然非在洪武末年也。

南村詩集卷二張建寧賦詩見寄次韻詩云：「十年仕宦厭馳驅，隨例歸休始定居」。是其明言仕宦達十年之久，惟居何職，則不可考。其任職之年，詩中亦未敍及，考書史會要卷首載有洪武九年丙辰四明鄭真序云：「先生世家天台，與四明接壤，令譽之聞，逅已久矣，今以官遊寓居淞江云」。是洪武九年時宗儀已任公職。明正德七年顧清修松江府志卷十三載華亭縣學修殿立石，乃洪武二十年九月教諭袁凱撰文，題「儒士陶九成篆額」。其稱儒士，則二十年時已退休矣。由

此考之，其仕宦期間，應在洪武二十年以前，約洪武十年前後。次張泉民讀書莊雜興詩有云：「功名諸弟貢，問候列華裾」。宗儀職級大抵甚低，或為府學訓導之屬。至率諸生赴禮部考試，則在彼退休以後，或其在任職之時，未嘗率領，退休後始膺其事，以償素願。故紀行詩有：「此行非浪遊，素願誠我償」之句。

陶氏著述甚富，孫作小傳稱有說郛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四庫總目著錄者，除說郛，輟耕錄，書史會要外，尚有國風尊經一卷，草莽私乘一卷，古刻叢鈔一卷，南村詩集四卷，滄浪櫂歌一卷等五種。阮元進呈四庫未收書目著錄游志續編二卷。千頃堂書目著錄金丹密語一卷，共十一種。其中之國風尊經，四書備遺，金丹密語三書今佚傳。所傳八書中之輟耕錄三十卷及書史會要九卷，補遺一卷二書，係洪武初年宗儀在生時由其友人及地方人士醵資刻於松江外，餘皆後代翻雕以傳。至若續百川學海所收之元氏掖庭記，三續百川學海所收之淳化帖考、蘭亭帖目、漢隸釋、西域梵文、槧譜、院本名目、博古紀聞、雜劇類編、書訣，廣說郛所收之唐義士傳，元曲選卷首所載陶九成論曲等書，實皆就輟耕錄中抄撮出，而杜撰書名者。尚有欣賞編及續說郛所收之琴箋圖式，則係偽書託名宗儀者也。

四、說郛之纂編

說郛原書一百卷，楊維禎為之序，此序東維子文集及明弘治間朱昱編鐵崖文集均未收，僅見於說郛卷首，渡邊氏謂四部叢刊本東維子文集載之，實推測之辭。序云：「天台陶君九成取經史傳記，下迨百氏雜說之書千餘家，纂成一百卷，凡數萬條，翦揚子語，名之曰說郛」。宋濂作書史會要序亦言：「九成嘗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未見者，因倣曾慥類說，作說郛若干卷」。楊宋二氏與宗儀同時，皆見及此書，其言原書所錄凡千餘家，當無可疑。唯宋氏謂此書係倣曾慥類說之說，則有可議。試以二書比較之，其異有二，類說於每書僅錄書名及撰者（按此據鐵琴銅劍樓藏殘宋本及今傳之舊鈔本，明天啟刻本則刪去撰者），而說郛於原書之卷帙，撰者之字號、爵里並錄之，此其一。類說於書每條但撮大要，故所錄不盡同於原文；說郛則悉據原文節錄，此其二。故在體例上實與類說乖，而與馬總意林同。祇以所錄多筆記雜說之書，與類說近似耳。

宋濂稱此書倣類說之說後，人多本之以評此書。明郎瑛七修類藁卷十八有云：「陶南村作說郛百卷，蓋倣曾慥之類說而為者。然類說刪取精到，而說郛如未刪之書，不若不刪，總而名之如百川學海可也」。然夷考此書纂輯之緣起，於選錄非精之評，當可釋然。據宋濂書史會要序稱「

宗儀因倣曾慥類說，作說郛若干卷。曾所編者，則略去之，君子謂其尤精博云」之語觀之，宗儀之纂此書，蓋有作讀書筆記之意。其跡在說郛中，尚可尋繹。按卷四所錄東觀奏記第四條云：「上尤重科目，鄭顥知擧，帝索科目記。顥撰十三卷，自武德至大中，仍乞令放榜，錄及第人姓名記賦題進入有司，接續編次。卽登科記之始」。說郛所錄東觀奏記之文，全摘自類說，此條末六字「卽登科記之始」爲類說所無。今傳東觀奏記全書記此事，亦無此六字。此六字當爲陶宗儀抄錄此條後，所加之按語。又卷廿三所錄之賓退錄中，載有花蕊夫人詩廿八首，卷廿四錄湘山野錄，其末條記王安國奉詔定蜀氏獻書，傳錄花蕊夫人詩卅二章，僅錄四章，註云：「又廿八篇見賓退錄，此不更鈔」。又卷廿四所錄之吹劍續錄，中載蜀僧祖秀撰華陽宮記，第三十卷錄雲谷雜記，復錄有祖秀華陽宮記之文，且較吹劍續錄所收加詳，陶氏因於吹劍續錄該條末註云：「具在第三十卷雲谷雜記中」。由此觀之，殆陶氏閱書，遇有會於心者之材料，輒筆記之，以備遺忘。及後閱他書亦有記同一事而加詳者，復錄之，而於前條之文加注云見何卷何書，或有文重複者，則僅錄其前所無者。

復次，來研究陶氏之其他著作，亦可發現與說郛之關係。雖然宋濂有「曾所編者，則略去之」之說，如輟耕錄卷十六所引王質紹陶錄，卷廿九所引葉寘坦齋筆衡等書之文，卽不見於說郛所

錄之該二書。然而大多數資料均互見，例如卷十六引清異錄藥譜，卷十八引湯垕畫鑒六條，卷二十引田閒書，卷廿二引河源志，卷廿五引吹劍錄及希通錄，其材料均見於說郛所錄各該書。又所引蔡京曲宴記見說郛揮麈餘話，此類例子尚多，無煩縷舉。另如遊志續編所載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林昉會友人遊山檄，均見說郛。又玉澗雜說，說郛中僅有「有山處常患無水」一條，遊志續編中，共載五條，此條亦在內，當是說郛略之而未盡，留一條以存書名者。阮氏進呈四庫未收書目遊志續編提要云：「書中有存其目，而其書未經採入者，若李格非之洛陽名園記，范至能之驂鸞錄，吳船錄，後人遂疑為未成之書」。按此三書說郛均錄有之，唯篇幅較多。或陶氏以遊志續編既非付刻，故未過錄入，但存其目，以備遺忘。後人以此疑為未成之書，蓋未了然說郛與諸書之關係也。就以上所考，說郛之為陶氏搜輯材料之讀書筆記，當無可疑。昔高似孫子略評庾仲容子鈔云：「仲容所取，或數句，或一二百言，是有以契其意，入其用，而他人不可共享者也」。吾人之於說郛，亦當以此意觀之，明乎此，則郎瑛之批評，實為贅詞矣。

說郛成書之時代，伯希和氏以楊維禎曾序其書，而楊氏卒於洪武三年，因推測當成于元代，其言甚是。案陶氏輟耕錄成書於至正廿六年，孫作南村小傳縷列陶氏著作，以說郛冠首，輟耕錄次之。是孫作亦認為說郛係陶氏之第一部著作。復據以上所論說郛成書之性質，及其與輟耕錄之

關係，且說郛中於元代著者，輒冠「皇元」二字，則說郛之纂輯成於元代，可為定論。

五、郁博刪校說郛辨僞

說郛原本一百卷，凡一千餘家，見楊維楨序、孫作小傳，及宋濂書史會要序。今傳涵芬樓排印張宗祥校明鈔說郛一百卷，凡七二五家。卷數雖依舊，而種數則減逾四之一。原本之必有殘失，殆無可疑。四庫提要云：「三餘贅筆稱說郛本七十卷，後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學海諸書足之，與孫作楊維楨所說又異，豈邛時原書殘闕僅存七十卷耶？考弘治丙辰（九年）上海郁文博序稱與百川學海重出者三十六種（予按原序作六十三種，此云三十六種，當係傳刻之譌），悉已刪除。而今考百川學海所有，此本仍載」。於殘闕之事，雖已涉及，然未下斷語。邵懿辰四庫標注則逕稱：「原本一百卷，後佚去三十卷，弘治中郁文博仍補為一百卷」。按郁文博序云：

說郛一百卷，乃元季寓吾松南村天台陶九成取經史傳記，諸子，百氏雜書之所編，予未嘗見。成化辛丑（十七年）予罷官歸鄉，於土人龔某家得借錄之……然字多訛缺，兼有重出與當併者，未暇校正。繼而慶為司牧部使者借去，分命人錄，而所錄之人不謹，遇有字誤，慮對出被責，輒將予舊本字塗改相同，以掩其過，而字之訛缺者加多。予憤其人，而無可奈何

。邇年以來，借錄者頗簡，遂欲校正。復遍閱之，見其間編入百川學海中六十三事，學海近在錫山華會通先生家翻刊。銅版活字盛行於世，不宜存此，徒煩人錄。於是以其編入者並重出者，盡刪去之。當併者併之，字之訛缺者亦取諸載籍逐一比對。訛者正之，缺者補之，無載籍者以義釐正之，終歲手錄，仍編為一百卷，猶恐有未盡善，留俟後之君子重較而刊行焉。

伯希和氏因據此序辨郁文博不唯未增三十卷，且更刪削與百川學海重複之書。而謂都卬所稱七十卷者，或彼所見祇是殘本，或傳聞誤會以刪除而為增補，然考都卬字維明，號豫軒，吳縣人，太僕寺卿穆之父。據王文成公全書卷廿九載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弘治十八年，卬年八十。三餘贅筆一書。四庫據范氏天一閣藏本著錄，凡二卷，提要稱其中有陶九成著書一條，說郛提要復引其文。唯二卷本現不傳，今傳之格致叢書，續說郛，續知不足齋叢書諸本皆僅一卷，無此條，蓋乃節本，非全帙。四庫提要之說，當不妄。此書無序，不詳成於何年，當是晚年之作，吳縣與松江鄰府，其說「說郛本七十卷，後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學海諸書足之」當有所本，諒非虛構。因之渡邊氏解釋稱「郁文博刪去重複，後來松江某氏知之，欲復陶氏之舊，復取百川學海足之，編入後三十卷。都卬僅聞知此事，惟不知有郁文博校訂之事」。其解釋雖較伯希和能將二相異之

記載調合、仍難免牽強附會也。

郁文博、上海人，以字行，景泰四年上海縣鄉貢第三，登五年甲戌孫賢榜進士，官至南京御史湖廣僉事副使。其所校訂之說郛，在明代曾刊行。按今人東莞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著錄有明刊本說郛一百卷，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前有郁文博及楊維禎二序，此書刊年不詳，據推測約刻於弘治至嘉靖間。其本前冠郁序，當據郁氏校訂本翻雕。唯未著錄子目，不詳其內容如何。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明鈔本說郛一部，約抄於嘉靖間，題「天台南村陶宗儀九成纂，上海後學郁（郁訛作都）文博校正」（見圖一），書前僅有楊維禎序一篇。雖無郁序，然據其本所題，係出郁校本可知。此本所收之書，較涵芬樓校印明鈔本略少數種，蓋此本間有缺葉，然分卷則兩本大抵相同。復與培林堂書目所著錄之舊抄說郛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舊抄殘本說郛無甚差異。涵芬樓本係根據六部明鈔校印，卽京師圖書館藏隆萬間寫本、坊間明抄本、涵芬樓藏萬曆抄本、及傅增湘藏本。張宗祥跋云：「沅叔先生之書，係彙明抄本三種而成。一洪武間抄本，一弘農楊氏抄本，一叢書堂抄本，本不全，書估挖填割裂卷首尾，湊足百卷……以洪武抄本最舊，前後書各條錯誤最多，推測可知係自南村稿本錄出」。按傅氏所藏說郛，著錄於雙鑑樓善本書目，云：「明抄本，合弘農楊氏本，弘治乙丑本，叢書堂本三種配合」。據此知張跋所稱之洪武本，實

係弘治乙丑（十八年）抄本，云洪武本者，殆初審定之誤。由此可以推知近世所傳之百卷說郛，實出同源，皆出弘治初年郁文博編校之本。伯希和氏謂郁校本不傳，及培林堂舊抄本為南村原本之說，皆不足信。

現在試自說郛所收見於百川學海之書來研究。據涵芬樓本或中央圖書館藏郁文博校正明抄本所載，見於左圭百川學海者凡七十二種。計第四卷一種，第十五卷一種，第卅四卷一種，第六十四卷一種，第六五卷一種，第六六卷二種，第六七卷一種，第六八卷以後共六十四種，卷六八至七十、七六、七八、七九、八一至八三、八八至九十、九二至九四、九六、九九諸卷，幾全係見於百川學海之書。渡邊氏謂重見者七十種，蓋誤計也。如取說郛本與明弘治間錫山華氏覆宋本，或民國十六年陶氏涉園影印宋刊本百川學海校勘，卽可發現說郛據以節錄之祖本，前後頗有不同。例如：

卷四之筆記一卷，百川本名宋景文筆記三卷。按此書宋有一卷三卷兩本，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志著錄一卷，郡齋讀書志及通考著錄三卷，知陶氏乃據一卷本錄，非用百川學海三卷之本。

卷十五之師曠禽經一卷，所錄文與百川本編次略異。

卷卅四之春明退朝錄一卷，說郛節本有三條載官制官品之文為百川本所無。

卷六四之韓魏公遺事一卷，文句與百川本詳略頗異。百川本書名韓忠獻公遺事亦與此不同。卷六五之香譜一卷，題唐無名氏撰，即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之本。而百川本分二卷，題宋洪芻撰，二者文亦不同。

卷六六之酒譜二卷，節錄自全書。百川本一卷，乃出曾慥類說節本，文較說郛簡略甚。

卷六七之孫公談圃三卷，末條王女井一條為百川本所無。據王楙野客叢書卷五載此條乃孫升外甥朱淳所記，建炎初錄本始有之，而臨汀、高沙諸本均無。知說郛乃據建炎初錄本摘錄。

在卷六七以前所收見於百川學海之書八種，除卷六六之竹譜不悉出於何本外，餘七種則確可知非據百川本摘錄。然觀卷六八以後所收之六十四種，毫無可疑，皆出百川本。如卷八九之畫簾緒論，係一卷全錄而少條案篇第四，御史篇第五，及聽訟篇第六之前半段，所缺適當宋咸淳本或明弘治本之第六至九凡四整葉，必所據錄本適脫四葉故耳。此六十四種摘錄之方式亦與其他各書顯異，如釋常談、漁樵對問、隋遺錄、翰林志、燕翼貽謀錄、厚德錄、東坡志林、畫簾緒論、海岳名言、宣箴、書斷、歐公試筆、前定續錄、翰墨志、茶錄、菌譜、荔枝譜、南方草木狀、劉蒙菊譜、史正志菊譜、梅譜、牡丹榮辱志、揚州芍藥譜、名山洞天福地記等廿四種悉全錄，另疏食譜亦

係全錄，僅略刪註文。又如道山清話僅錄首九十一條，續書譜僅錄首七篇，前定錄僅錄首十五條，法帖譜系雜說僅錄上卷，硯史僅刪末條，海棠譜僅錄上卷，中華古今註僅全錄上卷及下卷，而刪中卷。或如學齋佔畢、藍氏客語、鼠璞、欒城遺言、珊瑚鈎詩話等書僅摘錄短條之文。按類此僅抄錄某卷或首若干條，或但錄逕文，在說郛六十七卷以前尚乏其例。至若一書全錄者，雖間有之，然多係宋元未曾刊雕而極罕見之書，而無若此據一叢刻大量抄錄之事。按百川本書斷一卷，實係宋人所編之書斷列傳，非唐張懷瓘原本。張氏原本現雖不傳，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七至九尚全載之。考陶宗儀書史會要卷首引用書目中，列有張懷瓘書斷及張彥遠法書要錄，當知其原本，而說郛中何捨原本而全抄百川学海中之書斷列傳？又按百川本東坡志林集一卷。考說郛卷廿九已自東坡手澤三卷本摘錄十五條，據直齋書錄解題云東坡手澤即俗本之志林。旣陶氏已得見東坡手澤一書，其欲錄此論古十三條，何不逕據東坡手澤，而必欲別抄自百川本乎？根據以上所考，陶宗儀纂輯說郛，雖有見於百川學海之書，而並未以百川本為節錄之底本。卷六八以後見於百川本之六十四種，絕非陶氏所輯之原本，而出後人之補輯者。

其次再研究卷六八以後之各書。自卷六八至卷一百共收書一百四十九種，除上述見於百川本者六十四種外，有八種與卷六七以前書重複，十九種係摘錄自紺珠集。按說郛首八卷中頗有根據

類說摘錄者，然往往集若干種冠一總名，如諸傳摘玄、談壘、廣知等是也，而未嘗錄自紺珠集，此十九種各以一種為名，散見各卷，與前例不類。如卷七三之韋續書訣墨藪十二條，係自紺珠集節本摘出。然考陶氏書史會要引用書目載有韋續墨藪一書，是彼嘗見其書原本。設陶氏欲錄其書，何不逕據全帙，必欲摘自紺珠集耶？又如卷七三之南楚新聞，卷七五之金鑾密記，係出紺珠集，按說郛卷七諸傳摘玄中已嘗據類說節本摘錄此二書，所錄之文亦與此二卷錄自紺珠集者內容大抵相同，僅字句略異。既已前錄，何必重出。且南楚新聞中頗雜紺珠集節本鄴侯家傳之文，尤屬訛錯之甚。由是推之，此諸種是否陶氏原輯，頗有疑問。另有六種係明人所著，其書為：

卷八四之錢譜，無撰人。文中敘及永樂通寶。按明史食貨志，宣德九年嘗鑄錢，此書於永樂帝稱廟號，末言宣德通寶，當為洪熙或宣德初年所撰。

卷八七之格古論，明曹昭撰，書成於洪武戊辰廿一年。

卷九七之稽古定制。據千頃堂書目，其書乃洪武廿九年十一月頒示功臣。

又勸善錄，明成祖仁孝徐皇后撰，書成於永樂三年。全書二十卷，說郛僅自首二卷中錄短文十二條。

又神僧傳，明成祖御撰，書成於永樂十五年。全書九卷，說郛僅自首四卷中錄較短之八傳。

又效顰集，題趙弼撰。弼，南平人，永樂時以明經授翰林院儒學。其嘗撰雪航膚見，成書於正統景泰間，則為成祖至英宗時人。

六種書中，除格古論、稽古定制二書陶宗儀晚年尚可見及外，餘四種成書時代皆在陶卒之後，然說郛成於元至正間，因之此六書當然皆非陶氏所原輯。卷六七以後之一四九種中，除入於百川本六十四種，重出之八種，出紺珠集之十九種，及明人著作六種外，尚餘五十二種，不過約當五卷書。雖則其間尚有一部份可懷疑者，如卷七五之唐徐堅初學記纂有開元以後之人事等，但還無法證明究有若干種非陶氏原本所有。然則末卅三卷書，其絕大部份係後人竄入者，則斷然無疑。由是言之，吳縣郁邛所稱說郛原本僅存七十卷之說，誠非虛語。其竄補為百卷者，當即出郁文博之手，復觀今傳郁校本中如老學菴筆記，吹劍錄、侯鯖錄、後耳目志等，均一書分列二卷中，則郁序所謂刪去與百川學海重出者，及當併者併之，悉出虛構也。

根據以上分析，吾人對於說郛之源流，似可獲得下列之結論。說郛原本百卷，宗儀卒後，稿藏其家，後佚三十卷。據葉盛水東日記卷六陶九成說郛條云：「近聞說郛百卷尚存其家，有九成塗改，去取處不知如何。其亦未成之書歟」？葉氏，淞江之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卒於成化十年。水東日記約撰於天順成化間。是其時百卷尚存，闕佚之時期，當在成化初葉。成化十七年郁

文博返鄉後，獲得其稿，然佚三十卷，於是取百川學海等書以足之，自卷六八開始補入。自卷六八開始者，殆其見卷六五、六六、六七所錄適有見於百川學海之書，如此欲不露痕迹耳。而將原本卷六八至七十等三卷之書，散列以後各卷。及後聞錫山華家將翻刻百川學海，恐人識其卽以百川之書補入，於是撰寫一序，詭稱刪去重見百川之書，不過欲圖掩飾其殘闕之跡。幸都邛聞其事而見之，因不識郁氏，故但曰松江人，蓋上海亦松江府屬。然郁氏之序亦適欲蓋彌彰也。說郛雖經郁氏之竄補，幸尚存原貌，而其書亦賴郁氏以傳，其功仍不可沒。

說郛原本百卷千餘家，郁文博得其稿時已佚三十卷，據涵芬樓本首六十七卷凡五七六家，末卅三卷，倘按此比例，當約三百家，合併亦不過近九百家，猶不足楊維禎宋濂二氏所見其書千餘家之數。其事之解釋或如宋濂所稱「曾有編者，則略去之」。如輟耕錄中所引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鄧椿畫繼，漫浪野錄，廣客談等書，說郛中均未載。或是各卷尚有脫葉，觀說郛中頗有錯簡脫文，其事亦非不可能也。

六、郁文博本之雕印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云：「明人刊本有一百卷校刊本不同，藏嘉定吳氏，又一部藏常熟陳子正

家。惜二書皆闕二字本」。邵懿辰四庫簡目標注所云亦同。莫邵二氏同時人，二書亦大抵相同。究竟孰據孰稿，尚無定論。然必二者之一曾見及有明刊一百卷本也。惟所云「惜二書皆闕二字本」一語，文義不明，不詳所指。按今傳百二十卷本重編說郛卷首有讀說郛一篇，引黃汝亨云：「今世未刻唯册府元龜說郛二書，元龜以楊陳二君及諸博雅同修，疎漏處正復不少。矧說郛出陶氏一手，無論抄錄訛舛，恐當時亦未及詳證」。汝亨字貞父，浙江仁和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因黃氏有說郛近世未刻之語，故伯希和及渡邊二氏於邵亭書目載有明人校刊百卷本，頗予懷疑，伯氏且謂明人刊本之「刊」字，應是「鈔」字之誤。但據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卷下云：「戊辰之歲，余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餘紙，題趙飛燕別傳。閱之，乃知即說郛中陶氏刪本」。戊辰為隆慶二年，足證在隆慶以前，說郛已有刻本行世。伯氏亦引此段資料，然彼不信說郛在十五、十六世紀曾刊行，因疑胡氏所見之說郛殘葉，為元代原刻。按陶氏家貧，孫作小傳已言之，彼之著作，及身雕印可考者，厥為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前者為其友人邵亨貞疏引發起，友朋輩醵貲雕板；後者據洪武本每卷末所列乃松江地方人士及其學生輩二十餘人助刊刻成。以說郛卷帙之鉅，當時能輯成，實難令人相信。而明初若文淵閣書目，崑山葉氏菉竹堂書目均不載是書。且如陶氏已予刊版，當不致毫無編次，致後世傳本舛亂若是。伯氏之推測，實乏根據。

按今人東莞莫伯驥編其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著錄有明刊本說郛一部，云一百卷，前有弘治九年郁文博、楊維禎二序，書作「卷」字，不作「弓」。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不言刊刻年代，亦未列子目。胡應麟氏於隆慶二年在燕中書肆所見殘刻說郛節本趙飛燕別傳，當卽此刻。今本說郛趙飛燕別傳文約二千字，連前敍及書名著者標題，以此刻行款計，約當九葉有餘，如連別傳前後書文，胡氏所稱十餘紙，亦近似之。此刻刊於何時，因未目驗，無法考定。唯其前冠有郁序，則刻於弘治以後可知。胡應麟筆叢九流緒論卷下又云：「宋何先異聞載碧蘭堂一女子詩云……兩花字相犯，當是抄錄之誤。今說郛殊無善本，余嘗得一部於王長公處，多長公手改定者，惜此未經刊削」。王長公世貞，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王氏及胡氏並嘉靖迄萬曆初人，皆富藏書，而所藏說郛率為抄本，則嘉靖中葉以後，此刻卽已流傳甚希，則其本當刻於嘉靖中葉以前也。據莫伯驥所記其藏本，郁序在楊維禎序前，似卽刻書序，因疑其本卽弘治迄嘉靖初年郁氏家所雕版。邵亭書目所稱嘉定吳氏及常熟陳子正家藏有明人校刊一百卷本，實非妄語，誠有所見。惜刻本流傳甚罕，所收之書，諸目亦不載，無緣考見。莫氏藏書於抗戰期中散出，戰後雖稍稍收集，然無目錄行世，此書不悉無恙否？莫氏藏書，近聞已售出，此書之下落更不詳，如有得者能予影印傳佈，於說郛之研究，當甚有貢獻。茲但據莫目所載，知其本係據郁文博本刊雕。國立中央圖書

館所藏明藍格抄本，卷二末有「新城生員王儀錄」一行，儀、始末無考。其本自紙色觀之，約抄於嘉靖間。題「上海後學郁文博校正」，卷字亦不作另，頗疑卽自刊本錄出。該刊本當日印行數量恐極少。萬曆以來之著名藏書家如祁承㸁澹生堂，趙琦美脈望館、毛晉汲古閣、錢謙益絳雲樓、錢曾述古堂、徐乾學傳是樓、徐秉義培林堂、以及季振宜所藏，見於各該藏書目著錄者，率皆抄本，可以見之。諸目除培林堂書目載有子目外，餘均無。培目與中央圖書館藏明抄本略同。以此推之，諸家所藏，殆亦悉自明刊郁校本出。故黃汝亨有說郛近世未刻之語，蓋亦僅見抄本，而未知曾刊版也。

七、陶珽與重編

今通行之一百二十卷本說郛，乃明末所編刻。千頃堂書目、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及四庫總目著錄者是也。各家藏書目悉題爲陶珽重編。然按其刻，傳世凡有數本。渡邊氏說郛考引日本京都帝大藏本，凡收一二五五種；景培元說郛版本考引通行本，凡收一二八七種。此二本前有元楊維禎、明弘治九年郁文博、順治四年李際期、五年王應昌等四序，卷一目錄末題「天臺陶宗儀九成纂，姚安陶珽重輯」。又續說郛題「姚安陶珽纂」。另國立中央圖書館及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

究所藏本，凡收一三六四種；中法漢學研究所藏本，凡收一三六〇種。此二本僅有楊郁二序，而無順治李王序，又首卷目錄末無「姚安陶珽重輯」，及「姚安陶珽纂」字樣。據渡邊及景培元二氏之研究，後二本實與李王序本同板，而印行時代在前。則以說郛重編者委之陶珽，實出順治印本，並非原題。

陶珽，雲南姚安人，清甘雨姚州志卷七載其傳云：「珽字紫閬，號不退，有夙慧，因自號天台居士，慕孔稗圭之為人，故又號稗圭。中萬曆辛卯（十九年）科舉……萬曆庚戌（三十八年）成進士。歷任刑部四川司主事、福建司員外郎、山西司郎中、大名府知府、隴西道副使、遼東及武昌兵備道。未第時，嘗讀書於西湖，與陶石簣、袁中郎、黃慎軒、董元宰、陳眉公諸名卿交。所為詩文，海內稱絕。著有閬園集，錢牧齋序之。並纂說郛續、伯敬史懷諸書」。渡邊氏推測珽重編說郛在中舉以後，成進士以前，讀書於西湖，與諸名卿交時。然據此傳僅言其纂說郛續，並未言其重輯說郛之事。按順治四年李際期說郛亦僅言「此書續於姚安陶先生，類采諸家說部」。與姚州志合，亦無一語述及陶珽重輯說郛之經過。珽所交遊，既皆當時名士，如其校輯說郛此一鉅著，理應為一時盛事。然在其友好如陳眉公（名繼儒，著有陳眉公全集，白石樵真稿，眉公雜著等書），陶石簣（名望齡，著有歇菴集，陶文簡公集），袁中郎（名宏道，著有瀟碧堂、瓶花

齋、鐐帆、解脫諸集），董元宰（名其昌，著有容臺集），黃慎軒（名輝，字平倩，著有黃太史怡春堂逸稿）諸人文集中，無隻字言及其事。是明末刻本說郛為陶珽重編之說，實不能不令人懷疑。景培元說郛版本考對此事之解釋稱：

通行本說郛卷端讀說郛中備引包衡、何良俊、黃平倩、釆斯行、潘之恆、黃汝亨、胡應麟等七人語，而無珽名；續說郛所選，亦多與珽並時往還諸人之作，而獨無珽著，則說郛為珽所校續，似有可能。其所以自闕其名者，或有難言之隱，亦未可知。明季閹黨肆虐，清流自危，若董元宰、陳眉公諸人，皆抗志高、以遠禍。錢牧齋為珽所著閬園集作序，謂：「不退之為人，恂恂已爾，穆穆已爾……規言矩行，老而彌謹」。是珽乃謙卑自牧一流，與徐文長，田之執等狂狷之士，似非同道，或不願以文字賈禍歟—？「尤有進者，明季文人每好為坊肆選文，有如今日之書坊編輯，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言之綦詳，今考說郛之梓行者，乃武林宛委山堂，應在今之杭州，與陶氏未第時之流寓是邦，若合符節。意者陶珽之續纂說郛或與朋儕分校，或避標榜之譏，而有意自晦。直至清初李氏重訂時，始根據當地傳聞，大書特書歟。

景氏所稱韜晦之說，核與事實未符。按珽嘗評鍾惺伯敬史懷，今尚有明末刻本傳世，卽題有

陶珽之名。且編纂舊籍，亦非攻訐時政之比，謂之闕名避禍，自爲無據。至釋之爲坊肆選文，與朋儕分校，就今傳之資料觀之，尚略近之也。

考今傳之重編說郛各本：無論有無順治李王二序與否，皆非原編初印，乃掇拾殘餘版片並補刻重印者。原版每書皆題有校閱者姓氏。原編初印本今雖無傳，其原版式尚可於今傳之明末何允中廣漢魏叢書、百川學海、吳永續百川學海、馮可賓廣百川學海、藝遊備覽、熙朝樂事等叢書見之。此各叢書皆就說郛之一部分原版或滲刻數種而編印者，每書首葉第二行撰者下題有校閱者姓名，書中並傍刻圈點。今傳之重編說郛多就此等版剗去撰人之「撰」字，校閱者姓名，及書中圈點而重印者，說詳下章。就上述六叢書所收之四百餘種書中所見，當日校閱人多達百餘，所署地望，率多武林，知原刻於杭州，已無可疑。其中所載著名之士，如陳繼儒、鍾人傑、潘之恒、孫穀、程嘉燧、王穉登、袁宏道、屠本畯等皆曾任校閱之事，陶珽之名亦見之，所任校閱者爲胡太初畫簾緒論一種（圖二）見重編百川學海丁集。重編說郛中所收此書，卽以此版，剗去其名重印。按袁宏道卒於萬曆三十八年，則渡邊氏推測說郛重編於萬曆十九年以後，三十八年以前，陶珽讀書杭州之時，似屬可信。然觀其中所題校閱人尚有何鏜（校閱入越記、吳郡諸山錄、使高麗錄三書），田汝成（校閱雜劇段數，高宗幸張府節次略二書）二人。何田二氏皆嘉靖時人，在重編

說郛之前，焉得亦預其事。如以題何氏校閱之書係採自其西湖遊覽志而題其名，然採自上述二書之文尚多。如入蜀記、九華山錄等所題之校閱人王道焜、顧懋樊、又皆明末人。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啓辛酉鄉試，顧懋樊，仁和人，崇禎中副榜貢生。據此推之，是刻所題之校閱人是否實任其事，則尚有可疑也。明季文人每為坊肆選文刊刻，固屬事實；而坊肆刻書，每冠名士校閱或鑒定，以易其售，在傳世之明末坊本書中，亦屢見不鮮。是故陶珽果否曾預其事，尚未可必；即有其事，亦僅分校之一員。原印本不著編人，而順治印本遽題陶珽重輯，實不考其何所本。然疑以傳疑，存而毋論可矣。

八、通行本重編說郛非原編印本考

順治四年李際期重刊說郛序云：「此書兵燹之後，煨燼殆盡，因重定較梓」。五年王應昌序則云：「周南李君督學之暇，得華容孫氏說郛善本，因重授梓，蓋以板燬於辛酉大火，去今幾三十年，此書復開生面」。二人於重定是書之動機，雖所說微異，而謂重新授梓則一。據浙江通志載李際期任浙江提學道，在順治三年，而據其序，說郛刻成於四年，重編說郛一百二十卷、續說郛四十六卷，以此一部卷帙浩繁之鉅製，而當戰事甫定之後，一年之間，能予覆刻完成，且視原

版，一筆一劃，不爽毫釐，實難令人置信。渡邊幸三氏取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藏無李王二序及「姚安陶珽重輯」字樣明印本（以下簡稱京都本，此本東方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著錄云順治刊本，乃在渡邊氏考訂之前所編者），與京都帝大所藏通行順治四年李王序本勘對，考定順治本卽就無序本之版而重印者，因斥李序稱「重定較梓」為誇大之辭。其研究結果實為一重要發現，足破三百年來藏書家之惑。唯其稱京都本卽萬曆原本，則尚有待研究者也。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云：「明人有書帕本，往往刷印說郛數十種，卽稱某叢書，余嘗見唐宋叢書卽是也」。唐宋叢書題鍾人傑、張遂辰編，據邵氏四庫標注稱其書有真偽二本，偽者無宣和書譜二十卷。所謂偽本今流傳較多，其本乃就順治說郛版重編印，版多漫漶，有宣和書譜之所謂真本，則余未見，不詳其版如何？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中有何允中廣漢魏叢書、明末重編百川學海、續百川學海、廣百川學海、熙朝樂事、藝遊備覽等六叢書，與重編說郛版式悉同。皆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只是此六叢刻各書首葉第二行撰者下題有校閱者姓名，書中並旁刻圈點，為說郛本所無耳。取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印本說郛，與此諸叢刻互勘，知說郛卽以各叢書之版而剗去圈點及校閱人姓名、撰者名下之「撰」字而印成。其中如卷六之嚴之麟校聖門事業圖（見圖三），卷六十之武林吳懷古閱南宋市肆記，卷六七之武林李宗臯閱南宋故都宮殿等，校閱人名尚存。尚有

版中圈點剗削未盡者，例圖四所示說郛卷七九詩品與廣漢魏叢書同版，首葉卽有一圈尚存。此書中法漢學研究所藏明印本（以下簡稱中法本），則「武林徐仁毓閱」六字且未剷去。至於版中有斷折痕處，說郛與各叢書版大抵悉相符。由此互勘結果所示，此六部叢書所收四百餘種書中，約四之三逾三百種，說郛卽據此舊版重印。其餘之書，說郛或翻刻，或重刊，或未收。今傳重編說郛之版，雖未能悉知其所出，僅就此六叢刻與說郛版片之關係，亦可證明今傳之重編說郛實非原刻編印，乃掇拾舊版並補刻重印者。由此發生一連串之問題，上述六叢書間之關係如何？是否卽說郛原版而分散者？傳本重編說郛與原版說郛之關係又如何？

根據此六部叢書來研究，吾人可以斷言確係自一叢刻版分散而印行者。諸叢書版式行款及版匡大小相同，此其一；各叢書中所題校閱人如章斐然、潘之淙、張遂辰、徐仁毓、黃嘉惠、翁立環、鍾人傑、徐仁中、陳斗垣、于之英、聞啓祥、仲震、王道焜、錢敬臣、胡滑、顧懋樊、陳甫中、翁敬業、吳懷古、金維垣等皆互見，俱武林人。可證乃同時同地刊雕，此其二；百川學海所收之書與宋刻及明弘治十四年錫山華氏覆宋刻本左圭原本不盡相同。如中華古今注、孫公談圃、國老談苑、螢雪叢說、道山清話、劉賓客嘉話錄等，都是左圭原本百川學海所有之書，而明末本百川學海未收，諸書反收入續百川學海中，足見明末百川並非翻刻，不過就其所得版片而印之，

故所收書不盡同左圭原本，此其三；何允中廣漢魏叢書及吳永續百川學海二序均稱重刻，唯馮可賓廣百川學海序云：「近喜友人重校學海正續，精美典贍。因擇篇目相近者為之廣，併附燕都所挾抄本數種，俾玉魚金盌，並出人間」。從其「因擇篇目相近者為之廣，併附燕都所挾抄本數種」之語來玩味，可知彼乃擇舊版篇目相近者，並附刻數種，編為一帙，此其四。根據以上四點可以看出此諸叢書俱非重刻，而乃各就所得之書版並補刻數種另標書名。譬如廣漢魏叢書中之新書、新序、新論、新語等書字體與他書顯異，當屬新刊者。此各書版就後來重印說郛情形觀之，無疑即說郛之版片而分散者也。

今傳之重編說郛既非完全為原版所編印，其與原本之淵源如何？原編印本今無一帙傳世，當日是否已編印成書，尚在疑似之間。按清初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卷三云：「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寇四家有說郛全部，以四大廚貯之。今見虎林刻本，才十六套，各種為數少者且全鐫，多者成為逸去，甚至每一集有存不四五頁者。陶氏當時即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之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抄錄者。及此刻出，不知者以為說郛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四庫提要以說郛原本，楊維禎孫作均目睹其書，稱為一百卷，而周氏謂全部凡四巨櫥，因評為虛妄。考周氏所謂虎林刻本十六套，即今通行之順治印本重編說郛一百二十卷及續說郛四十六卷，凡一百六十冊

，分裝十六函。至所云之老寇四家所藏四大櫥說郛，雖未明言為刻為抄，但就情形推之，殆重編說郛之原印本，而非指陶宗儀原本。前已言之，廣漢魏、百川學海等叢書多取重編說郛原版所印，今試以此諸叢書版與通行說郛版互校，如晉皇甫謐高士傳，廣漢魏叢書本三卷，今傳說郛本一卷，細勘二本，知說郛即以廣漢魏叢書版之卷上一卷，而剷去版心與大題「卷上」二字及張遂辰閱一行而重印者（見圖五）。

如松漢紀聞，續百川本凡正編一卷，續編一卷。說郛本僅一卷，即以續百川之版削去校閱人及圈點重印，而無續編一卷。如穆天子傳，廣漢魏本六卷，說郛中一卷，係重刻，所刻僅全書之卷一且刪注文。如拾遺記，廣漢魏本十卷，說郛中一卷，僅覆刻卷第十，改題作拾遺名山記。如顏氏家訓，廣漢魏本二卷，說郛中一卷係覆刻，所刻僅勉學篇之前半。如搜神後記，全書十卷，說郛所刻僅首二卷。他如古三墳、春秋繁露、搜神記、述異記、神仙傳、別國洞冥記、西京雜記、三輔黃圖、洛陽伽藍記等書，在廣漢魏本中篇帙均較多，說郛本均係重刻而簡略甚。如吳越春秋、劉子新論、抱朴子、論衡、博物志等書，皆陶宗儀原本所曾節錄者，廣漢魏叢書亦有其書，是重編說郛原印本已刻者，而今傳之重編說郛則俱無。就上述之跡象推測，重編說郛原印本卷帙必甚鉅大。周亮工氏所聞老寇四家藏說郛四大櫥殆即指其原印本，當非妄誕。重援拾舊版編印者，必

於其未能收得舊版之書而卷帙較多者，則摘刻一二，甚或闕之。如有所得舊版殘闕不全者，則改頭換面，以充其數，故即今今傳本重編說郛在子目方面，尚沿原編印本之舊，而在內容方面，已絕非原面目也。

九、重編說郛版之始末

重編說郛刻於何時？據渡邊氏之考定，陶珽重校梓說郛，應在萬曆十九年中舉以後，卅八年成進士以前，流寓杭州之際。景培元氏則據中法本目錄葉用藍色，而藍印乃天啓以後盛行。又郁文博序「校」字作「較」，避熹宗諱，因推測云：「陶珽之重較及補續，或於萬曆間先完初稿；至宛委山堂之付梓，則在萬曆末年。而其刊刻工程，又亘泰昌天啓崇禎三朝歟」？渡邊氏之論據在確信說郛為陶珽所重輯。然據前所考訂，是書是否為陶珽重輯，尚在疑似之間。景氏之推測雖略近事實，但其立論在相信中法本為明刻原版，故所採證尚未足信。考書以藍印，源起其早，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正德十一年刊藍印本八陣合變圖說，嘉靖間葑溪草堂刊藍印韓雍襄毅公文集，萬曆間所刻之大統曆亦頗有以藍印者。按萬曆初年胡應麟所著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卷四云：「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是不待自天啓以後始盛行。至郁序諱校

作較，然此本既非原本，郁序之為原刻抑重刻，尚未可知。且以較易校，通行於天啓末年以後，故亦未能遽據以為天啓間刊刻之證。茲就廣漢魏、百川等六叢書所收說郛原版觀之，其中凡於校閱之校字，或作校（參見圖三），或省其字，而大多則減筆作挍（參見圖二），從手而不從木。按熹宗御名由校，就今傳明天啓間刻本，多避用校字，凡題某氏校閱，多易作訂閱，參閱，或閱，或減筆作挍，偶亦有不諱者。天啓末年間用「較」字以代，其例尚不多，崇禎時始通行，迄清順康間尚沿其習不改。原版說郛今既不能獲見其全，姑就此印入六叢書之版中校字或用、或省、或減筆，亦可推知原版始刻於萬曆末年，而大部份刊雕於天啓年間無疑。王應昌序有「板燬於辛酉武林大火」一語，辛酉為天啓元年。按明史五行志載：「天啓元年三月甲辰，杭州火，延燒六千家。七月戊子，復災，城內外延燒萬餘家」。王序有大火之語，固非虛誕，然說郛版片斯時是否已全部刻成或遭受殃及，則乏記載可考。就今說郛原版流傳情形來推測，即令說郛版未直接遭辛酉大火之殃及，而其版之分散，或亦間接受其影響。殆刻者因災後經濟之關係，於是以其版分鬻。何允中、吳永等人各以所購得之版，益以新刻，印為叢書。而如南方草木狀、竹譜、鼎錄、書品、詩品等書，廣漢魏叢書與百川同版。葉子譜、續葉子譜等書，藝遊備覽與廣百川同版。南宋市肆記、故都宮殿等書，熙朝樂事與續百川同版。蓋甲乙互鬻，挹彼注茲，晚明坊本，每每如

斯，未足為奇。迨有有力者，復掇拾舊版，挖削增補，重編印行，說郛之版本，由分而復趨於合也。王應昌序稱得華容孫氏善本，因重授梓，華容孫氏者，孫穀也。穀字子雙，亦說郛校閱人之一，百川學海中之岳陽風土記一書，即題「華容孫穀閱」。說郛舊版是否即彼所重蒐輯補刻，則莫可考矣。

說郛版之由分而合，重編印行，據傳本於郁序之校字作較，揆其時當在崇禎間。第一次印本為說郛一百二十卷，共收書一三六〇種，內法闕者一二四種，又續說郛四十四卷，收書五四四種，內注闕者六種，即中法漢學研究所藏本是也。景培元氏以此本所收種數及卷數略少於京都本，而謂印行較京都本稍後，實由於未詳考。例如說郛卷七九之詩品，續說郛卷三九之六博圖，中法本於校閱人一行尚存，京都本及清印本則已剷去，此其一。如中法本所有之稽神錄、太乙攤、西湖勝蹟記、詞評、嵩岳嫁女記五種，京都本及清印本俱無，此其二。就景培元氏所編各本說郛子目異同表所列，中法本所無或注闕之太湖石志等三十一種，京都本及清印本均有之，此其三。續說郛中法本四十四卷，京都本及清印本俱四十六卷，此其四。就上述四點各本收書情形觀之，於各本印行之先後，實可瞭然。第二次印本說郛一百二十卷，共收書一三六四種，內注闕者一一三種，續說郛四十六卷，收書五四二種，內注闕者八種，即京都本與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是也。景

培元說郛版本考引明末四焐堂刊陳時編「說郛理」一書，前有癸未（崇禎十六年）冬至編者眉言云：「元季陶九成取古今書潰二千家，翦其語，名說郛……昭代續之，又潰六百家，綜一百六十六卷……厭歲坊遊，方耳其書」。陳時在崇禎十六年所見到之說郛一百六十六卷本，即第二次印本，此本印行時雖於第一次印行之舊版略有闕佚，然所增較多，為說郛版本最盛時期。入清以後，版片復有殘缺。順治三年，李際期任浙江提學道，整理舊版，重定印行，亦一六六卷，凡說郛一百二十卷，收書一二八七種，內注闕者七五種，有錄無書者四三種，續說郛四十六卷，收書五二五種，有錄無書者二十種。此後版片遞有損闕，或因觸新朝忌諱，而予抽燬挖改，迭次印本不惟種數遞減，即存者亦多失本來面目。其版在康熙年間終於由合而復分。就今傳而可考者如五朝小說、所謂僞本唐宋叢書、別本百川學海、合刻三志諸書皆以此漫漶之說郛殘版編印者也。

十、重編說郛與郁文博本之關係

重編說郛本卷首載有郁文博序，然而其本與郁本間之關係如何？伯希和認為重編說郛既收有郁文博所刪去重見百川學海之書，故稱其本「似未以郁文博之抄本為根據」。而渡邊氏持相反之意見，謂說郛以「另」字代「卷」，始自郁文博校序，非陶宗儀之舊，據以為重編說郛連郁本之

證。然根據前數章之研究，郁文博既未刪重見百川之書，亦未以「另」字代「卷」，二氏所執之論據，既成問題，故所論亦未中允。對於此一問題，吾人如試自其編次及內容兩方面來分析研究，當能比較清楚。重編說郛原本今既無傳，茲就重印之本來觀之，既易百卷為一百二十卷，復用包衡之說，易「卷」為「另」；用黃平倩之說，刪削子書二卷，竄入鹽官王文祿所偽學庸古本；用黃汝亨之說，割掇說郛，從類編輯；並刪削每書所註原卷數及著者爵歷。是在編輯方面，均已改易舊章。在涵芬樓校印郁文博本所收之七二五種書中，見於重編說郛本者，除去重出之三十三種外，共計四八六種。此四八六種書，如取各本來校勘，可以考出重編說郛所根據刊雕之底本，絕大多數並非出自郁本。重編說郛所根據之底本，試分析之，約可分為下列四類：

一、全本尚流傳者，重編說郛或逕錄全本，或另自全本節錄，而不用說郛節本。例如孫公談圃、香譜等全錄百川學海本，雲仙雜記全錄明代通行十卷本，兼明書全錄寶顏堂秘笈本。又如貴耳集一書，郁本說郛摘錄廿一條，係出全帙三卷。三卷足本崇禎以前罕傳，至明末毛晉汲古閣始刊入津逮秘書。萬曆時通行者為歷代小史及寶顏堂秘笈本，僅一卷九十八條，實當全書之下卷，並非完帙。重編說郛即全據歷代小史本，刻此一卷。如鶴林玉露一書，郁本摘錄卅八條，係自甲乙丙三集十八卷本錄出。是書十八卷本國內久無傳

本，日本尚曾翻刻之。明代通行者爲十六卷不分集本，乃明人所編，頗有闕脫。重編說郛本所載凡十條，卽自十六卷本摘出，而未用郁本。

二、說郛節錄本如已爲其他叢書收入翻刻者，重編說郛亦率據通行之刻本刊雕。例如真臘風土記一書，今傳有古今說海、古今逸史等本。清錢曾據從元鈔校錄本校古今說海本，謂：「說海刻者，抵牾錯誤，十脫六七，幾不成書」。見讀書敏求記。蓋傳本乃出陶宗儀說郛節本，非全帙也。重編說郛所刻此書，脫語言條「大抵多以下字在上，如」句下一百三十九字。及野人條「黨中常自相殺戮」句以上九十六字，適當古今說海本第十六葉全葉，足證其本乃據說海本刊刻，而適有闕葉之故。又如洞天清祿集一書，說郛本分九類。清代所刻之讀畫齋、海山仙館諸叢書本，皆源出之。而重編說郛改名洞天清錄，無集字，乃據格致叢書本翻刻，增列古今紙花印色辨一類之目，共分十類。而水滴辨少玉水滴一條，古今石刻辨少北墨一條，古畫辨少近世畫手一條。以上不過僅就文有脫異，顯而易見者，略舉其例。旣如無脫異之書，亦可自校勘中考見重編說郛本之譌文誤字，往往率同當時通行之顧氏文房小說、古今說海、歷代小說、稗乘、格致叢書、寶顏堂秘笈等刻本。

三、如原本說郛係出輯錄之書，而無傳本者，例古典錄略、墨娥漫錄、諸傳摘玄、廣知等篇所錄輯佚書，重編說郛往往增輯其文。如春秋元命苞，說郛輯二條，重編說郛除首錄此二條外，增輯十一條；南康記，說郛輯一條，重編說郛除此條外，另增輯七條等是也。

四、如原本說郛所錄之書，別無刻本，全帙亦無傳者，重編說郛始據以刊雕。然如其書篇帙較多者，却又往往刪節其文，或另錄其他略本。例如俞文豹唾玉集一書，說郛凡錄十七條及序文二篇，重編說郛則刪去二序及文一條，又一條百餘字僅節載廿二字。如碧雞漫志，重編說郛係據說郛刊雕，而於霓裳羽衣條前後共刪削四百十五字。又如事始、續事始二書，說郛原本凡錄六百八十五條，重編說郛不據說郛節本，而據紺珠集中節錄之廿一條刊雕。

兩本之異同情形，以上但各聊舉一二，以為示例，其詳悉具書目考中。就以上之分析，重編說郛之校刊，確曾根據一郁文博校訂說郛抄本無疑。只是郁本之書並未盡收，且其凡據說郛抄本刊雕之書，頗多舛誤錯亂之處。譬如卷二十七所載之鑑戒錄十一條，首尾五條出說郛鑑戒錄，中間之樓羅、馬齒、甘羅、十圍、宅家、千字文等六條，實乃說郛節錄黃朝英緗素雜記之文，而誤竄入其中，卽其一例。由此可以推見其所據之抄本，諒係一頗多顛倒譌脫之殘本，實不足據。故所刻

之書，凡已有刻本流傳者，多儘可能據通行之刻本翻雕，而不復用抄本說郛。

楊維禎說郛序云：「陶九成取經史傳記下迨百氏雜說之書一千餘家」。此處「一千餘家」，重編說郛本楊序刻作二千餘家，殆其所據抄本之訛。重編說郛者既未能獲見郁本之全書與全目，因此序有二千餘家之說，於是廣搜博采，流傳之叢刻雜纂，無不囊括，欲符其數。於是明人之書或偽本竄入者有之，如蠡海集，漢雜事秘辛，大學古本等。或一書而分立數目，如四庫提要所評：「其中如春秋緯九種之後，又別出一春秋緯；青瑣高議之外，又別出一青瑣詩話；孔氏雜說之外，又別出一珩璜新論；周密之武林舊事，分題九部（案渡邊氏云凡分十一部）；段成式酉陽雜俎，別立三名（案渡邊氏云凡立六名）；陳世崇之隨隱筆記，詭標二目（按渡邊氏云凡標三目）」。其他如雲谷雜記之外，又別出艮嶽記與東齋記事；松窓雜記之外，又別出一撫異記；平泉山居記之外，又別出一平泉山居草木記；次柳氏舊聞之外，又別出一明皇十七事；山家清供之新豐酒法，煎茶水記之葉清臣述煮茶泉品，各析出另為一書；幽怪錄、續幽怪錄均有二目，一出說郛，一出紺珠集及太平廣記。率皆一書，分為數部，或杜撰書名，或詭標撰人。凡此，無非以求其種數之多耳。由是論之，重編說郛在編輯體例上既變亂舊章，內容方面復與說郛大部迥異。但祗因襲說郛之名，及「五經、衆說郛也」之義，與郁文博本或陶宗儀原本說郛之關係，僅此而已矣。

十一、張宗祥校明鈔本說郛

自刻本重編說郛行，而原本說郛晦，故昔人每興「說郛刻而說郛亡」之嘆。然遠者如絳雲樓、述古堂、傳是樓、季滄葦、培林堂等諸家書目，均著錄有百卷說郛抄本；近者如京師圖書館、江安傅氏雙鑑樓亦藏有其書，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引朱修伯云：「浙東有兩舊抄本，藏沈杜二家」。邵氏四庫標註引孫詒讓謂黃巖舉人王詠霓獲有一部汲古閣抄本，是其書尚不絕若縷也。民國八年海寧張宗祥主京師圖書館，獲見該館所藏明抄說郛殘本，復借涵芬樓及傅增湘所藏明殘抄四種，以及書估求售之明抄本共得六種，互相參校，訂其訛奪，配成全帙，先後歷時六載，十六年由上海涵芬樓排印。其本凡子目七百二十五種，據張氏跋稱，大抵以涵芬樓藏萬曆抄本寫定。前有楊維禎序，卷一首葉有「南齋龔鈇校正」一行。龔鈇其人無考。其本雖無郁文博序及郁校字樣，實與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抄郁文博校正本子目及卷次大抵相同，則其本亦出郁文博本可知。明人不學，抄書每善附題己名，如中央圖書館所藏之明抄殘本說郛重編集類，卽題「齊東熊佑良佐重編」、「古亭毛駿汝健校勘」，若此之類，未足異也。其本雖未能悉如張宗祥序所稱「還南村之舊」，然南村原本尚泰半存也。

張宗祥氏嘗取說郛所載節本與流傳之全帙互勘，遇有其文不見於傳本者，輒注云「今本未見」，於以見說郛保存文獻之價值所在，其例頗善。惜張氏所校之書不多，取以校勘之本亦非盡善，故迭有失誤。如卷十五之洎宅編，說郛係自十卷本摘錄。張宗祥氏注云：「今本三卷」，於其中之十條，均注曰「今本未見」，蓋但據稗海所收之三卷本校勘，而未知十卷本今尚有明刻本及讀畫齋、金華叢書兩叢刻本傳世，此十條皆見於其本也。如卷廿四之孔氏雜說漢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條，張氏注云：「此條今本未見，其他抄本亦未見」。按今傳之全書如寶顏堂秘笈，學海類編、墨海金壺諸本皆有此條，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抄本亦有之。張校云云，蓋其據古今說海、格致叢書等節本校無此條故也。又湘山野錄，張氏於末三條注云：「以下諸條，今本未見」。按此三條乃湘山續錄之文，續錄一卷，津逮秘書、學津討源、擇是居叢書等本均附刻於正錄三卷之後，殆張氏所取校者乃無續錄學海類編本。如卷五七演繁露之養和條，張氏注云：「此條今本未見」，案此條今本卷十有之，而霞帔條、代名花書條，及續集之鈐下威儀條均不見於傳本，張氏則未注。如卷六七孫公談圃玉女井條，注云「今本未見」。案此條乃孫升之甥朱淳所記，出於建炎初錄本，而為今傳之百川學海、稗海等本所未載。唯學津討源本乃翻刻四庫文瀾閣本，已自王楙野客叢書輯出補遺三條，附刻於後，此條卽其一也」。若此之類，皆張氏校勘所失察也。

自弘治間郁文博補訂說郛以來，其書遞經輾轉傳抄，就古今說海、稗乘、歷代小史、夷門廣牘、寶顏堂秘笈諸叢刻所翻雕出自說郛節錄之書，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二抄本說郛觀之，率多訛脫舛誤。蓋是書自明嘉靖以來，卽鮮善本，張氏校訂本，係據六部明鈔校勘，頗多是正。雖不失為今傳之一較佳之本，然仍不乏譌文誤字，或有錯簡，或有脫漏。例如卷四墨娥漫錄之荊州記，前後分標二目。以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鈔本校之（以下簡稱明鈔本），其所據鈔本，適有錯葉。卷八廣知之續博物志，凡錄七條。考其文乃出曾慥類說，首五條為續博物志，末二條乃物類相感志之文。按明鈔本末二條另標書名物類相感志，尚不誤。張校本則脫標目，誤混為一書。卷四二化書元人序結銜僅云：「至順庚午日南至奉訓」，下有佚文。據明鈔本其下脫「大夫興化路總管府判官拈蒼林定老序」十六字。卷四四稿簡贅筆耗磨日條云：「趙冬必飲酒，如今之社日」。按明鈔本「趙冬」下有「曦詩云：『春來半月度，俗忌一朝閒。不酌他鄉酒，無堪對楚山』。詳諸詩蓋當時耗磨日」凡卅二字。此類之例尚多，茲但略舉其大者。甚至有各本悉同，然猶可藉他書考訂，知其為訛誤者。如卷四之西京雜記，明鈔本亦同。其書凡錄六條，率記唐時事，當非葛洪之書，各家書目或題葛洪撰非也。此六條，細核其文，蓋悉自類說錄出。首二條為韋述兩京雜記之文，末四條為元澄秦京雜記之文。當係輾轉傳錄訛兩為西，並脫秦京雜記書題，致混而為一

也。如續搜神記，凡錄三條，明鈔本同。其末條記曹公船事為今傳十卷全本所不載。考此條太平廣記卷三二二有之，注云「出廣古今五行記」，殆此本前脫廣古今五行記一書書題，致併入續搜神記中。如卷四九柳公權小說舊聞記，凡錄四條，明鈔本同。然核其文，悉出皇甫枚三水小牘，書名作者俱訛，是此校本猶未能稱善也。

十二、說郛之評價

說郛一書，自來論者頗衆，毀譽互見。毀者自著述之旨立論，故評其選取未精。譽者蓋在舊籍日稀之際，因贊其多存逸文。批評之不同，蓋隨時代而異也。四庫提要云：「斷簡殘編，往往而在；佚文瑣事，時有徵焉。固亦考證之淵海」。四庫所著錄，乃順治間印重編說郛本，尚未目睹原書，即有此論。張宗祥嘗稱說郛具有三善，其序云：「事始續事始，世無傳本，一善也。雲谷雜記，雖非全本，然較武英殿本已多二十餘條；意林，世所傳皆五卷本，此書所收為六卷本，二善也。老學菴續筆記，有目無書久矣，四庫各閣皆無，此獨有之，三善也」。其言固是，然所論說郛之價值尚僅及其保存逸文，說郛於我國圖書史上之影響，其價值實不止此。茲試論之。

宋史藝文志於寧宗以後著作，闕焉不錄。元史不列藝文。清代雖有倪燦、錢大昕二家補宋元

史志，然所據多本千頃堂書目，非盡獲見原書。說郛中所收宋元人書頗夥，每書率注所錄原書卷帙。如家世舊聞一書，係自二卷本錄出。毛晉汲古閣據說郛摘本七條，刻入陸放翁全集，不言原書卷數，故各家著錄僅知其書一卷，咸不曉其原帙。如娛書堂詩話四卷（此據明鈔本，張宗祥校本誤作十卷），此書宋志不載，四庫著錄一卷，讀畫齋叢書及歷代詩話續編所刻者，皆僅二卷。四卷本尚見讀書敏求記著錄，而其本罕傳。顧修僅得首二卷刻入讀畫齋叢書，而改題上下卷，掩其殘跡，幾使人不知其原書為四卷矣。上述二書，國立中央圖書館均藏有舊鈔全帙，可以覆按。又如鶴林玉露，說郛註云甲乙丙三集十八卷，其書宋元舊本不傳，自明以來刻本咸十六卷，不分集，倪氏宋志補及四庫即據以著錄。按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日本寬文二年刊本，分天地人三集，每集六卷。又藏有近人鄧邦述校明王叔承刊本，云據日本活字本校，活字本分甲乙丙三集，共十八卷，卷次均與說郛著錄合。傳本蓋乃明人改編，頗有闕佚，非宋元之舊。陶宗儀說郛目悉據原書著錄，故咸可依據，或可補史志，或可資考訂，甚具目錄學之價值，此其一也。

類書者，割裂群書而分類編次，其體創於魏文皇覽，迄唐宋而咸行。輯佚者，採逸文於諸書，裒合為一，以復原書之舊，其例蓋源於北宋。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謂其書即自馬總意林及文選鮑照舞鶴賦李善注輯出，是為輯佚之始。其後王應麟輯齊魯韓三家詩佚文

為詩考一卷。陶宗儀說郛中如古典錄略、墨娥漫錄、讀子隨識、廣知、諸傳摘玄等篇所載，出於輯錄之書，多至九十餘種。明萬曆末年刻重編說郛，遞事踵輯，其傳既廣，流風所及，有華容孫穀之輯古微書，蓋廣說郛之古典錄略為之者。孫穀者，重編說郛校閱人之一也。寖及清代，此體大興，以輯佚名家者輩出，如王謨、趙在翰、張澍、嚴可均、茆泮林、馬國翰、黃奭等，或專精一類，或橫及四部，一鱗半爪，搜無逸文，淪亡古籍，吾人今日尚可得豹窺者，輯佚之功也。然溯其源，實說郛有以啓之，此其二也。

我國叢書之輯，始於宋嘉泰元年俞鼎孫之儒學警悟，後七十二年左圭輯百川學海繼之。而彙輯叢書之盛行，則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輯刻之人，率多雲間（即松江府）、吳郡人氏。如正德六年長洲沈津之欣賞編，正德嘉靖間吳郡顧元慶之文房小說及明四十家小說，嘉靖廿三年雲間陸楫之古今說海，嘉靖間吳郡袁褧之金聲玉振集及前後廣四十家小說，萬曆間雲間陳繼儒之寶顏堂秘笈。考諸家彙刻之書，或多採掇說郛節本，或仿說郛之例刪節諸書。按其時，正當郁文博增訂說郛完成並流佈之後，其地則雲間為陶宗儀僑寓之鄉，吳郡則為鄰邑。嘉靖間華亭何良俊嘗謂：「今人所著猥雜小種，皆如陶氏悉錄，則後世豈復有遺逸難搜之憾」（見重編說郛卷首讀說郛引）。蓋本說郛之意，提倡彙輯諸書。陳繼儒偃曝談餘卷下云：「吾鄉自陶南村撰輟耕錄及說郛，

有此一種氣息，而嗣後陸祭酒儼山，最稱博雅。陸祭酒名深，輯刻古今說海之陸楫，即其子也。明正德嘉靖以後彙輯叢書之盛行，與說郛間之關係，其消息於此可略窺一斑，此其三也。

今傳之古籍，如元聖武親征錄，遂初堂書目，皆藉說郛之收錄而傳，此人所咸知曉。尚頗有已非全帙，然其亦實自說郛節本出，而世人鮮知之者。如宋張唐英蜀檮杌一書，據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志均著錄十卷。今傳學海類編、函海、藝海珠塵諸本僅二卷，四庫著錄亦同。其本前載張唐英自序及陸昭迥序，均言分為二卷。四庫提要據樓鑰攻媿集引此書有大順初情實為黔南節度使辟張琳為判官一條，今本無之，云非全帙。其考甚是。按曾慥類說嘗錄此書廿三條，不見於今本者凡十五條，其他佚文尚多。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云：「外史檮杌十卷，見於宋人著錄，而近所傳，未知何自出」。今以說郛校之，知傳本乃出陶宗儀之節本。改序文十卷為二卷，及分節本為二卷，殆始曹溶之輯學海類編。又如教坊記，新唐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宋志皆著錄一卷，與今本同，故世莫有知其非全本者。考類說嘗錄此書十七條，其中之失落、呂元真打鼓、打毬墮馬、觔斗、舉伎兒、四女善歌、賣假金賊、娘子眼破、左轉等九條，不見於今本。又摘彈家、蘇五奴二條文較傳本為詳。足證傳本頗有刪削而非完書，蓋亦出自說郛節本也。此類之書頗多，如北邊備對、溪蠻叢笑、洞天清祿集、湯垕畫鑑、雲林石譜等等悉是之，無煩縷舉。

至若捨說郛而外，別無其他傳本之書亦夥。除張宗祥序所指出之老學菴續筆記、事始、續事始而外，如坦齋筆衡、唾玉集、蘭亭博議、負暄雜錄（凡錄四十一條，皆考證之作，重編說郛雖有此書之名，實僅自此本中之三條，摘錄數語，每條寥寥）等是也。說郛於保存古籍之功厥偉，此其四也。

舊本不傳於今，今本乃出四庫輯自永樂大典者；或舊本雖傳，而頗有闕佚者。說郛所載，雖係刪節，然頗存逸文。孫詒讓札迻卷十一所載之列仙傳原序（按此序汪士漢秘書廿一種本有之。唯汪氏竄改首尾，據為己作），張宗祥說郛序所稱之雲谷雜記、意林是也。茲再略舉數例以明之。如韓拙山水純全集，今傳有函海、螢雪軒論畫叢書，神州國光社及中華叢書委員會印美術叢書諸本，皆一卷，凡九篇，悉出王氏書畫苑詹景鳳補益本。四庫亦著錄，提要云：「凡九篇，而序中自稱曰十篇，豈佚其一歟」？按說郛中所錄十篇俱全，較傳本多「論三古之畫過與不及」一篇，其餘各篇能補脫正譌者亦復不少。如馬永易實賓錄，原書不傳，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蒐輯得六百餘條，編為十四卷，著於錄。商務印書館據文淵閣本影印入四庫珍本叢書，提要稱「自元以來，其書久佚。陶宗儀收入說郛者，僅寥寥數條」。蓋四庫館臣所見乃重編說郛本，非宗儀之舊。涵芬樓校印明鈔本說郛凡錄二百八十八條，每條各註出處，四庫輯本則無，且頗多為四庫輯大典

本所未載者，而原書編次尚略可藉以窺見也。如藏一話腴，說郛著錄云十二卷，分甲至己六集，集各二卷。四庫著錄及傳本皆四卷，僅存甲乙二集，刻本改作內外編，已非原次。說郛摘錄三十條，末十六條不見於今傳甲乙二集本，當是丙至己四集之逸文。說郛中若此類足資拾遺補闕之史料甚多，此其五也。

陶氏說郛纂於元季，所見率舊本，未經明人竄改者，故所錄之文莫不有資校勘。張宗祥氏嘗謂「至於各子，佳字尤多」，實非虛語。茲以曾子為例，曾子一書今傳無單刻本，書載大戴禮記第四、五兩卷。說郛僅錄廿二則，事父母章云：「孝子無私憂，無私樂」，傳本悉無「無私憂三字。按方孝儒遜志齋集卷四引此文孝子下即有無私憂三字，極稱此數句。傳本無者，當係闕脫。又天圓章：「龍非風不擧，龜非火不兆，鳳非梧不棲，麟非藪不止」。明袁氏佳趣堂本，清盧氏雅雨堂叢書翻元本等皆脫末二句。武英殿聚珍本始據永樂大典補入。除子書而外，如樂府雜錄、詩詞餘話、山水純全集等書，傳本率多譌脫，不堪卒讀，以說郛校之，頗多是正。此其六也。

以上六點，不過僅擧其犖犖大者，至於片言支語，有裨考證者，則更僕難數。近人余嘉錫氏撰四庫提要辨證，即頗資以考證。法儒伯希和氏於說郛考一文述其研究後之結論云：「即使無敦煌或日本古鈔本之發現，中國本部雖然氣候潮濕，及兵燹頻仍，尚存有不少未經人引用過之直接材料」，洵非過語。

跋宋浙東茶鹽司本周禮注疏

周禮疏五十卷，南宋初年浙東茶鹽司刊明初修補印本，每半葉八行，經文大字，行十五至十九字不等，注疏小字雙行，行以廿二字為率，惟卷一或有作廿三至廿七字者。卷首序文則作中字，半葉十二行，行廿一字至廿四字。左右雙欄，版心白口，單魚尾，上方或記本版字數，魚尾下刻周禮（卷）幾暨葉次，下方或記刻工姓名。宋諱玄、弦、朗、敬、警、驚、儆、弘、殷、匡、筐、恒、貞、徵、樹、讓、桓、溝、慎、敦諸字偶缺末筆，蓋避諱未甚謹嚴。卷首頂格大題「周禮疏卷第一」，次行下署「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次賈氏正義及周禮廢興二序。另葉正文前重標大題周禮疏卷第一，次行即為篇題，而不重署銜名。蓋出唐本賈疏舊式，序文與正文相接也。第二卷以下則大題與銜名備列，每卷末隔行刻尾題，書中不附釋文。此本大題不著「注」字，惟卷一篇題後有「鄭氏注」三字，以下各卷則不重出。書中凡有釋經之疏文，則逕接經文下，次列注文，再接釋注之疏，疏文均冠以「釋曰云」三字。倘無釋經之疏，則以注接經，以疏按注，與出自十行注疏合刻本編次異。全書分卷五十，亦與後代通行本作四十

二卷不同。蓋依單疏本之編次而補入經注之文爾。

此本前後無刻書序跋，不詳雕梓年月。按其刻工及行款與傳世浙東茶鹽司所刻尚書、禮記諸經同。禮記正義後有紹熙壬子（三年）八月三山黃唐跋及校刊銜名，其跋文云：

六經義疏，自京蜀監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他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云。

則此本亦浙東茶鹽司所刊，為群經注疏合刻最早之本，亦即九經三傳沿革例所云越中舊本注疏也。

此帙遞經修補，而印行於明代初葉。就其字體及版式、刻工覘之，似不下五六次之多。原刊之葉仿歐，端正渾厚，版心上方不記每版字數。其刻工為：丁璋、毛昌、毛期、王全、王安、王仲、王琮、王瑋、王珍、朱明、李寔、李憲、李詢、余永、余坦、洪先、洪乘、洪新、卓受、徐茂、徐亮、徐顏、孫中、許明、陳安、陳保、陳俊、陳高、陳錫、黃安、黃琮、梁文、梁濟等。此諸刻工大多見於宋紹興間所刊雕之白氏六帖事類集、水經注（藏園群書題記）、戰國策、事類

賦、明州本六臣文選（俱見寶禮堂宋本書錄）、台州本景德傳燈錄（文祿堂訪書記）、廣韻（中國版刻圖錄），以及孝宗時所刻說苑（文祿堂訪書記）、廣韻、豫章黃先生集（國立中央圖書館宋本圖錄）、武經龜鑑（寶禮堂宋本書錄）等書，蓋皆南宋初葉紹興乾道間杭州地區雕鐫之良工，是此本當亦刻於其時。惟其中之李憲於紹熙三年曾參與雕鐫禮記正義之工作，且其最早之雕鐫僅見於乾道本武經龜鑑及廣韻，紹興刻本中俱未見其人。乾道元年迄紹熙三年凡廿七年，古代刻工雕鐫生涯大抵以三十年計，則此帙原版之付雕，最早不逾紹興末年也。

此帙第一次補版約在光寧之際，殆浙東庾司刊雕毛詩及禮記之同時，曾整理舊刻易書周禮三書版一併修補印行，故此書第一次補版刻工與傳世禮記正義及慶元六年紹興府刻春秋左傳正義二書原版之刻工多相同。光寧之際第一次補版之字體亦甚端整，惟無原版之渾厚，蓋原版因印刷次數較多字有磨耗之故。版心上方記每版之總字數，與原版異。其刻工為：方至、方堅、王玩、王政、王恭、王誠、王寶、包端、朱用、朱益、朱渙、吳中、宋琚、宋通、吳祐、李忠、李諒、金滋、洪福、施昌、高異、秦顒、張允、張亨、張永、張昇、張富、張謙、陳明、陳浩、陸選、章東、童遇、蔡邠、鄭春、劉仁、劉昭、顧達等。前人每言宋本版式，版心上有刻工私記本版字數，惟就傳世紹興乾道刻本觀之，尚罕此例。則版心記字數，當始於光宗時，初則不分字之大小，

但記每版總字數。至於分別記錄大小字數，恐在寧宗以後，此例足供鑒別宋版者之參考。

第二次修補版之刻工爲：王桂、王燁、方中吳、朱子文、朱光、何通、李寶、沈瑋、沈謙、范華、孫琦、曹榮、徐囦、徐信、徐榮、張珍、陳用、陳思義、陳萬二、董用、葛辛、黃亨、趙遇春等。所補之版，版心上分記每版大小字數，與第一次補版異。字體雖亦仿率更體，然已呈滯拙，惟遇宋諱仍偶減筆，當在未入元前所補刻。案其刻工中之范華、曹榮、董用，亦見於八行本孟子注疏解經（寶禮堂宋本書錄及文祿堂訪書記）。浙東茶鹽司或紹興府刻孟子雖不知在何時，要當晚於慶元六年刊春秋左傳正義。且書中諱及擴廓諸字，應是寧宗以後刻本。又王燁、沈祖二刻工，見於理宗寶祐湖州刊大字本通鑑紀事本末。則第二次修補當在理宗之時，上距紹熙間第一次補版約五十年。

第三次修補於元代，版心上亦記大小字數，字體更遜於前，或有仿鷗波者。其刻工爲：丁之才、大明、大用、文玉、文亨、太初、王六、王正、王子文、王百九、王祥、王壽三（或山）、毛文、永昌、占讓、朱文、朱子成、任阿伴、沈重（刊）、吳文昌、吳中、吳玉、吳祥、李仲、李詳、李庚、李德瑛、何垕、何建、何慶、金友、金震、杭宗、范堅、孫開一、孫誠、徐杞、徐友山、劭夫、俞吉、曹祚、曹新、婁正、陳之、陳天錫、陳允升、陳彥昭、陳德寧、陳邦卿、陳

新、陳琇、淩茂、潘佑、劉仁中、萬二、仁、杜、姚、□明、國、義、祥、霍、壽刊、虜、（重刊）費、鍾、信、張等。此諸補版字體非一，當非一次刊成。按元世祖下臨安後，盡收江南各郡書版，以杭州宋太學舊址，設置西湖書院以掌管之。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所載之周禮注疏，當即此書之版，而王靜安兩浙古刊本考，以其為南宋監刊周禮單疏本，殆誤。至元間有無修補印行，無記載可考。泰定元年西湖書院山長陳袤重整書目記云：「始自至治癸亥（三年）夏，迄於泰定甲子（元年）春，以書目編類，擬議補其闕」。考上舉刻工中之大用、王六、王正、何建、何慶、杭宗、曹新等人，又見於泰定元年西湖書院刊雕之文獻通考；文玉又見於元刻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則泰定元年不僅整理書版，「類編書目，議補其闕」，確曾見之於事實也。復按至正廿二年臨海陳基書目序，謂至正廿一年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吳陵張公，命左右司員外郎陳基主持整理西湖書院書版修補工作，計重刻經史子集欠缺版七千八百九十有三，繕補各書版一千六百七十一。察此帙中有元代重雕之版，亦有僅繕補原版上下部分印行之葉，與陳基序言合，則是至正中此書亦嘗修補印行，時距泰定修補凡卅六年。元代修補可考者，至少不下兩次，上舉刻工何者為泰定時，何者為至正間，或亦偶有明初補版之刻工，惟已難以細加區別矣。

明太祖驅除胡元，奠都南京，又令西湖書院所貯書版，悉移藏南京，由國子監掌管，南監於

所藏亦曾遞經修補印行。就此帙字體覘之，似至少不下三次。考明梅鷟南雍經籍考卷下識梓刻本末云：

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史書梓數，正與今同。則本監所藏諸梓，多自舊國子學而來也明矣。自後四方多以書版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欽依修補。然板既叢亂，每為刷印匠竊去刻他書以取利，故旋補旋亡。至成化初、祭酒王僎會計諸書亡數已逾二萬篇。時巡視京畿南京河南道御史上海董綸，乃以贓犯贖金送充修補之費，文獻通考補完者幾二千葉焉。弘治初始作庫樓貯之。嘉靖七年、錦衣衛閑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勘史書，委鷟校分有九類，鷟以己見附焉。一曰制書類、二曰經類、三曰子類、四曰史類、五曰文集類、六曰類書類、七曰韻書類、八曰雜書類、九曰石刻類。亡缺者，視成化初又過半矣。

與此帙修補重雕版之情形正相契合，蓋入明後又遞經洪武、永樂、成化三次修補。明代補版不記字數刻工，明初字體尚仿松雪體而呈圓潤，最晚之補版如卷三首二葉、第八葉，卷四第九葉、廿五葉等約四五十葉則呆滯拙劣，為成化弘治南監補刻書中習見者。觀此等補版尚屬初印，則此帙為成化初修補竣事後印行之本，殆無可疑。此書已不載於南雍經籍考，則嘉靖初此書版已亡佚竟盡矣。

浙東茶鹽司所刻八行本群經注疏，據王靜安兩浙古刊本考、計有易、書、周禮、禮記、毛詩、及論語、孟子凡七經。又紹興府刊春秋左傳正義亦行款相同，共得八種。惟旣已雕及孟子，似十三經俱已付梓。考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中所載，十三經注疏除無左傳注疏（僅有左傳疏）外，餘十二經注疏俱有。惟王靜安西湖書院書板考均以爲南宋監刊單疏本。然西湖書院書目旣明著爲注疏，應是注疏合刻，王考疑非。元時十行注疏本書版尚在閩建，入明後始移南雍，西湖書院所貯群經注疏書版，當是浙刻八行之本。惟今存世可考者僅有七經。周易注疏十三卷藏日本足利學校及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瞿氏藏本缺首卷，亦見文祿堂訪書記著錄。尚書正義二十卷亦藏足利學校，日本曾予覆刻。又宜都楊守敬在日本曾購獲一部，中缺五卷，抄配補足，見日本訪書志及文祿堂著錄，後歸天津李盛鐸。禮記正義七十卷，南海潘氏寶禮堂及日本足利學校均有收藏，又文祿堂著錄殘本六卷（卷一、二、六十三至六十六）。春秋左傳正義卅六卷，藏上海涵芬樓，見中國版刻圖錄著錄。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僅本院藏有殘帙卷十一至二十凡十卷，卽文祿堂訪書記著錄者。孟子注疏解經十四卷，亦僅本院藏有完帙，另外寶禮堂藏有三、四兩卷殘本、及文祿堂著錄殘本四卷。周禮疏五十卷，除本院所藏爲全帙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盛鐸氏、及文祿堂著錄者均爲殘本。其餘八行本諸經有無存於天壤，尚待繼續蒐訪。

自季唐以來，群經注疏，本各自單行。注疏之合刻，蓋自浙東茶鹽司始。而越刻注疏，實以此書為厥首。據黃唐跋文，易書周禮三經雖同初刊於庾司，而周禮編輯之體例乃與易書二經小異。易書體例以注接經，以疏接注，每節之下以一陰文大「疏」字為識，先標經之起止，以釋經之疏繫之，此下再標注之起止，以釋注之疏繫之。此經編輯之體例，釋經之疏，逕接經文，故轉列注文之前，而下以一大「注」字別之，再釋注文。倘無釋經之疏，其注逕接經文者，則冠以小「注」字別之（案：卷五十第十三葉經「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句下，獨以注接經，釋經之疏列注文下，以圓圈隔開，不標經文起止。再引注某某至某某，最後列釋經之疏，與全書編輯體例異，而與八行本他經略近。察此葉為宋末或元初補刊之版，版心上方除記大小字數外，並刻有「寫本」二字，殆補版時未能見獲原書，乃依當時通行之本仿寫補入，故體例與全書獨異也。）按六朝以來撰群經義疏者，本連經注全文，未有省略。唐代士人以經注既已單行，傳錄正義者遂仿釋氏論疏，於正義原本所載經文注文，以意省略，但標起止。故存世各古本，省略並無定例。宋刻單疏，亦沿其式，即黃唐跋所謂：「六經義疏，自京蜀監本，皆省正文及注」也。浙東茶鹽司革刻周禮注疏，即依通行之單疏本而補入經注全文，而視單疏本之標明經注起止為贅疣，乃刪略不刻，蓋欲以規復賈疏原貌，故卷數一依賈疏，且大題不著「注」字。及刻易書二經正義，或不欲

變動通行單疏之原式，乃改以注接經，以疏按注，仍存經注文之起止，其式遂為後來刻禮記、左傳正義及論孟注疏所存襲，日本河右司正氏謂「周禮疏革刻最早」，殆即依此推測，所言是也。宋元間閩建所刻十行本群經注疏又沿八行本論孟之例，所不同者，但增附釋文耳，此後遂成注疏本之定式。

此本雖不乏魯魚帝虎之譌，然細按之，大抵出之明代補刊之葉。明南雍修補書版，多罰監生為之，繕雕草率，校勘粗疏，其不善原無足異。所幸此帙明代補版尚未甚多，估計不足什一，故佳處不勝枚舉。昔阮芸台校刊十三經注疏，於周禮注疏除用宋十行本及明閩監毛諸本外，訂正最多者為惠士奇惠棟父子校本，而惠氏校本乃據何義門校本。何氏云：「康熙丙戌（四十五年）見內府宋版元修注疏本，粗校一過」何氏所見內府藏本，殆即此帙，故惠氏校語多與此本合。惟何氏自云僅粗校一過，故失校之處尚多，皆可以補阮氏校勘之未逮。茲酌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卷一：大書「鄭氏注」，下接疏文「鄭氏者……」云云，而十行本以下均將此段疏文輟於上節「天官冢宰第一」疏文之後，使讀者幾不知其所指。

卷五：天官冢宰：「酒正……以法式授酒材」，注曰：「鄭司農云、授酒材，授酒人以材」。阮本脫「授酒材」三字，校勘記謂：「余本、嘉靖本、鄭司農下有授酒材三字，

宋本亦無」，誤。

卷六：天官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節，疏文云：「諸侯合同，亦張大次已下，故云亦如之」。自十行本以下，「張大次已下」五字，改作「設重帟重案」。按孫詒讓氏正義考謂：「明合諸侯亦於壇內外設大小次及重帟重案也」，知諸本皆非。

卷十：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節，疏引公羊云：「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與傳世宋本公羊解詁合，而諸本俱脫「賢也何」三字，致意義不成。

又、「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疏：「故大司徒以六樂防萬民之情」，傳本「以六」二字俱訛作「云云」。

卷十二，地官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疏：「教謂十二教」下，阮本脫「云治政令之法者，謂十二教」。校勘記云：「監毛本有此十一字，當由臆增」。覆校又云：「監毛本是，他本誤也。」按宋八行本有之，非由臆增。

卷十六（通行本卷十五）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疏：「凡道皆有三塗……

：軌廣六尺，自然徑不容車軌而容牛馬及人之步徑」。阮本六尺譌作八尺，校勘記引惠校本作九尺，云「惠棟誤也，軌無容九尺者」。按惠校既據宋，則作九尺者，當是字之譌。考孫氏正義引賈疏正作六尺，蓋若八尺則可容車軌也。

卷廿六（通行本卷廿三）、春官樂師「詔來瞽皐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及徹」二字上，阮本誤增一「詔」字。按明嘉靖覆宋單注亦無「詔」字。

又、「及序哭亦如之」疏：「及執事眂斂、獻器遂哭之，注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阮本脫獻器至將葬凡十字。校記云監毛本有。則與宋本同。

卷廿八（通行本卷廿四）卜師：「凡卜，辨龜之上下……」。疏「凡旅，太卜陳龜」。阮本脫「太卜」二字。

卷廿九（通行本卷廿五）太祝：「大會同造于廟……」。疏「非時而祭曰禜，故云反行舍禜」。阮本脫末六字。

卷卅二（通行本卷廿七）、御史：「大喪廞革車」疏：「經不云戎路革路，而云革車」。阮本戎路下脫「革路」二字，校勘記云：「監毛本戎路下增革路二字，非」。按監毛本實出宋八行本，不誤。

又、「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疏：「故王制云，鷹隼擊然後罻羅設」。阮本「鷹隼擊」誤作「鳩化鷹」。

卷卅三（通行本卷廿八）、夏官司馬：「凡制軍……」節疏：「是以州長職注云：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師帥」。阮本脫「則是於軍因為師」七字，注云「原本實缺七格」。又此節疏文傳本多譌字，據宋本可校正達十餘字。

又、「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節疏：「上文教戰，班旗物訖」。阮本「戰班旗」三字譌作「戰旗獲，校記引浦鏜云「戰頒二字誤截，從儀禮通解續校」，亦與八行本未盡合。

卷卅五（通行本卷卅）、環人：「巡邦國、搏諜賊」疏：「彼據王國，此據邦國，故異言之」。阮本脫「王國此據」四字。

卷卅八（通行本卷卅二）、戎僕「掌馭戎車」疏：「此云戎車，巾車云革路，建太白以即戎，故云戎車革路也」。阮本脫「故云戎」三字，校記云「毛本重戎字，此誤脫」，尚未全是也。

又、（通行本卷卅二）、校人「辨六馬之屬……」疏：「以此而言，種馬最在上……」阮本「而言」作五者，校記云：「閩本同，監毛本五者改而言，非。疏除駑馬計之故

五者」。按監毛本乃出八行本，經云：「辨六馬之屬」，當以宋本為是。

又、圉人「廄馬亦如之」疏：「此遣車之馬，遣車、則天子九乘，載所苞遣奠以入壙」。阮本脫「之馬遣車」四字。校記云：「閩本同，監毛本此遣車下衍之馬遣車四字」。此四字不當衍，又「載」字、阮本譌「戰」。

卷四一（通行本卷卅五）、士師「若邦凶荒……」注：「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阮本「則刑罰」三字誤作「不明判」。按阮本此三字旁曾加圈，然未有校記。明嘉靖覆宋單注本與八行本同。

卷五十（通行本卷四二）、「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疏：「故云頭取名焉。頭取名焉，猶言取名於頭也」。阮本脫下「頭取名焉」四字重文。其本誤脫重文之處尚不乏，不縷舉。

以上所述，僅患氏失校之大者，至若片語隻字可資校正阮本者，其數當以百計。亦有賈疏本為小注或釋音者，傳本誤混入正文中：如卷六天官內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注文末，傳本多「治直吏反」四字，按此乃釋音，誤混入注文中。如卷四六（通行本卷卅九）考工記輪人：「直以指牙……」疏：「後鄭讀槷卽是槷蘇結切，注槷讀如涅」。又卷四八（通行本卷四一）

梓人：「外骨內骨……」疏：「自關而東謂之螾衍音引」。此二處注音，阮本改作單行，則幾使人不知其爲音注也。

除文字之異同外，亦有傳本疏文反較八行本多出者三處，茲列舉之如下：

阮本卷廿七春官御史：「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其下增釋經之疏：

「凡者、以其衆多故，此良車散車二者皆不在於服車五乘之等，列作之有精麤，故有良散之名」卅七字。

又卷卅夏官射人：「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增釋經之疏：「此文承賓射大射之下，則王射射人皆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廿九字。

又卷卅二夏官繕人：「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增釋經之疏：「繕人惟主王所乘之車而言，凡乘車則除革路之外，玉金象木之車，車皆有右，備制非常，皆充其籠箙及所載弓矢」四十四字。

考此三處傳本溢出之疏文，多未解釋經義，或與釋注之疏意義重疊，或有誤釋，與全書不合，斷屬後人妄增，非賈疏之原文。亦有賈疏本爲釋經，傳本誤引作釋注，如卷卅一（宋本卷卅七）「虎賁氏掌先後王」節之疏文等是；或本爲釋注之疏，而傳本引作釋經，如卷卅四（宋本卷四四）

秋官司寇「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節之疏文等是；或將疏語錯置，如卷四十（宋本卷四十七）考工記鳧氏「鐘大而短……」疏語，應為下節之解釋，而誤綴於此。若此之類，不一而足，顯屬編輯之錯誤。倘無宋本，無以諟正也。昔陸貽典嘗云：「古今書籍，宋版不必盡是，時刻未必盡非，然較是非以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時刻之是者無六七」。誠屬經驗之言。此帙固不僅孤本秘笈之可貴，而其校勘之價值具在也。

公彥，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賈氏之先，疏周禮者，據隋志，有沈重周禮疏四十卷，又有無撰人十九卷、十卷、九卷凡四家。賈氏殆即本沈重諸家而撰成。迨賈疏行 而諸家遂廢。黃唐字雍甫，一字信厚，福州長樂人。淳熙四年太學上舍釋褐，授建功郎太學錄，歷校書郎、著作郎，官終考功郎中。此帙原藏齋宮，書中無收藏印記。何義門所云康熙四十五年見內府宋刊元修注疏周禮，當即此帙。而乾隆嘉慶兩次選檢天祿琳琅藏書，均遺此書，亦可怪異。然亦因乾隆中未選移天祿琳琅，得免丙丁之厄，可謂大幸矣。玆本院仿原式覆印竣事，原本卷十七所缺第卅葉，亦仿寫抄配補足，使此幾百年罕覯之秘笈公之於世，誠快事也，故不揣簡陋，略述此本之珍善及考其雕印修補之始末，以就正於方家。

跋宋乾道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四十卷，宋徐兢撰，乾道三年江陰郡學刊本，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版匡高一八・七公分，寬一二・七公分，左右雙欄，白口，單魚尾，魚尾下題「經幾（卷）」，再下記葉次，版心下方記刻工：沈忻、沈卞（或忭）、黃康、毛福音、王□、徐益、裘華、陸（或六）榮等。書中遇宋諱完、敬、驚等字，偶缺末筆，貞觀改作正觀，而凡高宗廟諱「構」字，以「太上御名」小註雙行四字代之，孝宗廟諱「愼」字，概代以「今上御名」四字，則甚爲謹嚴。每卷首行頂格大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幾」，尾題於正文後隔行或隔二三刻不等。凡篇題低三格，條目則低四字。書中凡遇皇帝、詔、本朝、朝廷等字樣均提行。首冠宣和六年八月六日徐兢序，次四十卷卷目。卷四十正文後附乾道三年四月張孝伯撰徐兢行狀，末有同年夏至日江陰軍主管學事徐蕆跋。全書印以麻紙，其卷二第四葉、卷八第五、六兩葉原本缺，係舊抄配。

兢字明叔，號自信居士，四庫總目卷七十云：「是書末附行狀稱甌寧人，文獻通考則作和州

歷陽人，思陵翰墨志又作信州徐兢，似當以行狀爲確」。而清陸心源宋史翼卷廿七所撰兢傳，亦據行狀，則謂先世甌寧人，遷家長洲。諸說不一。考此本所附行狀云：上世建州甌寧人，自其祖師固始徙居和州歷陽。紹興中金兵犯淮甸，乃遷家信州弋陽。故諸書或稱歷陽人，或謂信州人。而四庫提要謂行狀稱甌寧人，宋史翼云遷家長洲，皆失於考也。宋史翼之說，殆緣兢兄林南渡後家於吳，及兢病卒於吳門而致誤也。兢初以父閣中任，補將仕郎，授通州司刑曹事，歷攝雍丘、原武二縣，移監元豐庫，奉派以上節官隨使高麗，歸撰書進上，徽宗賜同進士出身，擢知大宗正丞事，遷刑部員外郎，以事謫監池州永豐監，調沿江制置司參謀官。丐祠，歷主管南京鴻慶宮、台州崇道觀，紹興廿三年卒，年六十三。宋史翼謂卒於廿五年，非也。兢洞曉音律，精於繪藝，山水人物俱稱冠絕。尤擅書法，真行遒麗超逸，褚薛顏柳隸體兼備，南渡後以善書稱。自少刻意篆籀，筆力奇古，惟每喜陶鎔離析，故魏了翁跋其篆赤壁賦，謂於說文解字以外自爲一家云（鶴山集卷六二）。

是書乃徐兢於宣和六年撰進者。五年，兢奉派以奉議郎充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官，隨國信使給事中路允迪，副使中書舍人傅墨卿出使高麗，祭奠弔慰國王王俁之喪。於三月陛辭離汴赴四明，奉頒賜禮物及備治行裝入舟，自五月十六日發四明，經定海放洋，六月十二日抵高麗禮成港，

登陸入王城，留匝月，七月十三日離王城登舟，八月廿七日返抵定海，海程往返三月餘。兢因精繪事，於沿途所經島嶼，高麗之風俗事物、城池館宇，莫不圖其形並記述之，凡廿九篇，三百〇一條，附圖若干，釐為四十卷，名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詔給筆札，於翌年進上之，而副本藏於家。

是書始刊於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去兢卒已十有五年。兢兄林之子徐蕆時以左朝奉郎發遣江陰軍主管學事，遂刻置於郡齋。惟其書經靖康之亂，內府所貯及家藏副本俱燬於兵，世所抄傳者，率有文而無圖，圖遂無從覓刻。周煇清波雜志卷七嘗記其事云：

宣和奉使高麗，詔路允迪、傅墨卿為使介，其屬徐兢倣元豐中王雲所撰雞林志為高麗圖經，考稽詳備。物圖其形，事為其說，蓋徐善丹青也。宣和末先人（按卽周邦彥）在歷陽，雖得見其圖，但能抄其文，略其繪畫。乾道間刊于江陰郡齋者，卽家間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

故是書自宋以來傳者，雖仍名高麗圖經，實皆無圖也。遂初堂書目及直齋書錄解題著錄者，當卽乾道刻本。其後歷元入明未再繙刻，而舊本罕傳，傳者多輾轉抄錄之本。迨明末始有海鹽鄭弘氏據抄本重刻之，惟脫漏譌誤不下數千字，不堪卒讀。四庫全書著錄者，係據兩淮馬裕家藏抄本，

其訛脫視鄭氏刻本尤甚。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歙縣鮑廷博據家藏抄本參校鄭氏刊本，再刻入知不足齋叢書中。其本雖補正鄭本謬誤甚多，然知卷十七興國寺條脫五字，卷廿七西郊亭條脫二十字，卷四十儒學條脫二百五十三字，仍無法補入。其餘譌文誤字，亦時時有之，尚非善本。故清蔣光煦輯斠補隅錄及近人段瓊林均有校勘記，以匡其未逮也。

本院所藏宋本，全四十卷三册，每册前後護葉鈐有「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三朱文方璽。每册首葉鈐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朱文長方、「天祿繼鑑」白文方形、「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橢圓三印記，末葉則鈐「天祿琳琅」朱文方形一章，蓋錢遵王舊藏之本，見於讀書敏求記及述古堂書目著錄。考嚴元照悔菴學文卷七有「書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後」一文，其云：

此書有毛斧季於康熙甲申（四十三年）從宋中丞借宋板校正，裁割補綴，用力甚勤。紙之黏接處，皆以虞山毛扆手校朱文長印鈐縫甚精，後有斧季題字，在錢塘何氏夢華館。

似錢氏之外，清代傳世者尚別有一宋本。惟毛氏校宋本遍見昭文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及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著錄，按毛氏跋語所記宋本闕葉，與本院藏本正同，知毛氏所借校者，亦即錢氏述古舊藏之宋本，存於天壤間者，捨此外別無他帙。惟毛氏云康熙甲申從宋中丞借宋板，按

錢大昕撰錢遵王年譜稿，遵王卒於康熙辛巳四十年，似錢氏卒後此書曾歸之商丘宋犖，然書中未鈐宋氏收藏印記。何時進之大內，亦無可考。審書中所鈐印璽，當在乾隆末季或嘉慶初葉，故天祿琳琅書目不載，而著錄於續編也。

除吾國外，高麗亦嘗刋雕其書，仁和趙氏小山堂藏有之，見鮑廷博跋語，惟近代中日韓諸藏書目俱未見著錄，不悉據何本校刋。本院所藏之帙既為宋代原刻，且係存世孤本，後世諸刻復多訛奪，民國廿一年嘗據之影印入天祿琳琅叢書，欲廣其傳，以正通行諸本之失。惟當年發行無多，今歷時逾四十載，景印本存世已稀。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韓國亞細亞文化社以知不足齋本為底本，據攝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天祿琳琅叢書景宋本微片校注異同，並加句讀，末附段瓊林氏校記，排印行世。其本於鮑本之闕文雖已補入，惟句讀多誤，校勘未審，舊誤既未盡正，新譌復多衍生，茲略舉例言之，如卷五五府條，宋本與鮑刻本頗有歧異，該本概未校注。他如卷十五雜載條：「故雜載多用馬……其行頗駃云」。「駃」，鮑本作「駛」，韓本從之，未據宋本校正。按「駛」者，馬行疾貌；「駃者」者，集韻云：「駃跳踏自撲」。是條首云「麗國多山，道路坎壈，車運不利，又無槖馳可以引重」。下云：「其制以二器夾裝，橫跨於背，應用之物悉置器中，絡首鞅胸，如乘騎之度，前引後驅」。似此情形，馬行何能疾速，當從宋本作「駃」，狀

其跳躍顛行。又如卷卅四沈家門條：「舟人謂之摳風」，韓本、鮑本作「拒風」。按說文通訓定聲：摳謂扣結所紐，即紐曲之意，而拒者乃抗禦之意。此條前云：「辰刻、四山霧合，西風作，張蓬委蛇曲折，隨風之勢，其行甚遲」。察此情狀，自以宋本稱「摳風」為合。若此之類，無煩縷舉。至若鮑本原不誤，而韓本新衍生之訛脫，例卷六長慶殿條：「香火千家祈國壽」，火誤作花；卷十二左右衛牽攏軍條：「以馭衆馬」，馬譌作馬；卷廿五祭奠條：「示鎮撫於爾邦」，示譌作樂；卷廿七詔位條：「使副以次從行」，脫「使副」二字等類，尤更僕難數。是韓國新排印本，雖云以景宋校，仍非善本也。

是書所述高麗世系皆與宋史朝鮮傳合，而與朝鮮史册每未盡符，如以昭為武子，治卒弟誦立等等。按朝鮮柳希齡撰東國史略，昭為武之弟，其前尚有兄堯立四年卒；誦為伷子，於治為姪，而無隆、欽、亨三王。又諸王繼立年歲，亦多未合。蓋王氏高麗，北宋時迫於契丹，與中國絕不通使數十年，故宋朝史官所記世次不盡可據也。然徐氏記海道歷程及所目睹高麗風俗事物頗詳，雖圖已亡，敘述仍歷歷如繪。徐氏之前使臣吳栻、王雲所撰雞林記既已散佚不傳，則此書厥為研究早期高麗之重要著作也。通行本既仍多訛奪，本院以所藏宋槧孤本，再倣原式精印，期廣其傳。因略述此本之源流及與傳本之異同綴於後，昔顧千里云書以彌古為彌善，信然。

跋影宋本北山錄

右景宋印本北山錄十卷，版匡約高二二・六公分，寬一五・四公分，左右雙欄，版心白口，有雙魚尾，有單魚尾，魚尾下刻書名、卷數、及葉次。單魚尾之葉，版心下方記刻工，可辨識者僅徐志一人及姜、趙、姚、葉、包數單字。每半葉十二行，行大字廿四字，註文雙行，行約卅字，間有逾此數者，率屬校改擠刻。遇宋諱玄、眩、絃、敬、境、弘、殷、匡、恒、貞、禎、徵、樹等字缺末筆，然不甚謹嚴，神宗以後諱字則全不避。每卷首行大題「北山錄卷第幾」頂格，每篇篇題則低三字，尾題於正文後隔行刻。卷一第二、三行下方分題「梓州慧義寺沙門神清撰」，「西蜀草玄亭沙門慧寶注」，卷二以下則不重署。全書十六篇篇目，分上下兩列，冠於卷一正文之前，凡此，皆存古式。書首有熙寧元年五月沈遼序，卷末有無年月釋贊□、及熙寧元年十二月丘濬二後序。其後附北山錄註解隨函二卷，題儀封縣平城淨住子比丘德珪撰，亦半葉十二行，小注雙行，行約卅三字，大字一略當小字四。版心白口，雙魚尾，下記刻工范、李二單姓，不避宋諱。卷末有「宣授講主心印廣福大師全吉祥謹施長財陸續重刊」、北山錄一部十卷釋音一卷註解隨

函二卷科文一卷、鈔文一十二卷、善利端為祝延、皇帝萬歲、太子千秋、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萬民樂業」分刻十行。

察此本乃據三種不同之版本配補影印而成。民國初年此書存世有二殘帙，一帙殘存卷一至三、卷七至十，凡七卷二册，為明嘉興項氏天籟閣舊藏，單魚尾，版心記刻工，當為熙寧元年沈遼、丘濬二序所云釋惟賢據蜀本刊雕者。卷十末有「明萬曆丙子仲秋望日重裝，墨林項元汴持誦」墨書二行，鈐有「檇李」、「子京所藏」、「墨林秘玩」、「項墨林秘笈之印」、「天籟閣」、「檇李項氏世家寶玩」諸印記。一帙殘存卷一至六，並附注解隨函二卷，為華亭朱大韶文石山房舊藏，行款與前帙同，惟版匡略短，版心作雙魚尾異耳。字體亦仿歐陽率更，避宋諱止樹字，當亦北宋時期江浙地區重刊熙寧本者。所附註解隨函二卷，與錄非同版刻，字體亦異，且不避宋諱，為廣福大師全吉祥捐貲刊雕者。吉祥之名，錢竹汀十駕齋養心錄考謂起於蒙元（見卷九），則刊板於元代者，雖同時雕鐫者尚有北山錄及鈔科文等，唯不傳，僅存注解隨函二卷，遂取附宋刻北山錄之後爾。卷中鈐有「華亭朱氏文石山房藏書印」，又有「與身俱存亡」、「後百宋一廛」二印記，則為袁克文氏藏章，是此帙在民國初年曾經袁寒雲藏弆者。此書為自宋以降所修大藏經俱未收錄，陳援菴氏發現此秘笈，遂於民國十年取二殘本配補為全帙，約集同仁醵資照原式影印

以廣其傳，其事始末，陳氏所撰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略述及之。此本之四至六三卷及注解讀函二卷為朱氏舊藏，七至十四卷為項氏舊藏，因無別本互參，偶有缺文，故悉仍其舊。首三卷則取二本互補而成，故單魚尾雙魚尾之葉互見也。此二殘帙後俱歸南海潘宗周氏，已著錄於寶禮堂宋本書錄。

釋神清字靈庚，俗姓章氏，綿州昌明縣人。年十三從綿州開元寺辯智法師出家，後主慧義寺，元和末卒。平昔好為著述，撰有法華玄箋、釋氏年誌、新律疏決要、二衆初學儀、及北山錄等共百餘卷，事跡略具宋釋贊寧高僧傳卷六。今除北山錄外，餘書俱佚。北山錄亦名北山參玄語錄，曰北山者，因其所居在長平山之陰；曰參玄者，蓋參儒道之說以闡揚佛學者。全書凡十六篇，倣周秦諸子，每篇以二或三字標題，曰天地始、聖人生、法籍興、真俗符、合霸王、至化、宗師議、釋賓問、喪服問、譏異說、綜名理、報應驗、論業理、住持行、異學、外信。神清博極群書，會萃六經、及老莊荀孟楊墨班馬之說，馳騁其間，引喻取譬，敷論甚暢。綜其主旨有三：一曰參儒道以闡佛學。李唐之世，佛教甚盛，每詆毀儒道。而神清以釋教實藉儒道為前驅而得宏揚，故力斥誹儒道之不當。其言曰：「觀乎古今撰製，多先貶周孔而降老莊，以為能文者，此啓戶納盜怒敵慕壹之由也。又言「二教之於我，贊而不害也；吾之於二教，統而有歸也」（外信）。其

弘法因多參儒道之首。昔人每以為李翱以佛入儒，為儒佛合流之始，未曉李氏之先有神清，已開儒釋道合流之先導也。二曰抑禪宗而崇義學。其大旨見於真俗符，識異說等篇，以禪宗為「泥空者涉於斷」、「斷則無善不棄」，故力貶之。三曰駁儒者之非佛，大旨見於異學，外信諸篇。窺其論似對韓愈而發，按憲宗元和十四年勅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韓愈上表諫之，故元釋念常撰歷代佛祖通載，次神清撰北山錄於元和十五年也。

慧寶字光用，俗姓王氏，梓州玄武縣人。撰有三國嗣要志十卷、錦鳳彙十卷、玉谿新藁十卷等，見贊□後序。所注北山錄，其卷三至化篇引開寶六年事，卷十外信篇引宋初雕大藏經板及太宗登極事，當為北宋初葉人。惟所注多所未諦，故德珪撰注解隨函以糾其失。德珪生平未詳，觀其註引贊寧僧史略及景德傳燈錄，則真宗以後人。錄有差誤，輒為糾正，注有差誤，隨函正之，有未逮者，則補注之，並頗增音釋，實神清之功臣也。

此書雖以弘法為主，因合參儒道之旨，故不為釋子所喜，且抑禪宗，尤為禪者所詬病。宋釋契嵩曾評其書，謂為「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為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清之謂也歟」（鐔津集卷十六）？故其書雖見於唐宋史志及崇文總目著錄，且據序注所述，有蜀本、熙寧本、古本、絳本、京本、廣福法師刊本等，宋元間曾屢次刊

雕，而自宋迄清諸釋藏悉未收錄，殆以此也。自民國十年景宋印本流傳後，世人方曉此書。十三年日本修大正藏經，始據景宋本錄入，列載護法部，而刪削德珪注解隨函二卷。四十四年台灣中華大藏經會重印藏經，復據大正藏本影印。大正藏之修纂，係由日本高楠順次郎及渡邊海旭二博士所主持，校勘頗稱矜慎，惟以此原本校之，其中仍不乏譌文誤字，茲列校記於次：

卷	葉	行	景宋本	大正藏本	備註
一	五下	七	湯問革「曰」	曰譌日	
	十上	六	夸父能「逐」	逐譌遂	
	十下	十一	夔以「跉」踔	跉譌跉	按跉踔語出莊子秋水，狀一足跳行貌，跉者偏行也，失其義。
二	八下	三	相附如糺纆	纆譌纏	按糺纆語出史記賈誼傳，狀二股索糺結，而纏者繞也，義不同。
三	五上	八	悉舉「擧」	擧譌與	
	十上	八	「胅」其頭	胅譌滕	
		又	「什」無慍色	什譌付	

卷	葉	行	文	校語
	十六上	九	「曰」聖明	曰譌日
	十七下	八	而彈指「曰」	曰譌日
	十八上	十二	張奴與「柾」度	柾譌極
四	四下	九	朗質「玉」瑩	玉譌王
		又	比於阮「戚」	戚譌戚
	七上	一	遞相祖「述」	述譌迷
	九上	十一	以籍「莽」食	莽譌脊
	九下	六	絕若腐「纆」	纆譌纏
	十二下	七	傷乎「訐」直	訐譌許
	十五上	一	竉「基」姓尉遲	基譌某
五	一下	九	「石」露盤	石譌右
	二下	六	以艾「蒿」	蒿譌嵩
	十一下	九	上九在「亢」	亢譌元
	十七下	一	餌松「朮」	朮譌木

又　六　脩者「居」此　居譌君

八　二下　八　孔「丘」弟子　丘譌兵

四上　一　教其軌範　教軌其範

七上　九　如狗逐「凷」　凷譌由

七下　十　「皁」隸者歟　皁譌卑

十八上　八　「冀」彼澄想　冀譌異

七　八下　十一　妙盡樞「紐」　紐譌細

九下　九　「曰」不然也　曰譌日

八　五下　一　異視宮「徽」　徽譌微

六下　二　殘溪轂「殺」　殺譌冠

七上　十一　佩「玉」則兆　玉譌王

八上　一　周旋「裼」襲　裼譌禓

又其下注文二裼字亦譌禓，按裼襲一辭出禮記表記，作禓襲誤。

十二上　六　「夫」學道者　夫譌天

又　九　何莫「於」其徒　於訛放
十三上　十　斯誠與「調」　調訛調
九　二上　八　波「你」仙　你作爾
七下　七　嘆「咤」不平　咤訛咤
十　三上　十　貞白先「生」　生訛主
四上　九　「沴」氣者　沴訛冷
六上　四　「義」軒已前　義訛義
十上　五　良如「卿」言　卿訛鄉

其他如殘、枂、隟、鏁、翦、慠、懲、罥、慆等字悉改作俗體戔、析、隙、鎖、剪、傲、懲、羂、慆。尤失原真者，如卷七之首葉，景宋本原缺殘前半葉，大正藏本僅自其下半葉起錄，而未註明其前脫文若干，又卷十第十四葉後半葉原殘闕，景宋本該半葉首有墨書「行要堅深心要定，性須懸忍量須寬」二行，乃項元汴氏所手題。而大正藏本誤為原書之文，闌入釋贊□後序之尾，並以其下空白為闕文。中華大藏經悉沿其誤而未改。

曩歲余撰說郛考，慚聞見狹陋，於說郛卷三談叢中所錄之北山錄四條，未曉出於釋氏所著，

亦不知即唐宋史志釋家類中所著錄之北山參玄語錄，復未悉此書尚有宋槧傳世且經印行，及大正藏經業已收入，故於說郛書目考中謂是書未見著錄，亦無傳本。幸承友人嚴靈峰教授惠函指正，並蒙以此景宋善本寄贈，高誼紉感無既。此帙藏之笥篋已十有餘載，今夏思重訂說郛考，因檢出取與說郛所錄及大正藏本校勘一過，始知大藏本之未足盡據，不僅註解隨函二卷為所刪削也。文史哲出版社彭正雄君慨允影印，願廣其傳，廣結善緣，此正釋氏之所謂作功德也。因綴數語，以誌此書之顛末，且贖余前愆，冀世人識此書之淵源與珍善也。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孝感昌瑞卿謹識於士林雙溪蝸居。

跋元坊刊本大元聖政國朝典章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六十卷，附至治新集條例不分卷，元刊本，典章每半葉十八行，行二十八字；新集條例則半葉十九行，行三十字。版匡高一九．五公分，寬十三公分。版心上下黑口，雙魚尾。上魚尾下記「典章」二字及綱目卷第，下魚尾下記葉次，版心或記本版字數於卷次下方，亦偶有記於版心右下方者。新集條例則但記每門葉次，無總葉次，亦不記字數。首冠綱目，每半葉十一行，綱目篇題後有木記一方，文凡七行，云：

大德七年中書省劄節文：准江西奉使宣撫呈，乞照中統以至今日所定格例，編集成書，頒行天下。照得先據御史臺，比及國家定立律令以來，合從中書省為頭，一切隨朝衙門，各各類編中統建元至今聖旨條畫，及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編寫檢舉。仍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提刑按察司體究成否？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至廢弛。已經遍行各屬，依上施行去訖。今據見呈，仰照驗施行。

次總目錄，每半葉十八行，各門目則跨行。新集至治條例前亦冠綱目及目錄，綱目半葉九行，目

錄則十九行，門目亦跨行。綱目前有木記，文凡六行，云：

大元聖政典章，自中統建元至延祐四年，所降條畫，板行四方已有年。今謹自至治新元，以迄今日頒降條畫，及前所未刊新例，類聚梓行。

目錄之末則刻有行書四行，云：

至治二年以後新例，候有頒降，隨類編入梓行，不以刻板已成，而靳於附益也。至治二年六月謹咨。

典章每卷大題在下，篇題在上，類題及門目均佔二行。新集條例則大題頂格曰：「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次行下題「至治二年新集」墨地白文。類目佔二行，門目則不跨行。每門所載條格篇目均作墨地白文，書中遇皇帝、先帝、皇太后、聖旨、聖壽等字樣均提行頂格，遇詔書、萬歲、詔、令旨、懿旨、王、公主、皇太子，啓禀等字樣則提行低一格刻。所錄條格事例均低二字，文中頗用俗體簡筆字。卷五第七葉前半葉文末有簽名體「孟□」二字，殆書寫之人或刻工姓名。卷四十三刑部五第八葉「強盜殺傷事主經革倍徵埋銀」條末有「至大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路吏劉允承奉省府令史孫英承行，十月初五日札付」墨筆手書小字雙行，卷四十九刑部十一第十葉「盜賊出軍處所」條末有墨筆書「四月二十八日杭州路吏呂憲承」一行，又第十一葉「剜豁土居人物」條末有「杭州路吏趙世澤承行，十月十二日旨揮」墨書一行。又新集條例末有都省通例一篇七葉亦係

抄配，均不悉何人所錄，書寫甚舊，疑出元人之手。書中偶有缺葉，計缺典章卷二十八禮制一第三葉，卷三十八兵部五第四葉，及新集條例戶部田宅門第三、四兩葉，刑部刑制第二葉，共缺五葉，均存紙待抄補。書中鈐有「毛晉之印」、「毛晉私印」、「毛氏子晉」、「汲古主人」等朱文方印，及「毛」、「晉」朱方連珠印，又鈐有「沅叔審定」朱文方印。蓋明清之際常熟毛氏汲古閣舊藏，惟士禮居刻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未載。不悉何時進入內廷，貯之齋宮，四庫總目存目著錄者，卽據此刻。

典章凡分大類十，曰詔令、聖政、朝綱、臺綱、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類下又各分門目，凡詔令五目、聖政三十二目、朝綱二目、臺綱六目、吏部四門五十二目、戶部十五門七十五目、禮部四門二十三目、兵部五門三十九目、刑部十四門一百三十二目、工部二門七目，總計三百七十三目，每目下列舉條格事例，自一條至二十餘條不等，起中統以迄延祐；最晚者爲延祐七年十一月事。新集至治條例分大類八，曰國典、朝綱、及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國典僅詔令一門、朝綱三門八目、吏部四門十七目，戶部十門二十二目、禮部三門四目、兵部二門三目、刑部十四門三十八目、工部二門二目，總三十九門九十四目，門目名稱與典章並不相應，所錄條格以延祐三年迄至治二年爲主，亦偶錄有早至大德、皇慶者。按此書前後無序跋

，書中亦未載編輯者名氏，不詳何人編纂，何時刊版。考是書之纂修，元史未載，清姚鼐惜抱軒書錄卷二著錄抄本此書云：

史載至治二年金帯御史李端言：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為令，使吏不得為姦，治獄有所遵守，英宗從之。書成，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計其時與此元典章之成，正同時也。然此書條例較為繁多，意其出於胥吏所初輯，而通制稍加删定歟？

四庫全書總目政書類存目著錄此書，亦言與大元通制不相應，各為一編。又言新集不分卷數，似猶未竟之本。並據書前中書省劄文中有置簿編寫之語，而謂為吏胥所鈔記。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八跋鈔本元典章則謂：

此書當日乃奉官刊布，以資遵守，非僅為吏胥之鈔記。刻於江西，故有江西奉割之語……此書初刊於大德，嗣後隨時續增，以至延祐。前集有延祐五六七年詔令事例，不止於四年。新集有至治三年事例，亦不止於二年六月。當日官書隨時續增者有之，故與所記不能盡符。總目疑為未竟之本，殆未究其故也。

胡玉縉撰四庫總目提要補正引沈氏跋語並加案語云：「大抵前集為官刊，新集乃坊賈所次耳

」。綜諸家之說，以此書與至治三年修成之大元通制非為一書，皆無異辭。至此書之輯，或以為吏胥所為，或以謂出之官修，或以前集為官刊所頒，新集為坊賈所輯，意見殊不一致，按此書首冠之大德七年中書省劄文，雖有江西奉使宣撫呈請將格例編集成書，頒行天下之語。然中書省通行各屬，僅令置簿編寫，庶官吏有所持循，並無頒行成書之辭。且其事元史未載，可覘其時並未纂輯成書頒行。沈胡二氏據之以為大德中江西奉劄官刊，嗣後續增，純屬揣測之辭，未可以為據。考元史卷二十八英宗本紀云：

至治三年正月辛酉（二十九日），命樞密副使完顏納丹、侍御史曹伯啓、也可札魯忽赤不顏、集賢學士欽察、翰林直學士曹元用、聽讀仁宗時纂集累朝格例。

又卷二十五仁宗本紀：

延祐二年四月辛丑（二十四日）命李孟等類集累朝條格，俟成書聞奏頒行。

又卷一〇二刑法志序：

世祖平宋，疆域混一。自是簡除繁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劃有關於風紀者，類輯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至英宗時復命宰執儒臣取前書而加損益焉。書成，號曰大元通制。

由上所引，知在仁宗延祐二年嘗命李孟等纂輯歷朝格例，且已編輯成書，當即刑法志所云之風憲宏綱。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博學強記，通貫經史。以薦累官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元史（卷一七五）、新元史（卷二〇一）俱有其傳，惜均未記述此年奉旨纂修事，故不得知其詳。仁宗時之纂集格例，雖本紀云「俟成書聞奏頒行」，然刑法志未明言頒之有司，且至治三年復命大臣聽讀，當是其書尚未定稿，故未幾據以損益重纂修大元通制頒行。關於此元典章之修纂，元史無一字及之，雖書首冠有大德七年中書省劄文，然與書中所錄時代不相應。風憲宏綱始纂於延祐二年，成書時間不詳。但至治三年英宗已命大臣聽讀，二年且命儒臣重修大元通制，則其成書當在至治以前之延祐年間。觀此元刻典章所載率延祐六年以前事，偶有延祐七年各條皆係補刻，與風憲宏綱之時代相當，則此二書或不無關係，然亦非即官修之風憲宏綱也。其何以明之？緣大元通制據元史刑法志係依風憲宏綱損益而成。大元通制雖全書不傳，而前國立北平圖書館尚藏有通制條格殘本五册，即明文淵閣書目卷十四政書類所著錄，內閣大庫舊藏之本。該殘本僅存條格卷二至九、卷十三至二十二、卷二十七至三十凡二十二卷。由此殘本覘之，其書依事分門，不按六部，此與元典章分門不同者一。且所錄條格皆據中央尚書、中書兩省各部及御史臺、宣徽院、太醫院等檔案，或欽奉詔書、欽奉聖旨條畫，或丞相某奏。而元典章所鈔錄雖亦頗有中央各部之檔，

然以抄錄各地方行省，尤以江浙江西行省之檔爲多。此兩者不同者二。由是言之，此書絕非如沈胡二氏所云爲官書，而大元通制亦非如姚氏所云據此書删定。若云爲據風憲宏綱爲底本，而增輯自各省抄錄之檔案條格而分部類輯，或庶幾近之，故格例視官修之大元通制溢出甚多。至於編輯者，或如四庫總目提要所云：殆吏胥所錄記，然主其事，似爲坊賈也。觀新集中所錄格例前每冠「某年某月鈔到」，尤爲顯見，故是書「細碎猥雜」、「體例瞀亂，漫無端緒」。書首冠令各衙門置簿編寫條畫格例之大德七年中書省劄文者，以有此令，各衙門之案卷始易稽查傳錄。如此推測，諒距事實不遠也。

關於此本之刊雕時地問題，按日人島田翰所著古文舊書考，其訪書餘錄謂在江浙閩所見秘要，有典章之元末刻本。惟檢今傳世江南諸藏家書目，均未見著錄此書元刻本。卽此本爲毛氏舊藏，而汲古閣秘本書目亦未載。張允亮氏所編故宮善本書目，考訂此本題爲元至治二年建陽坊刻，民國五十六年本院出版之存臺善本書目卽從之。今觀此刻版式字體，其爲建陽坊刻無疑，而刊年則尚有可議者。按此本前集典章與新集條例版式雖同，而行款則異，字體亦微有不同，以前集稍精，顯非同時刊版。據新集條例綱目前木記，謂元典章類集自中統至延祐四年所頒降條畫，且云板行四方已有年，當是延祐五年以後付雕。檢此本所載已下逮於延祐七年十一月，惟察所載延祐七

年之條格，多係增補刊入。其顯見者，如卷二聖政一，其第十四葉重出，蓋於撫軍士一目下增刊延祐七年三月及十一月兩條所致。又如卷三十六兵部三第二十、二十一兩葉間多出一葉，蓋增刊延祐七年十一月遠方病故官屬回違脚力一條所致。尤顯然者，卷一詔令類仁宗皇帝之標題一行闕文。其所以致此者，殆原題今上皇帝，及刻成時英宗已卽位，遂增英宗今上皇帝一門，而將原題仁宗為今上皇帝標題一行剗去，未及補刻謚號故成空白也。由是證之，元典章之刊版，當始事於延祐五年，而成書於延祐七年底英宗登基以後也。至若新集條例則為二年六月始刊版，但依門目為次第而無總葉次者，蓋便於以後隨時增補，不致如前集之葉次重出。覘此本尚非初印，而其中尚未增入至治二年六月以後之格例者，當係逾年大元通制修成頒行，而此書遂廢矣。至若沈跋所謂書中有至治三年事例，係指刑部騙奪門持杖白晝搶奪同強盜條，此元刻作二年，乃其所藏鈔本誤二為三之謬，未足以為據也。

是書始見著錄於文淵閣書目。文淵目卷十四政書類載「元典章一部、十册闕」。不悉為刻為鈔。惟內閣藏書目錄未著錄，則文淵閣藏本至萬曆時已散佚矣。千頃堂書目卷九典故類載有元國朝典章，惟作十五卷。又述古堂書目政刑類亦著錄內府抄本元國朝典章十五卷六册，卷數與此書異。按述古之藏本係獲自錢牧齋家，絳雲樓書目稱作「元至正國朝典章六册」，與此聖政典章似

非一書。遵王藏本，其讀書敏求記未著錄，後代亦未見流傳，故不知其詳。此書元刻除內府一帙外，民間未見有著錄者，惟鈔本尚不絕如縷，如虞山張氏愛日精廬、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歸安陸氏皕宋樓、杭州丁氏善本書室、江陰繆氏藝風、東莞莫氏五十萬卷樓等書目均著錄有此書舊鈔。而自明以來，此書未再翻刻。光緒三十四年武進董綬金始據杭州丁氏藏本傳錄，刻之北京法律學堂，歸安沈家本跋其後，方廣其傳。惟沈刻所據鈔本，不乏衍脫錯譌顛倒之處，而沿其誤，致不堪卒讀。且變易行款，而致條目相淆。抬頭綴連，而生誤連上文之弊。擅改元本俗體為正，時生繆誤，樛葛不清。妄增損詞句，致失原文旨意，尤以每門目前所列表格，橫直線多闕，上下失序，左右不應，眷亂不堪，均不足為據。昔人謂刻書而書亡，即此之類是也。民國二十年新會陳援菴先生取故宮博物院所藏元刻，吳氏繡谷亭、闕里孔氏之影鈔本，及巴陵方氏、南昌彭氏兩鈔本，共計五本以校沈刻，得譌謬一萬二千餘條，略仿宋樓大防樂書正誤式而稍變其例，撰成札記六卷，闕文三卷，並改作表格一卷，曰沈刻元典章校補，由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刊雕以行。並有釋例六卷，則另刊單行。陳氏校讎精審，於沈刻闕者補之，脫者增之，謬者正之，錯亂者明之，於讀者理應無憾。惜其書須附沈刻以行，檢核維艱。且於條格原式，原本俗體之字，仍無從顯見，總不如元本之條目清晰也。

陳氏謂闕里孔憲培舊藏影元鈔新集條例，每半葉十八行，行二十八字，與故宮藏元刻行款同，但非出於其本。按元刻新集實半葉十九行，行三十字，前集始十八行耳，當係陳氏偶疏失數計。至若其言孔氏影元鈔本非出此元刻，乃以孔本較此刻多祭祀一門為證。竊嘗考校之，今傳諸抄本無論影抄或傳抄，似皆自此元刻出，而輾轉傳錄，致訛誤衍生。茲嘗試證之。元刻舊本除汲古閣舊藏後進歸天府之此本外，未嘗見之他家著錄。雖島田翰謂江浙藏家有元本，然稱為元末刻，殆得諸傳聞，而未曾目驗。且清季以來江南藏家無一人提及元刻。似有清三百年來僅此孤本秘笈，別無二帙，此可疑者一。自清以來傳世諸鈔本，早者如康熙間朱氏曝書亭鈔本，見虞山張氏愛日精盧藏書志。次者如康雍間璜川吳氏探梅山房，錢塘吳氏繡谷亭鈔本，皆號稱影元，而無一早於朱明者，似皆自汲古閣藏本輾轉錄出，故或以半葉十五行之本，亦謂作影元鈔，皆未目睹元刻之故，此可疑者二。如典章卷七吏部一第十三葉後半葉末行「宣」字下，此本因破殘而缺三字，就所知各鈔本此處所缺悉同。倘據別一元刻傳錄，當不致殘缺處全同。此可證三也。如卷十八戶部四「嫁娶寫立婚書」條云：「至元六年三月十一日」，按元刻原有月無日，「十一」二字係墨筆填注，而今傳各鈔皆作十一日。又同卷兄收弟妻斷離條云：「至元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其二十一原刻無，此本係以朱筆填入。又如卷三十三禁割肝剜眼條，元刻為「至元三年十一月」，

此本以墨筆將十一月三字改作十月日。又如卷五十三第二十一葉「醫戶詞訟約會」條，原刻「頭目一」下空二行有脫文，此帙係有墨筆填寫「處約會……」云云二十四字。若此等處，今傳各鈔本皆同此帙所添寫增改之字，而不從原刻之文。倘鈔本或據別一元本，添寫之字，不應雷同如是，此可證四也。如新集至治條例目錄第二葉，此帙「假故」門下有墨筆補寫「作闕官告敍委官保勘」一條目。按書文此條應是「告敍」一門之條目，次於「作闕」目後，而元刻目錄漏刻此條目。此帙藏者以「作闕」目後無間隙，遂補寫其目於「假故」目下之空白處，而今傳各鈔皆從其誤，而不予更正。此可證五也。由此推論之，今傳之各鈔本率自此帙出，應無疑義也。至於傳本或較此帙所載溢出者，固不僅孔氏藏影元鈔本，如沈刻所據之杭州丁氏藏舊抄本，除新集禮部多祭祀門「祭祀社稷體例」一條外，又吏部丁憂門多「劉萬戶奔繼父喪」一條。巴陵方氏藏舊鈔本且於祭祀社稷體例條更多「添支各項祭錢」條殘存七十字。倘諸鈔本率自此帙出，其故安在？茲嘗試辨析之。按此元刻新集所闕之三條，均至大年間條格。劉萬戶條爲至大二年正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祭祀社稷條係至大元年鈔到大德八年四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劄，添支祭錢條亦係至大元年鈔到大德九年八月湖廣行中書省劄。固然新集條例所載以延祐至治二年間條格爲主，但其前木記已明言「及前所未刊新例，類聚梓行」。察元刻中亦有大德十一年蝗蟲生發申報（見戶部勸課

門），及皇慶二年定婚不許悔親別嫁（見戶部婚姻門）凡二條，固不得以其爲延祐以前之檔，而新集中所不當收。按此帙吏部職制門凡七葉俱全，其間並無缺葉。檢諸鈔本劉萬戶條爲丁憂款之末條，倘元刻本原有此條，應刻在第四葉背之末，並於第四、五葉間增出一葉。前已言之，此本刷印稍後，而未嘗增刊至治二年六月以後之條格，且逾年大元通制頒行，更無增刊之必要，則諸鈔本增出之此條，應非元刻本所原有。至於諸本溢出之祭祀一門之二條，因在禮部之末，不能定此帙是否無脫葉，茲從其檔首冠「至大元年鈔到」六字考之。檢新集中於格例上冠「某年某月鈔到」或「抄錄」字樣者不下二十餘處，其中除了二條爲至治元年鈔到外，其餘俱屬至治二年。而至治二年之檔未冠鈔到字樣者僅四條，俱據福建宣慰司劄。由此著錄情形，可以推見新集當始刻於至治元年之秒，陸續收到各地抄錄來之條格而編刋入，故冠以某年月某路抄到字樣。於福建宣慰司新檔或不冠者，以書刋版於建陽，可就地蒐輯也。諸本溢出之二條冠有「至大元年鈔到」字，與原書編輯體例不合，應非據元刻所抄錄。古人讀書，每遇有關資料，補錄其後，傳錄者不察，一體抄入，以爲本文。若此情形，古籍中不乏其例。諸抄本或有溢出元刻之條。當係由此情形而來。陳氏以此而謂孔氏影元抄本非出此帙，尚未得實情也。

是書所載雖皆案牘之文，未免瑣碎猥雜，然採錄繁富，於蒙元一朝開國典章制度，頗可考見

。元史成書倉促，諸志皆潦草殊甚，不足徵一代之典制。而經世大典、大元通制又皆散佚，幸賴有此書傳世，足供治元史者之考研。然四庫館臣以其冗雜，廢棄不錄，故識者譏其識舂香之爲馥，而不知狄蘭之亦芳。傳本既多譌脫，陳校雖精而不便讀，今慰堂院長命以院藏孤本影印行世，以饜學林之渴望，洵盛事也。此書出，沈刻陳校覆瓿可也。此刻爲世所罕覯，故不揣愚昧，詳考是書之緣起與傳本之同異，以就正於讀是書者。　壬子仲秋孝感昌彼得謹跋。

中國圖書史略

任何一個民族，其圖書的歷史，都是圖畫先於文字。在文字發明之先，古人有所見聞，都用繪圖來表達，此所以在山窟石壁往往發現有先民的繪畫。顯見的例證，如現在傳世的山海經一書及楚辭中的天問篇，其原來的著作僅是圖畫，而為後人把遠古遺留下來圖繪的意義，用文字記述下來而成書。迨文字發明以後，文字的記述居於主要的地位，圖畫成為附庸，但仍襲用了圖書這一名辭。

中國的「書」字，是一個形聲字。它的初文僅作「聿」則是一個象形字，象以手執著毛筆的形狀。原意是凡用筆寫的都可以稱作書，換句話說，即文字的記載都是書。後來因為文化進步，文字記載的品類繁多，為了確定它意義的範圍，於是在「聿」下加一「箸」字而成為「書」字。「書」字的古文及篆文都是上半從「聿」，下半從「者」，「者」即古「箸」字。其意為用筆著作的方能叫做「書」，這比凡是文字記載的即稱書，範圍要狹窄得多，譬如金石上的銘文，我們就不便稱它為書。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文字起源甚早，相傳是三皇之一的伏羲氏所創造，也有一說是五千年前黃帝的史官倉頡所發明。有了文字後就應當有記錄或著述的書，祇是商周以前的古籍不僅沒有一部留存下來，就是舊籍中有關三皇五帝古書的記載，尚在疑似之間，不能證實。至於對於上古時代的圖書究竟是什麼形象，也無法考知。現在所能確切知道的，是始於西元前一千三百多年商王盤庚遷都到殷地（現在的河南安陽縣）以後的圖書。自殷商以後，中國圖書的歷史，從它的形制或構成可以區分為下列四個階段：

一、簡冊時代——這一時期始於殷商，直到東漢和帝元興元年（西元前一三八四—西元一〇五年）蔡倫發明紙止，以竹或木作為圖書的主要材料。此外在商代還盛行文字寫或刻在龜甲獸骨上，即所謂甲骨文字；春秋戰國之間，並開始知道用帛來寫書。

二、紙書卷軸時代——始於蔡倫發明造紙，至七、八世紀之交盛唐時代雕板印刷術發明止，以紙來取代笨重的簡冊及昂貴的縑帛，作為寫書的材料。圖書主要作卷軸形，將已寫好的一張張紙粘成長幅，在末端附著一根軸捲起來，以便於收藏。惟因卷軸不便於查檢，開始改進，漸有作「葉子」者。

三、印刷書冊時代——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以拓石及鈐印為先導。七世紀中葉有印佛出現

，旋進而有雕版印刷。印刷技術隨著時代不斷的進步，由單色印刷演進到元代的朱墨雙印，明代再發展有多種彩色的套版印刷。由雕版印刷進而發明膠泥、木、銅等各種活版印刷。書的裝式也因印刷的普及而改進，由卷軸變為葉子，再改為摺疊本、胡蝶裝。由胡蝶裝進步為包背裝、及近代尚通行的線裝。

四、西洋印刷術影響時代——自清同治年間開始，西洋的鉛活字版、石印法，及各種的照相版印刷術傳來中國後，逐漸取代了舊式的雕版及活版。而圖書的裝訂也在西式影響之下，以迄於今。

茲分別概述之。

一、竹木簡冊時代

這一時期的書，以竹或木為主要構成的材料。除了竹木而外，在殷商時代還盛行將文字的記載寫或刻在龜甲與獸骨上，即所謂的甲骨文字；戰國初年並已開始用本來供裁製衣服的縑帛（即絹綢）來寫書，即所謂的帛書或繒書。

簡冊　在紙發明以前的書，使用最普遍的要數寫在竹或木上的簡冊。簡是一種用竹木製成狹

長形的片條，單指一根稱為「簡」，把若干根簡編連起來則叫做「册」（或策）。「册」字的古文也是一個象形字，象許多簡編連起來的形狀。簡製作的材料有竹木兩種。竹簡的製作法：先將竹截成筒，再破成一根根狹長條的簡。這種新竹的簡尚不能即用來寫書，除了要打光它的竹節處外，還需要經過一番修治的過程，稱為「殺青」與「汗簡」。「殺青」者，刮削去竹面的青皮，因為青皮不能固墨，文字容易磨滅。「汗簡」者，炙去新竹的水分，有水分則容易蛀蝕。水份經火炙烤而出，凝在竹面，有如汗珠，故名汗簡。這是兩種不同的修治手續，前人或以為「殺青」就是「汗簡」，似與事實不合。經過殺青汗簡以後的竹簡，才可以繕寫書，故後代以「殺青」一詞比喻著作脫稿。木簡的製作則比較簡單些，將木材解析成條片經乾燥後，即可以寫書。古人製竹簡大抵用肉竹，製木簡則多用松、杉、柳等木材。

簡册的長度，按古籍中記載，通常有漢尺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及八寸三種規格。重要的書如儒家的詩書等六經，皆用二尺四寸長簡大册；次要的如孝經用一尺二寸簡，論語等則寫以八寸簡。二尺四寸的大册，古人尊稱曰典，漢代特別尊崇六經，故用大册書寫。後代習稱經典，即由此而來。近代在武威漢墓中所發現王莽時代的幾種寫本儀禮，各簡的長度皆在五五至五六公分之間。漢尺每尺約為二三公分，五五公分正當漢尺二尺四寸，可證舊籍的記載無誤。用大册寫重要

的典籍，除了有示尊崇的意義外，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六經之文每篇的字數比較多，若用短簡，每簡所能容的字數少，則所需的簡必多，而不便於編冊舒卷。據晉荀勗序汲冢書，晉太康年間所發現的戰國時寫本穆天子傳，及後漢書載曹褒撰的禮書，自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的制度，皆是用的二尺四寸簡。又桓寬鹽鐵論責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是傳記書籍、律文及私撰的禮書，都可寫成大册，則二尺四寸簡，並不僅限於寫六經。除了上述三種的標準尺寸外，據王充論衡稱諸子書為尺書，則又有作一尺者。武威漢簡中的日忌雜占書，簡長二三公分，正漢尺一尺，與論衡所說合。又長沙出土的戰國時代楚簡，長僅一三．五公分，當漢尺六寸。可知古代竹木簡册圖書的長度，除了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三種通制外，還有其他的尺寸。至於何書用大册，何書用短簡，似尚無嚴格的規定，完全看抄寫者的需要。好像現代的圖書，在通常的十六開、廿四開、卅二開等三種標準的版式外，也不乏八開、十八開、四十開等別形異制的書册。

古代的簡書皆是每簡僅寫一行，故簡甚狹。簡的寬度，就武威所出的儀禮而言，在四分之三公分上下，約當四分之一寸。至於前人書中或有稱寫作二行或五行者，皆是詔策或公牘，而非書籍的制度。每簡所寫的字數，據舊籍所記，寫為大册的六經，有作四十字的，有作三十字的，有

廿五字或廿二字的，少的有僅寫八字，而近代出土的武威簡儀禮，大抵皆在六十字上下，但有一本每簡率寫一百餘字，其中一簡多的且至一百廿三字。是以每簡所寫的字數，古代也無規定。固須視簡的長度而定，也要看寫書的人所寫字體的大小。這與後代寫本書或刻本書各書的行款也不一致的情形相同。

古人在著作定稿後，或決定繕寫某書時，即著手用竹木製簡以供抄寫。一篇寫畢後，用絲繩或韋皮像編竹簾似的編成長幅，而後以最末的一根簡為軸將字向內捲起來收藏，這樣一捲古人稱為一篇或一册。內府或貴族藏書講求美觀，多用有顏色的絲繩來編簡。一般士人的書大概只有用韋皮或麻繩來編連。韋是一種柔軟的牛肉皮，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所讀的易經係用韋編，近代居延所出的永元兵器簿七十七簡則是麻繩編連的。編連的方法，通常在簡的上下端各編一道。但遇大册時，也有用三道、四道，甚至多至五道的。例如武威簡古本儀禮，從簡上的遺痕可以看出即曾用四道、五道編連的。為了防止簡上下移動或脫落，古人往往在編繩經過的地方，於其棱角上刻削極小的三角形契口，以固定編繩，在長沙及武威發現的楚簡與漢簡上即可見到。或有以為古代簡册的編連法，是在簡的上端橫穿一孔，再用絲繩或韋皮貫串後束起來成册。按漢劉熙著釋名，解釋書契中的「札」說：「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釋「簡」說：「間也，編之篇篇有間

也」。所謂間，指簡編的簡與簡之間有間隙，即指的竹簾式編法。札才用穿孔貫串如櫛齒的編法。再從近代敦煌、居延所發現的漢代遺物來看，與釋名所說合。那種有如梳子的櫛齒並列穿孔貫串法，僅只施用於策命及公牘，而沒有用之於編書冊者，因為書冊所用的簡數比較多，倘用穿孔串簡法，只能使簡平列，不能舒卷，則不便於收藏。公牘函札或策文的字數少，所寫簡牘不多，櫛比排列，且便於加函縛紮，上加鈐封泥寄遞。故單穿貫孔來編的方法，古代只有函牘及策命等使用，而非施用於圖書。

古代的圖書在每篇文字之後，往往有尾題記該篇的字數。如果該篇有經文有傳注，則或分別記「凡經若干字、傳若干字」。這種計字尾題也為後代所沿襲，如敦煌所出的六朝隋唐寫本及宋代刻本五經的各篇也往往附記經注的字數。此款式不知起於何時？也不悉是著者或編者所載？或是像宋元刻本中刻工在版心記大小數字一樣而為傳抄者所記？但到漢代幾已成為定例，著者往往在敘記中總記全書的篇數及字數，如史記太史公自敘、趙岐孟子題辭、許慎說文解字後敘等即其例。一篇寫畢後，因為係將字向內捲起來收藏，為了便於識別篇第，所以往往在全篇開首的第一、二兩簡的背面書寫篇題及篇次。即在第二根簡的背面寫篇題，第一簡的背面寫篇次。如此方式寫，則捲起來後，背面的篇題及篇次字樣在卷子的最外面，由右而左順讀，即成為「某某篇第幾」。從

所發現武威漢簡的儀禮，可以顯見此格式。古書題篇名大概不出下列兩種方式：一種以書的內容來題篇名，如尚書的堯典、舜典，春秋的十二公等係以所記的事情來題篇；如莊子的逍遙遊、齊物論，墨子的兼愛、非攻，荀子的性惡、正名等等則依義理題篇。這一類依書的內容來題篇；大抵出於著者所自定。另一種非出於自著，而係後人將前人的言行雜記，積章為篇，編次而成，首尾原無一定者，則摘其第一簡開首的二三字作為篇題，如論語、孟子的各篇，莊子的秋水、馬蹄等篇皆是。古書每篇但標篇題，而罕有標大題（即書名）者，因為古書的篇卷本來可以單行。近人葉德輝（一八六四——一九二七）說漢人注本六經，都是小題（即篇名）在上，大題在下，實在是源於六朝而盛行於唐宋的書式，證以武威漢簡及熹平石經，知漢以前並不如此。

用竹木寫字除了簡冊以外，因其用途及形制的不同，還有奏、牘、方版、槧、觚等名稱。用作向皇帝上書的簡稱為「奏」，形狀亦為狹長形，可用木或竹製。「牘」、是公私往來的公文函札，較「簡」「奏」為寬，用木製作，上面可寫數行字。漢代的牘通常長一尺，後人稱信函為尺牘，即由此而來，惟皇帝所用的牘長一尺一寸。「方」就是「版」，用木製作為長方形，每版上多的可寫九行，但也有寫到十餘行，可以容納百字上下。古代多作為官方文書簿冊，私人也有用作記事的。後代雕刻印刷所用的也稱為「版」，即因其形制與古代的方版相似，故名。「槧」是

未經刮削修治的版，長的有三尺，作為臨時記事打草稿用的，修過刮削後，可以製作簡牘。以上數種雖然寫有文字，但用途不是圖書，只有「觚」可以說是古代書籍的另一種形式。「觚」、用木製，其形有三面、四面、六面、或八面，每面皆可以寫字，因其形狀略似飲酒器觚故名。古代多用作抄寫供學童誦習的字書，也有拿來記事的。用作抄寫字書，大抵以一觚一章為標準。古代的字書如倉頡篇、訓纂篇、急就篇等，有以六十字為一章，有以六十三字為一章。觚、每面可寫一行，每面所寫的字數，須視觚的面數而定，或八字、或十字、或二十字、或二十一字不等。古人用觚抄字書者，因為觚可以豎立，放在桌上，可用手隨意轉動，便於兒童誦讀習寫。中國用竹木製成簡牘寫書，至遲在西元前一三八四年盤庚遷都到殷以後就已經開始使用了，雖在紙發明以後，恐怕尚未完全停用，後漢書載安帝初年，吳恢任南海太守時，曾打算殺青簡以寫經書，雖然其事為其子吳祐諫阻未成，可見仍有人憧憬古制的。一直到晉及南朝劉宋時期，公文戶籍尚偶有用札牘者。

甲骨　商代的書，除了寫在竹木簡牘上編連成冊外，另有一種形式即是甲骨文字。存世的甲骨文字是近代在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商王盤庚遷殷以迄紂王亡國二百七十三年間（西元前一三八四——一一一一）的遺物，是三千多年前史官用筆寫或刀刻的真蹟。商人是一個相信鬼神的民族

，殷商王朝每遇有猶疑不決的事情，卽去詢問他們認為聖靈的鬼神，叫做「卜」。卜的方法是用經過製作的龜腹甲、或牛羊的肩胛骨，在內的一面整齊地予以鑽鑿成一直一橫的漕溝，再在鑽鑿處用火燒灼，則其處因收縮而爆裂，於是在另一面（正面）就出現了似「卜」字的裂紋，史官卽依據卜紋的形狀來判斷所卜事情的吉凶。卜完之後，把所問的事情寫在卜兆之旁，寫完又刻，也有刻完之後，再在文字上塗飾硃或墨，以使字跡明顯，這就是所謂的殷墟卜辭。在卜辭的後面，又往往補寫刻「追記」或附記有關的其他占驗事項的文字。近代所發現的甲骨文字，固然絕大部分是卜辭，依據後代對「書」所下的定義，嚴格地說，還不能稱為真正的書。但從已出土的龜版中，曾發現有的在龜尾右下方刻有「冊六」、「編六」、「絲三」等字樣，其上方並穿有孔。孔的作用是備貫穿韋編以防散亂。至於冊六、編六、絲三的字樣則是該片龜版的編號。由此可以推知殷商甲骨文字原來的放置，似皆有一定的順序，而不是隨便敍置的。以韋編貫穿各甲，並編寫順序，與竹木簡牘編冊或後代的書裝訂成冊並無不同。何況甲骨文字中除了卜辭以外，記事的骨簡也有不少，一根骨簡上面的文字且有多到一百七八十字的。所以甲骨文字毫無疑問的，也是殷商時代視作圖書的另一種形制。漢許慎說文解字序說：「著于竹帛謂之書」，而不說甲骨者，因為自周以後卽已不用龜卜，許氏未見到罷了。

帛書　「帛」是用蠶絲織成的絹綢，或名為縑，或名為繒，本來供裁製衣裳的。因為其上可以使墨，故古人也利用來寫書。古代帛的幅度，據近人的考證，每匹以長四丈，寬二尺二寸為常制。寫書時，看字數的多寡需要，隨時裁截一段以供抄寫。寫畢後，在末端附一根軸捲起來收藏，稱為一卷。近人或有因為簡冊也是捲起來收藏，遂對於舊說以為漢書藝文志中所載以卷計的書指的是帛書，而發生懷疑，認為以卷計的書也可能為簡冊。然而我們細檢漢志對篇卷兩個單位名辭區分的相當清楚，凡是圖繪的必以卷計，沒有用篇計者；就是附有圖繪的書，如數術略中著錄的，也都以卷計；倘圖文分開的，則圖用卷計，文以篇計，如兵書略中著錄的即其例。因為簡狹窄，不便於繪圖，圖繪必為帛書。如果原書本來是簡篇，內府改寫為帛書的，則漢志必篇卷並記，例如爾雅著錄為三卷二十篇。故古書稱篇的必係指的簡冊，稱卷的當是帛書，應無可疑，不因簡冊也係捲起來收藏而稱為卷。

用帛寫書開始於什麼時候？現尚無資料可以確考。按論語中記載子張曾把孔子所說的話，臨時寫在他束腰的帶子上。可以推見春秋末年很可能已有用帛寫書的事實，故子張在未攜帶簡牘時，得以臨時仿效，利用腰帶作記錄。墨子的書中常以帛與竹並稱，則在戰國初期用帛寫書已經相當的流行了。現在存世的有一九三八年在長沙古墓中發現的一塊戰國時代楚國的帛書，中為文字

，四周彩繪十二月的神像，從此遺物可以略窺古代用帛寫繪圖書的大概。帛比竹木簡牘要輕便，但古代帛貴，故在使用上仍不如竹木普遍。用帛寫書歷秦漢，直到紙發明後，尚未即廢止。東漢時，有錢的人仍多用縑帛代紙，民間的習俗尚以用紙寫書送人為不恭敬。晉初荀勗領秘書監時，曾主持整理繕抄內府藏書，據史書記載，說：「書用緗素」，則知晉初內府尚多用淡黃色的帛來抄書。此後用帛寫書的事，雖未見於記載，但唐宋時代，名家揮毫作書，仍不乏用素牋的，尚是古代帛書的遺制。

寫書的工具　古代寫書所用的工具，除了甲骨文字需用銅刀契刻及塗飾或圖繪需用丹砂與其他顏料外，一般常用的則有毛筆、墨、書刀、鉛等。因為中國自來相傳有秦代的將軍蒙恬造筆之說，遂對蒙恬以前究用什麼工具寫字，不免生出種種的臆測。或因漢晉人著作中形容古書有蝌蚪文漆書的記載，於是以為先秦時代的筆必係竹梃，蘸漆在竹木上寫字。或因漢人常用書刀，於是以為古人必用刀代筆，在竹木簡牘上刻字。姑不論中國筆字是一個象形字，象以手執著有毛穎的筆，也不論近代在殷墟發現的實物足以證明殷商的文字必係用毛筆書寫，即在先秦的古籍；如爾雅、詩經、莊子等書中皆不乏用毛筆的記載。惟是先秦時代的毛筆，據晉人崔豹在古今注一書中解釋說，係用兎毫竹管製成，蒙恬始改進用枯木作管，其毛穎部份，中心用鹿毛，外層用羊毛，僅

是在製作原料及技術方面的改良，並不是毛筆的最初發明者。近代在居延、武威所發現的漢筆，與崔豹所說大致無殊。古墨、大概是用松烟製成的丸墨。鉛是供臨時記錄或打草稿用的，有如現代的鉛筆，不過古人用鉛塊。西京雜記記載揚雄經常攜着鉛及槧，隨同上計的官吏，沿途採訪記錄各地的風俗與方言。書刀又名「削」，是一種鋒刃向內的小刀，古人用備刮削簡牘上誤寫的錯字，以便在原處改寫正字。史記稱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筆謂記敘，削指刪削，並不是用來代替筆刻字的。

二、紙寫卷軸時代

用竹木製成簡牘寫書，固然價廉易得，但太過笨重，僅僅一部六經的正文，即需用一二輛馬車來載運。縑帛雖輕，惟其價昂，雖西漢內府的藏書，也不能全部用帛抄寫，更何況一般的讀書人。為了促進文化的發展，於是有紙的發明。

紙的發明　造紙術是中國對於世界文化的一項重要貢獻。按中國歷史的記載，紙是湖南桂陽人宦官蔡倫在東漢和帝元興元年（西元一〇五年）發明的。但根據其他的文獻，早在蔡倫以前一二百年自西漢，就已經有名為「紙」的物品存在。蔡倫以前的紙，是古人製造絲棉的一種副產

品。在水中漂擊蠶繭製作絲棉時，沉澱有殘餘的廢絲纖維。這些廢絲纖維用蓆子從水中提取出來，即在蓆面結聚薄薄的一層，俟稍乾揭下，則成絲紙，即古人所謂的「方絮」。故原始的紙是絲製品，薄而幅面小，產量也很少，用途不廣，恐怕還不能充作寫書的材料。蔡倫即在此製造絲紙舊有的技術基礎上，改良用樹皮、麻以及用過的破布舊漁網為原料，以替代絲，製造純植物纖維的紙實驗成功，因其價較縑帛或絲紙低廉甚多，也比竹木簡牘輕便，故天下莫不從用，而以紙的發明歸之於蔡倫。竹與帛在紙發明及普遍以後，雖然在中國歷史上仍沿用了一段不算太短的時期，但終歸於淘汰。

紙書的形制　紙寫圖書在形制上，承襲了簡冊與帛書兩者。漢晉時代的紙幅大小如何，尚乏記載可考。唐代的紙幅，據宋程大昌演繁露引唐李義山集新書序，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為邊準，用十六行式（原註：言一幅解為墨邊十六行），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李商隱所說的紙幅可寫十六行，行十一字，雖與近世敦煌所出六朝以至唐代的寫經紙幅，不完全相同，但是字有大小，李氏所指的或是通常的情形。唐以前的紙幅就前代的記載及近代的遺物來看，大抵高不過一呎，寬不過呎半，古紙的幅度，大概也與之相若。為了模倣帛書的形制，於是將若干張紙以漿糊粘成長幅，在末端也附一根軸捲起來收藏。為了便於直行書寫，使行與行有間隔空隙，以鉛將紙上

下劃線分別界欄，即唐人所謂的「邊準」，宋代所謂的「解行」，明清以來所稱為「絲欄」的，實係簡册的遺制，展開卷子，一行行的文字，就好像簡牘的編連一樣。

紙寫卷子的軸有竹製、木製、稍講究的則用漆或琉璃，甚至有鑲以象牙或玉的。為了保護卷軸以防磨損，則在卷外包裹以「帙」，「帙」、即書衣，通常以布或綢製作，敦煌所出唐代卷軸中也偶有用細竹簾為書帙的。古書卷數較多的，大概以十卷為一帙，小部頭的書也可以三五卷或僅一卷為一帙。不過集許多卷為一帙的帙，似乎不是裹在卷軸外的書衣，而是套起來的書囊。梁阮孝緒七錄序說：「晨光纔啓，湘囊已散；宵漏既分，綠帙方掩」。別囊帙為二。惟自東晉以後計圖書的數字皆云「若干帙若干卷」，而不以囊為計算單位，或囊亦可名帙，但形制似與包裹一卷的書衣不同。唐韓愈贈李泌的詩有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所說的「牙籤」，是古人為了便於檢取，在卷軸上懸掛上寫明書名卷數的象牙製作的籤牌，以資識別，有如後代的書籤。印刷術發明後，卷軸變為書册，書帙及籤牌廢而不用，但自宋以來書畫卷軸的典藏仍保存了這種形制。

古代造紙，為了防止蛀蝕，多用黃檗樹木的汁來染紙，謂之「裝潢」。後代以裝潢解釋書畫的裝裱，則已不是它的原義了。黃檗是芸香料的喬木，其致用能避蠹，故古人用來染紙，所以古

紙多呈黃色。因為紙多為黃紙，古人抄寫書的時候遇有寫錯的地方，恐怕刮洗傷紙，貼紙又容易脫落，遂用雌黃塗抹在寫錯的字上面。雌黃是一種礦物，與雄黃相類，其顏色與裝潢過的紙色相似，可以塗滅字迹。故古人用來校書，而後將改正的字寫在所塗的雌黃之上。猶如現代作水彩畫，在畫錯的地方塗上鉛粉，而後再畫的情形一樣。晉代的王衍善於談論，遇到自己引經據典有引錯了的時候，輒隨口改正，當時人謂為「口中雌黃」，乃拿校勘圖書來作比喻。後代常用信口雌黃一語來形容人胡亂發言，則已經失去了雌黃原來的意義了。

圖書形制的改進　紙寫卷子圖書比起簡冊來固然是輕便得多了，只是一卷書往往長達丈餘，閱讀起來，舒展及捲起來相當的麻煩費事。假如從頭到尾順讀，舒捲的麻煩倒也可以容忍。倘若僅需要查閱卷子中間或卷末的一段文字或一句話，勢必要將卷子前面的部分完全解散，這就很少人有耐心了。古代有幾種僅供查檢的書：一種是類如現代的字典的字書，譬如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梁顧野王的玉篇等；一種是類似現代百科全書的類書，如曹魏時編的皇覽、梁劉孝標的類苑等；再一種為韻書，如陸法言的切韻、孫愐的唐韻等。前兩種查檢的時候尚比較少，而後一種，在詩學發達的時代如唐代，則使用頻繁。唱酬詠哦之時，需要隨時翻檢。卷軸式既不便於查檢，乃不得不謀求改良。改良的第一步則是變為「葉子」。

葉子　自紙發明以後，中國的圖書都作卷軸形。但尚另有一種外國裝式的書，傳來中國的也不少，那就是印度的貝葉經。唐代以前，印度尚不知造紙，其國的佛教經典都是用所產的貝多羅樹葉裁成長方形，經過製作後來抄寫的。積若干葉後，上下用夾板，再以繩縛紮，稱為一夾。東漢以來印度或西域的僧人來中國弘法，或中國的和尚往印度求經，所攜來的都是這種貝葉經。如北齊文宣帝請那連提黎耶舍翻譯佛經，將宮中所藏梵本一千餘夾送往天平寺中（續高僧傳卷二），唐玄奘法師自印度運返的佛經六百五十七部、五百二十夾（慈恩法師傳），即是例子。這種一張張單葉的經，如果查某一段，只要查出那一葉就可以了，毋需像卷軸一樣前面不看的也要解散。中國卷軸圖書的改良，第一步即模仿印度貝葉經式，不再將一張張的紙粘成長幅，只要保持原來的單張積起來收存，這就是宋人所謂的「葉子」。中國的圖書為什麼稱一張為一葉，即源此而來。「葉子」既是一張張的散葉，必須加以裝置，才不致容易散失。裝置的方法，一種可能仿印度貝葉經用夾板，另一種則用函裝。「函」的本義為容，有如盒子，可以盛物的積也可稱函。古代有所謂玉函、石函，都是用來盛裝珍貴的物品。至於到什麼時候始借用這個名詞來作為圖書的一種裝置？葉德輝氏認為自南朝蕭梁時改卷軸為摺疊本以後，裝書始用函；並且說當時護書的帙，應當叫做函（書林清話卷一書之稱函篇）。他認為用函裝書起於改卷軸以後，誠然頗有識見

，但他以為摺疊本始於晉代，並由此推衍說蕭梁以後的書帙應當稱函，則是他對於「本」字的誤解，而作的揣測之辭，實不足信。「帙」是用作包裹卷軸，「函」是用作盛置圖書，二者的意義及形制並不相同。而且在唐以前只有書帙，並無書函的記載。根據文獻記載，用函裝書最早起於唐。唐代詩人孟郊（七五〇—八一四）讀經詩云：

垂老抱佛腳，教妻讀黃經。經黃名小品，一紙千明星……拂拭塵几案，開「函」就孤亭。

儒書難借索，僧籤饒芳馨。（孟東野詩集卷九）

用函盛書，當在改卷軸為葉子以後，後來書册盛行，尚一直沿用這種方式來保護圖書。

「葉子」起始於什麼時候？尚無記載可考。宋代的歐陽修在所著的歸田錄中說：唐代中葉以後流行有一種供遊戲的葉子格，這種葉子格是模仿供查檢用寫成葉子形式的圖書而作成，故名。根據他的說法，葉子格既係仿葉子而作，則葉子的起始必較早，至遲應當在唐中世以前。再從其他的種種跡象來看，大約在唐代初年，中國的圖書就已有改成葉子式的了。依唐釋道宣的續高僧傳及宋釋贊寧宋高僧傳中，記載自唐太宗貞觀（六二七—六四九）以後的和尚讀佛經，每每以能通若干紙來計數，這與所記唐以前的和尚讀經以卷計不同。若干紙固然尚不能就說是葉子裝的若干葉，但與葉子制的通行，不能說毫無關係。又按釋法聰傳載：貞觀廿一年法聰法師應海鹽縣的邀請，前往講涅槃經，在他講畢後，遺留下幾紙經書。假如他的涅槃經是卷子的話，一卷首尾相

連，當不致會遺下幾張紙，可見必為散葉，才有遺落的事情發生。再據釋一行傳載：一行奉玄宗詔，入宮對玄宗說自己的長處，惟能強記。於是玄宗命取宮中的書籍給他看。傳說：「行周覽方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唱數幅後，帝不覺降榻稽首曰：師實聖人也」。說一行「覆其本」，而不說他掩卷。下並云「唱數幅」，可見內府的圖書也有作「葉子」式的。此類的例子在唐人著作中還很多，足以證明「葉子」制在初唐已開始有了，盛唐以後漸漸推廣。

唐代的「葉子」，雖說是仿自印度貝葉經，但形制則略有變通。貝葉經的形式，因貝多羅樹受天然的限制，為狹長形。而梵文是由左而右橫寫，所以形成上下較窄的扁狹長方形。但是這種形式，對於由上而下直行的漢文字，寫讀起來就不太適宜了，故唐代的葉子不能不變其制。依據前人的記載及近代發現的遺物來看，大約有兩種形式：一種雖然作扁長方形，但上下比貝葉經加高，寬與高的比例約在二比一以至三比二之間。唐代紙幅高寬的比例亦約為三比二，由此推想唐代的葉子，大概就是以一幅為一葉。因為這種葉子的紙幅寬大，為了便於藏檢，唐人多採用硬黃牋。例如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八著錄的唐貞元十一年釋義道手寫的法華經，及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卅八寫韻軒記一文中，說到他曾見過唐仙人吳彩鸞手寫的韻書三四部，這都是唐代的葉子，而皆云：「硬黃書之」。所謂硬黃牋，據宋人書中記載，是將紙放置熱熨斗上勻塗黃蠟，使其透明，

本來是供臨摹書法用的。而唐人以葉子寫佛經及韻書也往往用硬黃牋者，似乎是取其比較硬挺，適宜於翻閱收檢。好像後代的書畫，作册葉裝置時，必裱在較硬的紙上一樣。

葉子的另一種形式，除了尺寸較小而外，與貝葉完全無異，所不同的只是變貝葉經的橫式改為直式，成為上下高濶，左右狹窄。如清乾隆十一年四川潼川琴泉寺寶塔中所出，王蜀時代（九一九—九二五）宰相王鍇手寫的葉子法華經，每葉五行，行十六字，見藝風藏書續記卷二。又敦煌所出，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的西元九五〇年印本陀羅尼咒七葉，係從一塊雕板上印成而後裁開的。上面所舉的二件貝葉式葉子，雖皆是五代時的遺物，不過五代時所流行的這種裝式，很可能淵源於唐代。唐天才詩人李賀送朋友沈亞之的詩，有云：「白藤交穿織書笈，短策齊裁如梵夾」（歌詩編卷二）。李賀卒於憲宗元和十一年（八一六），年僅二十七。沈氏的藏書既有「齊裁如梵夾」的，可見中唐時代已經有人把書裁成貝葉式的葉子來收藏了。

「葉子」比起卷子來，無疑地查檢起來要方便得多。但是它不像卷子是將紙黏連成長幅，當然比較容易散失錯亂，所以法聰法師在海鹽縣講涅槃經，才會遺下幾張紙。因之唐釋玄逸曾喟嘆的說：「若鍵度失其次葉，猶禮記脫錯先後」（宋高僧傳卷五玄逸傳）。葉子既有此缺點，故歐陽修說，凡有常備檢閱的書，始用葉子來寫，這恐怕是葉子不太流行的主要原因。於是又從而改

進，這種改進，係沿着兩種不同形式的葉子分途發展，由貝葉式的葉子演進成為摺疊本，幅葉式的葉子則進步成為宋元通行的蝴蝶裝。這時雕版印刷術早已發明，並且相當地普遍了，但卷軸裝式並未卽廢，後代的書還偶有採用者，北宋開寳年間所刻印的大藏經，及金代平水地方所刻印的趙城藏經尚彷古作卷軸式，此後則只有書畫沿用了。

三、印刷書册時代

用紙寫書比起竹木簡册來當然要輕便得多，但用手抄寫費時，終究不能大量的生產，以使知識普及。根據隋唐時代的高僧傳記中記載，那時似乎有一種專門職業——寫經生存在，他們抄寫同一部佛經動輒以千百份計，而且抄寫的索酬也並不低，寫一張紙，多的要到二百五十錢，少的也要數十錢。在這種人力財力浪費的情形下，自然會有人想到如何用複製的方法以替代重複的抄寫。佛教信徒是很重視作功德的，佛教所謂功德，卽修善行以祈福。作功德的方式很多，雕塑佛像、抄寫佛經來施捨於人供養誦諷，也是功德之一。豪富之家可以請人抄寫塑雕，無錢無勢的人則希望有廉價的代用品。自六朝以來，佛教在中國非常的盛，在這種情形下，印刷方法的產生是很自然的事情。

印刷術的前驅　印刷術的發明，是中國對於世界文化的另一項重要貢獻。印刷術能夠在中國最先發明，則不能不歸功於中國已有的兩項技術基礎，即是拓石與鈐印。中國至遲自殷商以來就習慣用印章作為憑信。把姓名或職銜寫成反文刻在木石玉銅或象牙上成為印章，印章初期施用於封泥上作為封緘之用。到用帛及紙發明以後，則蘸朱色印泥鈐在帛或紙上。無論是鈐在封泥或帛紙上，原來的反文則成為正字。後來道家的符籙也有刻成印章式而施於封泥的。到東晉時，印章發展到且有長至一尺二寸，寬二寸五分，以及上面刻的文字有多到一百二十字的，這種大印章幾乎與後來的雕版相似，只是那時僅知道鈐蓋，尚不知道刷印的方法。

把文字正寫刻在石碑上，在中國發生也很早。現存最早的石刻有先秦時代的石鼓文、詛楚文，秦始皇以後刻石紀功的事情較為普遍。東漢末年且有把儒家的經典刻在石碑上，作為官校的定本，豎立於洛陽太學門前，以供全國讀書人來校勘或傳抄。曹魏正始年間又重刻過一次。至遲到了南朝蕭梁時代（五〇二－五五七），有人想出了用紙墨拓取石碑上文字的方法。將紙覆在碑文上，用棉球蘸墨在紙上細打，然後揭下，即成為墨底白文的拓本，即唐人所謂的「打本」。唐代甚至有專門為了打本而將文字刻在石碑或木板上的。「打本」在技術方面雖然與雕版印刷不同，但對於墨的使用多少可以提供一點技術。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無疑地就是在上述兩種技術聯

合運用下所產生的。

印刷術的萌芽　中國的印刷術究竟起始於什麼時候？史册上沒有明白的記載。因之自來的學者有各種的推考，早的有謂始於東漢靈帝時的，其次有始於北齊之說，以及始於隋代之說。固然我們並不能武斷的說，印刷術不可能起始於隋代以前，但上述三種說法立論的根據，實在是前人對於古籍文義的誤解，在未獲得進一步的證據以前，尚不可信。在中國現存的文獻中，敍及印書的事，最早不過九世紀初期的中唐時代。現存記有年代最早的印本書，是敦煌所出，現藏大英博物館的唐懿宗咸通九年（八六八年）王玠刻印的金剛經。但這一件印刷品的印刷技術已是相當的進步，顯非早期的印品，必定經過較長時期的演進，始克達到如此的水準。另外在敦煌及新疆境內所發現的唐代遺物中，似乎有較早的印本，但尚無法考出其年代。故對於中國印刷術起源的時代問題，只有尋求旁證來推測。鄰近中國的日本與韓國，是接受唐代文化薰陶最深的兩個國家，都曾派遣許多學生到當時的首都長安留學，歸國時多帶回了書籍。有的見於記載，如八六五年宗叡回國，攜帶了一百四十三卷書，其中有抄本書，也有印刷的書。日本現存最早的印本，是由稱德天皇於七六四年下令着手，迄七七〇年印畢的百萬塔陀羅尼經，而由曾在長安留學達十九年之久的東宮學士吉備眞備所主持。吉備之建議以印刷來代替手寫，極可能他在留學期間曾目睹這種

新方法，而回國仿效。韓國現存最早的印本是一九六六年在南部光州的盤谷寺內寶塔中所發現的達摩經卷。據考證此寺建造於七五一年，寺內的寶塔及所貯的佛經當亦在同時建造印成。達摩經是由曾在長安留學了廿四年（六八〇—七〇四）之久的新羅和尚彌陀仙用漢文譯成。以新羅與唐代文化關係之密切，經文由留學中國的和尚翻譯，則此經之雕印也極可能是受中國的影響。由此旁證來推測，中國印刷術的起源，至遲不會晚至八世紀初葉盛唐以後。

在中國現存的印品中，固無早於盛唐的實物，也無印書可信的記載。但據文獻，在唐代初年却有印佛像的事。唐馮贄雲仙雜記卷五引僧園逸錄說：「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衆，每歲五馱無餘」。雖然雲仙雜記一書，前人對它懷疑的很多，以為是宋人偽撰託名的。但據唐釋慧立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載玄奘法師曾「造像十俱胝」。俱胝是梵文中一個數目字的釋音，據一切經音義解釋為一億，即一千萬，也有解釋作十萬或百萬的。不論俱胝作十萬、百萬、或千萬來解釋，十俱胝總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造十俱胝的像當然不可能是雕像，也不會是繪像。因為據玄奘法師傳中所述的雕像最多不過二百餘軀，繪圖最多也只有一千幀。造十俱胝的像絕不可能為雕像或繪像，只有一種情形，用印刷的方法，才可能有那麼許多。故雲仙雜記引僧園逸錄所說玄奘印普賢像施人的事，實與玄奘傳的記載契合。我們不能因為這部書的作者，有出於宋人偽

託的嫌疑，而連它引錄的記載也不相信。

玄奘用什麼方法印成普賢像，我們根據敦煌所發現的唐代遺物來參證，似乎即是將佛像刻成印章式樣，蘸墨鈐蓋到紙上，印成佛像，尚不同於雕版印刷。在方法上雖然還不脫印章使用的範疇，但是在人類的思維上，卻有了不同的意義。由僅是憑信的作用，演進到可使圖像印製迅速的概念，不能不說是思想上的一個進步。雖然距離文字的印刷，可能還有一段歷程，但有這種思想作為動力，相信不會太遠了。玄奘法師生於隋開皇二十年（六〇〇），卒於唐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若說在第七世紀結束以前，中國雕版印刷術就已經開始萌芽了，應該是可相信的。

印刷術的普及　在西元第九世紀中晚唐時代，雕版印書的風氣，已經相當的普遍了。自刻書的地域來說，見於記載的，至少有四川、河南、淮南、浙江、江西、陝西，幾遍及於黃河長江流域，且遠至西陲敦煌，也有雕版印刷的事。自雕印的範圍來說，除了佛教的經咒而外，有詩集、曆書、字書、小學、以及陰陽五行一類數術的書。不僅是短篇的民間通俗印刷品，甚至大部頭的，士人必讀的小學書，如五卷的廣韻、三十卷的玉篇，都曾印過。那時雕印的技術，我們可從敦煌所出八六八年王玠印金剛經卷子見到。其印刷之清晰，字體的遒勁，卷端圖像雕刻的生動，足覘已經相當的進步，決不是短時間的發展就可以達到這種水準的。唐代利用這種新發明的印刷術

出版圖書，尚只限於私人。官府的雕印書籍，要到五代時才開始。五代後唐明宗皇帝滅前蜀以後，曾想稽古右文，踵漢唐的盛事，雕刻石經，豎立於國子監。但終因政府的財政支絀，才由宰相馮道建議，改委國子監用木版雕刻印刷。這項工作，從明宗長興三年（九三二）開始，直到周太祖廣順三年（九五三）才畢工，前後經歷了唐、晉、漢、周四個朝代，費時廿二年。所雕印的除了九經三傳以外，並附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種。稍後，在顯德六年（九五九）國子監又刻了一部經典釋文。五代國子監刻印九經三傳，的確是中國圖書史上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這是官刻圖書之始，也是儒家經典有印本之始。因爲政府採用雕版印刷術的鼓勵，使得印刷業更得發展而愈臻於精美，開兩宋官私印書之盛。

摺本與胡蝶裝　當印刷術萌芽之初，中國書裝因卷軸不便於查檢，於是有改作「葉子」者。然「葉子」容易散失錯亂，不得不再作改進。新的改進的進行，則在印刷術普及以後。宋羅璧識遺卷一說：

> 唐末年猶未有摹印，多是傳寫，故古人書不多而精審。作冊亦不解線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概粘之（原註：猶今佛老書）。其後稍作冊子。

羅氏的意見，書裝的演進，在唐代末年先有摺本，後有冊子。但考諸文獻，似不相合。按北宋初

年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四載：

盧光啓策名後，狀歷臺省，受知於租庸張濬。清河北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八行重疊別紙，自公始也。

此處所謂的重疊別紙，當是後代奏摺的濫觴。中國的奏議書疏，在唐代以前，都用卷子，所謂的「行卷」，盧光啓始改為摺疊。張濬征并汾事，按史書記載在大順元年（八九〇年），與羅氏所說的唐末合。惟盧光啓改書疏為摺疊，不知係受圖書形制變遷的影響，抑圖書受彼之影響而改變，因無資料可考，然其先後應相距不太遠。而冊的出現似稍早。「冊」字、本來是簡牘時代圖書的名稱，將許多根簡編連起來才稱作冊。卷軸時代此名詞已廢而不用。後代借用這個字再作為圖書的名詞，根據它的原義，必定是在將書葉連訂在一起以後。所以我們習稱散葉謂之葉，積若干單葉合訂才叫做冊。唐代的葉子係散葉，尚不知道合訂的方法，故還不能稱冊。考記載後代書冊最早的資料，是范攄所著的雲谿友議。其書卷中載劍南西川節度使張延賞的女婿韋皐離川東遊，張延賞贈送他七匹驢子馱載的物品，以壯行色。然而皐每到一驛站，即附遣還一馱。行經七驛，將張氏所送的物品，全部送還。他隨身所帶的，僅其妻所贈的粧奩及他的書「冊」而已。這段記載已用「冊」字形容韋皐所帶的書。韋皐在德宗貞元初（約七九〇年）代張延賞為劍南西川節度

使。范攄是僖宗咸通時代人（九世紀中葉），即令章阜攜帶書冊東遊的事不確，而范氏已用「冊」字形容圖書，則其時必已有將書葉連訂成冊的事實。其時代似比摺疊本稍早。

摺疊本是由貝葉式的葉子發展而來，其裝置法：仍將紙粘成長幅，但不作成卷軸，而摺成像貝葉式的狹長形，可以迴環翻閱，宋人或稱為「旋風葉」。敦煌所出唐人寫本波羅密多經現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者，現雖改作卷子式，但其中每六行即有一摺痕，知原本必作摺疊式。又所出五代漢乾祐二年刻本佛經，現藏大英博物館，亦為摺本凡六葉。此種裝式入宋以後只有釋藏及道藏尚採用，故又名經摺裝或梵夾本。直到明萬曆間嘉興楞嚴寺募刻大藏經，改作方冊。摺疊本大抵每五行或六行為一摺，刻本書約每版五摺，在版心之中刻記版數。

「冊子」則是從幅葉式葉子演進而成，唐代中末期冊子的裝訂法不詳。五代以後，採用已廣，五代國子監所雕印的九經三傳，據五代會要載即作冊裝。惟五代監本已無傳，不能詳其裝式。現存南宋初覆刊北宋舊監本爾雅，王國維跋其書，認為其行款大小與唐人寫諸經卷子，一一相近，云是五代舊式。但覆刊本有版心以記書名卷葉數，與敦煌所出五代刻本版式不同。法國伯希和教授在敦煌石室獲得了五代時雕刻的切韻殘紙十六葉，每葉三十四行，每行的字數有廿四、廿五、廿七、廿九及三十等五種，係五種不同的版刻。裝置的方法是字向裏對摺，有如宋代的胡蝶裝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五代刻本中間沒有版心，以卅四行爲一版，每版的版數刻在每葉正文的最後面。從而知道五代刻本的版式，假如不由中間對摺起來，卽是唐代的幅葉式葉子。字向裏對摺，積若干葉而包以封面封底，用糊粘連，卽成爲宋元盛行的胡蝶裝。五代監本的裝式，恐怕亦爲如此。入宋以後，殆因摺疊處易損傷文字且不易整齊，於是在中間留一空行，刻記書名卷數葉數，卽所謂的版心，其間並刻魚尾以作爲摺疊的準心，又在邊欄的左上角附刻一小匡，內刻篇名，以便查檢，卽所謂書耳，胡蝶裝始發展完成。

活字版的發明　雕版印刷術經過了至少三百年的演進，又在政府的倡導下，到了宋代更加普遍起來，官私書坊刻書極盛，私家且有父子世業的。刻書的範圍，經史子集四部之書無所不包。多請書家手寫上版，刻工亦爲專業，雕鐫精美。上焉者印以桑皮紙，次者以麻紙，而校勘也謹慎，故宋版書爲後代所珍貴。宋代除了雕版印刷以外，又發明了活字版印書。

北宋仁宗慶曆年間（一〇四一—一〇四八），有冶金工人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其方法是用製造陶瓷的粘土雕刻若干常用單字的字印，字印甚薄，約二公厘厚，放在火中燒使其堅硬。另預備二塊鐵板，先在上面鋪滿一層松脂、臘、及紙灰之類的東西。要印書時，則取一鐵製的匡範放置鐵板上，乃檢膠泥字印排滿鐵範爲一版，持往火上烘，俟臘脂稍熔軟，再用一

平版放在字印上壓按，使字印的表面平整，下部則為臘脂所凝固不動。一板印刷，另一板排字。俟此板印畢，第二板字已排就，如此循環交替。印畢的板，又放置火上使藥熔，用手將字印拂下，可供再排版之用。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預備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的字印，依韻分別以木格貯放。倘排版時遇有稀見而未具備的字，亦可隨時雕刻，用草火燒製。這是中國用活字印書之始，比歐洲谷騰堡活字版要早四百年。可惜宋代活字印書現在沒有傳世的，不能覘其印刷的精美如何。

膠泥活字版的演進　自畢昇發明膠泥活字版，後代頗有模仿製造的，如元代初年有姚樞教他的學生楊古仿製畢昇活字印書。除了仿製以外，也有研究另行設計改進的。大約在宋元之際，有人在版上不用松脂臘紙灰，而改塗以稀瀝青，在上面排燒熟的瓦字印書。或有人不用鐵範，而用泥範，界行內用薄泥以代替松脂臘或瀝青，將熟瓦字排就後再放入窯內燒成整版來印書。這些新設計，因前人記載不詳，故不悉其效果如何，就常識判斷，似未必勝過畢昇的活版法。明代未聞有製膠泥活字版印書的，入清以後，其法漸廣。康熙末年有山東泰安人徐定仿畢昇法，並加釉製成了瓷活字來印書。道光十年（一八三〇）有書坊七寶轉輪藏用膠泥活字印刷了一部南疆繹史勘本。而製作較精的則為安徽涇縣人翟金生，他化了三十年的時間研究實驗，製成了一套十多萬字

的膠泥活字，字體分為大、中、小、次小、最小等五號。其特色是字印非雕刻，而以木刻字翻成銅模，再用銅模灌膠泥燒製。道光廿四年（一八四四）製造完成，開始排印書。清代膠泥活字印的書，現尚頗有傳本，其精美決不遜於銅木活字印本。

木活字的發明　自畢昇以後，約在元初又有製作錫活字印刷的，並用鐵條嵌在盥內作介行排字印書，但金屬活字難以刷墨，往往印壞，故錫活字的試驗未能成功推廣。元成帝元貞元年（一二九五）有山東東平人王禎任旌德縣令時，發明了木製活字印書法。他把他設計的木活字印書法詳細地記載了下來，附在他所撰的農書後面。其特色倒並不是刻字、排字、介行等方法，而是他新設計的檢字韻輪。在他以前的活字印書時檢字排版，皆是將字印依韻分貯於木格中，由排版的人按韻去覓字。韻母既多，排貯的面積較廣，排版的人須來回奔走以檢字。王禎設計了一種韻輪，用較輕的木材製作大輪，輪盤的直徑約七尺，中貫一輪軸，軸高約三尺許。另用大木鑿孔，上作橫架，中間貫穿輪軸，下置一臼，以承輪軸，可以轉動輪盤。輪盤用圓竹間隔成若干小格，依韻編號排列活字。通常製成兩個輪盤，排版時，一人中坐，可左右轉動輪盤檢字。其優點為可使字就人，而非以人尋字。如韻內所沒有稀見字，可隨時令刻工添補。印畢撤版，也可用此法將字印歸還韻輪原處。自王禎發明木活字後，明清兩朝仿製的很多，較著名的大書如清武英殿聚珍版

叢書及續資治通鑑長編，即用木活字印成。

銅活字的淵源　宋元有膠泥及木活字的發明，入明以後，又有金屬銅活字的推廣。用銅製活字印書創始於何人，現尚無可考。死於嘉靖六年（一五二七）的祝允明嘗說：「自沈夢溪筆談述活版法，近世三吳好事者盛爲之」。祝氏此語殆指無錫華氏會通館、尚古齋、及安氏桂坡館等數家大量用銅活字印書而言。現存銅活字印本記有年代最早的，是弘治三年（一四九〇）華燧會通館印的宋諸臣奏議。然華氏印書序文中並未說他創製銅活字。與他同時而稍後的華珵、華堅、安國等人的印書序中也未把銅活字的首創歸之於華燧，如在其前必已有用銅活字者。近代傳世的活字印九行十七字本唐人詩集尚有若干，亦係銅活字印頗精，惟無序跋，不詳其時代，據鑒定約印於明成化弘治間，然確否無考。中國的東鄰朝鮮，在明代初葉，是用銅活字印書最盛的國家。據云在十三世紀中葉，當中國南宋理宗時代，即曾鑄活字印書。而在十五世紀之初，更大量的鑄造銅活字印書，故近代學者多推測明代銅活字的推廣，或受朝鮮的影響。

朝鮮的銅活字是以字模澆銅鑄字，中國的銅活字究竟是鑄是刻，前人衆說紛紜。然就事理來推度，銅質堅硬，鐫刻費時費力。且每副銅活字，輒以萬計，如一一雕刻，則不合用活字印書的經濟原則。倘從字範中鑄造，則快捷省事。故邵寶所撰會通君傳，稱華燧「範銅板錫（鑄？）字

」，較為可信。自弘治以後，以銅活字印書曾盛極一時，僅就現存及可考者計之，已近百種，其中且有多達一千卷的太平御覽。清初則有內府於康熙雍正間印行多達一萬零四十卷的古今圖書集成。乾隆以後則罕聞，殆因銅價較貴，故以活字印書者改用木及膠泥的緣故。

中國以活字印書，創於北宋畢昇的膠泥活版，歷代皆遞有發明改良，然活字版在中國終不如雕版印刷之普遍。推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中國的單字太多，雕為活字，所需準備的字亦多。因字數過多，故檢字亦較費事。不如西洋拼音文字，僅只二十六個字母，刻字、鑄字、檢字具較省事。故西歐活字版發明後，雕版印刷即廢而不用。二、活字固然可以反複使用，印刷所需的時間較少，如以印刷一次的成本而言，自較雕版為輕。然前代一次所需的印數有限，譬如萬曆二年（一五七四）福建以銅活字擺印的太平御覽，在版心註明僅「印一百餘部」。因活字版印後即拆版，倘再有需要，即需重排。不如雕版，雖初期成本較高，然版片可以貯存，以供再需要時印刷，無須一次印就積壓成書。就長遠而言，成本反較活字版為低。五代時、孟蜀的宰相毋昭裔曾自雕刻了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諸書版。初雕印時，他的親友多嗤笑他浪費。入宋以後，他的子孫靠著這些書版刷印出售維持生活，家業尚稱富饒，當年嗤笑他的人反向其家借貸。中國雕版多用棗梨木材，質地堅實，歷久不壞，一版雕成，往往可印數十百年。即此一例，可以想見雕板

印刷得以在中國歷八九百年而不為活字版所取代的原因所在。

雕印圖書的演進　自五代國子監雕印九經三傳後，促進了圖書出版事業的發達，也推動了學術文化的勃興。兩宋國子監繼承了五代的事業，大量的修纂刊雕經籍，各地方官府，上自司庫州軍，下至縣學書院，皆以傳刻古籍為務。私家刻書亦盛，四川眉山、浙江杭州、福建建陽三地的書坊林立，成為宋代出版業的中心，遠在高麗且曾派人委託福建書坊雕刻書版，以海舶載回本國印刷的。宋代刻書除了用棗梨版以外，次焉者則用榕樹木。印書上者用桑楮樹皮造的紙，厚實耐久。次者用麻紙，雖稍薄，也具有韌性。最下者用竹紙，久後較易脆裂。書刻的字體，因多請書家手寫上版，故書法精美。杭州刻書多歐陽詢體字；四川福建刻書多在顏柳體之間，南宋以後，間雜有宋徽宗的瘦金體。在版式方面，版心多為白口，其上方的右側或左側，往往刻有刻工私記本版的大小字數，下方則有刻工的簽名。版心中間部分或僅上部有一魚尾，或上下各有一魚尾，其間則刻書名、卷數、及葉數。南宋以後，開始有在版心上下的正中留一細黑線，即所謂的「小黑口」，原來的作用殆同魚尾，以便折紙之用。後來又偶有「大黑口」出現，即版心的上下方全部為墨印。然大小黑口多私家坊刻採用，官刻書多用白口。此版式為元代所沿襲，明初則多用大黑口，嘉靖以後又回復到採用白口，不過不記字數及刻工，而將書名刻在版心的上方，中間部分

僅刻卷葉數，與宋版略有不同，清代的版式，則又沿自明代者。

宋朝的北方，遼金兩國，雖然也雕印書籍，但遠不如宋朝的興盛及精美。遼國對於書禁甚嚴，有將書傳入中國的，罪至死刑，故對於遼國圖書出版情形，所知甚少。金國的出版業以平陽為中心，只是他們多以擄掠自宋朝國子監的書版重印，官私自刻的不多。蒙古統一南北，仍能繼承宋金的出版事業，只是四川在蒙古軍攻宋時，經過戰火的洗禮，將出版業的基礎摧殘殆盡。故入元以後，四川出版的書甚罕，而以建陽、杭州兩地為盛，山西平陽次之。這時在印刷技術方面又有新的發展，那就是用兩種顏色印書方法的發明。

套印圖書的萌芽與發展　宋代的出版雖盛，但出版的圖書大都用單色印刷，以墨印為主，也許可能有用朱色或藍色印刷的。用兩種顏色配合刷印一部圖書，始於什麼時候？創始於何人？尚無可考。現在存世的用兩種顏色合印最早的書，是元至正初年（一三四一）中興路（今湖北江陵）資福寺所印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注。為經摺裝，經文大字，印以丹朱，元釋思聰的注釋作雙行小字，印以墨色。燦爛醒目，益增加了書的美觀。這部書，從它印刷的情形來察考，是用一塊版分兩次印成的。印朱色時將注文蓋貼，印墨時則將經文蓋貼，這就是明代所謂的「雙印」，尚不是後代的「套版印刷」。從這部書印刷整齊精美的情形來看，絕不是萌芽期試驗的印品，必經過若干的實驗後，始能達到此水準。用幾種顏色印書，主要是取其醒目，美觀尚在其次。譬如有注釋

的書、有評點的書，假如把正文及注釋或評點分別用不同的顏色印成，即可使讀者一目瞭然。明末套印書的盛行，即在評點詩文的書暢銷的時候。在北宋時，已有朱墨實錄流傳民間的記載，不過那是寫本書。元初程端禮著的讀書分年日程曾談到朱墨點抹法。宋元之際，曾風行一陣子劉辰翁評史及評點詩文的著作，其盛況恐不下於明末的公安竟陵派所評點的書。元至元寶鈔即用墨加鈐朱印而成，以其法雙印圖書，是相當自然的事。中國用朱墨二色印書，很可能在十三世紀末期元代初年已有了。古代用的朱為丹朱，較為貴重。用兩色印刷，也比較費工。所以明萬曆初年的一位學者胡應麟曾說：「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這大概是古代朱墨印本流傳稀少的主要原因。

用朱墨兩色印書到了明代萬曆末年（十七世紀初）才大為盛行，有吳興人閔齊伋專門研究用幾種不同顏色印書的方法。他初期的印本，可能仍是仿元代的舊法，雕一塊版，而分別顏色印兩次。但雙印法有一個缺點，即不能印比較複雜的書。如評點在字裏行間與正文參差不齊，用貼蓋法則相當的費事且效果難佳，至於有幾家的評點更無法印刷了。於是閔氏設計發明了套版印書法，如印二色的，分別將印朱色及印墨色的文字部分各雕刻一塊版，文字嵌合起來就是一版，故名「套版」。用這樣的分版印書法，比較複雜的書皆可以印成，比元代的雙印又進了一步。更推衍無論印三色、四色、五色，只要分離三塊、四塊、五塊版就可以了。閔氏的另一項貢獻，是他更

到了代用的朱色印料。丹朱顏色鮮艷，能歷久不變，固然甚佳，但其價過昂，無法大量用於印書。閔氏印書的朱色，就今傳本來看，因歷時久，色已發暗，顯非丹朱。此朱色顏料究以何物調製而成，文獻乏載，尚不能詳。閔氏套印的書，據近人統計，存世的已不下一百三十二種，且尚有疏漏。他所印的，自二色至五色，朱黛繽紛，光采炫爛，甚為人所喜愛，故當時人多以套版印刷術發明的榮譽歸之於他，而鮮有知道他從元代的雙印改進而來的。與他同時也擅套印法的，尚有凌濛初，也是吳興人。

因為有了套版印書的技術基礎，於是更進一步，到崇禎初年把繪畫藝術融於套印術中而有彩色印的圖繪書出版。祖籍海陽的胡正言在南京開設了一家書坊名十竹齋，於崇禎初年先後出版了用彩色套印的十竹齋箋譜及畫譜兩部圖繪的書，把中國的彩筆水墨寫生用雕版印刷表現出來。胡氏早年學過造紙、製墨、雕鐫印章、繪畫，是位藝術的通才。箋譜及畫譜兩部書，從繪畫、雕版，直到印刷，都是胡氏一手製作的。尤以畫譜是他後期成熟的作品，凡墨色的濃淡，顏色的淺深，具表露無遺，直使人把它視作寫生册，而無印刷的感覺，真可以稱得上曠絕古今。至於這兩部版畫書是如何印成的，據近代人研究後推測，是用的「餖版」套印法。所謂「餖版」，即把畫中不同的顏色，分別其部位，各雕為一塊版，亦即將閔氏的套版法擴大，雕成更多的版。用一張紙

經過不同的版，不同的顏色印刷，而成為一個完整的彩色畫面。至於這樣推測是不是可信，尚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附圖圖書的盛行　書中附刻的插圖，前代或名圖繪，或稱繡像、出相，近代名為版畫的，不但能增加書的藝術氣氛，加深讀者的印象，而且能輔助文字的不足，把難以言傳的意念，藉繪畫的技巧而表達出來。任何民族的文化發展史，都是先有圖畫，後有文字。即是印刷術的發明，也是先印圖像，而後才及於文字，中西皆是一樣。現在存世的唐五代印本，也大都是以圖像為主。入宋以後，雖雕版印書的事甚為普遍，而附刻圖繪的比較少，就是少數附有圖像的，繪雕的近乎古拙。蓋大抵出於工匠的臨摹，而不是專擅的名手。這種情形一直到明隆慶萬曆以後始大改其觀。宋代的出版業，以浙、蜀、閩三地為中心。四川經過宋末的兵燹而趨於衰微，元末出版最盛的福建麻沙書坊又毀於戰亂，明弘治十二年福建另一出版中心建陽書肆復遭大火燒毀，故閩刻亦衰。明中葉以後，蘇州代之而起，書業多集聚於此。萬曆以後，吳興、南京的書坊又蠭起，與蘇、杭並盛。太湖流域素為江南富庶之區，而三吳鍾山水之秀，景色宜人，自明初杜瓊、沈周以後，名畫家輩出，影響所及，雖販夫走卒，也知道愛好藝術。故書坊得投其所好，為了爭奇鬭勝，多以重金延聘雕繪的名手，精印插圖作為號召。萬曆崇禎間發行最廣的書如章回小說、人物傳記、

譜錄、詩集、劇曲、以至於地理書，其中莫不附刻插圖。當時若干較著名的畫家如丁雲鵬、黃鳳池等多曾為之手繪上版。因係出於名手，遂捨臨摹而自行造意。插圖的類別很多，有山水人物，有翎毛走獸花卉樹木山石，也有仿古的筆意，範圍之廣，無所不包。其造意的高雅，人物的生動，線條的勻稱，雕鏤的精巧，促使版畫成為一種獨特的藝術。當時的圖版，係用木理最細緻的黃楊木雕鐫，故雖細如毫髮，無不畢呈。清代初年尚能承襲其盛，雍乾以後，因樸學興起，出版者以翻雕宋元本為主，遂使此項藝術，衰微不振。

書裝的再改進　興於唐末五代而盛行於宋元的胡蝶裝，因其裝置係靠版心部份粘連書背，因然其四周為空白，置架時橫放而豎立，不致磨損文字部份。但時間長久，書葉終容易脫落。明代初年，又從而改進作包背裝。包背裝法是將書葉正摺，文字在外，在書腦的部份，用紙捻或線釘牢，其外用封皮以漿糊粘連包裹脊背，其外形則與胡蝶裝同。此種裝釘法因書名及卷葉數在書口，甚便於查檢，故邊欄左上角不再如宋元時附刻書耳。包背裝大抵始於明永樂初年，存世的永樂大典即作包背裝。到了明代中葉，線裝興起，其與包背裝不同處，是封面封底分開，不包裹脊背，並用線釘在封皮之外，如此則封皮不致脫落。線裝式，迄於今而未替，是中國流行最久的一種裝訂法。

清代的出版概況　清代的學風，因懲於明末的空疎，而欲規復漢學，故校勘、訓詁之學大盛，輯佚的風氣興起。影響於出版的，是明末以至清初盛極一時，聚集於蘇杭南京各地的書坊，康熙以後趨於凋零，代之而起的是私家刻書轉盛。所刻的書重實學、重版本。私家刻書，或慎摹宋元舊本，或廣羅罕傳的秘笈，往往彙編叢書，精校慎刻。明末風行的演義、傳奇雜劇、以及公安竟陵學派評點詩文一類的書，很少有人刊雕了。因爲樸學風氣的瀰漫，影響及於印刷技術也停滯不前。在雕版印刷方面，雖然也有若干繪雕頗精的插圖，也有用套版法並選用上好的開化紙餞色套印的書。在活字版方面，雖然也有堪稱爲煌煌鉅製的，如銅活字版古今圖書集成、木活字聚珍版叢書。但出版圖繪書、套版書、活字版，終沒有像明代一樣的盛況出現。至於彩色套印的版畫書，清代固然也出版有芥子園畫譜，但精絕則遠遜於十竹齋了。故清代僅承襲了前代的技藝，而沒有什麼新的貢獻。等到迅速且成本低的西洋印刷術傳到中國後，而使中國的印刷術遭受淘汰。

歷代的寫本圖書　自印刷術發明並推廣以後，雖說取代了用手抄寫，但寫本圖書在中國仍不斷的產生，而在前代的藏書家收藏中仍佔著重要的份量。如明代初年雖緊接著宋元雕印之盛，其文淵閣的藏書，據明史藝文志稱，鈔本佔十分之七，刻本佔十分之三，鈔本爲刻本一倍有餘。何以會有這樣的情形？因爲一般出版的多是需要者較多的書，一些不爲當代所重視或較專門的著作

，仍賴輾轉傳抄而使它流傳下來。中國的寫本書大別可分為三類：一類為稿本，包括著者或編者的手稿或清稿本。這些著作無論曾否刊版印行，前賢的手澤仍為後人所珍視保存下來。還有若干書，在編纂後，因卷帙過鉅，未能刊行，只有寫本流傳。最著名的如明成祖勅修的永樂大典，明代曾寫正副兩本，每部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及清乾隆時編的四庫全書，收了三千四百多種書，當時一共抄寫了七部，分貯京畿、瀋陽、及江南各地，每部抄成三萬六千餘冊。第二類是稀見的古籍。這些古籍前代或曾出版過，而後代未再翻刻，讀書的人為了研究的需要，既無法覓致舊本，只有借本來傳抄了。尚有中國的藏書家為了保存文獻而不墜，凡罕見的孤本秘笈，無不設法羅致或錄副以存。這就是清代洪亮吉所論藏書家中的收藏家，「專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如南宋中期的禮部尚書尤袤是一個喜歡讀書的藏書家，以抄寫古籍定為日課，他家中的子弟及女兒也都喜歡抄書。明末的藏書家祁承㸁，他曾與朋友組織了一個「搜集會」，每月集會一次，各把所獲得的秘笈公開互相傳抄。假若至期不能獲得秘本或隱匿不公開的，訂有嚴厲的罰則。故明清兩代的藏書家，大都專印有抄書紙以備傳抄之用，前代的寫本書以這一類為最多。雖然某些書後代或已刊印了，但這些舊抄本仍有校勘的價值。第三類是影寫本。藏書家遇有宋元刻本而不能購得時，往往請名家照原本摹寫以藏，前代影寫本最著名的有所

謂「毛鈔」，即明末清初常熟毛晉汲古閣家的寫本，繕寫精美，其價值僅下原本一等。其次如蘇州黃丕烈士禮居、常熟張蓉鏡小嫏嬛福地的影寫宋元刻本也都為後來的藏書家所寶重。是以寫本圖書在中國圖書史上，不僅不因印刷的發明和普及而減少它的價值，反而佔有更重要的地位。

四、西洋印刷術影響時代

中國的造紙術及印刷術在發明以後，相繼地東向直接傳到高麗、日本，西向經過漫長的歷程輾轉的傳到歐洲。而在本土也不斷的演進發展，甚至於與藝術融合為一體，有過輝煌燦爛的時期。但在方法上始終脫不了古人的窠臼，脫不了手工藝的型式，致不能適應近代教育發達、知識普及的潮流。而西洋的造紙術，印刷術在工業革命以後，走向機械化，利用機械的動力，而能迅速產製價廉的圖書紙張。復因物理化學的不斷進步，使得印刷的方法日新月異。這些新的技術，從清末以來陸續的傳來中國，逐漸替代了中國固有的雕版及活字術。而圖書的裝訂也慢慢地廢棄原來的線裝而改為西式的平裝及精裝。

西洋印刷術最先傳到中國的是鉛字排印法。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有英國倫敦佈道會的馬禮遜（Robert Marrison）來廣州傳教，秘密的雕刻中文字模，欲鑄鉛活字以印中文譯本聖經

及華英字典等書。但事為地方官府獲悉，刻字模工人恐禍及身，而將已刻成的字模付之一炬，雖然未能完成，但這是中文用西法字模之始。後來馬氏在馬六甲設立印刷所繼續雕鑄鉛字，於一八一九年（嘉慶二十四年）印成第一部新舊約中文本聖經，是為西洋鉛活字排印中國文字的首創。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有廣東人某君仿西法鑄了一批大小二種的金屬活字共十五萬餘枚，但專印文件，而非用以印書。中國人澆鑄鉛字排印書籍，始於同治年間上海申報館等所附設的書局。清內府採用這種新式的鉛鑄活字排印書則始於光緒二十二年，由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奉勅印行當時編纂完成的七省方略。此後用鉛字印書隨着西洋新的技術不斷的傳來，及中國在排字技術方面不斷的改進，而逐漸推廣，成為印書的主要方法。

其次傳來中國的是石印法，用特製的墨將文字寫在特製的紙上，再翻印到石版上以供印刷。此法是奧國人施納飛爾特（Alois Senefelder）在一七九六年發明。中國最先採用此法印書的，是上海徐家滙土山灣印刷所，所印的率為天主教宣傳品。稍後、有上海點石齋石印書局，開始石印中國書聖諭詳解、康熙字典等。清內府石印書籍，則始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由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大臣、戶部侍郎張蔭桓，奏准石印古今圖書集成一百部。其書原本一萬卷、目錄四十卷，石印本並增入考證二十卷。此書係由上海同文書局承印，費時四年。此後上海開設書

局專用石印法印書的風起雲湧，曾盛極一時。自入民國後，西洋各種新的印書術如珂羅版、影寫版、照相銅鋅版及各種平凹等相繼傳來中國後，石印法遂廢。

自西洋的鉛活字版、石印法傳來中國後，雖曾予中國舊式雕版印刷以莫大的威脅，但尚未能全部取代。推其原因，殆其時西法印本究不如雕版印刷之精美，而中國寫雕的技工尚多有；且西洋欲印製迅速，須有動力，而中國在民初以前電力尚未普遍。故好古之士或偏僻地區仍不乏用雕版印書者，大抵在四十年代以後始全廢。至於裝訂，西式的平裝及精裝，亦利用機器以代手工，生產迅速，逐漸取代線裝。現代僅有影印古籍珍本，為了典雅，尚偶有採用舊式線裝者。

中國圖書的歷史，至少已有三千三百五十年了。曾最先發明紙來寫書，用雕版印刷迄今已近一千三百年，用活字排印書也有九百多年，曾有一頁光輝的過去，影響並遍及於全世界，但很可惜的是後人在印刷裝訂方面只能作技術上的改良，而在方法上始終未能跳出前人的圈子，致無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終遭到西洋圖書印刷及裝訂的取代。但中國文字也是一種藝術，現代圖書的字模是沿襲明清以來流行的匠體字，呆滯不靈，固遠不逮宋元時代圖書的優美，且不及明清時朝鮮的活字版書。如何將中國固有藝術融合新式印刷中，而產製更精美的圖書，使讀者不僅能於中吸收知識，且能賞心悅目，則是現代的印刷出版尚有待努力的。